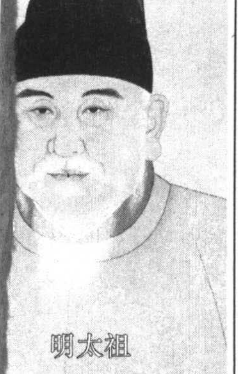

正说明朝三百年
一个神秘莫测的朝代 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本书为您揭开明朝三百年的重重迷雾
孙景峰 李金玉 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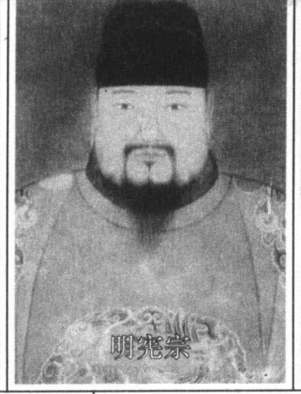
一睹历史之真相
澄清戏说之盲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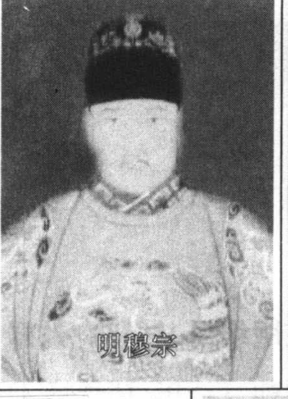

ISBN 7-5078-2489-6
9 787507 824896 >

ISBN7-5078-2489-6/K·90
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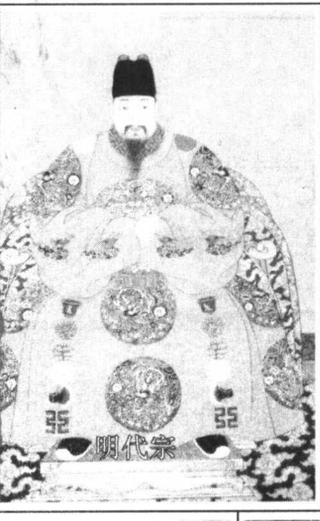




正说明朝三百年



孙景峰　李金玉　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说明朝三百年/孙景峰，李金玉等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6

ISBN 7-5078-2489-6

Ⅰ．正…　Ⅱ．①孙…②李…　Ⅲ．中国-古代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534 号

正说明朝三百年

著　　者	孙景峰　李金玉等
责任编辑	唐松波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7.5
印　　数	8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6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489-6／K·90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明代的帝王

南明诸王

明代的后妃

明代的宗室

明代的城市、宫苑和陵园

明代的内阁

明代的宦官

名臣名将

外交与边防

政治斗争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思想文化

明朝的灭亡

明代的帝王

明代的皇帝制度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关于明朝的起迄，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在明朝灭亡后，其残余力量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先后在南方各地建立起数个政权，史称南明，共21年。严格地说，南明政权已经算不上是中央政权。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明朝的来龙去脉，我们把南明政权21年的历史也包括在内，这样加上明朝原有的277年历史，整个明朝共有将近300年的时间。

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历史上的其他封建专制王朝一样实行皇帝制度。明朝从建立至灭亡共有16帝，依次为：太祖洪武帝朱元璋（年号"洪武"，在位31年）、建文帝朱允炆（年号"建文"，在位4年）、成祖永乐帝朱棣（年号"永乐"，在位22年）、仁宗洪熙帝朱高炽（年号"洪熙"，在位8个月）、宣宗宣德帝朱瞻基（年号"宣德"，在位10年）、英宗正统帝朱祁镇（年号"正统""天顺"，在位22年）、代宗景帝朱祁钰（年号"景泰"，在位7年）、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年号"成化"，在位23年）、孝宗弘治帝朱祐樘（年号"弘治"，在位18年）、武宗正德帝朱厚照（年号"正德"，在位16年）、世宗嘉靖帝朱厚熜（年号"嘉靖"，在位45年）、穆宗隆庆帝朱载垕（年号"隆庆"，在位6年）、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48年）、光宗泰昌帝朱常洛（年号"泰昌"，在位1月）、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年号"天启"，在位7年）、思宗崇祯帝朱由检（年号"崇祯"，在位17年）；南明政权前后共有5帝，依次为：南明福王弘光帝朱由崧（年号"弘光"，在位2年）、南明唐王隆武帝朱聿键（年号"隆武"，在位1年）、南明鲁王监国朱以海（在位1年）、南明嗣唐王绍武帝朱聿𨮁（年号"绍武"，在位41天）、南明桂王永历帝朱由榔（年号"永历"，在位16年）。



大明皇帝之玺

明朝与历史上的其他封建专制王朝一样，实行皇位继承的世袭制度，但有一定程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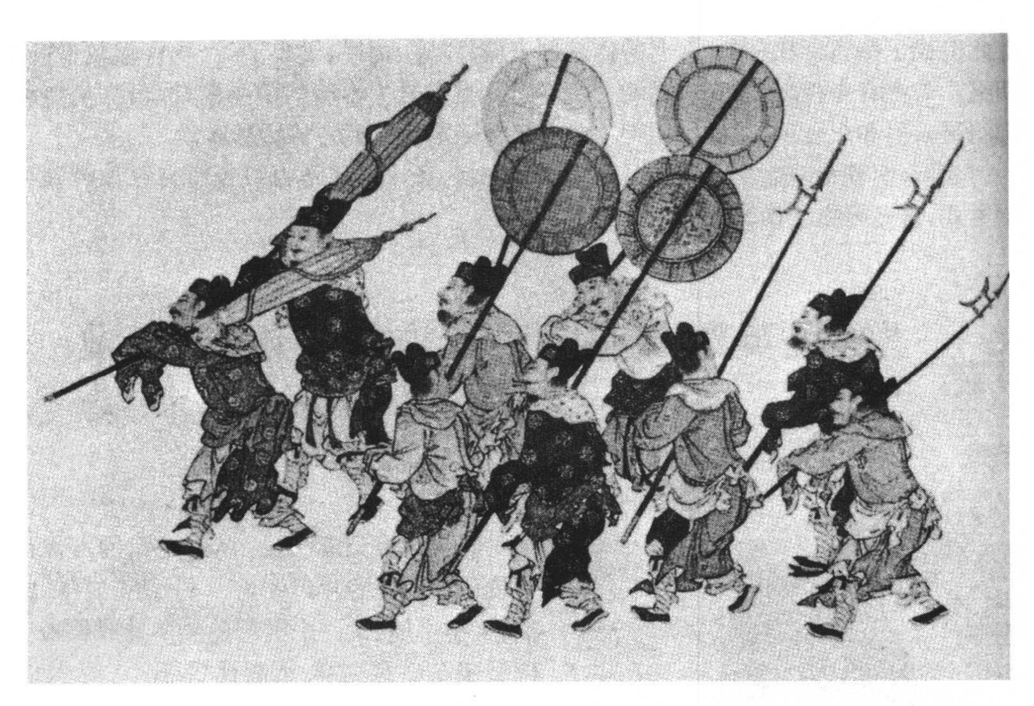
调整。在建立大明封建王朝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朝由权臣决定皇室事务、专擅国政对本身统治造成的危害，于洪武元年(1368年)宣布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企图奠定稳定、巩固的朱氏世袭统治。在屠戮功臣、改组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他又大封诸子为王，予以厚禄，尤其是对年长诸子，如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人均授以兵权，分别派遣他们治兵于腹里或边塞要地，任命他们率领大军出发征讨或负责军屯戍边等。朱元璋的意图是“立太子为天下本”，“用宗室以为天子屏藩”，由自己的儿子们掌握军事大权，以之作为朝廷的支柱，既可不虞反侧，又可镇压一切异己力量。

事实证明，在立太子定储位的同时，大力培植和加强诸王的军事政治力量，是一项自相矛盾的错误政策。由朱元璋亲自确立的明代立储、封王全部归朱氏皇族宗室的做法，不但在财政和民政上成为朝廷的大累赘，而且实际上对皇位继承和行使皇权造成了极大威胁，一度成为全国性大动乱的源头。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按照传统的做法，册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法定的继承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上台之后集中全力废黜诸王，实行坚决的“削藩”政策，但是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南下，攻陷南京。应该说朱元璋尸骨未寒，其亲自确立的立储和封王的办法就已经完全破产。他的子孙们兵戎相见，交相声讨厮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对皇位的争夺。朱棣在消灭建文帝势力登上帝位后，仍然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封嫡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立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孙，亦即为第二位继承人，同时也同样实行“削藩”政策。但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几个儿子也为夺取皇位继承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朱棣一度甚至受谗轻信，差一点就要将朱高炽废黜并杀掉。朱高炽虽然最后勉强继位，但在位仅八个月即去世，其子朱瞻基顺序继承，但开始时地位并不稳固，汉王朱高煦以皇叔之尊举兵反叛，欲重演“靖难”之事，后被戡平。

这些事实说明，在明初五帝统治的六七十年间，皇族近支中争夺皇位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因而使政局一再动荡。但是明代皇族争夺帝位的斗争并未到此止步。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也先俘虏北去，由其弟朱祁钰监国，随后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是为景帝。朱祁钰一登帝位，便极力要完全夺得帝统，首先便将朱祁镇的长子、原已被册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废黜，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他还一再阻止也先送回朱祁镇，怕他回来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其后，朱祁镇终于被送回北京，朱祁钰竟将他深锁在“南宫”之内，不许外出，不许臣下朝觐，不许过问朝政。而朱祁镇又在朱祁钰病危时，乘机夺回帝位，宣布复辟，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在此一立一废一复辟之中，这些皇室子孙为争夺最高统治权，丝毫不讲什么亲情之谊，也从来不以什么礼教宗法伦常为念。

另外，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先后有过安化王朱寘鐇之反、宁王朱宸濠之反，都是企图夺位。朱厚照无子，死后议立其堂弟朱厚熜为继位皇帝，是为明世宗。朱厚熜一登位，便发动起一场所谓“议大礼”之争，要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争上一个皇帝的谥号，为此不惜酿成重大的政治争论，甚至兴起大狱。因此可以说，明朝如同历史上其他封建专制王朝一样，并未有效地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制定出来的宗藩制度，不但未能起到屏卫皇帝统治的作用，而且还往往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瓦解，引起连续不断的动荡。



明代《出警图》，羽林军为皇帝护驾

不过，明朝皇帝制度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为保持和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明朝各个皇帝都极力提高君主大权，以君主作为权力主体，从制度上保证全国统治权力高度集中，而且表现得更为明确，规定和安排得更为周详具体，举凡官制、人事、行政区划、立法、司法、财政、民政、军事各方面的主要权力均由皇帝亲掌之并独掌之。例如，行政方面，要求绝对统帅和指挥自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的所有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彻底根据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等，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抗拒、违反或异议；制定和执行法律方面，明朝皇帝实际上拥有立法、执法、违法和废止法律的全权，而且将法律的镇压锋芒主要指向黎民百姓。明朝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等，都曾亲自参加制定或修改法律的工作，并亲自审理案件和掌握最终判决的权力；财政方面，明朝皇帝要求掌有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决定之权，明末的加派辽饷、练饷、剿饷等等，都是由皇帝决定，并强制执行的；军事方面，明朝皇帝不仅拥有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最高指挥权，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具有独异特点的卫所兵制，就是将日常管理训练的军政和战时指挥作战的军令分开，以防止任何人拥兵自重，造成割据叛乱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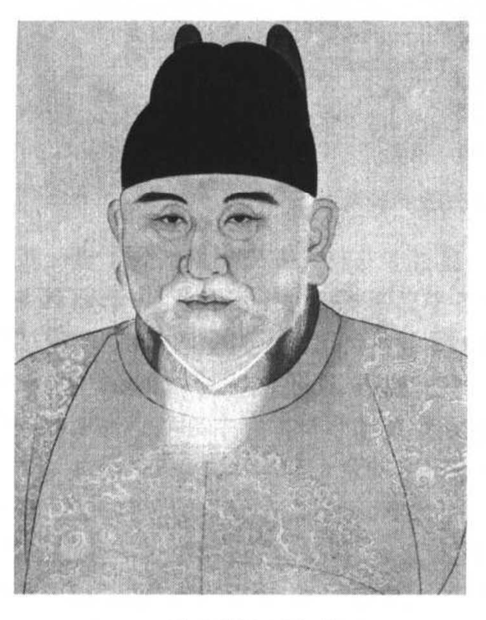
在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方面，明朝皇帝制度中还有两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明朝的宦官专权现象和特种镇压部门的设立。明朝皇帝虽然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但又害怕大臣将领和自己争权，害怕无法严密控制正规国家机关和职官的活动，不敢依靠他们，转而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并设立了庞大的宦官机关系统，即所谓 12 监 4 司 8 局等 24 个衙门。这 24 个衙门均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等，最多时曾统领 10 多万宦官，

由此造成了宦官专权现象，著名的宦官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均曾擅权专断，败坏朝纲。与宦官专权现象相应，明朝皇帝为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设立了特种镇压部门锦衣卫和东西厂，形成了明朝历史上极为专制而又独特的特务政治。

当然，明朝皇帝制度不仅仅是上述这些内容，每一位皇帝也总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统治方式，这些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平民英雄”起乱世 “血腥皇帝”创伟业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像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比较贤明的封建帝王，一生勤奋好学，励精图治，百折不挠，从一个贫苦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代开国君主。后世对朱元璋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平民英雄”，也有人说他是“血腥皇帝”。但无论如何，他的传奇身世与创业史，总是令人好奇，引人深思。

贫苦身世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东乡一个佃农家庭，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故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死亡。灾难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一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

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只好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但寺里也没有更多的余粮，他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一路流浪乞讨，云游四方。

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三年艰难困苦的流浪乞讨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铸造了他性格中残忍、猜忌的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朱元璋回乡以后，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

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很快影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郭子兴等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占据了濠州城。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难以平静。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由儿时的伙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四岁。

乱世成英雄 朱元璋入伍后，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由此朱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此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逐渐掌握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为拥兵十万的大元帅，在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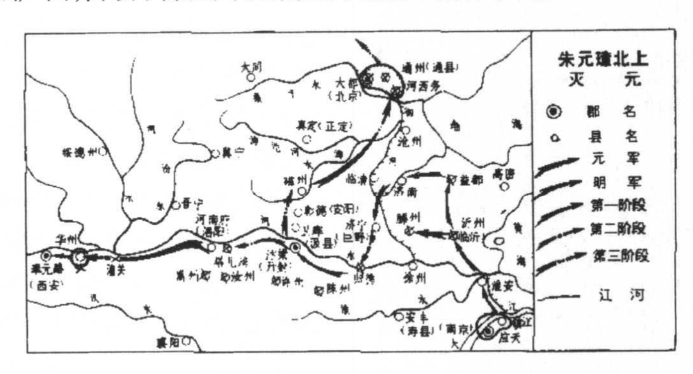


郭子兴像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同时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李善长、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析时势，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攻占集庆，并将之改名为应天府，作为他发展的基地，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儒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以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集中兵力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然后掉头东向，擒杀张士诚，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占领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不失时机地北伐。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统治中国近一百年的元朝遂灭亡。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四十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南京为首都。经过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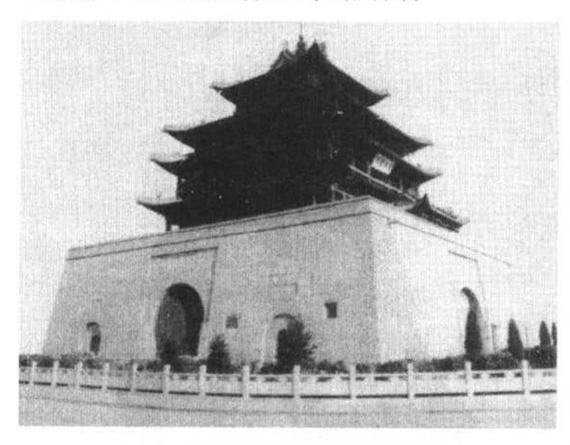


朱元璋北上灭元图

强化皇权 在后人眼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性格复杂、经历传奇的历史人物。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正是这样

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贤明与暴虐共处。这一点在他的统治体制尤其是强权政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朱元璋出身平民，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认为元朝灭亡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因此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以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建于明洪武七年的光岳楼

明朝初年，政治体制基本沿用汉唐和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废行中书省、设使司。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废丞相、升六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借口胡惟庸谋反，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他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訓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

洪武刻本《皇明祖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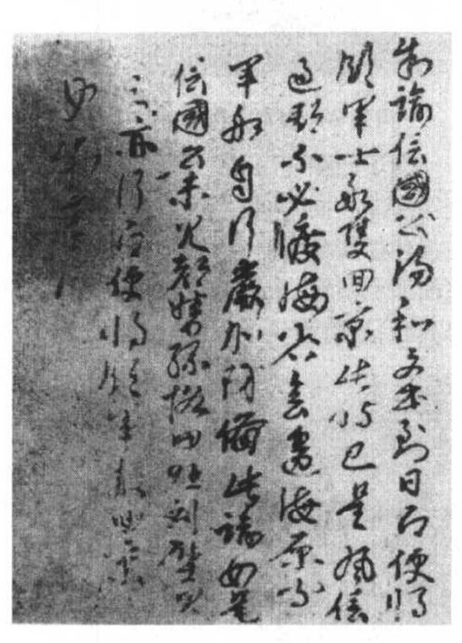
设立特务组织。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大臣和百姓的监视，特别设立了隶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

朱元璋的这些变革和调整，是对一千多年来我国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为此，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正是通过这些变革和调整，朱元璋使专制主义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

滥杀功臣　与强化君权相应的是朱元璋屡兴大狱，滥杀功臣，以至于被后人称为“血腥皇帝”、“千古杀手”。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

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

李善长比朱元璋大了将近20岁，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朱元璋起兵时，李善长是幕府书记，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为相国，朱元璋称帝时，李善长为丞相，并被封为韩国公。但朱元璋借“胡惟庸案”把李善长全家以及亲戚七十多人全部杀掉了。徐达是朱元璋的同乡，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徐达被列为开国功臣之一，任右丞相，封魏国公。徐达本人做事十分谨慎小心，从不居功自傲。但朱元璋也没有放过徐达。徐达背上生了毒疮，最忌吃蒸鹅。可是，朱元璋偏偏在他病重时特赐一只蒸鹅。徐达流着眼泪，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下，不几天就去世了。蓝玉是朱元璋军中仅次于徐达的重要将领，战功卓著。有人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不失时机地把蓝玉下狱审讯，不久就将之诛杀了。


朱元璋给汤和的手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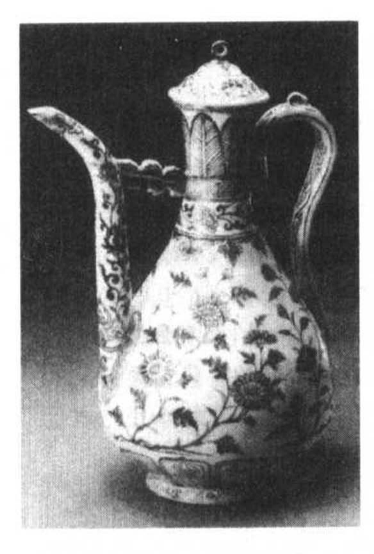
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也同样不会放过。朱元璋的义子李文忠，南征北战，立过大功，而且礼贤下士，身边聚集了许多儒生。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竟把李文忠毒死。

唯一得以善终的功臣是汤和。他和朱元璋是同村的放牛伙伴，与朱元璋一起长大，又随朱元璋打天下。徐达一死，朱元璋想要解除宿将的兵权，又不便直说。汤和看透了他的心思，主动告老还乡。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在老家凤阳为他修建宅院，赏赐特别优厚。从汤和的侥幸善终，人们也许能透视出朱元璋的真实用心。

严惩贪官污吏 明朝初年，许多官员蹈袭元朝之弊，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这使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联想起元末吏治腐败激起民变的教训，深为警惕和忧虑，他曾多次告诫群臣：“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因此，朱元璋在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利用重典酷刑打击贪官污吏。明初，朱元璋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颁行了量刑较轻的洪武七年律。不久，朝廷内的政治、经济斗争日趋激化，相继发生“空印案”、“胡党案”和“郭桓案”，农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时发生。朱元璋认为这是“乱世重现”，决定实行重典政策。他下令对“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并亲自汇集一批法外加刑的案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他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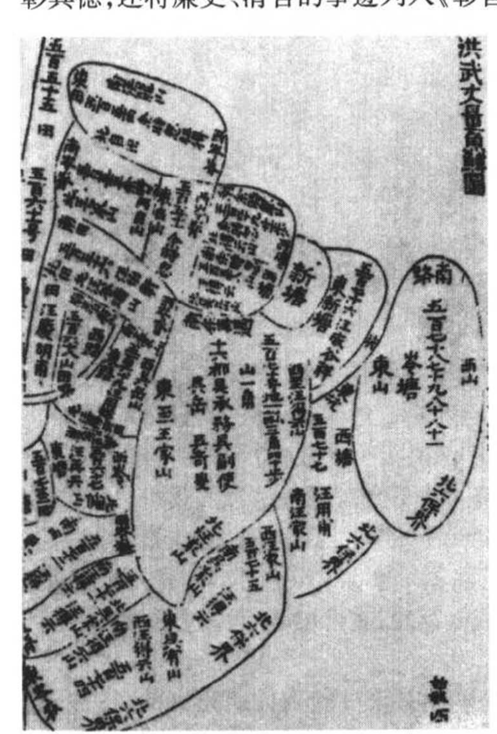
由于惩处过于严酷，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竟然很少有官员做到任期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就遭到贬黜或被杀头。因杀官太多，以至有些地方衙门无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还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洪武年间制青花执壶

当然，利用重典酷刑打击贪官污吏只是朱元璋反腐惩贪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从严律己、罚不避亲、加强教育、弘扬清正、倡导廉政则是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又一类重要措施。古人云：正人先正己。朱元璋抓反腐败首先从自身抓起。击败陈友谅后，其宫内有张镂金床，有人劝他享用，他却将镂金床砸毁，说此床与昏君孟昶的七宝溺器一样，用则丧志。立朝之后，朱元璋就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又下令儒士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辑成书，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他也曾亲自审讯、处置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不仅杀曾立过大功的贪官，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杀。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立有显赫战功，官拜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沉湎声色，骄奢荒淫，朱元璋先将其免职，后又将他杀掉。驸马都尉欧阳伦收受贿赂，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欧阳伦处死。

为了严束功臣，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申诫公侯铁榜，对功臣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处罚法律。同时，他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树立典型。陶垕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治赃吏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表彰他。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朱元璋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



洪武丈量鱼鳞图

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贪污贿赂打击最激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尽管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惨痛的教训，但也收到了较大的成效，起到了“整肃一代的作用”。经过长期的严酷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员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朝初期涌现出一批像陶安、陶垕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政治清明，吏治廉正，一度深得民众的拥护，明初清廉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朝仁宗宣宗年间，达七八十年之久。

亲民治政　朱元璋本人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在治国期间，他经常深入民间，亲民治政，做了很多有益于黎民百姓的好事。

作为一位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于农民没有土地耕种的痛苦是极为清楚的。因此，在位期间，他做了一件大事：清丈全国田地，编制土地赋役管理档案——鱼鳞图册，让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有了可以附着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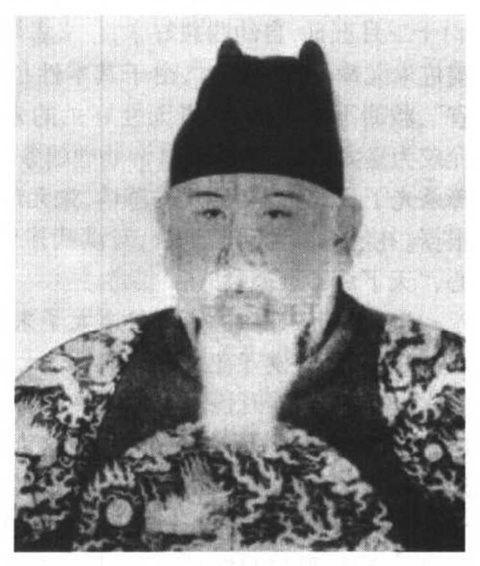
当上皇帝后不久，朱元璋发现许多富民隐瞒田产、逃避徭役，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土地赋役制度改革，在继承宋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启动了全国范围的鱼鳞图册编造工程。朱元璋多次派人在全国范围内核查田地，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全面完成了鱼鳞图册的编造工作，基本上掌握了全国的户口和耕地情况，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编管起来，使民附着于土地，为其纳粮当差。

鱼鳞图册是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管理的产物，也是从我国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管理模式中摸索出来的一种较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明代的赋役制度从赋役并行逐渐走向租税制，从过去税人转向税物，从实物征收转向货币征收，其转折点就是鱼鳞图册的编造。这是朱元璋的一大革新，被不少后世史学家所称赞。

谈到朱元璋亲民治政，不能不提我国各族人民的传统习俗——春联。据说春联的发展也有朱元璋的一份功劳。据《簪云楼杂记》一书载：有一年准备过年之时，朱元璋下旨各家各户都应贴上一副春联，以示庆贺。除夕前他微服上街视察，看到家家户户果然都贴上春联，有的可称佳作，心中甚喜。但他后来发现有一户未贴，询问究竟，才知是个目不识丁的阉猪人家。为此朱元璋兴致来临，挥笔为之写下了一副春联，上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写完就吩咐户主贴在门上。

谁知朱元璋回来查看时，两扇门板仍是空无对联，很是纳闷，便又进去询问，那户主忙答道："您走后才知道是皇帝驾临，怎能让您的御笔亲书遭风吹雨打呢？这不，我家正挂在正堂屋焚香祝圣呢！"朱元璋一听笑逐颜开，马上命随从赏白银三十两。由于该联对仗工整，用词幽默奇巧，又道出了阉猪行业的特点，符合主人身份，所以历来被视为"名对儿"，影响甚大。

生活简朴的明太祖　朱元璋一生生活简朴，严于律己。皇宫没有画梁雕栋，也从不种植奇花异草，倒是在空闲之地皆种瓜豆，也花红果绿、郁郁葱葱的。每逢地方上遇特大灾害，朱元璋与皇家的人都要吃一餐麦饭和野菜，以表与民同甘共苦。据说他一日三餐十分简单，大多是一碗玉米粥，几个窝窝头或米饭，再加上一点辛辣荤菜，一般没有大鱼大肉，也从不上山珍海味。一直到年老身体不行时，这种简朴生活才稍有改变。



明太祖朱元璋像

一次，浙江金华府向他上供一袋香米，他觉得十分好吃，但怕扰民，仅吃一餐，剩下便如数退还，申斥不得再上供。但后来他念念不忘这顿香米饭，就叫人从金华弄来稻种，让内臣在皇家苑林开出十几亩水田，自己亲自动手春插秋收。这样，才算解决了馋香米饭的问题。

由于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就养成了吃苦的习惯，虽然后来坐上了皇位，但深知奢侈之风不可开，故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他一生谨言慎行，很少接近娱

乐歌舞，不看戏听曲，更无酣酒夜饮的习惯。唯一的嗜好就是下棋，以此调节过重的脑力劳动。他一般不款待群臣，也不设宴席，就是设宴席也极其简朴。据说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设宴款待开国元勋，每人席上也只有一碟炒猪肉、一碗炖山羊肉、几样蔬菜、一壶水酒而已。

壮志未酬失帝位　不知所终千古谜

——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1377～?)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年仅21岁的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故史称“建文帝”。四年后，朱允炆的亲四叔、燕王朱棣率兵攻入京城，情急之下，朱允炆一把火烧了皇宫，他仅有的四年帝王之旅遂告结束，可谓“壮志未酬”，其生死也成为千古之谜。尽管如此，朱允炆作为一个主张“仁义化民”、“仁德治国”且颇富人性的皇帝，仍然常为后人追记。



明惠帝朱允炆像

“仁明孝友”的建文帝　朱允炆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十二月五日，自幼聪慧好学，仁义孝顺。其父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惹得天性好杀的朱元璋很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复佐以宽大”。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光了，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朱允炆还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莫不颂德焉”。

朱允炆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有重病，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炆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朱允炆“居丧毁瘠”，不食数日，悲哀异常，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也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让我怎么办！”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炆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朱标死后，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十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炆就成为首选。然而朱元璋担

心朱允炆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朱允炆“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家所认同的。于是，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在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正式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天下。两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朱元璋最初不愿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朱允炆像他的父亲朱标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重，日后驾驭不住众臣会吃大亏。但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他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秀才朝廷” 朱允炆即位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文新政”。

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轻文的局面。朱允炆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了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年号“洪武”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朱允炆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朱允炆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等。由于朱允炆所依赖的大臣多为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朱允炆使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的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朱允炆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他殉难的原因。



南京贡院

朱允炆采纳这些谋士的建议，首先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严刑峻法。朱允炆即位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使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人数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朱允炆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对于佛道势力多占良田的现象加以限制。

另外，在吏制方面，朱允炆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

他在位的四年间，撤销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朝廷内，朱允炆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可以说，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充分体现了他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给百姓、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削藩失策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寺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他听。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吾获是谋无忧矣!”

朱允炆即位后，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他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经常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市)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允炆的削藩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

但朱允炆在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先削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橚等五王为庶人，引起了藩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朱棣加紧做出准备。当朱允炆决定向朱棣开刀时，为时已晚。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挥师南下，争夺帝位，史称“靖难之役”。



黄子澄像

朱允炆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尽管燕军气势汹汹，但鏖战三年，仅据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战争出现僵持局面。这时一些被朱允炆处罚过的不法宦官向朱棣透露了京师空虚的情报，并表示愿充当燕军内应。朱棣正确分析了形势，觉得只要朱允炆在一天，地方军队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南京、成为一国之君后，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于是朱棣改变了以往攻城夺地的战略，率军直捣南京。

建文四年(1402年)6月，燕军渡过长江，兵临城下。此时的建文朝廷已乱作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齐泰、黄子澄借募兵为由，离京奔广德、苏州。左都督徐增寿密谋私通朱棣作为内应，被朱允炆察知，亲手将他砍死。守卫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大将李景隆私自开门降燕，让燕军杀入城内。朱允炆闻报，流泪说道：“朕未曾薄待朱穗、李景隆等人，他们竟在紧要关头背叛于朕。”

忠于朱允炆的御史连楹假意投降朱棣，挨近朱棣马前行刺不成，被朱棣所杀。朱允炆听说后叹道：“如此忠臣，朕却不重用，这是朕的过错，悔之不及，朕还不如一死以殉社稷。”说完拔刀就要自杀，被左右死命拦住，无奈之下，只好下令纵火焚毁

皇宫。

朱棣杀入宫中，搜寻了三天，始终没有找到朱允炆，追问内侍，他们也不知朱允炆是死是活，只知道他下令纵火后就不见了踪影。

结局之谜 朱允炆事前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因削藩而失去帝位。但是，当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后，朱允炆的结局到底怎样，也就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朱允炆结束了朱元璋的严苛统治，并力行宽政，深受好评，因而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为人们所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朱允炆的下落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说法：

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太宗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朱允炆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眼看大势已去，他不得已下令焚宫，并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朱允炆的下落。宫内侍人都说朱允炆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作证明。燕王朱棣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孺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清代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认为燕军破城后，朱允炆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太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朱允炆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他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三人剃了头，换上了僧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朱允炆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朱允炆叩首称万岁。朱允炆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据此，朱允炆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南洋说。有传言说，燕军破城后，朱允炆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后来，朱棣担心朱允炆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探寻建文帝踪迹。据《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朱允炆结局之谜，民间仍有很多解释和传说，绝不止上面列出的几种。近年来，随着对朱允炆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料掌握的不断增多，相信他并未自焚而是削发为僧出亡或漂洋出海的人渐渐多起来，台湾地区有学者甚至出版了《明惠帝出亡考证》一书。当然，到底朱允炆的结局怎样，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文治武功名垂史册　篡弑屠戮任人评说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像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三位皇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就藩北平，40岁以“靖难”名义兴兵，四年后从他的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改年号为“永乐”，故历史上又称为永乐皇帝。朱棣性格颇像其父朱元璋，一生在位22年，其文治武功也不亚于朱元璋，是继朱元璋之后又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明朝皇帝。尽管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多疑嗜杀，好大喜功，因而是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位帝王。

少年壮志　明成祖朱棣出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正是元末群雄并起、互相征伐的战乱时期。出生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棣七周岁时，朱元璋才为其正式取名为棣。朱棣不仅名字起得晚，而且其生母是谁，居然也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

但据历代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应该不是马皇后。到底生母是谁，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橚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硕妃。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其实无论朱棣生母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朱元璋的亲儿子。

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然四野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除了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诵读儒家经典，还要随时接受朱元璋的训诫。当然，朱元璋也不希望他的儿子们成为文弱书生，就经常让他们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以健体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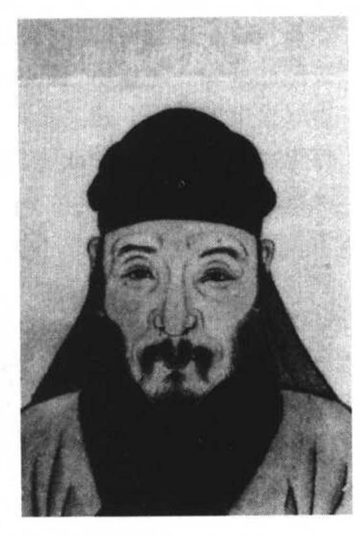
朱棣青少年时期不仅相貌英俊，而且才能出众，胸怀大志。据说皇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心中一直不高兴，曾在朱元璋面前说朱允炆如何如何无能。朱元璋为试朱允炆的才学，就让他作诗。朱允炆勉强作成一首，末两句是：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诗意衰飒，朱元璋心中很不高兴。又令其答对，出上联为：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一时对不上来，想了半天，冒出一句：雨打羊毛一片膻。调子比较低沉，毫无抱负和气度，朱元璋听后怒气隐现眉间。此时，朱棣上前一步，说愿意一试，续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朱棣的续联比起朱允炆的续联显得大有气魄，朱元璋不禁转怒为喜，连声称

赞:“对得好!”由此对朱棣大加宠爱,遂有更换皇储之念。

篡弑大屠杀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十年后,受命正式就藩北平。就藩北平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扶助下,朱棣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逐渐在众藩王中崭露头角,成为众藩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即位之初开始削藩,朱棣竭力反对。当矛头直指自己时,朱棣立即采取行动,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四年后,朱棣占领了南京,夺得大明江山。

朱棣攻取南京后,对那些不肯归附自己的大臣肆意屠戮。朱允炆削藩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先被砍去双手、双腿,然后方将其杀死,齐泰亦被“族诛”。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朱棣非常愤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后才将其杀死。礼部尚书陈迪和儿子等六人同日就刑,朱棣在行刑前将陈迪儿子的耳鼻割下煮熟让陈迪吃掉,并问味道如何。陈迪没有惧色,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鲜美无比”,坦然就刑。

这些事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最为惨烈。方孝孺是当时最有名的儒士,朱棣召他为其写即位诏,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以死相威胁,方孝孺不为所动,朱棣便问,“即使你不怕死,难道连你的九族也不顾了吗?”方孝孺大义凛然,朗声回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大怒,将其灭门十族。所谓十族,就是在九族之外将朋友、门生牵连在内。自古以来,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从来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一案,可谓空前绝后。



方孝孺像

这之后,朱棣又兴“瓜蔓抄”。所谓“瓜蔓抄”,含有顺藤摸瓜之意,即转相攀援,广加株连,滥杀无辜。此事始于朱允炆的御史大夫景清。景清在朱棣登基后并没有马上殉节,而是委身于朝班很长时间。一天,他身穿绯衣,暗藏利刃,准备行刺朱棣。朱棣见其神色异常,命人搜身,得到利刃。景清当庭辱骂朱棣,不屈而死。朱棣命人将他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并令人用铁刷子将景清的肉一层层刷下,还把骨头打碎。景清死后,其街坊邻居,甚至包括和景清稍有些关系的人都被杀。这种打击面比“诛十族”还要宽,因为“十族”还有明确的界限,而这种“瓜蔓抄”几乎没什么界限可言,所以无辜受牵连被杀者不计其数。

对建文朝遗臣的这场大屠杀,前后延续了十余年,无辜罹难者成千上万,难以尽数。其杀戮之惨,手段之恶,株连之广,甚至超过了异族入侵,确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朱棣因此遭到后人的严厉谴责。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毫无疑问,朱棣还是应该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综观其一生,文治武功不逊色于历朝君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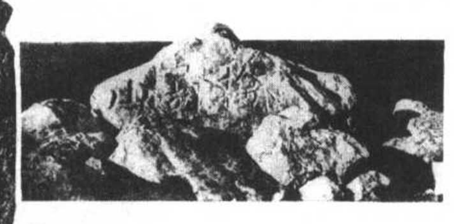
“马上天子” 朱棣自马上得天下,在血与火中建立起永乐政权,其一生起于兵,最后又死于行军途中,因此可谓马上天子,并由此树立赫赫威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时为燕王的朱棣第一次率军大规模出征,对元朝残余势力蒙古乃儿不花发起攻击,兵不血刃地大获全胜,得到朱元璋的嘉奖,遂命其节制北部边境兵马。这次出征,不仅使他的军事实力大大加强,而且也使他声名鹊起,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


永乐年间所造铜铳

靖难起兵后，朱棣率军进行了很多次战斗，初步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第一次战斗是在怀来击败建文帝的大将宋忠，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在真定大战中，朱棣又率军击退了建文帝派来的老将耿炳文，迫使建文帝用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在随后进行的郑村坝之战中，建文帝数十万军马又被朱棣击败。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却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息兵。此时朱棣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朱棣抓住战斗中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南军。白沟河之战是一场事关全局的决定性战役。这以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又率军在灵壁之战中击败南军。此战之后，朱棣再也没有遇到过大的战斗，顺利地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兵临南京城下，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明成祖第一次北征刻石

除了靖难之役中几次大的战事外，为了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朱棣曾率军进行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有：平定南方的安南与五次亲征漠北蒙古。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遣兵80万出征南方的安南(即交阯国，今越南北部)。永乐五年(1407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并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当时，对明王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而是北方的蒙古。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朱棣对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有赫赫战功。鞑靼部势力较强，朱棣有意联络瓦剌部，与之抗衡。


永乐年间所制青花梅瓶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命丘福率军10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亲率大军50万人出征。五月，在成吉思汗兴起的斡难河与本雅失里部遭遇，双方大战，最终本雅失里败逃。回师途中又遭遇阿鲁台部，激战数日，阿鲁台战败逃遁。朱棣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许多。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六月七日，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队。这场战斗十分惨



明成祖像

烈，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敌人才败走。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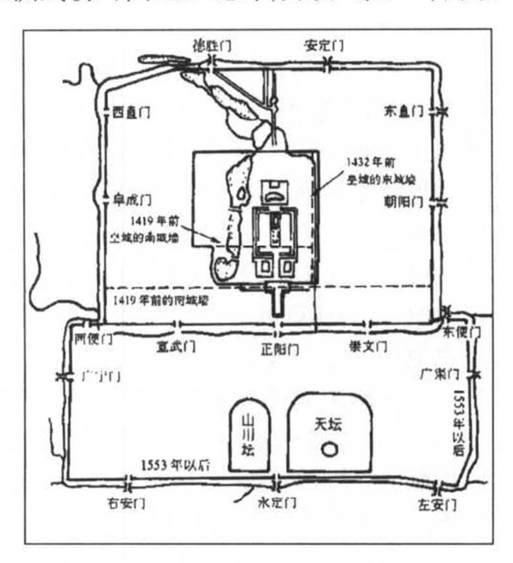
朱棣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于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宁，并消除元朝复辟势力的威胁。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朱棣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朱棣突然病逝，享年65岁。

文韬武略的明成祖 朱棣一生智谋过人，虽有武功，但更擅文治，以自己的文韬武略巩固和发展了大明政权，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可惜他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其"文韬武略"主要表现在：

果断削藩。虽然朱棣对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决定不满，但自己执政后也认为藩王势力太盛，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因此决定削藩。但朱棣不像朱允炆那样文弱与寡断，而是有威有谋，削藩有方：凭持重兵在手，将众藩王或迁南方，或废为庶人，分别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使诸王的帝国之梦难圆。

确立内阁体制，加强皇权。朱棣亲自从官僚中选拔人才充当自己的顾问，协助办理政事。任命解缙、胡广、黄淮、杨士奇、杨荣等人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同时，又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而最后的决断权属于皇帝。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在洪武朝"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由亲信宦官统领，专事侦缉、搜捕、惩办所谓"妖人"、"叛逆"、"大奸恶"。

迁都北京。朱棣长期镇守北京，深知北京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视北京为龙兴之地。即位之初，他仍以南京为京师，不过早有迁都北京的打算。但他并非是贪恋王府旧地，更多的是考虑到如何加强北方的边防。永乐四年(1406年)，他征调工匠、民夫百万人，开始修建北京城及其宫殿，做迁都的准备工作。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历时十四年的工程结束后，迁都准备就绪，朱棣下诏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以南京为留都，同样设立一套政府机构，但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北京从此成为明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永乐时期北京城平面图

编纂书籍。朱棣君临天下之后，尊儒纳士，

锐意标榜文治,喜欢聚众编书,命人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书》、《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永乐大典》编成于永乐五年(1407年),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自先秦至明初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郑和下西洋。郑和,回族,本姓马,小名三保(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军俘虏,入燕王藩邸为宦官,成为朱棣的亲信。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在永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也是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唯一的中国人。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按照《明史》中的说法,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建文帝踪迹,二是向海外诸国显示大明王朝的繁荣富强。

浚通南北运河。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发展经济,永乐九年(1411年),命刑部侍郎金纯与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畅通运道,缩短南北漕运的路程,确保水路运输正常。当年七月,会通河故道浚成,南方漕船再不用远涉渤海,由会通河可直达北京各地,会通河成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大动脉。

巩固边防。除出征安南、五征漠北蒙古外,朱棣还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西南地区,建立贵州布政司,在当时称做西番的青海、西藏一带,修建驿路,设立驿站,敕封番僧王号,加强管理。

仁政治国人鲜知　承上启下续正统

——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年(1404年)被册立为皇太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登极,次年改年号为洪熙,史称洪熙皇帝。他执政不到一年,而做太子却有20年的历史,因而他的很多事迹都被历史湮没了,以致于很少有人把他和他那铁血雄主的父亲朱棣联系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仁政治国,才为明朝的后世之君守成丰业准备了条件,因此可以说他是位承上启下的皇帝。



明仁宗朱高炽像

二十年的太子生活　明仁宗朱高炽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幼年即读儒家经书,生性仁厚儒雅,沉静好文,言行识度,很早就知儒家治国之道,以聪慧仁德著称,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宠爱。

据说,朱元璋曾让秦王、晋王、燕王的嫡子同时进京,要考察一番。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部队,只有朱高炽回来晚

了。朱元璋问他原因,朱高炽说,天气很寒冷,我想等军士们吃完饭再检阅,所以回来迟了。朱元璋很高兴,夸奖说,“小子知道恤下了!”又有一次,朱高炽奉命批答奏章,批好后,呈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发现奏章里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没有改过来,就问朱高炽是不是没有看到,朱高炽回答说,孙臣以为小过不足以上渎天听,朱元璋大喜,接着又问他尧舜的时候,老百姓遇到水旱灾害怎么办?朱高炽说,要“恃圣人有恤民之政”。朱元璋很高兴,说,“小子异日不可量也”。

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这个儿子并不讨他喜欢,甚至可以说朱高炽一生也没有赢得他的欢心。朱棣起兵靖难时,因为朱高炽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朱棣就命他留守北京。虽然朱高炽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奉命居守北平期间,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虽然当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

在此期间,建文帝曾遣书信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但朱高炽仁孝如一,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起原封不动地送到朱棣面前,才免却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由此便使朱棣不得不说,“留守之功胜于征讨”。

尽管朱高炽以仁厚儒雅获得了极好的名声,但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在通往皇位的路程上布满了坎坷。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出现了犹豫:朱高炽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朱元璋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皇二子朱高煦性格颇似朱棣,英俊武勇,在靖难中立下大功,朱棣登基后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朱棣本人来讲,希望立朱高煦为太子,因为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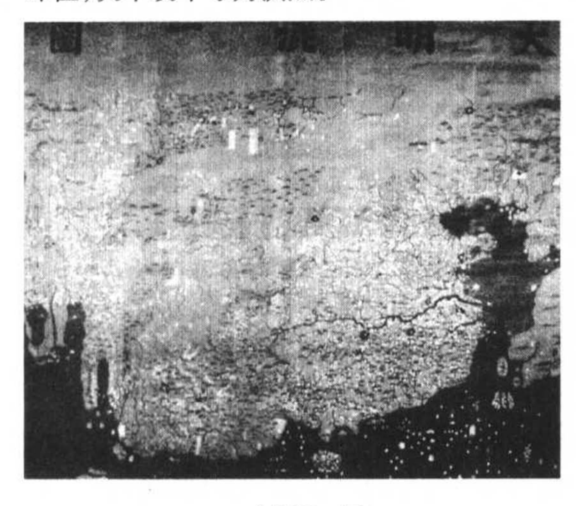
朱棣登基后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对此朝臣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是“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的仁君。

也许是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许是迫于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封建社会长幼有序的传统压力,更重要的是朱高炽作为燕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错误,废之无名,而且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朱棣最终于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成祖朱棣因北征和筹划迁都,常留北京,命太子朱高炽监国,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才随成祖到北京。监国时期的朱高炽,是在父皇多疑、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的陷害中度日的。由于有杨士奇等大臣的大力协助,在

处理日常政务及臣属关系，皇家父子、兄弟关系诸方面都适宜无错，加之汉、赵二王夺嫡野心暴露，被朱棣贬斥，太子妃张氏和皇孙朱瞻基受到朱棣的宠信，使朱高炽度过了监国时期的危难。

十余年的监国经历，使朱高炽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治国能力，为登基后稳定统治秩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死于北征归途。做了二十年皇太子的朱高炽，当时已经47岁，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尚书蹇义等人的支持下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洪熙。



大明混一图

仁政改革　朱高炽登上皇位后，顺应时代潮流，针对朝政的弊病，采取了一系列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措施，开始了他的一系列仁政改革。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显得有些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刚猛之治”。那些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政”，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坎坷的经历使他更加感到了“仁政”的可贵，因而执政之后便从多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在政治上，赦免了建文帝时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他们返回原籍；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孺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一些大臣的官爵；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杨”辅政；修明纲纪，废除古代的宫刑，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

其次，在经济上，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下令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珠宝采办，以减轻百姓负担；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

另外，在思想上，崇尚儒学，褒奖忠孝，并善于纳谏。他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在科举制度上，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规定了取中比例为“南六北四”，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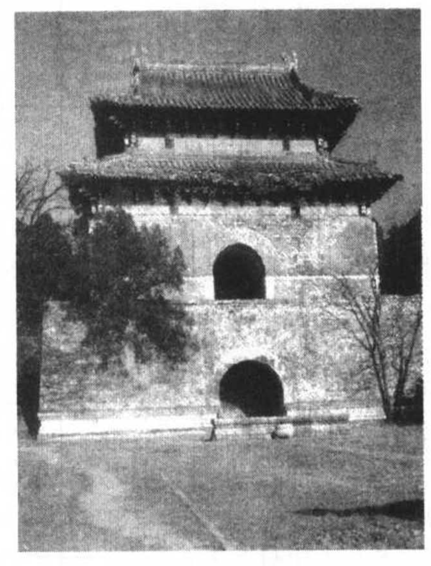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因此，在短短八个月里，朱高炽的拨乱反正很受朝野拥戴。连清朝乾隆皇帝都说，如果朱高炽多活几年的话，明朝不会中衰得那么快！尽管朱高炽在位时间很

短，但后人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暴卒之谜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暴卒，享年四十八岁。葬于献陵。从登基到去世，朱高炽在位时间不足十个月。去世前三天，他还在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而从身体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故明人黄景昉称他“实无疾骤崩”。

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已成历史之谜，多年来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朱高炽之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大臣李时勉在他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他谨嗜欲之语。他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他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他即位的宣宗朱瞻基，曾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瞻基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职。


献陵方城明楼

可见，朱瞻基对仁宗嗜欲之事也一清二楚。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釴《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可信度。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害死的。朱高炽生性温厚懦弱，嗜欲享乐，朱棣生前对他大为不满，只因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

朱高炽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朱棣在世时，朱瞻基深得祖父赏识。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炽。

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

示他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当然，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今后，随着人们掌握的史料不断增多，相信最终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太平天子"创盛世　"促织皇帝"留话柄

——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是明朝历史上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永乐九年(1411年)，被立为皇太孙，确立了储君地位。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病逝，朱瞻基即皇帝位，年号宣德。虽然明成祖朱棣曾经预言朱瞻基是个"太平天子"，但他从小就喜欢斗蟋蟀(促织)，因此又被称为"促织天子"、"促织皇帝"。尽管他在位仅有十年时间，但却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非常值得后人追记。

幼年受宠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深得明成祖朱棣的宠爱。据说在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在古代，大圭是权力的象征，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印证在孙子的身上？在朱瞻基满月的时候，朱棣看到他满面英气，长得非常像自己，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个梦有特别的寓意，是个吉兆。



明宣宗朱瞻基像

永乐五年(1407年)，到了朱瞻基读书的年纪，朱棣特地命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他讲习经书，可见对他的殷切希望。朱瞻基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学习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他还留意古今兴衰、历朝治乱的内容，从中领会治国的道理。永乐十一年(1413年)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刚刚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朱瞻基既有着祖父朱棣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朱高

炽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朱高煦不由得回顾失色。

在朱瞻基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朱棣的安排，他一心想把这个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永乐中期以后朱棣远征漠北，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太孙了解农家的艰辛，希望他以后做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正是在祖父朱棣的精心培育下，朱瞻基文韬武略，熟知政务，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壮年勤政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病逝。朱瞻基以29岁的年龄即皇帝位，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且可以不用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



《宣宗射猎图》

朱高炽病逝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当日就动身北归。途中，听说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要在半途截杀他，然后自立为帝。左右都劝他整顿兵马以作防范。朱瞻基说："君父在上，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依然轻身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当时朱高煦还真的没有派人设伏，因为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得如此之快。回到北京之后，朱瞻基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另一方面加强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年号为宣德，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朱瞻基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外藩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朱瞻基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朱高炽病逝，年轻的朱瞻基即位，国家动荡，正是造反的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朱高煦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宣德年间造云纹铜熏炉

早已准备就绪的朱瞻基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朱瞻基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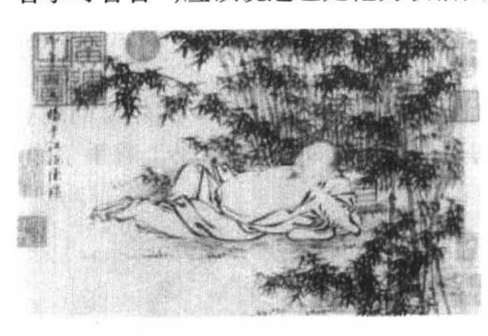
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回京后，朱瞻基马上传诏给另外一个皇叔、赵王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做卫）。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安南（即交阯国，今越南北部）问题也是朱瞻基成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朱棣时期，由于安南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朱棣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朱瞻基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的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从长远来看，此举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也利于安南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

成功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圆满解决赵王朱高燧危机和安南问题，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他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

当然，作为守成之君，朱瞻基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而注意体恤民情，爱惜民力，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尤其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百姓安居乐业，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起义也很少，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朱瞻基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政治国的指导思想。

英年早逝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幼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使他能吟诗作赋，擅长书法绘画。他登基后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儒臣登临万寿山，泛舟太液池，于良辰美景中赋诗唱和。他的诗内容侧重于重农、求贤，表达了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理念。他的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他所绘的《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明宣宗绘《武侯高卧图》

尽管朱瞻基涉猎广泛，睿智过人，但作为一国之君，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为后世所不齿的事情。朱瞻基的正宫皇后胡氏，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故受到冷落。朱瞻基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十岁时，经朱瞻基母亲张太后等人向明成祖朱棣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他择配的人选。孙氏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虽亦无子，然而深得朱瞻基的宠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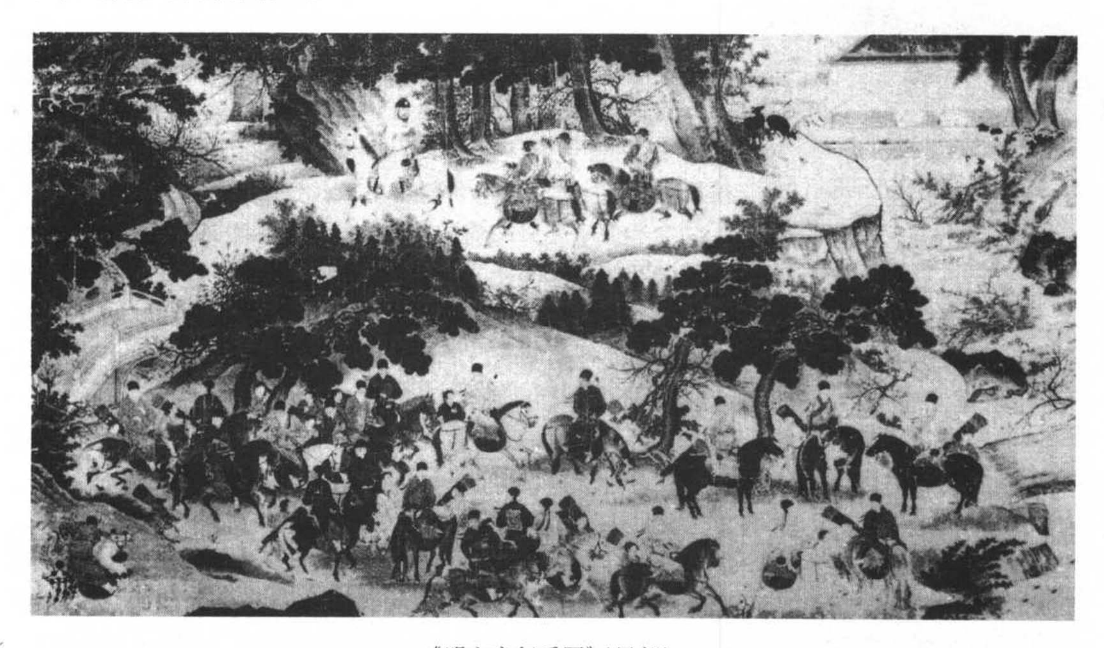
朱瞻基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什么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据说孙贵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派人在宫

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身孕，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自己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得朱瞻基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自己身边，并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朱瞻基，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



明宣宗绘《瓜鼠图》

孙贵妃"生"皇子朱祁镇，使朱瞻基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镇出生后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主动表示应早立皇太子。其实，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太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朱瞻基却不愿意等。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朱瞻基册立尚不满三个月的朱祁镇为皇太子，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三月，又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朱瞻基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是自我解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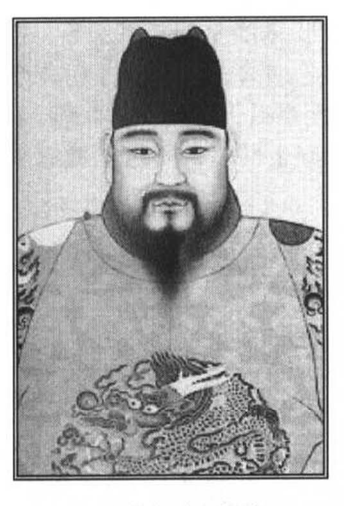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除了这件事外,朱瞻基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问题。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斗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朱瞻基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位之后,他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后来他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他,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弄得鸡犬不宁。朱瞻基也因此被百姓们称为“促织天子”、“促织皇帝”。

也许是忙于歌舞升平,声色享乐,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病危之时命左右起草遗诏,由太子继位,所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太后方能决定。不久死于乾德宫,终年三十八岁,可谓英年早逝。朱瞻基死后,被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两登帝位称传奇　曲折人生谁与知

——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像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六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曾两度登上帝位,共在位22年。朱祁镇在位期间是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大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朱祁镇虽然和他父亲朱瞻基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令人慨叹。

身世之谜　朱祁镇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其父朱瞻基结婚10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儿子自然十分疼爱,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初三给他赐名朱祁镇,同时又赐玺书,寄予厚望。三天后,出生仅仅两个多月的朱祁镇又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储。

命运似乎格外垂青朱祁镇,在父亲朱瞻基驾崩后,年仅九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了万人瞩目的皇位,开始君临天下。看起来,朱祁镇的人生似乎真的很幸运。但是,他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这些对他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真正不幸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身世都没能搞清楚,因为他始终不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生身母亲。

关于朱祁镇的生身母亲是谁,史学家们向来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他父亲朱瞻基的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据《明书》和《明实录》中记载,孙贵妃“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十岁时,经彭城伯夫人、朱瞻基母亲张太后向朱棣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年),册封为皇太孙嫔。朱瞻基即位后,册立孙氏为贵妃。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氏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张太后和诸大臣同意朱瞻基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

也有人认为朱祁镇是宫女所生。据《明史稿》记载,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

"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的《罪惟录》和《明史》也赞同这种说法: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朱祁镇的亲生母亲既不是孙贵妃,也不是宫女,恐怕另有他人。《明史·孝恭皇后传》就记载说:"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

不管朱祁镇是孙氏所生还是宫女或他人所生,对他父亲朱瞻基来说,只要是自己的骨肉,所谓"龙脉"即可。由此可以看出,朱祁镇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预示着他的一生也可能跌宕起伏,历尽人世间的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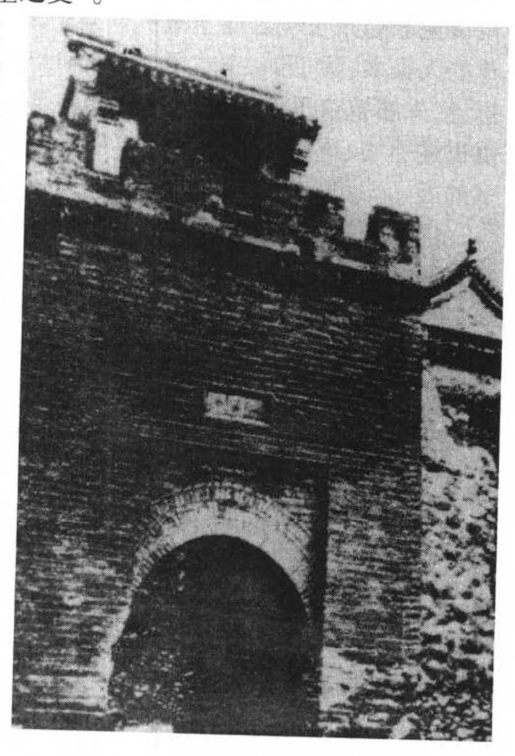
两登帝位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朱瞻基逝世,遗诏命皇太子朱祁镇继位。七天后,九岁的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朱祁镇继位初期,由皇太后和仁宣朝重臣"三杨"等人辅政,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朱祁镇可能会像先辈一样,做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之后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并改变了他本人命运的事件,即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当时漠北元朝余部(即北元)势力之一瓦剌部落在首领也先策划下,以明朝赏赐减少为名,发动战争。朱祁镇年少气盛,想御驾亲征,他所宠信的太监王振也想耀武扬威,名留青史,于是极力撺掇朱祁镇亲征。由于当时明朝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他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于是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了5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始亲征。结果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全军覆没,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事变后,朱祁镇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而此时在朝廷内部,因朱祁镇被俘,一时国中无主,人心不安。面临瓦剌对京城威胁的情况,在孙皇后与朝廷重臣的拥立下,朱祁镇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登上皇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他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第二年改年号为"景泰"。

朱祁镇被俘后,也先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朱祁镇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朱祁镇。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朱祁镇得以保全性命。朱祁钰登上皇位后,私心很重,不愿再让出帝位,特发诏谕,不许朝廷上下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一来,也先想靠朱祁镇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也先气急败坏地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但此时明朝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北京军民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给也先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土木堡城门

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

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来自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会非常艰苦。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与明朝讲和,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

当时景泰皇帝朱祁钰已经坐稳皇位,不想派人迎回朱祁镇,对从瓦剌迎回朱祁镇的建议极为冷淡,多次从中作梗。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众大臣的不断建议下,明朝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在漠北整整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朱祁镇被送回北京。但回到北京后,朱祁镇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朱祁钰令其哥哥、已被视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入居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实际上是将其软禁。在惊恐与饥饿之中,朱祁镇度过了七年的软禁生活。但软禁在南宫的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权力。

偏偏事情很具戏剧性,也是朱祁镇命中有第二次当皇帝的运气。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乘景泰皇帝朱祁钰得重病之机,潜入南宫,夺门出宫,帮助朱祁镇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朱祁镇第二次即皇帝位,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朱祁镇复辟后,他的弟弟、景泰皇帝朱祁钰在一个月后就病死了。朱祁镇以亲王之礼将他葬在了北京西山,由此便使朱祁钰和下落不明的明惠帝朱允炆一样,成为明朝历史上两位仅有的未能埋葬在皇家陵园的皇帝。

朱祁镇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等人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而他们也经常以“功臣”自居,骄纵恣肆,不可一世。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大学士王文等人。当时,因朱祁钰被废而受株连的人很多,除于谦、王文外,还有不少在朝官吏和妃嫔家族以及朱祁钰信用的太监等。据说,朱祁镇杀了于谦后可能有过一点后悔。于谦死后,边境的局势又开始紧张,朱祁镇很是担忧,这时有人跟他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他听了只是没话说,没有更多的表示。

由于朱祁钰被废,于谦等人被杀,景泰时期的点滴改革也被废除,政权又一次把持在宦官邪党手中,明朝更加积弱。也许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朱祁镇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以巩固皇权,整顿朝纲。同时,朱祁镇又重用李贤、王翱等贤臣,减免各地百姓的赋役,发展经济,因而从总体上看,天顺年间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政治与正统年间相比,也要清明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也可算是一位仁君。

盛德之事 应该说,朱祁镇的本性并不坏,只是由于他过于宠信宦官,忠奸不分,才导致自己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也许是一年难熬的俘虏生活,再加上南宫六年又五个月的煎熬,使他尝遍了人世间福祸相交的沧桑,他在复位之后,曾做了几件为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的好事。

其一,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并使之葬礼如仪。据当时人王锜著作《寓圃杂记》记载,在朱祁镇在位的最后一年,朱祁镇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但由于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只好把一腔同情寄托在被废的胡皇后身上,

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不过，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明英宗朱祁镇像

其二，释放建庶人。建庶人即建文帝朱允炆次子朱文圭。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朱棣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朱祁镇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据说释放建庶人一事在当时曾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或反对，但却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其三，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朱棣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等去世以后，都以宫妃殉葬。朱祁镇觉得这样做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走完了他复杂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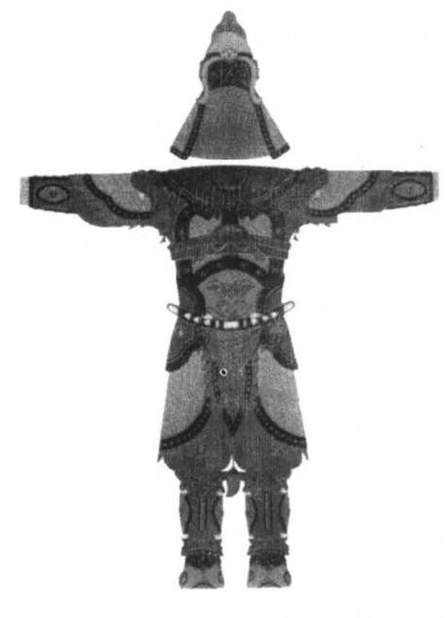
力挽狂澜建大功　心胸狭窄命多劫

——明代宗朱祁钰

明代宗朱祁钰(1428～1457)是明朝历史上第七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次子，与明英宗朱祁镇是同父异母兄弟。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朱祁钰登上皇位，力挽大明王朝狂澜于既倒，景泰八年(1456年)，又因明英宗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而失去帝位，在位时间仅有八年，一生可谓命运多劫。

捡来的皇位　明代宗朱祁钰出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他的生母吴氏，原本是明成祖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府邸的一位侍女。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自己叔父、汉王朱高煦的反叛后，将汉王宫中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朱瞻基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带回京城。


明代宗朱祁钰像


明将官胄甲


明代手铳

回京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朱瞻基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吴氏珠胎暗结，为他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宣德八年(1433年)，朱瞻基病重时，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驾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后来朱祁钰被封为郕王，朝廷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居住。

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烟，也许朱祁钰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之变"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朱祁镇被漠北元朝余部势力之一的瓦剌部落首领也先俘获，消息传到北京后，朝廷内外一片惊恐。当时前朝皇帝、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朱祁镇即为正统皇帝，次子就是郕王朱祁钰，当时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过才两岁，如何能治理国事？临朝议政的诸般事务，自然落在郕王朱祁钰身上。于是，为安定人心，皇太后孙氏下诏立朱祁镇二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又命郕王朱祁钰为监国，总理国政。

即使作为监国，朱祁钰也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因为，按正统(朱祁镇复辟前的年号恰巧是正统)的传承，应该是朱祁镇二岁多的儿子、皇太子朱见深继位，作为郕王的朱祁钰只能监国。再加上朱祁钰的性格比较软弱，很担心自己能否执掌好朝政，最初想逃避这件事。但是历史却偏偏给了他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

朱祁钰临危受命，担任监国后，惩处了土木堡之变罪魁太监王振的党羽，使京中的局面有了些起色，确立了在朝臣中的威望。面对这种情况，大臣们纷纷上书皇太后孙氏，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眼下明英宗朱祁镇返国无望，皇太子年纪又太小，只有另立一帝，才可使国家度过这危难之秋。尤其是时任兵部侍郎于谦向孙太后请命，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皇太后孙氏虽不情愿，但也再无良策，

只好下旨由朱祁钰继承皇位。

虽说朱祁钰最初很不愿意称帝,只愿做监国。但是面对瓦剌军队凌厉的军事攻势,面对北方防御军队几尽丧失的严峻形势,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明政权,朱祁钰似乎感到了自己应该承担保卫大明王朝江山社稷的历史重任。为了国家和皇族的利益,他不得不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继承皇位,遥尊已被也先扣押的正统皇帝、自己的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并立兄长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第二年(1450年)改年号为景泰,史称景泰帝。

朱祁钰继承皇位后,重用忠臣于谦,将之由兵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并对明朝政治、军事进行了一些改革,以防御瓦剌军队的侵犯。在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后,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也先军队以沉重打击,顺利地解除了对北京的军事威胁,迫使也先不得不退回草原。危急一时的大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易储风波 朱祁钰在位期间,许多被太监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因而这一时期与朱祁镇执政时期相比政治上较为清明。但是朱祁钰在处理自己兄长、太上皇朱祁镇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更换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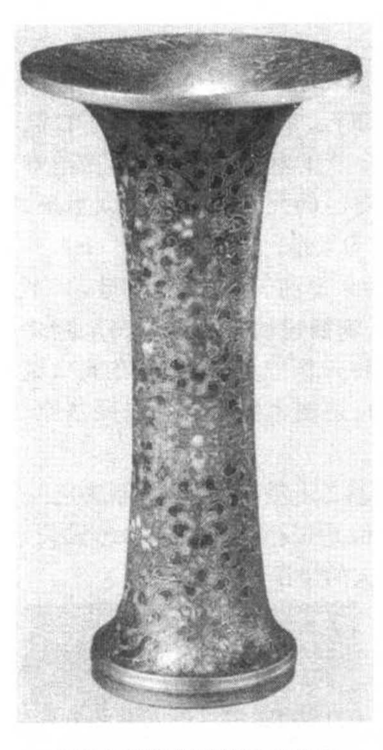
景泰年间所制掐丝镀金龙耳瓶

朱祁钰在坐稳帝位之后,就不愿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回京,害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冲突。这时又是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他向朱祁钰保证,“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朱祁镇归来不会影响他的位子,希望能遣使去迎接。最终朱祁钰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真的将朱祁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朱祁钰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

朱祁钰将太上皇朱祁镇迎回了北京,遂将他软禁在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果然如于谦所说英宗的回归没有影响到朱祁钰的帝位。可以说,在处理朱祁镇回归问题上,朱祁钰表现得心胸过于狭窄,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日后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这一点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也许就更让人想不到了:朱祁钰私心太重,为了巩固皇权,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朝臣们不愿公开反对朱祁钰,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太子朱见深被废为沂王,而朱祁钰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谁知,天违人愿,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早早夭折,使朱祁钰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朱祁钰尚在壮年,子嗣的问题对他来讲还不用发愁,建储一事便暂时搁置下来,景泰八年(1457年)初,朱祁钰得了重病,建储的问题又成了热点问题被



景泰年间所制掐丝珐琅花觚

摆上了朝堂，但众大臣的意见并不统一。就在这时，突然从内宫传来朱祁钰病体好转的消息，于是众大臣准备第二天上朝与朱祁钰商议。由于朱祁钰大病初愈，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不久就又睡着了。这一觉改变了朱祁钰的一生。群臣没有等到朱祁钰，相约明天早朝再来。谁知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著名的"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称帝，朱祁钰被废为郕王，并被软禁起来，明朝历史上朱祁钰的执政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

含恨而薨 据说朱祁钰听到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称帝的消息后，一连说了几个"好"字，私下叹息自己是"天无之人"，就不再说话，由此可以看出他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没过多久，朱祁钰就死掉了，年仅 30 岁。朱祁钰死后，他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墓寿陵，也被明英宗朱祁镇下令拆毁，只是以亲王之礼葬于北京西山。解放后，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等人，曾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并加以修整。

关于朱祁钰的死因，历来人们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朱祁钰是因病而死。在《英宗实录》里就记载了有关朱祁钰身体疾病的很多事实，并认为朱祁钰最终是因为病情恶化而不治身亡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朱祁钰是被朱祁镇害死的。明朝陆釴《病逸漫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这种观点应当说比较可信。历史上，清乾隆皇帝曾为景泰陵立碑题词，也认为朱祁钰是被人害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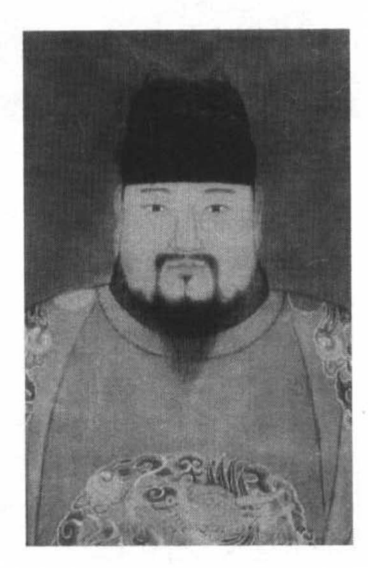
朱祁镇复辟后，积恨难平，在复辟诏书中严厉指斥朱祁钰，"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不久，又假借皇太后制谕，宣布他的罪状：贪天位，用邪谋，废黜皇储，私立己子，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不孝、不弟、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等等，可以说把自己七年来被幽禁在南宫的愤懑尽情地发泄了出来。即使这样，朱祁镇似乎感到还不够解气，在朱祁钰死后，又宣布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意思是朱祁钰终生为恶，死不改悔。

当然，这仅仅是朱祁镇自己的观点。朱祁镇死后，他的儿子、曾经被朱祁钰废过太子的明宪宗朱见深，倒是不记皇叔当年之过，承认了朱祁钰对于明皇室的扶危功绩，恢复其帝号，改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对其陵墓也给予了帝王的礼遇。到了南明政权时代，弘光帝朱由崧大概是在风雨漂泊之中，与景泰帝朱祁钰找到了共同语言，所以赐庙号为代宗，而这时历史已经过去了 187 年。也许"代宗"的庙号，表明他不过是代替他人当皇帝。史家曾评论朱祁钰说，"视天位也过于重，而视天亲也过于轻"。但无论如何，朱祁钰一生既曾力挽狂澜，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建立了大功，也曾因心胸狭窄而含恨而薨，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一妃二宦乱朝纲　才智平平称庸皇

——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初名朱见浚，是明朝历史上第八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天顺八年(1464年)朱祁镇病死后继位，改年号为“成化”，史称“成化皇帝”。朱见深一生共在位23年，在位期间，曾特别宠爱自己的贵妃万贞儿，重用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致他们擅自专权，败坏朝纲，使明朝弊政横生，危机四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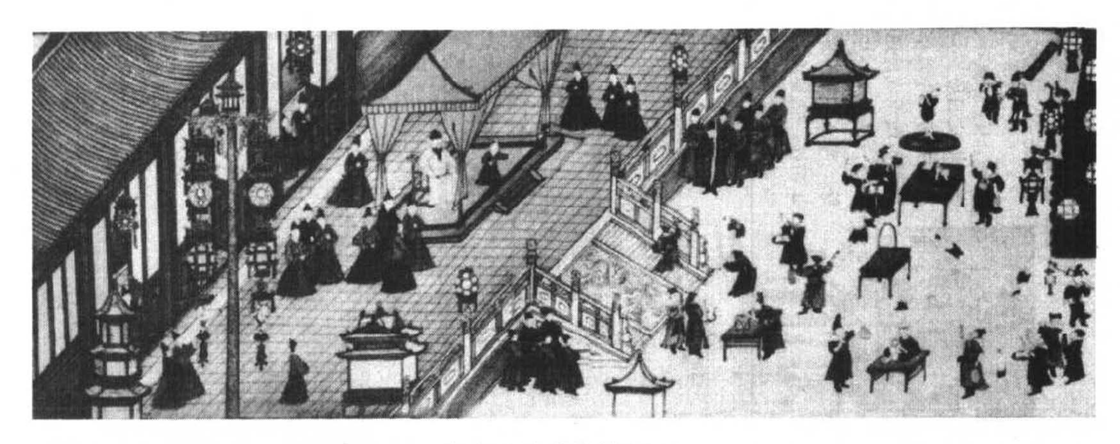
明宪宗朱见深像

成化初政　明宪宗朱见深登上帝位的命运曾几度起伏。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因父亲英宗朱祁镇被俘，皇太后命立他为皇太子，并立他的叔叔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代宗朱祁钰即位后，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就开始考虑如何废掉他，而以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取而代之。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朱见深被废为沂王。但是，也许命中注定他就是做皇帝的料，上天好像只垂青于他：此后不久，先是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早夭折，然后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样不仅他的父亲朱祁镇夺回了皇位，他的太子之位也失而复得。

天顺八年(1464年)，朱祁镇去世，时年18岁的朱见深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成化”，开始了他23年的帝王生涯。朱见深即位后十分倚重知经筵事的少保、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并任用李贤为相，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回报知遇之恩。当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

在他们的辅佐下，朱见深即位后做了几件很值得后人称颂的事情，看得出他的性格比较仁厚宽和，胸襟也比较宽广。首先，他不顾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钰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而以德报怨，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朱祁钰的陵寝进行了整修，谥号为景帝。其次是平反了于谦冤案，让大量被贬逐的正直大臣复职。

由于有贤臣名相的辅佐，加之采取了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即位之初的朝政还是比较清明的，而且颇有振兴的气象，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对贵妃万贞儿的宠爱，随着对宦官汪直、梁芳等人的重用，大臣们便很少能见到他，他也越来越怠于朝政，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和长寿秘术，纵情于声色之娱和货利之乐，政务则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可以说，执政后期的朱见深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一个才智平平的庸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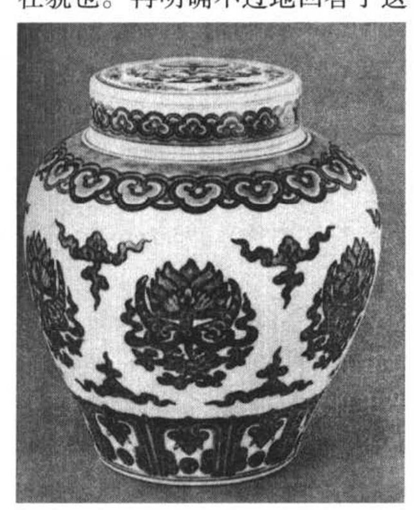


《明宪宗行乐图》(局部)

“妇寺之祸” 贵妃万贞儿原本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孙氏的宫女,四岁时被父亲万贵托同乡带进皇宫当宫女。年幼的万贞儿十分懂事乖巧,深得孙氏的喜爱,成为心腹之人。到了正统十四年,万贞儿已经长成了十九岁的妙龄少女,被孙氏派去照顾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这是他们缘分的开始,幼小的太子从此以后与如同保姆的万贞儿形影不离。

朱见深长于深宫,自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但却经常缺乏真正的母爱,万贞儿在他的眼中很像母亲,有时又很像姐姐。令人惊讶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朱见深居然爱上了大他十七岁的宫女万贞儿,这当然是为皇室所不容的感情,但是他却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当时无论是文武大臣,还是后宫妃嫔,以及后来的修史者,都对他的行为迷惑不解。

据历史记载,万贞儿相貌平平,并无倾国倾城之貌,相反,“貌雄声巨,类男子”。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就曾质问过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朱见深称,“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再明确不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用现代心理学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它绝不是一般的男女情爱,而是从小形成的复杂的依恋之情,是其他任何人代替不了的。



成化年间制斗彩莲花盖罐

天顺八年(1464年),朱见深继承皇位。当上皇帝的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册封心爱的万贞儿为皇后,但立刻遭到了他的生母周太后的强烈反对。万般无奈下他只能立周太后所喜欢的吴氏为皇后,改立万贞儿为贵妃。可是,年轻美貌的皇后吴氏并没有打动朱见深的心,他依然与万贞儿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虽然朱见深非常宠爱万贞儿,但万贞儿的心中却并不满足于贵妃的位分,早就想取代失宠的皇后吴氏成为六宫真正的主人。一次,在遭到皇后吴氏的斥责杖刑后,万贞儿不失时机地向朱见深哭诉。眼见心爱的女人受苦,血气方刚的朱见深马上下令废掉皇

后吴氏。

万贞儿原以为这下能登上皇后之位，但皇太后又是强烈反对，使她与皇后宝座再次擦身而过，皇后尊贵的身份给了王氏。王氏天资聪颖，又性情淡泊，早就看透了宫廷中的道道，因此对万贞儿一味地忍让，好让万贵妃无可乘之机，以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万贞儿实在无法绊倒王皇后，只能转而专注于迷惑朱见深。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已经三十七岁“高龄”的贵妃万贞儿为朱见深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



成化年间制孔雀绿青花鱼莲纹盘

欣喜若狂的朱见深于是晋封万贞儿为皇贵妃，并许诺立其子为太子。然而万贞儿并没有高兴多久，一年后，她的儿子居然夭折了，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儿子。失去了手中仅有的王牌，万贞儿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经常在后宫颐指气使，恃宠而骄，以残酷的手段使其他受孕的女子堕胎，以至于宫中人人都惧怕她。由于朱见深的宠爱，万贞儿在朝廷中也曾弄权不止：一方面许多官吏通过贿赂她而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其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把持朝政。

宦官擅权 可能是由于朱见深幼年就卷入皇位之争的漩涡中，精神压力非常大，因此留下了口吃的毛病。据说他每次上朝，如果准许大臣所奏之事，只说一个“是”字，以免出丑，也因此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很多时候，他需要通过自己身边宠信的太监来传达旨意，从而增加了他们干预朝政的可能性。

据说，自成化七年(1471年)朱见深召见阁臣一次后，此后连续16年从不上朝理政。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朱见深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欲望。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由大太监汪直任提督。

汪直，是大滕峡(今广西桂平西北)瑶族人，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因服侍贵妃万贞儿而受宠于朱见深。由于朱见深信任汪直，便将其选中提督西厂。自从统领西厂以后，汪直经常带领校尉四出察访，从京城到各府州县，从王府到百姓之家，事无大小，无论是官吏的言谈行动，到百姓的街谈巷议，还是打架斗殴，夫妻口角，都在刺探之列，都要秘密报告朱见深。汪直每次外出，都要带着众多的随从，前呼后拥，遮街塞巷。公卿大臣见到了他，都要改道而行，地方官吏听说汪太监来了，要从百里之外赶来，跪在马前迎接。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和汪直在路上相遇，没来得及让道，便受到了汪直当面的凌辱。

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汪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以后，更加作威作福起来，一方面，他屡次制造骇人听闻的冤狱，敲榨勒索，打击异己，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把朝廷上一些有影响的大臣罢官削职；另一方面，他将那些逢迎拍马，唯命是从的无耻之徒升官晋爵，树立私人势力，可以说是“威势倾天下”。

据历史记载，朱见深爱看杂剧。有一天，闲来无事，要内侍给他演杂剧看。小宦官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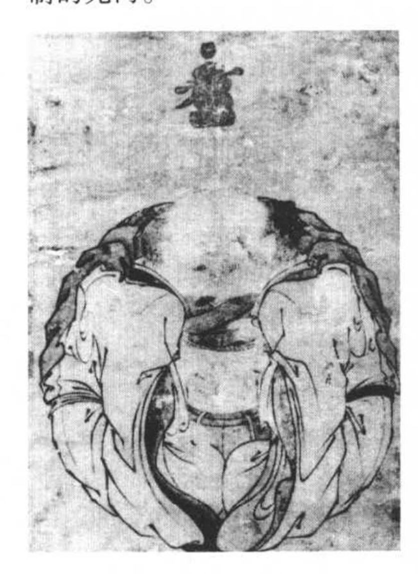

明宪宗调禽图

丑扮演一个醉鬼，跌跌撞撞，以醉步登场，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个不停。另一个演员出来对他喊道："圣上驾到。"醉鬼却不予理睬，谩骂如故。过一会，那个演员对他喊道："汪太监到！"醉鬼一听，顿时惊醒，撒腿就跑。那个演员一把拉住他问道："你皇帝万岁爷都不怕，怎么倒怕汪太监？"阿丑扮演的醉鬼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尽管小阿丑的杂剧逗乐了皇帝，但捧腹之余，朱见深对汪直的作为也不能不有所警惕，成化十九年(1483年)朱见深终于以欺罔苛扰罪将汪直罢黜，驱逐了周围的死党，并撤销了西厂。但汪直走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朱见深仍然过于宠信宦官。

除了汪直外，太监梁芳也是朱见深所宠信的宦官，但是他的手法与汪直不同：汪直注重"权"而梁芳注重"财"。为了敛财，梁芳经常给万贵妃送一些美珠珍宝，然后以采办珠宝为名，出使各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万贵妃的缘故，朱见深对此也就不管不问。

同时，朱见深在执政后期，越来越怠于朝政，沉迷于神仙、佛道和长寿秘术之中。为此，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人继晓等人，为他进献方术与符箓。慢慢地，朱见深从迷信方术逐渐发展到宠信方士，使梁芳、李孜省、僧继晓等人逐渐得以干预政事，李孜省任通政使、礼部左侍郎兼掌司事，继晓破格授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当然，为了满足他随意任用官员的要求，朱见深曾下旨不经吏部的选拔和考核，由自己直接任命官员，即所谓的"传奉官"，由此大批佞幸之人获得了官职，导致吏制败坏，开了明代许多朝不良官制的先河。


明宪宗绘《一团和气图》

大学士万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仅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自称子侄，以此博得朱见深的信任，而且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最后居然入阁拜相，参决朝政机务。明孝宗朱祐樘即位以后，曾在后宫中找到一个小竹箧，里面装的是一些奏疏，奏疏上谈的尽是一些"房中术"，每疏后面都写着"臣安进"。这个"安"，就是在万贵妃跟前称"侄"的万安，当时有《宫词》云："宫中谁进房中术？纸尾臣名署万安。"

当然，实事求是地评价，朱见深执政时期也曾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安置了当时的荆襄流民。另外，也许是朱见深自己比较喜欢绘画的缘故吧，他也曾采取措施，使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所发展。据说他亲自画了张《御制一团和气图》的绘画(现存故宫博物院)，首创了一种正圆构图的特色画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朱见深病死，终年四十

一岁，葬于茂陵，为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恭俭有制兴盛世　勤政爱民留英名

——明孝宗朱祐樘



明孝宗朱祐樘像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明朝历史上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三个儿子，成化十一年(1475年)被立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明宪宗朱见深病死后继位，改元弘治，故后世又称他为弘治皇帝。朱祐樘一生在位18年，在位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与其父朱见深执政的成化时期相比，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因此被称为“弘治中兴”。朱祐樘是明代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后世史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力挽危局，清宁朝序，勤政爱民，为中兴明主，其功绩不亚于太祖、成祖，在个人品德方面，更胜于太祖、成祖”。

不幸的童年　朱祐樘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应该说与他幼年时期备受磨难、坎坷不幸的宫廷生活经历分不开。朱祐樘生于成化六年(1470)七月初三，他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乱平息后，少女纪氏被俘入宫中，被派充到内廷书室看护藏书。一次明宪宗朱见深偶尔经过，见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

当时，朱见深的贵妃、宠冠后宫的万贞儿知道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该宫女心生恻隐，不忍下毒手，便谎报说纪氏是得了怪病，并未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后来纪氏偷偷生下了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精心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祐樘一直被偷偷地养到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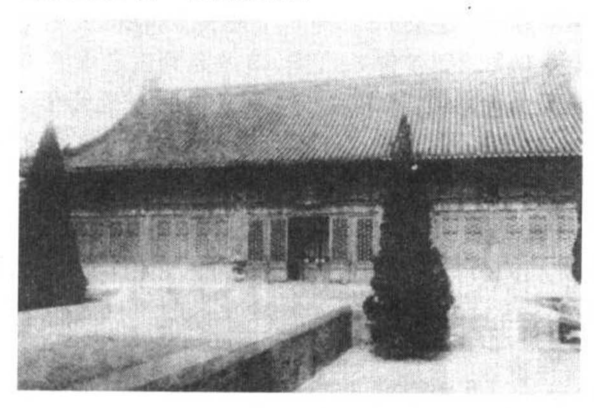
一天，张敏为朱见深梳头时，听到他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说出了真情。朱见深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喜出望外，立刻派人去接儿子。纪氏搂抱着亲生骨肉，泣不成声，嘱咐朱祐樘道：“我儿一走，我就活不成了。你看见穿着黄袍子，长着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父亲。”然后给儿子换上小红袍，长久目送着他坐上小轿子，去认自己的生父。朱祐樘这时已长到六岁，由于长期幽禁，一直没有剪过胎发，长长的头发披散到地面上。当朱见深第一次见到自己瘦弱的儿子时，不由得泪流满面，连忙抱起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亲切地抚摸，久久地凝视，连声说道：“这是朕的儿子，长得真像朕。”

当天朱见深就召集众臣，说明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太子，并封纪氏为淑

妃。万贵妃得知此事,又气又恨。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朱祐樘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这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但是,朱祐樘的太子之位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有一次,万贵妃请朱祐樘去吃饭,周太后叮嘱道:“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因此他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当宫人捧上汤羹时,年幼的朱祐樘说:“我怀疑此中有毒。”万贵妃既惊又怒,嚷道:“这孩子才几岁就如此,他日必加害于我!”

此后,万贵妃一改对朱见深后宫生活的控制,让他去临幸后宫的妃子,妃嫔们有孕也能顺利出生,许多妃子都生下了皇子,皇子渐渐多起来。于是万氏就天天在朱见深耳边说太子如何不好,让他改立其他皇子。朱见深对万贵妃一向言听计从,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并马上着手准备,虽然众大臣极力反对,据理力争,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朱见深换太子的决心。这一次是老天帮了朱祐樘,正当宫中为改易太子的事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泰山地区发生地震,当时的泰山是皇太子的象征,奇异的天象一出,群臣立刻上奏“上天已经示警了,如果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动乱”。笃信佛教的朱见深这次服软了,心中很是恐惧,于是下令不准再议废太子之事,朱祐樘的地位这才得以稳定下来。

也许是这种多难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增长了他的才干,锻炼了他的意志,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早熟。据说,丧母时的朱祐樘虽然仅有六岁,但却“哀慕如成人”。史学家们认为,明孝宗朱祐樘“恭仁俭朴,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也与他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文华殿

圣贤之君 朱祐樘被立为太子后,朱见深非常注重对他的培养教育。九岁时,他开始“出阁讲学”,接受比较严格的教育。讲读在文华后殿进行,对他进行教育的老师都是当时的学养深厚之士,如彭华、刘健、程敏政等人。从九岁出阁讲学到十八岁即位,朱祐樘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九年教育。

除此之外,朱祐樘在宫中也曾接受过很多人的教育,据说当时的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很大。九岁时,覃吉曾每天给他口授朱熹的《四书章句》。对此,《明史》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在宫中和外廷的双重教育下,年轻的朱祐樘既拥有渊博的学识,又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尤其是喜欢诗歌、绘画、弹琴等,并且在这些方面的造诣颇深。《明史》中曾收录过他的诗集五卷,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钱谦益在自己编写的《列朝诗集》中也曾收录了他的一首《静中吟》:“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不仅如此,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朱祐樘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既不像他父亲

一样，沉迷于神仙、佛道和房中术，也不像他以后的明代帝王那样淫佚放纵，而是宽仁忠孝、善良温和、尊礼儒臣、勤政爱民，以至于被视为是明朝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这里仅举几例：朱祐樘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婆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他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他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对她削谥议罪。而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

同时，也许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幼年时对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由此而来的宫廷斗争有着深刻的体会，也许是皇后张氏对朱祐樘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总而言之，他一生都对女色极为淡泊，据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后宫中只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皇后张氏，并且恩爱和谐如民间夫妇。晚明学者黄景昉说：“时张后爱最笃，同上起居，如民间伉俪然。”这在封建社会皇帝身处后宫粉黛成群的私人生活中，实属罕见。虽然朱祐樘有5个级别很低的夫人，但他却一直没有选嫔妃，而且终其一生也没有临幸过其他嫔妃，的确令人难以想象。

当然，他一生只宠幸皇后张氏一人，尽管看起来很难得，但还是带来了一些违背他本人意愿、也并非都是他能想到的问题：首先，朱祐樘和皇后张氏恩爱和谐，感情专一，造成了他的子嗣相对说来较少。尽管皇后张氏一生中先后生下了两男三女，但最后留下来的却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即后来的明武宗。其次，朱祐樘和皇后张氏恩爱和谐，感情专一，还造成了他执政时期的一大弊病，就是外戚势力的膨胀。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皇帝朱祐樘后，她的父亲张峦和两个弟弟张鹤龄、张延龄都曾先后受封为伯、侯和爵。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地位高升而飞扬跋扈，但她的这两个弟弟却仗着自己外戚的地位，到处为非作歹：不仅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使得许多农民都流离失所，而且倒卖官盐，极大地影响了国库的收入。但看在皇后张氏的面子上，朱祐樘也只好听之任之。

勤政为民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去世。18岁的太子朱祐樘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开始了他励精图治的执政时代。

事实上，朱见深留给儿子朱祐樘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朱祐樘在宫中为太子时已经是有所了解的。即位之初，他就着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整顿吏治方面：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其次斥逐佞幸之臣，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逐出京师，而一些获罪较轻的官员，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同时，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重新启用了一些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其中著名的有王恕、马文升等人，以及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并为前朝功臣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朱祐樘还注意更正律制，加强法制建设。明朝的法律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代制定的，以后又增补了繁多的条例。朱祐樘即位后就对条例进行整顿，选择了290多条与律并行。他所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一扫朱见深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据历史记载，于谦的女婿朱骥是当时的锦衣卫使，在审理大案时，十分谨慎，从不轻易定人死罪。朱骥的后任牟斌，也保持了这种宽仁的作风，挽救了许多被诬陷入狱的人的生命。

在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在内政上他最主要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
驛分持此符驗方許
應付馬疋如無此符
擅便給驛各衙官吏
不行執法徇情應付
者俱各治以重罪宜
令準此

明弘治年间的驿符

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他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尽管由于幼年坎坷的生活使朱祐樘一直身弱多病，但他却勤于政事，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和经筵侍讲，每天请有学问的大臣向自己讲解“圣贤经旨，帝王大道”，向群臣咨询治国之方，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也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从而避免受到宫中妃嫔、宦官的不良影响。

朱祐樘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但是，朱祐樘的统治进入中期以后，开始逐渐走上了父亲的老路，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孱弱，加之身边许多人的影响，朱祐樘希望能借礼佛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对佛教的笃信程度不亚于其父，因此少不了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李广后来畏罪自杀，朱祐樘以为他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直到这时他才真正醒悟过来，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励精图治、勤政为民的时期，重新整顿朝政，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并亲自告诫皇后兄弟收敛他们的恶行。但是这段时光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便驾崩了。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三十六岁的朱祐樘与世长辞。由于他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深受百姓爱戴，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朱祐樘被安葬在北京昌平泰陵，庙号孝宗。

人称“风流天子” 谁知“个性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樘长子，弘治五年(1492年)被立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即皇帝位，改翌年为正德元年，故后世又称他为正德帝。朱厚照一生共在位16年，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有人认为他一生纵情声色，荒淫暴戾，是为世人所诟病的“风流天子”；也有人认为他一生追求个性解放，追

求自由与平等，是极富个性色彩的“个性皇帝”，因此难以用只言片语概括他奇特的一生。



明武宗朱厚照像

幸运太子 朱厚照是明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出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时。如果用天干地支来表示他的生年月日时，是这样的：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而要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按照当时封建社会民间迷信的说法，这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与此有相似之处，因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朱厚照不仅出生的日子好，而且相貌也长得非同一般，据说朱厚照孩提时“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颇有帝王风范。因而他出生后朱祐樘欣喜异常，5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并为其取名“厚照”，意思是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成为一代贤明之君。为此，朱祐樘对他的管教也比较严格，在他8岁时，就正式出阁读书，接受严格的教育。

朱厚照生性好动，特别贪玩骑射，这使得他的父亲朱祐樘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像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由于父亲对他热衷骑射游戏颇为纵容，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当然，他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非常担心他玩物丧志，因此在弥留之际，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据说少年时代的朱厚照以聪明、机灵见称，前天讲授之书，次日便能掩卷背诵，而且有不少被大臣们称道的品行：好学、知礼，性情仁和、宽厚。每逢讲读，朱厚照总是“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朱祐樘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都会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如果讲课的老师告退，朱厚照也一定会“张拱致敬，作揖送状”。没有多久，他就记住了讲读老师的姓名，有时候老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朱厚照也会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果看到某位授课的学士误束花带，朱厚照也绝不责备，只是私下给左右说：“倘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

这些品行对朱厚照顺利地登上皇位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明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自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明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后，尽管总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事实上，纵观明朝的历代皇帝，只有朱厚照一人是真正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临大位的。

游戏国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朱祐樘去世，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的帝王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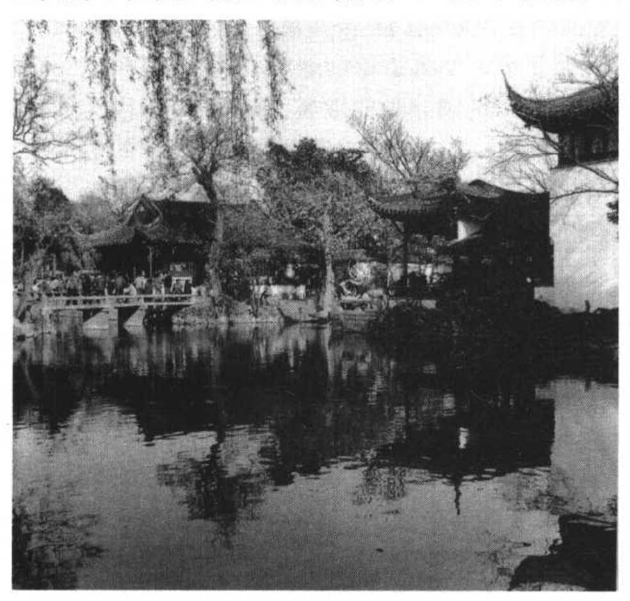
少年天子朱厚照登临龙廷宝座不久，贪玩好动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朝父母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他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



始建于正德年间的无锡寄畅园

朱厚照不顾朝臣的极力反对而沉湎于玩乐，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以刘瑾为首、号称“八虎”的东宫八个随侍太监的蛊惑。刘瑾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早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侍奉。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将会接踵而至。朱厚照即位后，刘瑾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鼓动他游玩享乐，还经常组织各式各样的演出以及各种体育活动，以至于当时的东宫被人们戏称为“百戏场”，试想年幼的天子如何能抵御这些东西的诱惑，于是就沉溺于其中，而且终其一生不能自拔，学业和政事当然也就荒废了。刘瑾却深得他的信任，被提升为内官监，掌控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在刘瑾的引导下，朱厚照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他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他挨家进去听曲、淫乐，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由于朱祐樘时期政治清明，给朱厚照留下了很多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这些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请求严惩“八虎”。朱厚照刚刚即位，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持不住，想与群臣妥协，除掉“八虎”。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刘瑾声泪俱下的哭诉使他的心又软了下来。第二天，他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但是却被他欣然批准，群臣失去了领头人，只好作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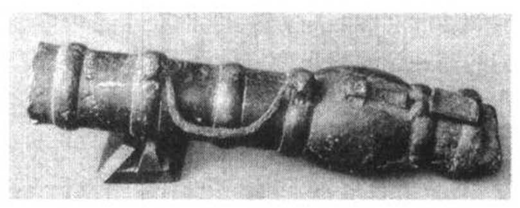
始建于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

在战胜了群臣之后，“八虎”气焰更加嚣张，也更加擅权跋扈。刘瑾靠着朱厚照的宠幸权倾朝野，而朱厚照自己也玩得更加肆无忌惮。后来因多人上奏刘瑾不法之事，朱厚照意识到刘瑾有夺位的意图，遂下决心杀了刘瑾。但刘瑾死后，他依然宠信宦官，最突出的是江彬和钱宁两人。江彬，原本是名边将，因军功觐见时，在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朱厚照意，遂被留在身边。钱宁善射，为尚武的朱厚

照所喜欢。据说朱厚照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正是由于刘瑾、江彬和钱宁等人的"侍奉"，朱厚照一直醉心于玩乐而无意理会朝政。正德九年(1514 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朱厚照见火烧起来，不仅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一旁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

由于朝政的荒废，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而这场动乱的发起者不是百姓，而是宁王朱宸濠，他妄图效仿永乐皇帝朱棣，趁朱厚照荒于政事，秘密准备叛乱，并于正德十四年(1519 年)扯旗造反。但朱厚照并未因此而着急，因为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不过，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

在朱厚照把治国当做玩烟火游戏的一生中，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少，应州之役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光彩时刻。正德十二年(1517 年)十月，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朱厚照在内心里一直盼望着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的战功，这回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朱厚照见状亲自率领军队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共经历大小百余战，期间朱厚照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当年明英宗朱祁镇曾率50 万大军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朱厚照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能取得胜利，实属不易。不仅如此，这场战斗也使蒙古兵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不敢内犯。在这场战斗中，朱厚照亲自领兵布阵，战术运用正确，现场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



铁佛郎机子铳

纵情声色 朱厚照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纵情声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违背历朝祖训和社会习惯。正德二年(1507 年)至正德七年(1512 年)，朱厚照耗银 24 万余两，在西华门另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共有房屋 200 余间，多构密室，犹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

朱厚照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朱厚照在此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



明人绘《芭蕉美人图》

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不过，豹房新宅并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朱厚照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

除豹房新宅外，宣府是朱厚照另一个淫乐窝。刚到宣府之时，每到夜晚，他总会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朱厚照离开京城，在宣府建造了他非常喜欢的“镇国府”，称此为“家里”，并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朱厚照之所以有此打算，是与他尚武、想立边功密不可分的。宣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朱厚照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驻守宣府，多少满足了他追求军功的心理。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出入。在豹房和宣府两处，朱厚照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朱厚照遂以此为借口率军南下亲征。然而当他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大军已无南下的必要，但他却继续南征，为的是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在山东临清时，他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去了哪里。原来，朱厚照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称为刘娘娘。朱厚照对刘良女非常好，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朱厚照面前求情，就不会被追究。此次南巡，朱厚照原本要带她同行，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于是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朱厚照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至临清时，遣信使接刘氏，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朱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朱厚照来到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一天，朱厚照亲自驾着渔船在江上钓鱼，玩得兴起的时候，不慎跌入江中，差一点被溺死，左右赶忙将他救起。由于当时已经是九月天气，江水寒冷，加之朱厚照身体已经被女色掏空，自此开始生病，这一病就再也没有好起来。

朱厚照匆匆回到京城之后仍不收敛，照旧纵情荒淫，身体日益虚亏，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能挽回朱厚照的生命，数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终年31岁。

尊崇父母争议礼　成神求仙梦难圆

——明世宗朱厚熜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正德二年(1507年)出生于湖广安陆府(今湖北省钟祥市)。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与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嗣，朱厚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

靖,故后世又称他为嘉靖帝。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朱厚熜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了一种特殊色彩:在位45年间,朱厚熜既因尊崇父母而引起“议礼之争”,又因迷信道教而梦想成为神仙,以期长生不老,更因任用宠臣而使朝纲败坏,因此可以说,朱厚熜是因意外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的怪物。



明世宗朱厚熜像

意外称帝 朱厚熜本来是湖广安陆府兴献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也许他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能坐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历史似乎格外垂青于他,真的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明武宗朱厚照因纵欲过度死亡。尽管他生前嫔妃如云,但死后却无一儿一女。他一死,大明皇帝的宝座便空缺了。谁是皇位的继承人?毋庸置疑,必须从朱家皇族中挑选。按明朝皇位嫡长继承制和兄终弟及的原则排列:武宗无子,上推至孝宗,孝宗有二子早死,再上推至宪宗,宪宗长、次子早死,三子即孝宗,已死,四子就是在安陆府做藩王的朱祐杬,朱祐杬已死,但他有二子,长子已死,次子朱厚熜,至此朱厚熜就成了法理上的皇位继承人。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

事实上朱厚熜能当上皇帝,与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支持分不开。朱厚照去世后,朝中事务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由于朱厚熜在当时是明宪宗朱见深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与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此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朱厚照病逝后的第二天,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便出发赶赴安陆,迎接前来即位的朱厚熜。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行程,来到钟祥的兴献王府,迎接新天子到北京登基。从此,明朝历史进入了嘉靖王朝。

为父争礼 朱厚熜即位之初,在大臣的协助下,励精图治,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人,使朝政为之一新。不过,朱厚熜是个孝子,登上皇位后,仍念念不忘家乡的父母。他是作为其大伯朱祐樘的继承人做皇帝的,而他的父亲只是个藩王,那么朱厚熜是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还是称大伯为“皇考”?

虽然“皇考”只是个称谓,但在朱厚熜心里却成了认不认父亲的问题。他深知,给自己父亲上封号阻力重重,然而不上封号,父亲永远只是个藩王,留在钟祥松林山的那个小小的藩王陵墓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要求给自己父亲一个高贵的封号,但是这一要求却遭到群臣、特别是首辅大臣杨廷和的反对,不久以后就爆发了“议


明世宗之父兴献帝显陵外景

礼之争”。

早在朱厚熜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皇位的他就在迎接的礼仪上与朝臣们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他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以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主观上来讲,朱厚熜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他不希望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当养子的身份来承继大统,于是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似乎“有情可原”,但是这恰恰是标榜尊崇礼教的众大臣们无法同意的。

就在朱厚熜准备让步的时候,新科进士张璁站了出来,帮了他一个忙,写了一篇文章,为朱厚熜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朱厚熜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当时反对的大臣们称为护礼派)。朝中由此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有朱厚熜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朱厚熜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群臣于是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朱厚熜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熜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之后,朱厚熜仍然余怒未息,又命人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廷和等削职为民,杨慎等充戍边疆。

这件事最后以朱厚熜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朱厚熜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朱厚熜定大礼,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父亲、恭穆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太后为“圣母”。

“道教皇帝” 同历代许多皇帝一样,朱厚熜一辈子追求的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因此,他特别崇信道教。从16岁开始,他就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在长达45年的帝王生涯里,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可见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道士们看准了他想寻找长生之道的心理,竞相向他进献一些邪方妖术,讨取他的欢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道士邵元节。

嘉靖十九年(1540年),道士邵元节要为朱厚熜炼制所谓的长生药“先天丹铅”,其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还有中草药、矿物质等成分,因而它事实上具有春药的功能。由于这种“丹铅”要用少女初潮的月经做原料,因此炼制过程就是残暴地摧残少女身体的过程。被选用当做原料供应者的宫女,即使不被折磨致死,也会落得浑身病

痛，终生痨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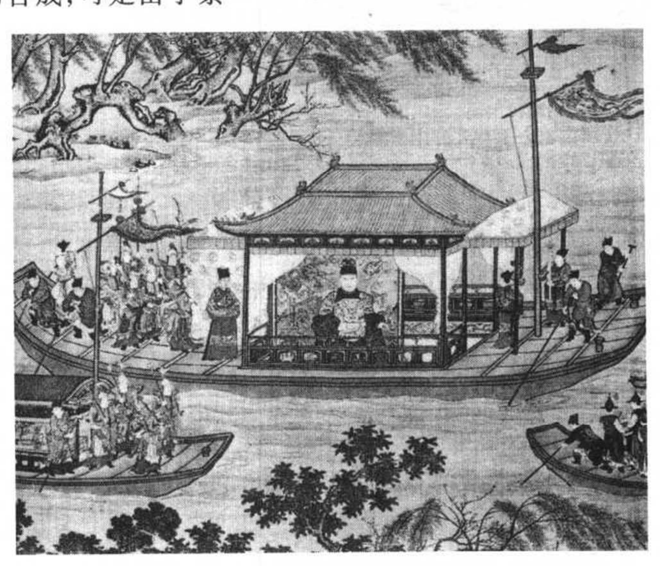
朱厚熜在民间选了数千宫女，放在后宫里备用。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所谓“丹铅”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他泄欲的工具。依靠一些药物，朱厚熜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暴戾、好色的朱厚熜，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而关于炼丹的种种可怕消息在她们中间早有流传。眼看着一个接一个被当做“炼丹原料”，骨枯髓竭，面无人色，身无人形，乃至早早夭折，成为宫中冤魂，宫女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私下商议要杀死朱厚熜。



明水陆画中的道士

明代炼丹炉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朱厚熜在自己十分宠爱的曹妃宫中饮宴嬉乐了一整天，晚上倒在曹妃床上酣然入睡，曹妃自己则避到另一间房歇息。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趁他熟睡之时，蹑手蹑脚潜入他的寝室，屏住呼吸，按住他的手脚，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准备勒死他。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可是由于紧张，宫女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这时被曹妃宫中另一名宫女张金莲发现，眼见事情不成，为顾全自己性命，急匆匆到方皇后处报信。方皇后马上领人来救驾，宫女们全部被捕。



《明世宗谒陵回宫图》

朱厚熜苏醒以后，仍然神志恍惚，好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管事。在此期间，方皇后全权处理这场宫变。方皇后对曹妃素有妒忌之心，审讯时将曹妃打成主谋。随后，以朱厚熜名义，下诏将杨金英等10名宫女及曹妃一并凌迟处死。朱厚熜恢复视事以后，得知方皇后构陷曹妃的经过，心里暗暗怀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1月，宫内发生火灾，方皇后陷身火区，厉声呼救。太监们向朱厚熜报告，朱厚熜却有意拖延，不采取抢救措施。方皇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火烧死。此件事件，虽然朱厚熜侥幸留得一命，却落下一个心病，总觉得宫中鬼影憧憧，总听到冤魂凄厉的哭声。但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只是为了躲“鬼”，长期迁居西苑，不再回旧宫。

当然，令朱厚熜遗憾的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他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的纵欲与滥服所谓“丹药”，其实只能加速他的生命衰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厚熜就重病不起，次年十月去世，结束了他寻神弄仙、希望长生不


《明世宗谒陵出行图》

老的一生。

宠臣误国 朱厚熜一心想长生不老，于是到处搜罗方士和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更有甚者，许多文人因为给他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民间遂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严嵩善于写青词，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思，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礼部尚书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军机，主持朝政。

在朱厚熜在位的45年间，他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而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严嵩与儿子严世蕃一起，立朋党，除异己，威风八面，人称"大丞相、小丞相"。尽管朱厚熜对严嵩的贪赃枉法了然于心，但就是不舍得处理他，直到晚年，他才罢免了严嵩，处死了严世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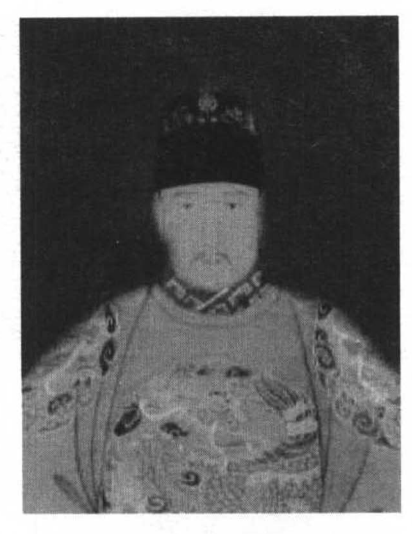
严嵩之前，朱厚熜还曾重用过张璁、夏言等宠臣，在严嵩之后，朱厚熜比较重用徐阶等宠臣。其中，张璁、夏言都是因为议礼而受宠，而徐阶则和严嵩一样很善于撰写青词。而与此相反的是，朱厚熜根本听不进一些忠贞大臣的意见，甚至罢免他们的职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已经60岁，他想长生不老，已久不视朝，专司斋醮之事，根本不考虑国家兴衰得失。这年旧历二月，户部主事海瑞忍无可忍，愤而写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言辞尖刻，上疏死谏。海瑞也自知上疏的后果，所以预先准备好棺木，诀别妻儿，遣散童仆，在家等候降罪。结果，海瑞的奏疏激怒了朱厚熜，将其逮捕下狱。

正是由于朱厚熜的昏聩和宠臣的误国，使得北方俺答汗入侵，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出了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但也不能抵消朱厚熜的过失。

《明史》中曾评价朱厚熜说："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政治清明人称颂　生活淫乱终成憾

——明穆宗朱载垕


明穆宗朱载垕像

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封为裕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登基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故后世又称他为隆庆帝。虽然朱载垕一生在位仅仅六年时间,但是在他统治期间,朝野政治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方面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相比,有了重大的改观,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因而可以说他是明朝历史上比较幸运的皇帝。但是,与他父亲朱厚熜一样,朱载垕也贪于女色,生活淫乱,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革弊施新　朱载垕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为生母未能得到其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宠爱,又非长子,因而很少得到父爱,再加上朱厚熜宠信道士,相信"二龙不相见",在太子死后迟迟不立新太子,也不与儿子相见。

尽管朱厚熜不喜欢他,但似乎是命中注定,朱载垕生来就是要做天子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垕和他的哥哥们受封为王,太监们却误将敕封太子的册宝送到了他的府中。更意外的是,他的哥哥哀冲太子、庄敬太子先后都因病去世,太子的位置居然就轮到他了。当时他的弟弟景王想和他争夺皇位,但不幸的是,在朱厚熜去世的前一年也死了。尽管朱厚熜一生共有8个儿子,但是在他去世前,唯一在世的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当时的裕王朱载垕。

朱载垕从小性情贞静、仁义,很少张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他能够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这些内忧外患使他更加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去世后,朱载垕登基继承皇位。即位后,朱载垕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一改朱厚熜时期的做法,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使朝政为之一振。

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冒死上书的海瑞,这时始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

施新,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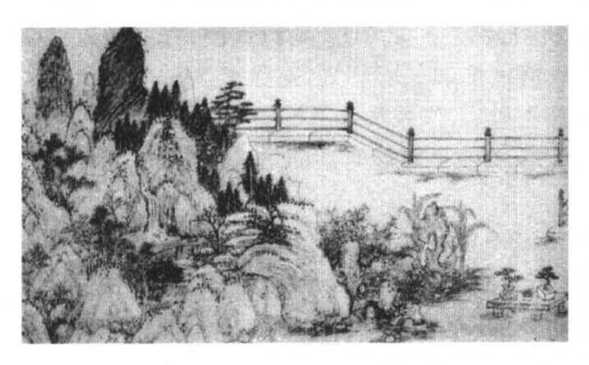
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与此同时，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制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一方面清田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革弊施新取得了比较大的实效，使得朱载垕时期乃至其后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当然，这一切并不完全都是他的功劳，更多的是大臣们努力的结果。当时的明王朝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而朱载垕也颇有齐桓公的风范，对大臣礼遇谦让，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

稳定边防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载垕统治期间也并非太平无事，因为他的父亲明世宗朱厚熜留给他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但他能够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强和巩固边事海防，创造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也成为他当政时期比较突出的一点。



明人绘《胡人出猎图》



明人绘《友松图卷》

北部边防：朱载垕在位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这是蒙古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朱载垕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不过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北京，只是大肆掳掠了一番而归。此次事件着实吓了朱载垕一跳，从此使他更加关心北部边境防务，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

后来，朱载垕采纳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他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同时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从而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景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族大规模入侵的事件。另外，朱载垕又升任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大修战备，积极防御东北边患。此时张居正在朝，戚继光在边，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显著的防卫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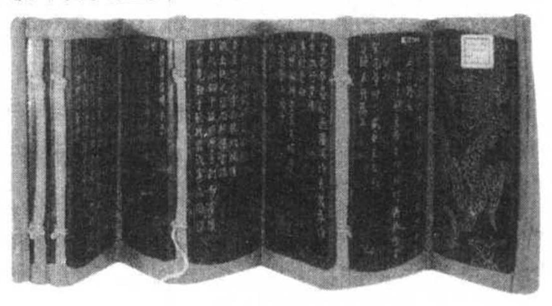
东南海防：由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一

直厉行海禁政策,导致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活动越来越猖獗。尽管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进行过很多次的抗倭斗争,但是倭寇问题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朱载垕即位后,大开关禁,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打破了明朝历史上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也使倭寇活动逐渐趋于消亡。

好色的明穆宗 朱载垕即位后,首先宣告天下,将废除朱厚熜时期的所有弊政,一时间朝廷内外都希望新君能有所作为。但是,革弊施新取得实效没多久,他便宠信太监滕祥等人,开始挥霍无度,纵情声色,荒废朝政。

在勤政方面,朱载垕的确是比较懒散的,即位后不久,很快就将权力交给了以高拱为首的内阁,以后只召见过两次阁臣,而他自己有了空闲就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犬马歌舞。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据说,朱载垕特别的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做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他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他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都有男欢女爱的雕刻和彩绘。对此,朱载垕的很多大臣都曾上书进谏,竭力劝阻,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明穆宗谥册

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他的身体没几年就每况日下,难以支撑了。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他自知病情不轻,急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后病逝于乾清宫。就这样,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朱载垕,匆匆走完了六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九岁的皇四子朱翊钧,终年只有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宗,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朱载垕死后,后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明史》中说,朱载垕"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有人把朱载垕视为明朝"除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外,仅有的可圈可点的皇帝",并认为,如果他不纵情声色,多活二十年,明朝一定可以恢复到仁宣之治的旧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了。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

——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故



明神宗朱翊钧像

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因而在明朝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总是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初政的辉煌 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贵妃原为裕王邸宫女，后被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看中，隆庆元年(1567年)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对于儿子朱翊钧教育颇严，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6岁时，他看见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载垕听后深受感动，当即下马，立他为太子，自此更加喜爱他。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仅九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

朱载垕去世时，为朱翊钧留下了很好的内阁班子，朝中贤臣当国，人才济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都是正直之士，极善谋略，而此时的内宫也非常安定，朱载垕的正宫陈皇后与朱翊钧生母李太后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当时的大太监冯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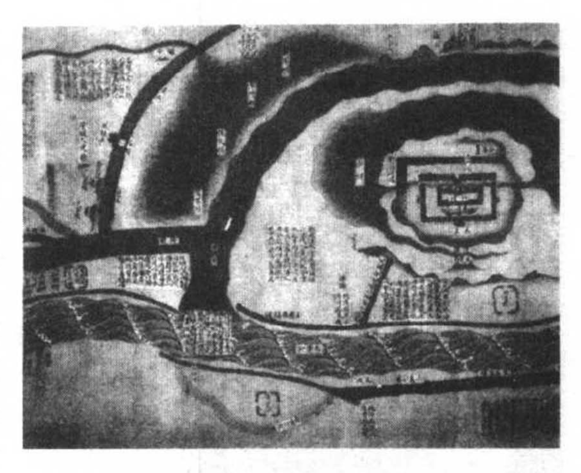
尽管朱翊钧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年天子"，但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励精图治，推行新政，颇有英主气象。朱翊钧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并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段时间，不仅是朱翊钧人生的辉煌时期，而且也使当时濒于崩溃的大明帝国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这一切当然与李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张居正忠心耿耿努力的结果。

张居正原本和高拱、高仪二人一样，同是朱载垕去世时的内阁顾命大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高拱、高仪先后都离开京城还乡，使得朝中三位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而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在朱载垕去世后就把教育培养朱翊钧的任务交给了张居正，因此张居正就不得不担当起辅弼小皇帝的重任。张居正一方面治理国事，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对朱翊钧的教育，亲自指导他读书，为他安排周详的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主持教学，培养其治国安邦的本领，因而朱翊钧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据说，朱翊钧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时，朱翊钧总是嘱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

亲政的衰落 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操劳过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

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翊钧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给予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翊钧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原因何在？由于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在他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仍提出这些要求时，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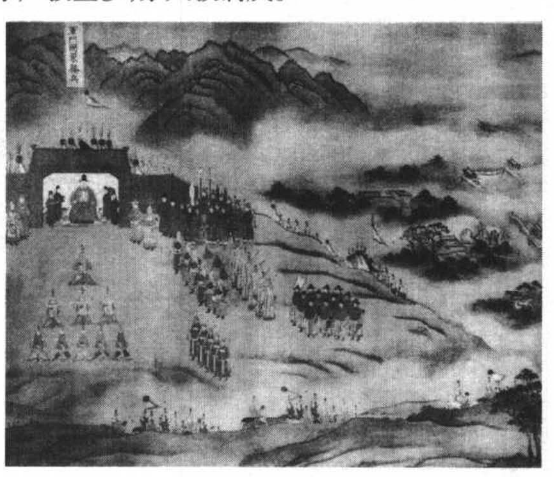
万历年间绘《河防一览图》

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他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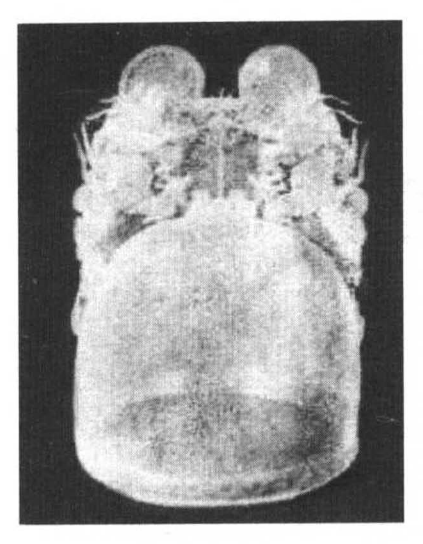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



万历年间绘《平番得胜图》


万历皇帝的金冠

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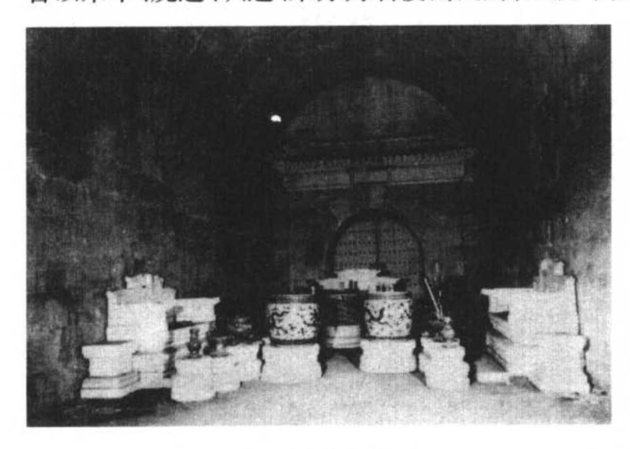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醉梦之期 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明定陵地宫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

——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像

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被正式立为太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死后继位,次年改元泰昌,故又称泰昌帝。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同时他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一生尝尽了人世的荣辱悲欢,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

侥幸立储　明光宗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有一次,明神宗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因此,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

不过虽然都是临幸,但态度却有所不同,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还是负责任的,而明神宗却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秘而不宣。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向神宗问起这件事。谁知,明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这件事发生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明神宗一时面红耳赤,无话可说,这才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是朱常洛了。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事实上,明神宗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身世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意欲将众

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但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明神宗拖延了10余年，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由此怀疑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而欲谋害朱常洛，一时朝议沸腾。但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史家没有定论。不过“梃击案”后，朱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治国除弊政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在当太子期间，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很清楚，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二宫’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由于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出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结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饷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米国柞等四人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起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宪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宪升为太仆寺少卿。当时每个寺里大都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明代美女

尽管如此，朱常洛所进行的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和拨乱反正，还是使朝政有了些起色，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常洛很快就因为“红丸案”送了命。

“红丸”之谜 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使身体大受损害。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已空虚不堪，在登基大典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饮酒作乐。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让他根本支撑不住，当夜就一下子病倒了。第二天，是朱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朱常洛服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的“红丸”。



李可灼像

服药之初，朱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是“忠良”，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但这次他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见朱常洛最后一面。九月初一早晨，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要查明谁是幕后人。

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的最后一桩“移宫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红丸案”才不了了之，成为又一个历史之谜。朱常洛去世时，他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他的陵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建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初一日，景泰陵经过短暂的修缮后，迎来了即位仅一个月便暴亡的明光宗朱常洛，并改名为庆陵。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

——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像

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史称“天启帝”。朱由校一生在位7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善于木工,曾制成过一座小巧玲珑的乾清宫模型和五间蹴圆堂模型,被誉为“天才木匠”,然而他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致使他统治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移宫登皇位　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母亲王氏原为明光宗朱常洛的选侍,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但选侍当中只有李选侍能得到朱常洛的欢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氏病死后,已经14岁的朱由校经父亲请示祖父明神宗后由李选侍照管,直到即位。

如果不是由于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去,那么懵懂少年朱由校也许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上皇帝宝座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因为,虽然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但却留下了一个祸害,这就是照管朱由校的李选侍。她和明神宗朱翊钧宠爱的郑贵妃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如何将皇后位置弄到手,此时的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朱常洛面前软磨硬泡,非要将封号讨下来不可,即使在他病危时也没有停止过。

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郑、李二人失去了保护伞,当时朝中群臣,尤其是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对他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扣留朱由校。由于朱由校生母早逝,李选侍成了他的实际看护人,此刻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将其扣留。先皇已经驾崩,朱由校已经被宣布即皇帝位,但却迟迟没有从后宫走出来,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朱由校。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帝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才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但李选侍却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她皇太后的封号。在以杨涟为首的东

林党诸位大臣的努力下，李选侍最后不得不带着宫女灰溜溜地迁出了乾清宫。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移宫案”后的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在朝中群臣的拥立下，16岁的少年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开始了七年的帝王生涯。

“天才木匠” 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诸大臣势力较大，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

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了赈济，明令免除了天下带征钱粮及北畿地区的加派，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政治上，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了结论，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荫，肯定了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给建文时期的方孝孺等人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

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制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大弊兴大利等方面毫无作为，因而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朱由校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整日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等事情，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其祖父明神宗所喜欢，他这个皇孙自然也在明神宗的视野以外。直到明神宗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朱由校即位时刚16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他的父亲朱常洛作为太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他所受的教育当然更逊一筹。明清史专家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有人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据说，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巧匠不能及”。

史书记载，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而且过分地信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



明黄花梨折叠式镜台

阉党祸九州 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

破坏。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乐，使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木匠皇帝朱由校除玩乐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兴正酣的时候，魏忠贤等人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他总是很不耐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

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中一些文臣，如崔呈秀等人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控制了内阁、六部，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杀害。东林党人被贬、被杀的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党，作了很多努力，是魏忠贤最痛恨的人。当时，他们有的已经告老还乡，有的还在任上，最后均被魏忠贤投入监狱，尝尽了人间酷刑。

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民不聊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步步进逼，使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乐：在盛夏季节，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还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游山玩水。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时，不小心跌入水中，虽被人救起，但从此落下了病根。后来经过医治，身体虽然痊愈，但他却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霍维华进献一种"仙药"，名叫灵露饮，说服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朱由校依言饮用，果然清甜可口，便日日服用，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后葬于北京昌平德陵，庙号为熹宗。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

——明思宗朱由检

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之弟，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说法，受遗命入继皇位，改第二年为崇祯元年，故后世称他为崇祯帝。朱由检一生共在位17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勤政治国，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时，终成亡国之君，很值得后人追思。

清除阉党　明思宗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10年)十二月，比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小5岁，少时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比朱由校要高得多。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朱由校，他做了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时年13岁，年龄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

期的生活环境，要安定得多，在几位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的悉心调教下，朱由检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虽然朱由检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她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明思宗朱由检像

明熹宗朱由校当了几年皇帝，一直无子无女，而兄弟7人中也只剩下五弟朱由检一人，可以说朱由检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病情加剧的朱由校决定让弟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10天之后，朱由校去世，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

本来皇帝的位子是人人向往的，但此时的大明江山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其颓废之势。朱由检继皇位之时，正是阉党魏忠贤等人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了然于心。故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思宗御押

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和朱由校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因而更加猖獗，甚至要求各地为他建立生祠，罪恶已经昭然于世。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就在朝内朝外怨声载道之际，朱由检抓准时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接着对他的爪牙痛下杀手，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途中上吊自尽，朱由检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曾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是随后的一系列错误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

急躁褊狭的性格　朱由检精明果断地铲除阉党，显示了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是将骄兵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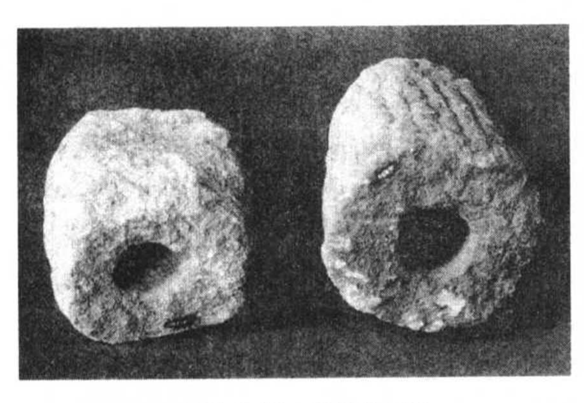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他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曾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并作了一个统计，称他平均每天只睡两个时辰。由此可以



思宗书法

看出，当时的朱由检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

在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状况，如平反冤狱，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整饬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托付其收复全辽的重任。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朝政与前两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



明军作战时使用的石雷

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使他养成了急躁褊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但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一代名将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虽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由于对朝中大臣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繁也是前所未有。据统计，朱由检当了17 年皇帝，先后任用了 50 位宰相，17 位刑部尚书。

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并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后来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二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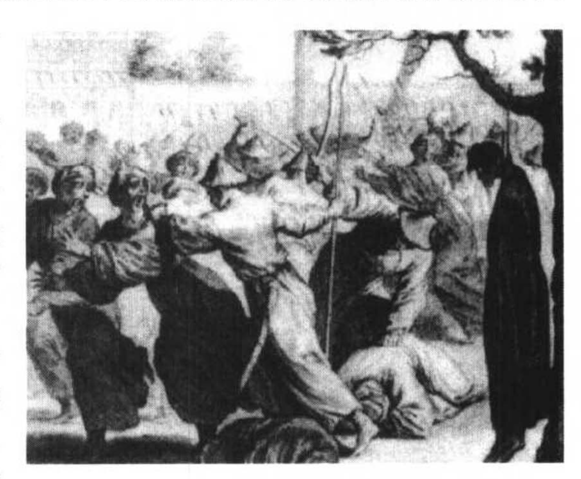
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事实上，崇祯为人极其好名，怕人议论，如此他生在太平盛世，他肯定能做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这就成了崇祯致命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无法两线作战，对于起义军，招了又叛，叛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彻底解决内乱，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一事，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愉出关和皇太极谈判。马绍愉回来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陈新甲看完后，随手放在桌上，被家僮以为是塘报，发了抄，和满清议和的事也因此败露。

本来和满清议和在当前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烈，谁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消息传出后，满朝大哗，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为好名，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崇祯并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部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最后被处死。而周皇后所提南迁之事，结果与议和这件事大同小异。崇祯和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时，崇祯都是作出不允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留守京师呢？京师是无法守得住的，失陷京城的大罪也不是自己所能担当的。君臣各有各的心思，南迁之事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的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们知道，后来北京失陷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来，因此，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自然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斗，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但是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崇祯自己不南迁，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的结果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待灭亡。

煤山自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夜间，农民起义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朱由检投降，被他一剑杀死。

此时，朱由检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觉得，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他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



法国人所绘《崇祯皇帝自缢图》

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朱由检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威门投降，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操之处，如今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弘光朝时，又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南明诸王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

——南明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像

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拥立为帝 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明神宗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她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她整天在明神宗枕边吹风，使他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妃子。不仅如此，在朱常洛长大后，明神宗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被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大臣们所阻拦而没有得逞。之后，在拥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至拖延了十余年。

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明神宗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在万历二十

九年(1601年)被出封洛阳为福王。据历史记载,朱常洵一生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常洵,愤怒的饥民曾将他的血分而饮之。在洛阳城破之时,朱由崧有幸逃脱出城,流落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继承了福王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的护卫下,他辗转来到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避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帝朱由检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的一班明朝大臣,不甘于政权就此灭亡,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由于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僻远的广西、四川,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潞王朱常涝。经过激烈的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


马士英像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迎入了南京。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为大内阁大学士,同时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共拥兵三十万。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弘光,这样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了。

荒淫无道的集大成者 应该说,朱由崧当国执政之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弘光政权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而极端的腐败,十分的脆弱。

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没有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自己却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荒淫透顶。据历史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而其手下奸佞之人,乘机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竟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惟利是图。"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为兵败而蹙,俱仰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北,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众臣曰:'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岂意思及此。'"

除此之外,朱由崧为满足自己的淫欲,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日晚间出城,四处捕捉虾蟆,配制"蟾酥合媚"春药。因为田成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四个字。守城官兵只要见了这灯笼,便开城门放行。为此,民间称朱由崧是"虾蟆天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是,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拼命向上行贿,致使民怨沸腾。时人张岱曾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亡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真能集大成也!”

亡国之时 由于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荒淫无道,在朝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而对外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直接导致了私光政权的迅速灭亡。

清顺治二年(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曾和朱由崧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朱常淓为帝,所以朱由崧对他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潞王信佛,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由检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而此时的朱由崧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顺治二年(1645年)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崧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守将黄得功的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冷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崧及其爱妃,送与清军邀功。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结束了他短暂而又昏庸无能的一生。

偏安一隅欲复明　食书不化梦难成

——南明唐王朱聿键

南明唐王朱聿键(1602～1646)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的八世孙,崇祯五年(1632年)袭封为唐王,他既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勤政爱民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朱聿键向朝廷要求借兵三千前去参与镇压，朝廷害怕藩王趁机叛乱夺位而予以拒绝。他便自行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朝廷因他违反国法，降罪而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曾将朱聿键释放。但后来又怕他争夺帝位，于是命他迁居广西平乐府(今广西省桂林市南)，不久流亡于福建。清顺治二年(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同年闰六月初七，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二十天后，朱聿键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年号为隆武，故后世又称他为隆武帝。

朱聿键称帝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总结弘光朝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在总体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他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并决定御驾亲征。尽管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的阻挠，没有实现，但他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仍然值得称道。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早在朱聿键就任监国时，就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阐明自己对于"党争"的看法。

再次，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聿键施政时曾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因而深得人心。监察御史吴春枝纠劾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贪污虐民。他当即下旨："各官赃私可恨，皆纱帽下虎狼也。若不严惩，民生何赖？都着革了职，该抚速解来京，究问追赃充饷。"

另外，朱聿键称帝后，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他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经常身穿土布黄袍，安贫若素，而且生活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皇后曾氏。

书呆子皇帝　尽管朱聿键有比较好的人品和才学，也特别希望做成一番事业，锐意恢复明朝江山，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尤其是他自身还存在很多致命的弱点，最突出的就是他在为人行事方面，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书呆子气十足。

据说，朱聿键读书相当多，有些决断也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食书不化"，严重脱离实际，加之未经历练，匆忙登上帝位，不但不能力挽狂澜，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反而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史书上曾记载着这样几件小事：当时，南明还有一个小朝廷，是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的。一次，朱以海的军队遭到清军的猛烈攻击，只好派使者前来福州向隆武帝求援。因为鲁王在信上称朱聿键为"皇伯叔"，而未称"陛下"，朱聿键龙颜大怒，喝令身边的人把鲁王的信使杀了，还振振有词地认为"时事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朱聿键的这种做法，导致两个南明小朝廷水火不容，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进攻福建,隆武小朝廷危在旦夕。朱聿键决定率群臣转移到清军力量薄弱的江西,在清军乘胜追赶的情况下,他竟然舍不得丢掉几十车心爱的书。拉书的车辆慢吞吞地走,结果很快被清兵赶上了,从而丧失了一次摆脱清军追兵的时机。当隆武小朝廷的人马到达闽赣边境时,本来可以一鼓作气迅速进入尚无清军威胁的江西省境内。然而,就在这个当头,朱聿键偏偏要停下来打开行李晾晒龙袍,以便穿戴整齐地接受臣民的觐见。

当然,朱聿键自身的弱点只是导致隆武政权过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隆武朝廷一些将领的背叛和清军的强大。朱聿键称帝后,曾任用金声、杨廷麟、何腾蛟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屡次打算出兵北伐,收复了安徽旌德、宁国等失地。但他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使朱聿键四面树敌,穷于应付。

在清朝贝勒博洛率大军猛烈进攻福建之时,朱聿键苦于自己无兵,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黄道周于半途被清兵俘杀,朱聿键只得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但为郑芝龙所阻留。不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直扑延平。清顺治三年(1646年)8月21日,朱聿键逃出延平,到汀州城外时被清军追上,他带着曾皇后和忠诚伯周之藩等躲入关帝庙。清兵在门前厉声呼喝:"朱聿键出来。"忽然,一个人手持钢刀跳出庙门,高喝,"我就是隆武帝",挥刀杀向清兵,清兵急忙发乱箭将他射死,原来此人是周之藩,他想舍身掩护朱聿键脱险。清兵也怀疑他不是朱聿键,进庙搜查,只见后门洞开,庙内空无一人,才知朱聿键和曾皇后已从后门逃入汀州城内。

清军前锋统领努山于是命令几百个兵士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直奔城门。汀州守军以为是败退下来的明军,让清军一拥而入,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并将他俩分别押入轿子送往福州。当清军押着他们走到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猛然窜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身死。朱聿键也几次想自尽,都因清兵的严密监守而未成,于是绝食而死于福州囚处,终年45岁,后葬于福州罗汉岭。

水为金汤舟为宫　意图中兴难成命

——南明鲁王朱以海

南明鲁王朱以海(1618~1662)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三位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嗣鲁王位。

"摄政"浙东　在明朝历史上,鲁王朱以海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他的祖上、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藩封于山东兖州。鲁王爵位传到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时,已经是第八代。当时,朱寿镛被嗣封为鲁肃王,而朱以海是他的第五个儿

子。算起来,朱以海应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世孙,崇祯帝朱由检的族叔,

作为皇家子弟,朱以海本来一生应该过着金衣玉食、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这样一个好的机会,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几乎全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死后,朱以海的哥哥朱以派被嗣封为鲁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朱以海也差点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在弘光帝朱由崧时期寓居于浙江台州。

当时,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明朝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朱以海在张国维、方逢年、方国安等人的拥护下,自台州来到绍兴,就任监国,以分守台绍道公署为行在,立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

荒淫无度的生活 应该说,朱以海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因而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即位后生活上极为荒淫无度。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第四子李寄曾写有一首《西施山戏占》的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

朱以海既缺乏治国之才,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又极为腐败。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竟然任用匪人,如谢三宾参加鲁监国政权后,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一斑。时人张岱曾对朱以海评论说:"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今天看来,张岱的话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在军事上,虽然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同时,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还与福建隆武帝朱聿键的政权相互倾轧,争斗不已。朱以海出任监国前,唐王朱聿键已经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六月初七日在福州称帝。清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已称隆武帝的朱聿键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对于是否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监国大臣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十月初一日,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最后兵戎相见。

"海上天子" 就在唐、鲁互争正统、自相残杀的同时,清兵大军压境。清顺治三

年(1646年),清朝贝勒博洛乘朱以海主力与隆武帝朱聿键作战的机会,渡过钱塘江,大举进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张国维兵败身亡。前来投靠朱以海的原弘光帝佞臣马士英、阮大铖,乘机唆使部将劫持朱以海降清。朱以海察觉后,慌忙单身一人逃到石浦,遇到了定西侯张名振。

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辗转于浙江、福建海上,过着"水上为金汤,舟楫为宫殿"的艰苦生活,时人称之为"海上天子"。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朱以海进城。于是,朱以海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从顺治四年(1647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朱以海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他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博洛已率清军主力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他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顺治五年(1648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福建建宁、邵武、兴化3个州及漳浦、海澄等27个县。事实表明,闽浙各地百姓迫于清朝暴虐统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斗争,朱以海不失时宜地组织抗清,颇有一番作为。特别是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高潮,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

然而,南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良机坐失,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所复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清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名振和荡湖伯阮进杀黄斌卿,并接朱以海至舟山,建立鲁王行宫,张名振和阮进等主持军事,重新整顿朝政。从这时起到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原为隆武帝政权的坚决支持者,不满朱以海大敌当前还与隆武帝自相残杀,削弱了抗清的力量,但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排他居住于金门。次年三月,朱以海取消监国称号,在海上与郑成功联合各部义军,坚持抗清多年,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十七日在金门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抢继大统成闹剧　以身殉国显气节

——南明嗣唐王朱聿𨮁

南明嗣唐王朱聿𨮁(1602~1646)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也是南明政权中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从称帝到被俘仅有41天。

侥幸称帝 朱聿鐭与其哥哥、隆武帝朱聿键均属崇祯帝朱由检的远亲，其祖上为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柽。在朱聿键继位为隆武帝后，朱聿鐭袭爵为唐王。清顺治三年(1646年)8月，朱聿键被清军俘获后，朱聿鐭和隆武朝的残余官员历经千难万险由汀州从海上逃到广州。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已经在广东肇庆推举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由榔为监国。

由于朱由榔宠信太监王坤，而王坤又与原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勾结，上下弄权，在江西赣州失守后，不顾广东籍官员的反对，仓皇从广东肇庆逃往广西梧州。到达梧州时，广东全境还在明朝掌控下。桂监国政权的这种逃跑政策，在广东许多士绅官员的眼中，无疑于自弃疆土，且不顾部属和百姓的生死，因而使南明政权的内部矛盾再度激化。崇祯时的户部员外郎、隆武朝的重臣之一东阁大学士苏观生曾在赣州城破后，率领大军退入广州。当他得知丁魁楚拥立朱由榔后，也想参与拥立。但他受到丁魁楚及另外一名大学士吕大器的排挤，苏观生感到极端的不满。

正在这时，朱聿鐭的到来使苏观生感到一个大好的机会从天而降：与其向桂藩乞求，倒不如自立门户，遂决定以封建宗法中的弟继兄位为据，拥立朱聿鐭。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日，苏观生及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拥立朱聿鐭为监国，并以都司署为行宫。为了抢在桂监国政权的前头，三天后，朱聿鐭正式称帝，改元绍武，故史称其为绍武帝。

朱聿鐭的绍武政权很大程度上是苏观生趁朱由榔君臣逃往广西的机会拉拢一部分广东官员建立的，社会基础狭窄，因而注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苏观生由于拥立之功，被任为首席大学士，加封建明伯，掌兵部，所以朱聿鐭很多时候不得不听任苏观生的摆布。

尽管如此，朱聿鐭即位时，竟还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制造符合皇帝规格的各级仪仗和器具，苏观生等仓促行事，举国奔走，并下令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夜以继日赶工。虽然做了各种准备，但毕竟财力物力人力皆有限，倾尽广州全城，却连文武衣冠都准备不及。在朱聿鐭即位后的十天之内，他曾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官吏们没有朝服，无奈之下只好借演戏所用的衣饰袍笏登场，被时人传为笑话。

同室操戈 朱聿鐭一登上帝位，就和广东肇庆的桂王朱由榔为争夺正统地位而攻战不已。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停地收编各路海盗，以图扩充实力。潮州人杨明兢赤手空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十万“满潮、惠之间”，居然被委任为潮惠巡抚。苏观生还招来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姓海盗，借以增强绍武政权实力。

登上帝位之前，朱聿鐭、苏观生为了拉拢桂监国政权，曾派遣原隆武朝兵部职方主事陈邦彦至梧州交涉。但在途中，朱聿鐭已经在广州称帝。十一月初八，朱聿鐭称帝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及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于是，朱由榔等人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并于十八日宣布即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滑稽而可笑地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

永历朝廷在迁回肇庆后，速派了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以参见藩王的礼节拜见朱聿鐭，向其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言甚殷切，可以说是声泪皆下，希望他退位归藩。但两人言语多次冒犯苏观生等人，致使苏观生大怒，执意斩杀了彭耀和陈

嘉谟。苏观生既斩两使，自知无法善罢，干脆下令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调动军队进攻肇庆，永历朝廷只得委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夏四敷、李明忠率军万余迎击。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三水县城西，内战正式爆发。

初战陈际泰临阵脱逃，绍武政权军队大败。林佳鼎首战告捷，遂志得意满，企图一举扫平绍武政权。而绍武方面，初战失利后，朱聿𨮁、苏观生令广东总兵林察会同新近归降的石、马、徐、郑四姓海盗，合共数万人前往抵挡。老谋深算的林察，采用劝降诱敌深入的计策，以同宗同事的名义写降信欺骗林佳鼎。林信以为真，遂于十二月二日在三水中伏，被四姓海盗的大船夹击，永历大军一败涂地，林佳鼎、夏四敷战死，李明忠仅以身免。消息传到广州，朱聿𨮁、苏观生等更为得意，下令广州全城上下张灯结彩以粉饰太平，将朝政大事皆委于关捷先、洪朝钟等人。

"从容遇难" 正当两个南明政权为所谓的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率领下由潮州、惠州一线向广州推进，一路上势如破竹，利用绍武政权忙于打内战、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广州西面的契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东面直扑广州，每到一地先扫除传递军情的兵士，封锁消息，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报告，以迷惑绍武政权。

十二月十五日，清军前锋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闯入广州，而朱聿𨮁和他的大小官僚还在梦中，预计此日"幸武学，百官咸集"。有人向正在武学里的众大人报告。苏观生叱之说："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于是，把报信人处斩。此时，清兵已自东门杀入城内，他们在内应的接应下，去掉头上的伪装，露出辫子，登上了城墙，乱箭下射，城中顿时鼎沸起来。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已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朱聿𨮁见大势已去，无力抵抗，只得慌忙逃到大臣王应华宅中躲避，被清军查出，关在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饮食，朱聿𨮁拒不接受，说："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坚决绝食。当天晚上，趁守兵不防备，朱聿𨮁解下腰带自缢而死。尽管朱聿𨮁胸无大志，庸懦无能，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在被俘后，却也如其哥哥朱聿键一样，"从容遇难"，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很值得人们称道。朱聿𨮁、苏观生及一些大臣自杀后，时人为纪念他们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将他们的遗骸丛葬于城北流花桥畔。清朝乾隆以后，有人为他们修墓立碑，称"绍武君臣冢"。

"逃跑天子"图复明　日暮途穷成泡影

——南明桂王朱由榔

南明桂王朱由榔(1623～1662)是历史上南明政权中称帝最晚、坚持抗清时间最久的皇帝，同时也是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初封永明郡王，清顺治三年(1646年)曾在广

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故后世又称他为永历帝。

继承皇统 桂王朱由榔也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朱由榔的父亲、桂恭王朱常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个儿子，算起来，朱由榔还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弟。因此，从血缘上说，朱由榔是嫡正的皇系。正是有了这点“皇家血统”，朱由榔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登上所谓的“九五之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明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进军湖南，桂恭王朱常瀛带着第三子朱由楥逃到广西梧州，第四子朱由榔却被大西军所俘，幸亏得到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吏保护，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到梧州与其父相聚。次年十一月，朱常瀛病故，由朱由楥掌管府事。



瞿式耜像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廷灭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朱聿键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因此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桂王。

不久，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遇害的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在大多数官绅心目中，桂王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子孙中当时剩下的唯一藩王，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虽然朱由榔生性懦弱，但却“相貌堂堂”，据说很像其祖父明神宗朱翊钧。父、兄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承人。不过，朱由榔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投入他的府中，懂得宫中“故事”，为其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

清顺治三年（1646年）一月，明朝原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立朱由榔为监国，十一月十八日，丁魁楚、瞿式耜等人又拥戴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

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贪生怕死，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此从称帝之日起，便在逃亡中度日，人称“逃跑天子”。

就在朱由榔称帝之前，隆武帝朱聿键的弟弟朱聿𨮁已在广州被大学士苏观生拥立，正式称帝。在抗清的关键时刻，两个南明政权却不能团结一致，为争所谓的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但是，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于是，朱由榔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清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榔到达梧州，仍恐不安全，又经平乐府逃到桂林。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二月间，清军将领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跟踪追至平乐府，进逼桂林。朱由榔依然故我，在四月间逃到了武冈。武冈守将刘承胤表面上保护朱由榔的安全，实际上是挟天子以自重。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清军将领孔有德率军向武冈进逼时，刘承胤向孔有德表示愿意献上朱由榔作进见礼。孔有德怀疑其中有诈，没有立即答应。刘承胤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投降，一面下令将武冈城门严密看管，防止朱由榔出逃；一面自己剃头再次前往清军营中接洽投降。

武冈城中的朱由榔和他的一小批亲信见清军追近，刘承胤行踪诡秘，感到情况不妙，请出刘承胤的母亲和兄弟刘承永，要求移跸靖州。在刘母出面干预下，才开了城门，朱由榔和少数朝臣带着宫眷匆忙出城逃难，象征皇帝威严的仪仗乘舆等都来不及收拾，全部丢弃在武冈，直奔广西柳州。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请他移跸广西省会桂林。朱由榔却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二月初五日才再次来到桂林。

然而，事有意外，全州守军降清以后，广西门户洞开。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至二月，清军孔有德部向桂林推进，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不得不离开桂林，逃到南宁。四月，清朝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并派使者迎请朱由榔移跸广东。六月初十日，朱由榔由广西南宁起程，前往肇庆。由于李成栋反清归明，使朱由榔的永历朝廷管辖区域骤然扩大到广东全省以上。这本是好事，但却由此产生了以瞿式耜、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以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为后台的"吴党"之争。

在瞿式耜、李成栋的支持下，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等五人结党把持朝政，招权纳贿，人称"五虎"。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朱由榔逃到广西梧州后，开展"打虎运动"，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由此也使朱由榔的中兴之梦逐渐幻灭。

惨不忍睹的结局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克广州，孔有德部占领桂林，驻于梧州的朱由榔君臣再次仓促登舟，向南宁逃难。不久，清军又从柳州南下，危及南宁。

南宁失守后，永历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自己的管辖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由榔和他寥寥可数的廷臣勉强接受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余部的安排，迁入贵州安龙府，并在此留住了四年。这时，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部已据有云南全境，使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永历朝廷又增添了活力。

但是，自从孙可望把朱由榔迁到安龙以后，朝政大权已经完全被他掌握。孙可望甚至放任或指使亲信拥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遇到了内部掌握兵权的李定国、刘文秀等将领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以偿。后来，李定国率军8万发动反攻，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

不幸的是，这时的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发生矛盾，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掉李定国。李定国不得不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是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只得撤退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控制的朱由榔。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朱由榔回师云南。次年，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孙可望虽兵力众多，但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被李定国所败。顺治十五年(1658年)，孙可望率军降清，贵州、广西均为清军进占。

由于孙可望叛乱，朱由榔失去了大部分地盘，南明政权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三路追逼南明政权。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在草房之中，处境十分困辱。

朱由榔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他

接连十三次派人去交涉，接永历帝回国，均被缅甸国王拒绝，朱由榔也不敢回来。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哇达姆摩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发兵三千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斥责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但最后却又说，希望这位“旧朝重镇，新朝勋臣”，念及“先帝大德”，留他一条活路。吴三桂不允，仍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缅甸国王于是派兵把朱由榔抬到吴三桂军营。

朱由榔被俘后，情形惨不忍睹，随侍的只有小内官五人、宫女三四人和跛足侍卫总兵邓凯。曾经随驾至缅的官吏及后妃、侍从，或死或散，或被清军抢走。吴三桂将朱由榔押回云南昆明，据说他被押回之时，“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许多百姓亲眼看到故主蒙难，“不免黯然神丧，无不泣下沾襟”。

后来，吴三桂担心如将朱由榔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又命昆明知县聂联甲派人搬运柴薪，把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军从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作证。但是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不忘朱由榔，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烧烬小骨葬于太华山。至此，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烟消云散，历史的车轮完全驶上了大清帝国的轨道。

明代的后妃

深宫里的莺莺燕燕们

——明代后妃制度

皇帝富有四海，天下只不过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物，能把这江山传给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这是所有开国皇帝的愿望。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而皇贵妃是到了宣宗宣德年间才开始有的，皇帝特别宠爱一个妃子，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立她为皇后，就把她从贵妃加封为皇贵妃，以示恩宠。俗言："后宫佳丽三千。"如果单算皇帝嫔妃的话，当然没有那么多，但如果连那些做粗使杂役的宫女也算进去的话，就远远超过三千了。明末，内廷宫女多至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皇帝面，也没和皇帝说过一句话，默默无闻，老死宫中。

前朝选妃十分注重门第，嫔妃多是名门闺秀、世家大族，这往往会使后族势力过大，威胁到皇权。如东汉有大将军梁冀，他的一个妹妹是皇太后，另一个妹妹是当朝皇后。梁冀权倾朝野，行事肆无忌惮，皇帝成了梁冀手中的傀儡，被称为"跋扈将军"。明朝吸取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代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如万历皇帝对郑贵妃恩宠有加，但也绝不允许她干政，当时有一个太监叫史宾，能诗善文，一直伺候在皇帝的身边。一日，文书房缺员，万历皇帝开玩笑地说："史宾可以补这个文书房的缺！"郑贵妃因为与史宾关系很好，因此在一旁大



章圣皇太后宝

说史宾的好话。万历皇帝一听大怒:“这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吗?”郑贵妃马上伏地请罪。正因为如此,明代的外戚始终未造成什么大的祸乱。

但是明代宫廷里有一件极端残忍的事,就是后妃殉葬。每当皇帝驾崩,皇宫里就哭声一片,她们并不是在哀悼死去的皇帝,而是哀悼即将陪葬的自己。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地上放着一排小凳子,上面的横梁上悬着一条一条的白绫,这些是为后妃们上吊准备的。朱元璋死时,殉葬的后妃有四十六人;永乐皇帝朱棣有十六人;仁宗死时,有五个妃子殉葬……明初的皇帝死时都有妃子殉葬。有一个贤而有文的嫔女叫郭爱,她入宫还不到一个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


皇贵妃图书印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直到英宗死前,口占遗命,吩咐以后不要用嫔妃殉葬,这种惨绝人寰的殉葬制度才最终废除。以下我们将近距离地去观察这群深宫里的莺莺燕燕们,和她们一起体会在皇宫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大脚马皇后

明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马皇后死后陪葬在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尊谥为“孝慈贞化哲惠仁徽成天毓圣至德高皇后”,是明代谥词最长的皇后,也是明代唯一能当得起这么长谥词的皇后。当然,在那些旧文人的眼里,虽然马皇后什么都好,却可惜天生大脚,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元朝末年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马皇后的父亲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女儿去投靠在濠州起义的好友郭子兴。马父在死之前把女儿托付给郭子兴,郭子兴便把马小姐收为义女,视若已出,十分疼爱。而此时的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帐下的一名小卒。但朱元璋计谋多,有决断,作战勇敢,很快便升为亲兵九夫长。郭子兴也越来越倚重这个和尚出身的九夫长,什么事都和朱元璋商量,对他言听计从,为了笼络住朱元璋,他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小姐嫁给朱元璋。这时朱元璋二十五岁,而马小姐二十岁。婚后两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马氏温柔贤慧,很受朱元璋的敬重。她知道朱元璋虽然胸怀大志,但和自己一样出身穷苦,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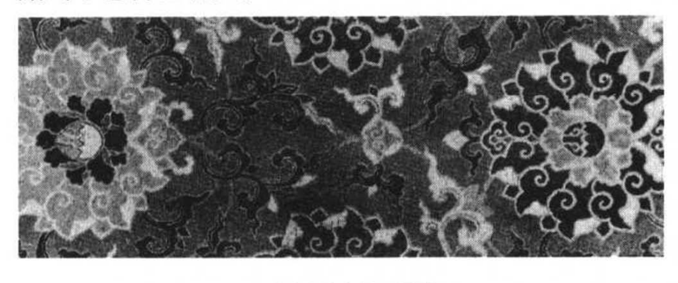

马皇后像

字不多，便时常规劝朱元璋征战之余，多多读书。朱元璋很是听从马氏的劝告，很快就能读书断句，还能写诗。马氏自己也对读书识字十分用心，她在军中见有文书，就叫人教她认字。

朱元璋凭着自己的才能，慢慢成为郭子兴手下的干将。郭子兴的儿子对朱元璋十分妒忌、怨恨，时常在父亲面前进谗言，因此朱元璋和郭氏父子的关系都很紧张。马氏对这种情况很担忧，时常劝朱元璋对郭子兴更加恭敬一些，作战时如果有什么掳获，也都献给郭子兴和他宠爱的二夫人，马氏自己也经常把金银首饰送给二夫人，谎称是朱元璋让她孝敬二夫人的。有了马氏居中调解，才使朱元璋避免和郭子兴反目成仇，朱元璋才得以从容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次，朱元璋又惹郭子兴生气，被郭子兴幽禁了起来，还不许送茶饭进去。马氏便把热腾腾的炊饼揣在怀里，偷偷拿给朱元璋，自己的胸口却被烫得通红。

朱元璋四处征战，难得在家里好好吃一顿饭，马氏便总准备好一些干粮腌肉，想法子让丈夫能够吃饱。丈夫在前线征战，她便带着妇女在后方缝衣做鞋。如果前方打了胜仗，她便拿出自己家中的财物犒劳士兵，大家都称赞她贤惠。

朱元璋在南京即位，马氏也被册封为皇后。这时马皇后已经三十五岁，但朱元璋还是十分敬重她，马皇后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马皇后都叫女官教自己读书，让自己知道历代有名妇女的事迹，以此来要求自己。马皇后虽然这时已经贵为一国之后，但还是坚持照料朱元璋的饮食起居，别人劝她不必如此操劳，但她说："侍奉丈夫是我的分内事，不能推辞。"她自己的衣服破旧了，也舍不得换新的。朱元璋看到妻子这样贤惠，时常对群臣感慨说："皇后和我同起布衣，历尽忧患。朕每每不能忘怀当年她不顾灼伤皮肤，为朕送来热食。而当朕受到郭公的猜忌，几乎被置于死地时，皇后更是为朕多方设法周旋，救我出危难。如果没有皇后，我哪里会有今天？朕怎么敢因为现在富贵了而忘了以前贫贱时的妻子？"马皇后却说："妾听说，夫妇相保易，而君臣相保难。陛下能够不忘怀妾，更希望陛下始终不忘群臣百姓。"


红地牡丹加银锦

危难时，患难与共容易；而富贵时，君臣相保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朱元璋为了防止出现权臣干政的情况，数兴大狱，杀戮功臣。当时宋濂被牵连进宰相胡惟庸的谋反案。宋濂是明初的大学问家，编撰过《元史》，还做过太子的老师。虽然

这时宋濂已经辞官回乡，但朱元璋并不准备放过他。太子听说皇上要杀自己的老师，急得跳了水，幸亏被侍卫救起来。马皇后听说了以后，暗自想好了办法。这天，朱元璋入宫用膳，发现一桌子全是素菜，问是什么缘故？马皇后说："平常人家请个教书先生，始终是礼敬有加。宋老先生这些年来，教导诸位王子，十分辛苦。我们今天吃素为他祈福。"朱元璋一听，又是为宋濂求情，大怒，甩手而去，但因为马皇后的求情，他还是放过了宋濂，只是把他发配到茂州。



宋濂像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脾气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暴躁，动辄杀人，马皇后经常委婉开导。一次，朱元璋听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不孝，竟然要杀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十分生气，当下就要杀掉他。马皇后劝道："郭景祥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杀了他，郭景祥就绝后，况且这件事不一定是真的。"一探查，果然是冤枉。又一次，一个宫女惹得朱元璋非常生气，便要亲自惩处这个宫女，马皇后也装作非常生气，马上把这个宫女交给宫正司议罪。朱元璋问："这是为什么？"马皇后说："你正在气头上，对这个宫女可能会惩罚过重，交给宫正司，他们会秉公处理的。"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福"字倒贴也与马皇后有关。一次正逢元宵，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南京)的街上赏花灯，看见其中一幅画，画中一个妇人骑在马上，怀里抱着大西瓜，而且赤着大脚。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用来讥讽马皇后出身寒微，没有裹脚。竟敢污辱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一定要严惩。于是朱元璋吩咐侍从走到挂着这副画的那条街，在各家各户的门上都贴上一个倒转的"福"字，作为标记，明天再一起算账。朱元璋回宫后，心里还是闷闷不乐，马皇后见他这样，便询问侍从，得知明天被倒贴上"福"字的人家便会受到惩罚，而且这大祸还是由她而引起的，十分着急。马皇后对朱元璋苦苦求情，但朱元璋怒气未消，她只好暗中再派侍从在全应天府各家各户的大门上依样贴上倒转的"福"字。第二天，朱元璋派侍从抓人时，被全城倒转的"福"字弄得糊涂了，不知该抓谁。朱元璋知道马皇后的苦心，再加上过了一夜，怒气也慢慢平息了，便不再追究此事。应天府的居民们看到自己之所以能平安无事，都是拜这个倒转的"福"字之福，自此之后，每逢过年时，便贴上一个倒转"福"字以祈求万事如意、阖家安康。

虽然这个传说难辨真假，但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马皇后仁德的形象深入民心。

马皇后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维持着宫廷里、君臣间、君民间的和睦，为朱元璋减少了很多的杀戮。后来马皇后病重，朱元璋对此寝食不安，到处求神拜佛，为皇后祈福，又征招天下名医为其诊治。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祈福有什么用呢？而药也只能医治不死病，臣妾不行了，陛下千万不要因此加罪于为我诊治的御医。"到了弥留之际，朱元璋紧紧握着马皇后的手，恸哭不止。马皇后看着逐渐苍老的丈夫，想起以前陪伴他一起征战天下的岁月，最后对朱元璋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

民得所而已。"是年马皇后五十一岁。失去马皇后的朱元璋,性格变得更加暴躁,马皇后临终所期待的君臣相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明初功臣被朱元璋屠戮殆尽与马皇后过于早逝也有关系。

仁宗张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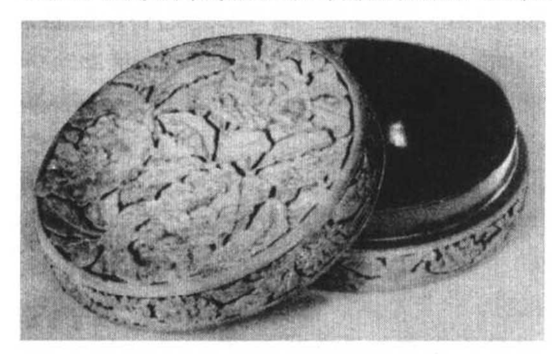
张皇后像

仁宗张皇后为人贤慧贞静、有谋有守,堪称女中豪杰,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有多次临朝听政的机会,却谨守妇道,安于内宫。而且对自己的娘家人严格管束,不使他们随便干预朝政,是一位备受称道的贤后。

张皇后,洪武二十八年就被封为燕世子妃,她的公公就是以后举兵赶走侄子建文帝,而自己登上皇位的燕王朱棣。张家只是小康之家,父亲是彭城伯张麒。张麒是在张氏做了皇后之后,父以女贵,才被封了彭城伯。张皇后有两个哥哥,也都在燕王帐下效力。

当时还只是燕世子的朱高炽,十分不讨燕王朱棣的喜爱。燕王起兵造反之后,亲自带兵四处征战。朱高炽因为身体肥胖,脚又有点跛,骑不得马,因此被留守北平。朱高炽由于留守后方,在整个靖难之役中不在朱棣身边,他的两个兄弟汉王、赵王时时在朱棣面前进谗言,想取而代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因为汉王功大,朱棣手下的几位大将也拥立汉王做皇太子,朱棣自己也常常摇摆不定。一日,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朱棣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因为张氏的能干,很得公公的喜爱,这对于仁宗朱高炽储位的稳固有很大的帮助。

仁宗朱高炽顺利登基后,张氏也随之被册封为皇后,可惜没过多久,仁宗便过世了,她的儿子宣宗即位,张氏被尊为皇太后。宣宗即位之后,十分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四方朝贡的物品也都首先进献给母亲。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干预朝政。宣宗和他父亲统治时期,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为了给常居深宫的母亲解闷,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和张太后,还有他的嫔妃们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搀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还陪同母亲去



明剔红漆茶花纹圆盒

拜谒明祖父成祖朱棣和父亲仁宗朱高炽的陵寝。一路上，百姓拜伏地上，高呼万岁。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们这样拥戴皇帝，是因为皇帝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皇帝一定要时常把百姓的困苦放在心上。"有农家献上酒食，张太后亲切慰劳，询问生计，还把酒食拿给皇帝品尝，让宣宗知道民间的风土人情。"仁宣之治"的形成，里面有张太后的很多功劳。

当然母子也有关系不协调的时候。宣宗不喜欢皇后胡氏，而喜欢更加貌美的孙贵妃，为了显示恩宠，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再加上胡皇后一直没有子嗣，宣宗就一直想废掉胡氏，而立孙氏为皇后。宣宗召集大臣商议自己想改立皇后的事，但大臣们都说："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看到宣宗听了不欢喜，又马上献计说："不如好好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辞去中宫之位。"胡氏便这样被逼着自己请辞，但因为张太后一向喜欢胡氏的贤慧，坚决不同意，宣宗对此便没了办法。传说宣宗对换后这件事殚精竭虑，胡皇后和孙贵妃都没有儿子，宣宗便用一个宫人之子冒充为孙贵妃所生，并且册立他为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孙贵妃母以子贵，在宣宗向张太后保证以后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张太后勉强同意改立孙氏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对无故被废的胡氏十分同情，时常加以照拂，经常将她召到自己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家宴时，还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但孙皇后也不敢对胡氏怎么样。

对于胡氏无过被废，虽然有张太后的极力阻拦，但终于还是无法挽救。后来的史家对宣宗无故废后这件事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宣德十年，宣宗驾崩。张太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沉浸在丧子的巨大悲痛当中，整天精神恍惚，滴水不进。而这时应当继位的英宗才九岁，宫中谣言四起，一说："年幼的英宗会继位，但张太后会临朝听政。"一说："英宗太年幼了，张太后将召外地的藩王来入继大统。"群臣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有的大臣已经在考虑怎么去拥立新皇帝，好立下定策奇功。张太后眼见局势日益混乱，人心浮动，只好强抑悲痛，出面宣召诸位大臣来到乾清宫，把年幼的孙子放在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说："这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天子，你们以后要好好辅佐。"众大臣高呼万岁。这样英宗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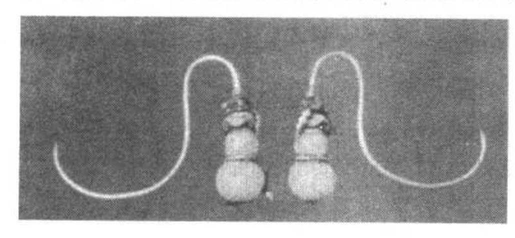


明代女子服饰

因为英宗年幼，不能理政，大臣们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说："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张太后始终不愿意听政，而是一意重用"三杨"等这班老臣，只有遇上重大难决的事，张太后才出面指示。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当时的内阁大臣，相当于宰相。他们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太皇太后对他们非常倚重，言听必从。

而对于自己的娘家人，张太后要求严格。张家此时已今非昔比。她的一个哥哥如今掌管着五军右哨军马，手握重兵；另一个哥哥曾经掌管过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是明朝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年幼的英宗登基后，她把她的兄弟叫到面前来，叫他们以后做人一定要自敛，不能干预朝政。当时杨士奇上书请求重用张太后那个已经赋闲的哥哥，张太后总是不许。有了张太后的全力维持，在英宗的早期，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繁荣昌盛。

当时英宗十分宠信王振，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又有张太后撑腰，自己无法动摇三杨辅政的地位，因此表面上对张太后和三杨毕恭毕敬，时常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样子。一次，英宗与小内侍在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十分痛心疾首的样子，对皇帝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看了，对王振大加赞赏。其实王振表面上对三杨事事顺从、百般讨好，但暗地里却时常劝导英宗对待臣下要用重典，不能过分倚重这帮老臣，还劝皇帝不用开"经筵"。"经筵"是翰林院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用来教皇帝读书写字和治国之道的课程。三杨被王振蒙蔽，而同样深处内宫的张太后却对王振逐渐干预朝政早已有耳闻。一天，她召见皇帝和诸位大臣，英宗侍立在左边，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五位大臣侍立在右边。还命令身旁的宫女装上戎装，守卫在一旁。接着，又叫人去传唤王振，喝令王振跪在地上。太皇太后指着诸位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老臣，是几朝元老，是先皇特地挑选出来辅佐你的，国家大事你要事事咨询他们，要听从他们的谏告，不能一意孤行。"又声色俱厉地对跪在地上的王振说："太祖时就定下家法，宦官不能干预朝政，违反者定斩不饶。你这畜生竟然敢乱祖宗的家法，我绝对不能饶你。"说完，侍立一边的宫女，刀剑齐下，就要把王振斩于阶下。王振已经吓得面无土色，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一见自己最亲信的太监就要被祖母斩杀，也吓得要命，跪在地上恸哭。而五位大臣平时被王振蒙蔽，还没发现王振的狼子野心，也一齐跪下为王振求情。太皇太后一见如此，怒气稍息，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这一次看在诸位老臣的面上，就暂且放过他吧。"但张太后对王振还是不放心，每隔几天便派人去内阁察看，看王振有没有擅权乱政。故张太后在世时，王振始终规规矩矩，不敢猖狂。



明代女子饰物

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重，不久过世。病危时，还召见杨士奇、杨溥，询问国家现在还有什么大事要办，她知道英宗不懂事，想趁自己还在的时候，把该办的事先办了。杨士奇接连上书指出国家急需办而还未办的事情。可惜，杨士奇第三封奏疏还没上，张太后便病逝了。由于失去张太后的钳制，几位重臣又死的死，辞职的辞职，王振肆无忌惮，开始擅权，朝臣中附和自己的便大加提拔，反对自己的一律排挤，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还把明太祖挂在宫内的那块"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给摘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他怂恿皇帝亲征瓦剌，由于准备仓促，而王振又越俎代庖，干预军队的指挥，导致明军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亦妻亦母万贵妃


万贵妃像

明英宗被瓦剌所掳后，举朝震惊。皇宫里更是人心惶惶，孙太后（宣宗时的孙皇后）和英宗皇后钱氏马上搜罗宫中的金银珠宝，满满地装驮了八匹马，派太监运送给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瓦剌好不容易掳获英宗，以为奇货可居，当然不肯。天不可一日无君，赎不回英宗，而此时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才两岁。国家这时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一个年长的君主实在难以应付这次灾难。因此孙太后便立英宗的弟弟为皇帝，也就是景帝，而朱见深则被立为皇太子。景帝当然希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侄子朱见深。在景泰三年，朱见深被废为沂王。后来明英宗又重新夺回皇位，朱见深才被复立为皇太子，朱见深得到储君之位可以说是经历了颇多的磨难。在这重重的磨难中，朱见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宫女陪伴着，这就是后来的万贵妃。

万氏是山东诸城人，四岁的时候便已经入宫，原本是孙太后身边的宫女。她面目清秀，又聪明伶俐，是孙太后的心腹，经常随侍左右。此时皇太子太小，孙太后便让万氏去照顾他。可能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宪宗生性懦弱，什么事都很依赖万氏。传说，万氏在宪宗身边，经常是戎装打扮，宪宗十分喜欢。可能过早地经历政治上的险恶，给宪宗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宪宗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他觉得有锦衣卫、东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还不足够，又增设了西厂，来刺探情报。而万氏的戎装打扮也可能会给宪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宪宗又有点口吃，不喜欢见生人。但是皇帝要上“经筵”，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违反。每次上课，他坐在位子上，任凭翰林院的讲官怎么问难，他总是一言不发，好像在听，又好像没在听，讲官对此毫无办法。下课之后，按例皇帝要留讲官们吃饭的，以示尊师之意。这次皇帝总是要开口，宪宗就只讲一句：“先生吃酒饭！”就让太监们示意讲官退下。宪宗的这些心理，从小照顾宪宗长大的万贵妃当然知道，这也是万氏以后虽年老色衰，但却始终受宠的原因。宪宗待万贵妃也与别人不同，叫她“万侍长”。在宪宗那里，万贵妃扮演的是亦妻亦母的角色。

宪宗朱见深十六岁即位，万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宪宗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阻力太大，因为举国上下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十九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后来万氏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皇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般无二的。万氏平日也仗着皇帝的宠爱，横行后宫，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吴皇后愤愤不平，一次抓着万氏的过错，令宫妇杖责万氏。万氏何曾受过这样的罪，马上到宪宗面前哭诉，宪宗龙颜大怒，马上把刚立为皇后的吴氏废掉，改立王氏为后。


明刺绣芙蓉鸳鸯图

由于有前车之鉴，王皇后谨小慎微，处处对万氏宽容退让，万氏成了后宫实际的主人。

万氏并不满足，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皇帝生下皇长子。像宣宗时的孙贵妃一样，如果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自己母以子贵，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后。因此万氏整天缠着宪宗，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苦有心人，在成化二年正月，万氏为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欣喜若狂，万氏晋封为贵妃就是在这时，只要再进一步，只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自己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了。可惜，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万氏从此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万氏把满腔的怨恨撒向其他的嫔妃，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以后还生个一子半女的，好来圆她的皇后梦，因此她不许其他嫔妃比她早生下儿子。从此以后，后宫中那些被宪宗临幸过并且因此而怀孕的嫔妃们都遭了殃，她们所怀的孩子都会被万氏强行打掉。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太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后来，宪宗偶然临幸纪氏，使纪氏怀孕生子，宫人冒险将皇子养大后送至宪宗跟前，让宪宗喜出望外。由此宪宗知道了万氏以前的种种恶行，但从小养成的依赖使他仍然对万氏宠爱有加。

万氏看到皇长子已经降生，而自己做皇后是无望了，便放松了对其他嫔妃的控制。自此宫中喜讯频传，宪宗的儿女接连诞生。

成化二十三年，已经五十八岁的万贵妃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为此茶饭不思，辍朝七日。从此郁郁寡欢，经常长吁短叹："万侍长去了，我还能呆多久呢？"没过几个月，宪宗在忧愁中随万贵妃逝去，终年四十岁。明代宫闱令人厌恶的一段丑闻遂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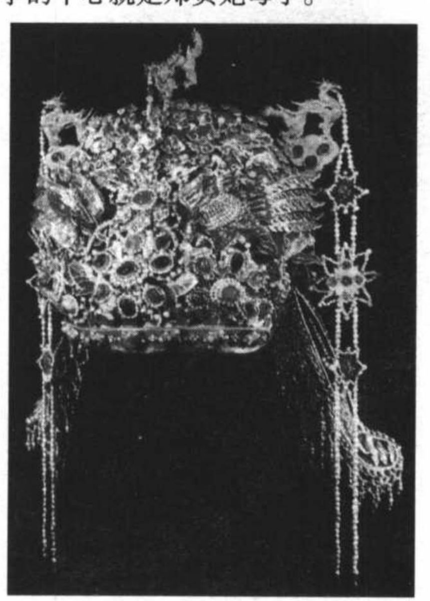
神宗郑贵妃

"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慢慢走向衰落，接下来的几个皇帝也很平庸。宪宗成化皇帝、孝宗弘治皇帝、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穆宗隆庆皇帝、神宗万历皇帝几个皇帝中，除孝宗外，其他几个皇帝都乏善可陈。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一心搜罗钱财；而大臣们在徇私结党，互相倾轧。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一般认为，明朝末年的党争起源于万历朝，万历年间的党争则是起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指储君的人选，立储君，定国本，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而处在这场纷争漩涡中心的就

是神宗的郑贵妃和他的儿子——福王朱常洵。


郑贵妃像

明神宗十岁就即位，是整个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长达四十八年。在万历年间初期，神宗年幼，张居正柄政。张居正是明代少有的权相、改革家，他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着力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使本已奄奄一息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气象。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神宗开始亲政。神宗不仅懒，不上朝、不理政外，还十分贪财。按说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产，但神宗皇帝十分奇怪，他非要把钱财搜刮进宫，存在自己的小金库里，这样他才欢喜。神宗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四处搜刮民财。民怨最大的是派出矿监和税使，就是派出太监去开采金银等矿和去交通要道设关收税。这些矿监税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皇帝敛财。神宗也知道矿监税使是天怒人怨，但在有生之年，自己实在舍不得这项财源。一次神宗病得不轻，自以为将离开人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说："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明代政令的发出是由内阁先票拟，进呈给皇帝，皇帝同意之后，便由司礼监代为批红，再发还内阁去执行。沈一贯见神宗有意要废除矿税，大喜，当天便票拟好废除矿税的谕旨进呈，神宗看后同意，也在当晚就回复。但是第二天，神宗感到自己的病竟然要好了，十分后悔，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说矿税不能废。沈一贯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谕旨发下执行。太监叩头恳求，额头都快流出血。沈一贯终于把谕旨发还。当时人便讥笑沈一贯说："只要你再坚持一会儿，把谕旨发下执行，百姓便可少受几年的苦了。"神宗国事处理得不好也便罢了，家事也弄得一团糟，对明王朝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场纷纷扬扬争论数十年的"争国本"案。而这场纷争的中心就是郑贵妃母子。


万历皇后凤冠

郑贵妃，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当差，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慢慢从宫女升至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国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因此按例应封皇长子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下的皇子排行第三，皇长子早已出生，但神宗不喜欢，迟迟不肯立为太子。皇长子的生母是妃子王氏。王氏本是慈宁宫里的一个小宫女。一次，神宗来到慈宁宫，叫人端水让他洗手。王氏端水进去侍候，神宗一时高兴，便临幸了她，神宗过后也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王氏怀孕了，李太后追问此事，神宗矢口否认。李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明朝有制度，皇帝私幸宫女，都由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核。神宗看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李太后又在旁边劝导说："我老了，想早点抱孙子。如果能早点生下皇子，这也是祖宗有灵，社稷保佑。"神宗这才勉强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

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

神宗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朱常洛,而郑贵妃一直受到神宗的宠爱。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神宗又把她进封为皇贵妃。神宗还向郑贵妃立下誓言,以后会立朱常洵为太子。外廷见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而对郑贵妃又宠爱逾分,纷纷担心皇帝会舍长立幼,坏了祖宗的家法。因此诸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早日确定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李太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日,李太后故意问神宗:"外廷的大臣都说应该早立长哥(长哥,明宫是对皇太子的称呼),皇帝打算怎么办?"神宗说:"可惜常洛是都人(明宫中称宫人为都人)所生!"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原来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神宗马上伏地请罪,无地自容。

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神宗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他心中又始终不想让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失望。对于群臣早立皇太子的呼声,神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会儿说,皇长子常洛还太小,等他再年长点再说;一会儿又说,祖宗的家法是立嫡不立长,常洛虽然是长子,但是庶出,皇后现在还年轻,以后还可能生子,那时该怎么办呢?群臣也知道神宗说的这些是托辞,但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从中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郑贵妃一直是一往情深,为了她一人甘愿与满朝文武对抗。



明代女子饰物

朱常洛身份迟迟未确定给朱常洛出阁读书、行冠礼、选婚等事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作为亲王还是皇太子在这些事上规格和礼仪上都不一样,因此朱常洛到了十三岁还没有出阁读书。群臣还为这些事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请愿,但神宗就是不让步。谁知这件拖了十几年的难题,竟因为神宗与郑贵妃的一次小小口角而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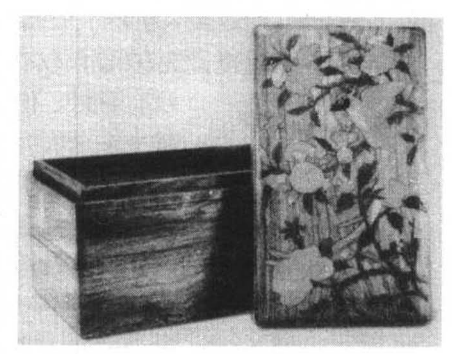
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病了,时常晕迷,只有无子的王皇后在一边照顾。王皇后见神宗病得这么重,时常偷偷哭泣,而郑贵妃却不知正在图谋什么。神宗知道了很生气。神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叫把朱常洛的玉碗拿来。以前家宴时,神宗曾赐给朱常洛、朱常洵各一个玉碗,朱常洛那个由郑贵妃代为收藏。而这时神宗叫郑贵妃拿出来时,郑贵妃说已经找不到了。神宗叫郑贵妃拿朱常洵的玉碗来,郑贵妃一下子就找了出来。神宗为此大为震怒,当晚就下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诏书。第二天,神宗又后悔了,下诏说太子改期再立。沈一贯碍于舆论,这次立场倒是坚定,说:"万死不敢奉诏!"因此,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

当然关于国本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万历三十一年,又发生了"《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当时围绕朝中大臣为了立储一事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吏,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赞同早立皇长子为太子,但也常常迎合帝意,想两面讨好。而另一派是以沈鲤为首的正直官员,他们立场坚定,言辞愤激。两派中又掺杂着复杂的切身利害关系,他们借着国本的争斗,常常利用匿名的印刷品来互相攻击对方。早在万历二十六年,京师里就流传着一篇《忧危竑议》,它是作为《闺范图说》的跋而出来。《闺范图说》,是山西按察史吕坤采编历代烈女事迹而成。这本书后来流传进了宫中,神宗皇帝特地把这本书赐给郑贵妃。郑贵妃嘱咐伯父郑承恩把这本书翻刻。当时有人匿名写了这本书的

跋，题为“忧危竑议”，里面援引历代很多嫡庶废立的故事，攻击吕坤的这本书是为扶立郑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而大做宣传。这件事牵连到郑贵妃母子还有伯父郑承恩等人，郑贵妃到神宗面前哭诉，神宗雷霆大怒，既然查不出《忧危竑议》是谁写的，只能把账算到那些强烈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官员身上，强硬派或被夺俸，或被贬职，或被流戍。

朱常洛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地位并不稳固，各种妖书案的出现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例如朱常洛做了太子后，恭妃本来应该母凭子贵，虽然不能像宣宗孙贵妃一样当上了皇后，但至少也应该进封为贵妃。但神宗好像是忘了这件事一样，对恭妃和朱常洛很冷淡。相反，对于郑贵妃母子，神宗是百般疼爱、万分迁就。如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之后，神宗在洛阳为他建造的王府用银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亲王受封后，应该马上到封地，而且不能进京。郑贵妃受不了母子分离的苦，坚持不让福王去洛阳就藩。神宗对此也十分迁就，对朝廷的大臣们说：“等拨给福王的庄田四万顷凑足，再让福王就藩。”以前亲王就藩，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者是废壤河滩，最多也不过数千顷。神宗为宠爱福王，一开口就要四万顷良田，这不知要筹措到何年何月？群臣哗然。后来神宗又借口让福王留下来给李太后祝七十大寿，等祝完寿明年再走。李太后对神宗过分宠爱郑贵妃母子也很不满，对郑贵妃说：“连福王都可以留下来为我祝寿，我那封在卫辉的儿子潞王能进京吗？”郑贵妃听了，才不敢再留福王。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正式离开京城到洛阳，这场沸沸扬扬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可是事情并没完结。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当时朝廷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郑贵妃想谋立福王。郑贵妃向神宗哭诉，神宗说：“外面的谣言很难根除，要去求太子。”在贵妃的恳求下，太子朱常洛和神宗一起召见群臣。两人在群臣面前表现得父慈子爱，十分和睦。神宗板着脸对群臣说：“太子仁孝，朕一向十分疼爱，况且福王现在远在千里之外，我怎么可能更立福王呢？你们不会轻信外边的传言。”朱常洛也学着父亲的腔调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如此议论纷纷，是自己想做一个不忠的臣子，而让我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吗？”至此，国本的纷争才真正落下帷幕。而郑贵妃从此隐居宫中，直到崇祯三年过世，而在崇祯十四年，闯王的大军攻下洛阳，她那养得肥肥胖胖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享福也终于到了尽头，被做成肉糜，被恨他入骨的百姓哄抢而尽。



明花梨木嵌螺钿花鸟盒

光宗李选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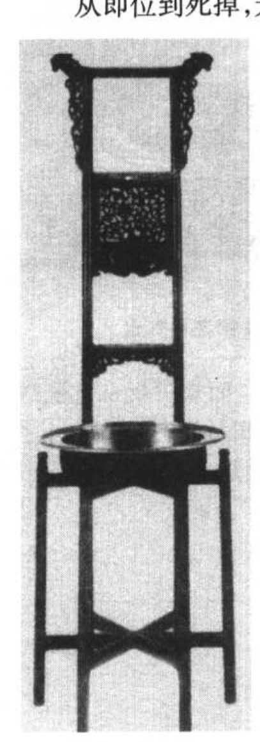
在众多直臣的力争下，朱常洛好不容易才坐好了皇太子之位。在万历四十八年，神宗过世，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


李选侍像

光宗朱常洛有众多妃嫔，他有三个皇后，她们都比较早逝，都是后来追封的。第一个就是郭氏。在万历二十九年，光宗被封为皇太子，郭氏也被册为皇太子妃。郭氏在万历四十一年就过世了，后来被熹宗追封为孝元皇后。另外两个皇后孝和王太后和孝纯刘太后，都是母以子贵，分别是熹宗朱由校和思宗朱由检的生母，在儿子即位后，她们先后被追封为皇后。她们也都是在万历年间就过世了，虽然都没有活到自己的丈夫光宗登上皇位的时候，但都有资格附葬在光宗的陵寝，是光宗身边地位比较高的嫔妃。

为什么光宗没有亲自册封皇后，而都是他的儿子后来所追封？原因很简单，光宗在位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光宗能登上皇位实在是非常不容易，靠着众多正直大臣的保驾护航，也是靠自己每天小心谨慎，没有被郑贵妃母子抓住什么把柄，这样他才保住了自己的储位。例如思宗朱由检的生母孝纯刘太后，一次被光宗责骂，刘太后一时想不开，寻了死路。光宗对此十分后悔，怕自己因此事被攻击而储位不保，就严令自己宫中任何人不得声张此事，悄悄把刘太后埋葬在西山。而现在神宗死了，自己也当了皇帝，再不用担心什么暗枪暗箭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了，连他以前的对头郑贵妃，也进献了四个美女来讨好自己。被压抑久了的光宗，暴得大位，生活也开始放纵起来。夜夜笙歌，沉溺女色，没过多久便得了病死去。

从即位到死掉，光宗在位仅仅二十九天。光宗不仅没来得及册封皇后，就是妃嫔也都没有册封。他即位后，最宠爱两个姓李的选侍，被称为东李、西李。其中东李优容退让，很识大体，而西李则一心做着皇后梦、太后梦。


明黄花梨面盆架

李选侍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朱由校和朱由检生母早逝，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宣召阁部九卿重臣来商量册立皇太子的事。光宗对着大臣们说："先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说完，叫皇长子朱由校出来与大臣相见，意为这是储君人选。接着光宗又说："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光宗说这些话，是要让大臣们知道李选侍的特殊地位。但是李选侍原本不是皇太子妃，又没有生下皇子，虽然皇太子妃和皇子们的生母都已经过世，依例她还是没有资格做皇后。

光宗即位没几天便染病，之后缠绵病榻，一蹶不起。一次，他吩咐太监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虽然皇贵妃仅仅次于皇后，但一心想做皇后的李选侍当然不会满足，悄悄在皇帝耳边说道："皇后！"但光宗假装没有听到。

光宗想早点把李选侍的名分定下，省得她一直在自己身边吵着要封皇后。不久，光宗宣召大臣到乾清宫，晓谕大臣要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但大臣们认为，原来的皇太子妃郭氏和皇长子生母王氏追封为皇后的事还没有办好，虽然李选侍有抚育皇储的大功，但册封皇

贵妃这件事应该往后拖一拖。光宗认为说得有理,就默许了。

不久光宗病重,在病榻前招见阁部大臣,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躲在门幔后的李选侍十分不满,走出门幔,把陪同光宗召见大臣的朱由校拉进去,耳提面命叮嘱了一翻。然后,让朱由校出来对光宗说:"要封皇后!"被接见的大臣相顾愕然,而光宗也为之色变。可惜李选侍时运不济,不但没有做成皇后,连皇贵妃也没做成,因为光宗马上就死了。

光宗过世,李选侍仍然呆在乾清宫,手里还牢牢控制着皇长子朱由校,不让他和大臣们见面。李选侍以为只要自己能以母亲的身份留在乾清宫"照顾"未来的皇帝——朱由校,那朱由校登基后,自己也就顺理成章成了皇太后,甚至可以垂帘听政。但是皇帝驾崩,皇位空虚,而李选侍挟皇长子自重,这种做法引起了正直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担忧,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让朱由校摆脱李选侍的控制。他们先将皇长子安排在慈庆宫居住,又强行将李选侍逐出乾清宫,使她的皇后、皇太后梦彻底破灭。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时,几个小太监趁机偷盗内府的秘藏,走到乾清门时,藏在怀中的金宝掉落到地上,而被发现。熹宗朱由校大怒,下令进行彻查,供词牵连到李选侍的父亲。当时便有流言说李选侍被逼得上吊,而她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杀。当时人不知真假,认为熹宗对李选侍太过于刻薄,因为李选侍毕竟是先帝的遗爱,既然李选侍已经搬出乾清宫,她就应该优待,而不能对她这么逼迫。朱由校马上出面澄清真相说,太监偷盗一案不会株连到其他人,意为不会牵连到李选侍,并且解释了移宫的始末。不仅如此,朱由校还讲李选侍曾殴打自己的母亲致死,抚育自己时更是时常对自己凌辱虐待。虽然如此,为了尊重先帝的遗意,自己仍然会厚养李选侍和皇八妹。至此,移宫案的争论才慢慢平息下来。

虽然李选侍最终没有当成皇后、皇太后,但还是得到了善终。到了魏忠贤等阉党当政的时候,他们对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大臣的所作所为大加诋毁,而对李选侍的评价也跟以前大不一样。在天启四年,她还被册封为康妃。

思宗周皇后

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明朝灭亡前夕曾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姑且不谈论朱由检是否应对明朝的灭亡应该负怎么样的责任,但崇祯皇帝的话自有其可哀可叹之处。古人已有"明实亡于神宗"一说,而朱由检本人至少在明代皇帝中,可以说是少有的勤勉。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崇祯皇帝确实不应该算是亡国之君,而她的皇后周氏,则更是一个少有的好皇后。

周皇后,祖籍在苏州,后来又迁到大兴。周氏成为朱由检的妻子还带有一段波折。当时,朱由检还是信王,熹宗张皇后为信王选王妃,见周氏虽然美貌文静,但身体却太单薄,恐怕以后难以担当重任。幸亏神宗刘昭妃说:"今虽弱,后必长大。"这样,周氏才被册立为信王妃。熹宗死后,因为没有儿子,便由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就是思宗崇祯皇帝,而周王

妃随之也被册封为皇后。


周皇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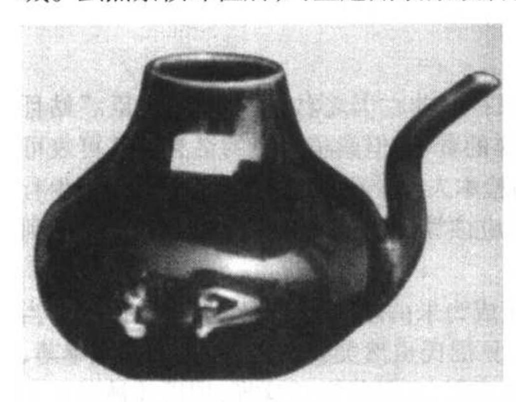
虽然周氏是皇后，但崇祯皇帝心中的最爱却是貌美无双、多才多艺的田贵妃，田贵妃恃宠而骄，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周皇后当然不高兴，有时也会因此而要点小性子。某年除夕，按例妃嫔要到皇后宫中朝贺。田贵妃来朝贺时，周皇后有意拖延不及时召见，使田贵妃站在门外苦冻了许久。待田贵妃入内参拜毕，周皇后也不说话，使田贵妃非常尴尬。而袁贵妃来朝贺时，周皇后对她则是十分亲热，说了好一会儿的贴心话，袁贵妃才离开。事后田贵妃向崇祯哭诉此事。崇祯虽然宠爱田贵妃，但对周皇后一向敬重，便一笑付之，不再提及。

皇帝注定是三宫六院，妃嫔成群。对于皇帝的其他妃嫔，周皇后一向很优容，以姐妹相待，如周皇后对待袁贵妃。即使对田贵妃的恃宠而骄，周皇后也不会一直怨恨在心。一次因为田贵妃太过于胡闹，崇祯皇帝很生气，把她放逐到启祥宫，一连几个月不召幸她。有一天，周皇后陪着崇祯皇帝在永和门赏花，周皇后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田贵妃一起来共赏？崇祯还没有完全消气，没有作声。周皇后见崇祯没有开口反对，就将田贵妃用宫车接来。由此可见周皇后的贤慧知礼。

关于周皇后，还有一件小故事。周皇后祖籍苏州，田贵妃来自扬州，两人平时都是穿着江南服饰，崇祯皇帝对她们都非常宠爱，“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江南服饰在皇宫内蔚然成风，被称为苏样。

虽然家事和睦，可国事却日益不可为。熹宗死后，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在万历四十六年时，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细说与明朝的不共戴天之仇，正式起兵反明。萨尔浒之战，明朝出动九万大军，再加上应召而来的一万多朝鲜兵，分四路进军，却大败于萨尔浒，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战是明朝与后金力量互为消长的一役，从此明军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反攻，只能消极防守。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相继陷落。到崇祯继位，山海关已成为明金战场的最前线，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锦州两座孤城。虽然崇祯即位后，马上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但不久崇祯又听信谣言，中了敌人的离间计，误杀大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此后，北方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皇太极步步进逼，时不时率领铁骑，绕开山海关，拆毁长城，逾墙而入，骚扰京畿地区。崇祯因此被搞得焦头烂额。


明代洗眼壶

外患渐深，内患更是难缠。旱、蝗、水、霜、地震、瘟疫各种灾害不断，尤其是旱灾，崇祯年间持续数年的大旱灾严重损伤了这个迟暮帝国的元气。天灾不断，再加上不断增派的饷银，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先是相聚为盗，然后又聚事起义。陕西最早爆发大起义，虽然起义军初期战斗力比较低，根本无法和明朝的正规军抗

衡，但他们打不过便跑，四处流窜，明朝又围堵不利，起义军慢慢流窜进河南、山西、湖北、四川等省，从此以后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大军在中原纵横捭阖、左突右击，崇祯毫无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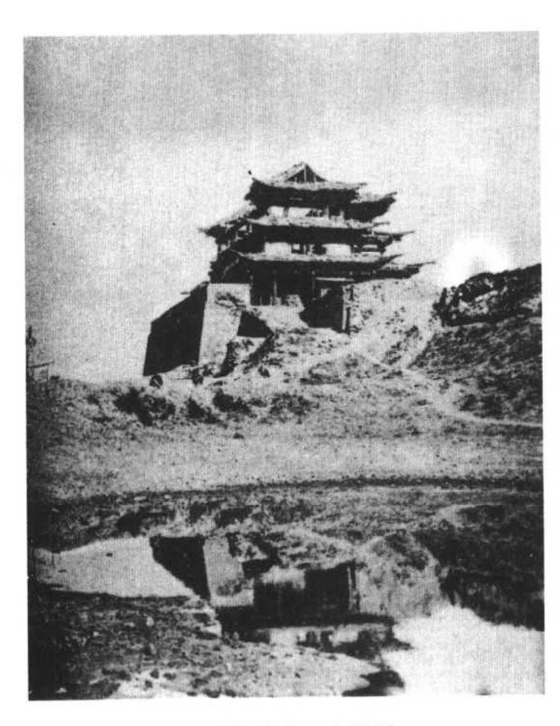
每天为国事忧劳，而国事却丝毫不见起色，崇祯皇帝就吃素，希望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如此一来，崇祯日见憔悴。周皇后为了崇祯的身体，亲自料理佳肴进呈。刚好崇祯的岳母进奏说，梦见崇祯的生母孝纯太后，太后说："皇帝每天这样操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饮食不要过苦。"崇祯看着奏章，恰遇正要进呈佳肴的周皇后，两人相对痛哭。

北方外有女真，内有寇乱，局势已经不可为，周皇后对此看得很清楚。如今之计，只有南迁还有一线生机。周皇后曾暗示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崇祯当然知道周皇后的意思，但北京是祖宗陵寝所在，面对舆论的压力，崇祯始终下不了南迁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春三月十七日，闯王李自成进军北京，驻扎在京城外的禁军三大营马上做鸟兽散。十八日，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周皇后顿首："妾身侍奉陛下十八年了，却因为没有听从我的劝告，以至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当天夜里，崇祯周皇后自缢。

明代的宗室

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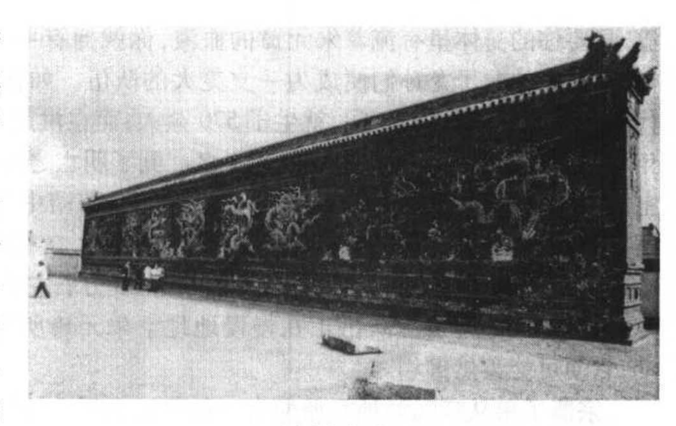
明九边之一大同城

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何确保朱氏江山的千秋万代，朱元璋苦心孤诣、精心布局。手下第一文臣李善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了，他被怀疑参与了当时的宰相胡惟庸谋逆案，因为他和胡惟庸是同乡，也曾经举荐过胡惟庸，他的侄儿还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朱元璋的布衣兄弟徐达也死了，传说徐达患背疽，最忌食鹅，朱元璋却派人给他送了一只蒸鹅，徐达怎么会不明白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含泪吃下蒸鹅，不久便也去世。经过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大狱后，明初功臣武将凋零殆尽，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怕什么时候会冒出一些乱臣贼子，他要小心提防，他只能信任自己的子孙，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的势力来拱卫帝室。

所以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朱元璋开始大封诸王，他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个战略要地，封国星罗棋布，控制着各个要害。如北方边塞重地，虽然朱元璋已经把元蒙势力驱除出中原，但残元势力仍然不时地威胁北方边境的安宁，朱元璋就在北方的险要地区分封了九个王国。

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设立王府，辟置官属，跋扈一方。虽然王府无权干预地方民政，但各王府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每个王府都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王府护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封在北方边塞上的诸王因为同时还肩负着守边的重任，王府的护卫人数则更多，如驻扎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的宁王，所部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而燕王朱棣不仅

护卫众多，而且能征惯战，多次带兵出塞征战，连军中大将也都受其节制，小事立断，只有大事才需要上报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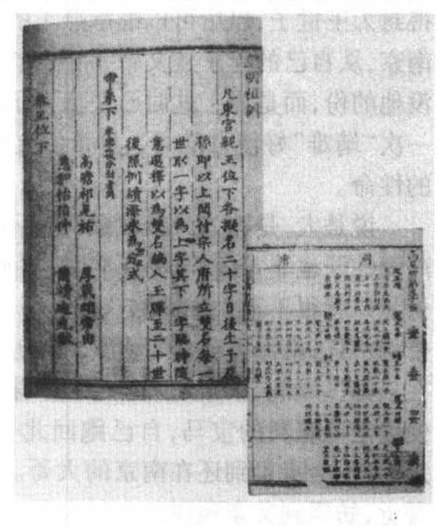


大同九龙壁

朱元璋把军权交给自己的骨肉，他终于可以放心了。如果有什么乱臣贼子敢犯上作乱，他只要一纸诏书，诸王便可以率领自己的护卫来勤王，拱卫京师。但当时有一个叫叶伯巨的官员上书对朱元璋说："各个王府军权太重，几代以后，可能会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朱元璋听不进去，反而大骂："这个叶伯巨是要离间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快去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历史不幸被叶伯巨言中了，不用经过几代的时间，朱元璋一死，祸乱就出现了。因为太子朱标早死，继位的是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仁柔少断，而几位王叔各自拥兵一方，自然不把建文帝放在眼里，所以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等书生的建议下决定削藩，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王的爵位，把他们废为庶人。而燕王眼看削藩马上就要削到自己，不想坐以待毙，终于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反抗朝廷，自称这次举兵是"靖难"，历史上就称之为"靖难之役"。燕王骁勇善战，而这时建文帝身边却没有可用的大将，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元勋旧将早已被朱元璋屠戮得差不多了。燕兵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建文帝自己放了一把火，不知所踪，而燕王朱棣经过三年的骨肉相残，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藩王作乱并未就此结束，朱元璋分封诸王，不但没有起到拱卫帝室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不断的骨肉相残。

朱元璋初封的只有王爵，宗室爵位还未完善，后来又亲自立下《皇明祖训》，具体划分了宗室的爵位：皇帝的嫡长子为皇太子，次嫡子和庶子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封为王世子，嫡长孙封为世孙，嫡长曾孙为曾世孙袭封亲王；皇太子和亲王的次嫡子和庶子皆封郡王，郡王嫡长子封为长子，嫡长孙封为长孙，嫡长曾孙为曾长孙袭封郡王；而郡王次嫡子和庶子也都授予官职，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



皇明祖訓

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

帝系下

万历刊本《皇明同姓诸王表》

亲王和郡王是属于世袭罔替的爵位，而镇国将军以下到辅国中尉则是降袭的，辅国将军的儿子只能授予辅国将军的爵位，而辅国将军的儿子又只能授予奉国将军的爵位，每代不分嫡庶，都要降袭一级，到奉国中尉以下就不再降袭。

从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子孙们封爵之

滥，只要你的身体里有流着朱元璋的血液，你就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爵位，经过几代的繁衍，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便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如在洪武二十五年受封于山西大同的代王，百年以后到弘治年间，就生子570余人；而在洪武三年封于太原的晋王，到了嘉靖初年，就增加了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到了明亡之际，宗藩人数估计有十万之众。光宗室子弟的禄米每年就要耗费国家米钱无数，在嘉靖中叶，全国每年供给京师米共400万石，而各处供给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00多万石，在有些省份，地方财政根本无力供养这么多的龙子龙孙，如河南一省存留米麦不过80万石左右，但当地宗室所需禄米就达近200万石，可知庞大的宗室队伍正在慢慢地蛀空朱元璋所建立的帝国大厦，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它便可能轰然倒塌。

宗藩子弟从呱呱坠地开始便有一份可以吃到老的禄米，他们享有种种的特权，不用为生计发愁。同时不许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更不许从事农、工、商这些贱业。龙子龙孙们整天无所事事、嬉戏度日，坐待老死。这种极度空虚的生活往往造成各种变态的人格，作恶多端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晋王朱棡对待宫女极端残暴，稍不如意便加殴打，有时叫人割掉宫女的舌头，有时把宫女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辽王朱宪㸅的荒淫残暴更是骇人听闻，或把人关在棺材中烧死，或用刀慢慢割人臂肉，或用炮烙之刑炙烤人的脸面，种种暴行令人发指。顾炎武认为他们“名为天枝，实为弃物”，“弃物”之称实在是名副其实，也终归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被埋藏。

自寻死路的汉王朱高煦

汉王朱高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第二子，在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依例他的大哥朱高炽得封为王世子，以后可以继承燕王的爵位，而他只能得到一个郡王的爵位。后来朱棣打下南京，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他自然水涨船高，得封为亲王。当然皇位还是没他的份，而是属于这时已是皇太子的大哥，因此朱高煦始终不满足，总想效仿父亲，再来一次“靖难”好使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皇帝没做成，反而赔了自己的性命。

说是犬，是因为犬虽然最终做不了山大王，但毕竟有着锋锐的爪牙，动辄能伤人。朱高煦性子也非常凶悍，举止轻佻，平时喜欢舞刀弄剑，不喜读书，在朱元璋还在位的时候，朱元璋就很不喜欢朱高煦这个孙子。建文帝时，燕王朱棣虽然身怀异志，但为了取得建文帝的信任，就派了他们哥俩来到南京做人质。一次，他的舅舅徐辉祖(徐达的儿子)看不惯他在京师里厮混，狠狠地训了一顿。朱高煦从小身娇气傲，怎么受得了这个，气愤不过，当下便偷走他舅舅的宝马，自己跑回北平。朱高煦也不管自己是来南京做人质，这样莫名出走，会不会牵累到还在南京的大哥。更不考虑，自己这样任性出走，会不会引起建文帝的警觉，妨碍到父亲预谋已久的大业。在回北平的路上，还随意杀了不少官吏百姓泄愤。这件事使燕王受到了满朝文武的指责。

朱高煦善于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燕王朱棣举兵之后，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立下很多的大功。例如在东昌之役，燕军遭遇建文帝一方盛庸率领的军队。盛庸排兵布阵，以逸待劳，静候燕军的到来。而燕兵因先前屡战屡胜，不免轻敌大意，一见南军，便鼓噪而上。南军等到燕军靠前，便火器毒弩齐发，燕军死伤无数。燕王一看急了，亲率精锐杀向南军中军。盛庸一见燕王杀来，故意分开两翼，先引燕王深入，再收缩两翼合围，燕王便被重重包围。眼看燕王就要被活捉，燕王手下大将张玉冒死突入，为燕王解围，虽然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但却为燕王杀出了一条血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燕王身陷重围，刀箭无眼，为何仍然无事？原来建文帝空负妇人之仁，曾经告诫出征的将士，不能杀害燕王，以致让他负上杀叔父的罪名。所以虽然燕王被围那么久，但南军却不敢对燕王动一刀放一箭，只想活捉他。燕王在张玉的拼死解围下，终于杀出重围，但南军紧追不舍，燕王环看左右，已经死伤殆尽，虽然南军不敢伤害自己，但看来最终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就在这时，朱高煦终于率援兵赶到，燕军且战且退，终于得以逃脱。

像这样的战功，朱高煦还立有很多，因此淇国公丘福等大臣都拥立朱高煦。而燕王在战场上，看到朱高煦这样九死一生地冲锋陷阵，也曾经许诺过：如果自己以后当上皇帝，就立朱高煦为太子。然而等父亲真地登上皇位后，自己眼中懦弱无能、无寸尺功劳的大哥仍然成了皇太子，自己只是被封为“汉王”，封国云南。朱高煦大为不满，嚷嚷道：“我究竟有什么罪行，要把我流放到万里之外？”朱高煦不肯去云南，硬是赖在南京不走。永乐皇帝自食前言，本来就觉得对不住这个儿子，便任他由他了，后来朱棣就近把他改封在山东青州。朱高煦在青州仍然对皇位不死心，暗地招兵买马，并且纵容手下在青州胡作非为。朱棣知道这个儿子不会安宁，不能再这样任他胡闹下去，终于下定决心，把他召到南京，准备把他废为庶人。这次多亏他那眼中的窝囊废大哥苦苦哀求，才被改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但永乐皇帝还是削除了他的两支护卫军队。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他这个兄弟倒是不计前嫌，赏赐不断。

然而仁宗登基十月左右，仁宗又驾崩了，宣宗朱瞻基即位。历史似乎要重演建文帝故事，主弱臣疑，王叔跋扈于外，但朱瞻基不是仁柔少断的建文帝，“蹇夏”“三杨”这一帮老臣也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齐泰、黄子澄，事易时移，朱高煦还想要造反已经是自寻死路。

在仁宗死时，朱瞻基从南京奔丧途上，朱高煦阴谋伏兵邀击失败后，便决定效仿自己父亲当年故伎，指责夏原吉等人是奸臣，举兵要“清君侧”，要再来一次“靖难”。朱瞻基在一帮重臣建议下，决定亲征。进军途中，宣宗朱瞻基问大臣们说：“你们看，汉王看到我亲征，他的动向会是如何呢？”有的大臣说：“汉王的封地——乐安城——太小了，他肯定会先攻占济南来作为自己的巢穴。”宣宗摇摇头。又有大臣说：“汉王以前就眷恋南京不肯离开，他定会举兵南下。”宣宗又摇摇头，笑着说：“济南虽然离乐安近，但却是坚城，一时难以攻下；而南京嘛，汉王的护卫军都是乐安人，他们是远离乐安的。汉王欺负我年少新立，想混水摸鱼，看似武勇，其实内心胆怯得很，又缺少谋断。我猜他听说我要亲征，肯定吓得躲在乐安城不敢出来，只会坐以待毙。”事情果真被宣宗说中，朱高煦起初听说朝廷派薛禄出征，便不把他放在心上，后来又传来消息，皇帝要亲征，朱高煦一时面无人色。宣宗指挥大军把乐安城团团围住，朱高煦走投无路，自缚请降，宣宗胜利班师。

朱高煦被抓到北京后，宣宗并没有杀他，只是将他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

城。但他最终还是难逃一死。一天，宣宗到囚室去看他，朱高煦对宣宗怨恨难消，伸出一脚把宣宗勾倒在地。宣宗大怒，命人用一个三百斤重的大缸盖住他，朱高煦力大，顶缸而起。宣宗命人压下，还在缸上堆起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烤死在缸中。自从朱元璋分封诸王后，骨肉相残的惨剧便不断发生，前有叔杀侄，后有侄杀叔。

赤手搏虎的宁王朱宸濠



朱宸濠像

经过这样几次宗室相残的血的教训，皇帝也开始逐渐削弱藩王的势力，以求彻底改变这种兄弟叔侄相残的局面。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便继续建文帝时期削藩的政策。如永乐元年革去代王的三护卫和官属；永乐四年削去齐王的官属和护卫，后又把他废为庶人；永乐十年削辽王护卫；永乐十五年贬谷王为庶人等，基本上把当时握有兵权的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但永乐皇帝削藩并没有削到自己的儿子头上，这才酿成后来朱高煦的叛乱。宣德皇帝平叛后，进一步推行这种削藩政策，从此王府不再设立护卫。藩王再想反叛，无异于赤手搏虎，即使这只老虎再凶猛，仍然是九死一生。但冒险本是野心家们的天性，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朱宸濠面对的是明代最荒唐最胡闹的正德皇帝，他能不能取而代之呢？

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孝宗婚后多年才生下朱厚照，对朱厚照十分宠爱。后来朱厚照的弟弟又早夭，朱厚照便成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明帝国皇位继承人。因此孝宗对朱厚照的宠爱达到了溺爱的地步，甚至带着朱厚照微服出宫游玩。在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突然驾崩，把一个庞大的王朝留给了年仅十五岁、不读书、好逸乐的朱厚照——正德皇帝。没有了父皇的管束，正德皇帝更是无法无天了，把政务抛在一边，整天跟自己亲信的八个太监，号为"八虎"，游戏取乐，不知今夕是何年。

朱元璋的儿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原来是在大宁一带，是北边非常有实力的塞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永乐皇帝一登基，便把势力最大，对自己威胁也最大的宁王改封到江西南昌，削弱宁王的势力。后来宁王也被削除了护卫，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到了他继承爵位时，宁王府已经今非昔比。相比正德皇帝的荒唐无行，朱宸濠也是一个轻佻的宗室子弟，但如果比做皇帝，相信朱宸濠也比正德皇帝强。在几个术士的蛊惑下，相信自己是龙姿凤表，有天子之相，因此生出了非分之想。但当时的宁王府已经没有半点武装力量，因此朱宸濠当然是先谋求恢复宁王府的护卫。

当时正德皇帝不理政，“八虎”之一的太监刘瑾欺上瞒下，权倾朝野，人称“立皇帝”，意思就是朝会时，刘瑾是站在正德皇帝身边的另一个皇帝。朱宸濠用金银二万，贿通刘瑾，终于把明王朝南昌左卫改为宁王府的护卫，之所以是南昌左卫，而不是江西的其他驻军，是有原因的，天顺年间宁王府因罪被削去护卫，宁王府的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南昌左卫就是原来的宁王府护卫。但是好景不长，刘瑾不久便下台，宁王府的护卫又被革去。不过这并没有使朱宸濠心灰意冷，他恢复护卫的心反而更加急切了。朱宸濠这一次更是不惜巨金，收买好了当时的兵部尚书，并把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宠爱的一个伶人臧贤代他四处游说王公大臣，并得到了他们的默许。可惜这时又出了一个老顽固费宏，费宏是大学士，在内阁办事。朱宸濠要恢复护卫，必须经过内阁的同意。而费宏也是江西人，对朱宸濠知根知底，经常对人说：“朱宸濠现在谋求恢复护卫不是安什么好心，以后会连累到很多江西人，我绝对不能同意。”朱宸濠便利用进士廷试那天，内阁大臣要到东阁阅卷，费宏不在内阁办事时，递上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其他大臣已经被朱宸濠买通，因此竟然得到批准。恐怕费宏会反对，又叫人在正德皇帝面前进谗，陷害费宏，费宏被迫辞职。朱宸濠对费宏阻挠恢复护卫一事怨恨不已，在费宏辞官回乡的路上，派人假装强盗来打劫，还放火焚烧费宏乘坐的船只，费宏和家眷侥幸逃脱。

恢复护卫终于得偿心愿，朱宸濠同时又千方百计讨好正德皇帝，进献了很多奇珍异宝，导正德皇帝游乐，削弱正德皇帝对自己的提防之心。一次元宵节，朱宸濠又进献了很多奇巧的彩灯，灯上画的花鸟人物栩栩如生，把这些彩灯在宫中依檐附壁悬挂，把整个宫中装饰得色彩斑斓、五光十色。正德皇帝一见大喜，大加赞赏。

朱宸濠恢复了护卫之后，又仗着自己在朝中收买了很多王公大臣，在南昌是无恶不作。他擅自杀戮地方官吏，霸占百姓田宅，强夺良家妇女，搞得地方上鸡犬不宁。地方官屡屡向朝廷申告朱宸濠的各种不法行为，但正德皇帝并不放在心上。皇帝不急，但地方官急了，当时的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已是暗自留心。王守仁文武全才，既是个大学问家，同时兵法韬略无一不娴熟。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带着自己蓄养的强盗响马们终于正式叛乱。这一天他以庆祝自己生日为由，把地方官请到王府，声称自己奉了皇太后的密旨要起兵入朝。他把不顺从的地方官全部杀掉，率领军队去攻打安庆。王守仁知道朱宸濠叛乱并攻打安庆的消息后，集结兵力直捣朱宸濠的老巢——南昌。而正德皇帝收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不忧反而大喜，原来正德皇帝有两个嗜好，一个是玩乐，一个就是打仗。玩乐不用说，正德对打仗更是痴迷，只不过他是万尊之躯，不能轻易涉险。正德皇帝多次巡游北方边防重镇，也曾率领军队小胜过鞑靼兵，还自己封自己做“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他不做皇帝，却更喜欢做将军。正德皇帝听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时，简直有点喜出望外，决定御驾亲征，趁机还可以到江南游玩。可惜，正德刚到达涿州，王守仁报捷的奏疏已经送到了。原来朱宸濠围攻安庆不下，又听到老巢也已被王守仁攻下，急忙回身去救，在黄家渡与王守仁军遭遇，朱宸濠大败，被王守仁俘虏，只有一个多月，叛乱就被平定了。正德皇帝收到捷报后，却装作不知道这个消息，继续南下，当然这次他只是为了游玩。正德皇帝一路游玩到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这才班师回朝。朱宸濠在路上被处死，并挫骨扬灰。

朱宸濠叛乱之所以这么快就被平定，除了朱宸濠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不得民心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室藩王的势力几经削弱,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问鼎九五之尊了,再加上朝廷上有识之士对此小心警惕,藩王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虽然荒唐胡闹如正德皇帝者,也能轻易平息这种叛乱。宁王朱宸濠靠纠结一群草寇就想举兵造反,无异于赤手搏虎,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葬身虎口。

浊世青莲朱载堉

虽然明代宗室子弟自从生下来那一天,便拥有一份可以吃到老死的禄米,衣食无忧,但同时皇帝对他们在政治上进行种种限制,防止他们干政,如不能参加科举,不能离开自己的封地等。也有少数如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的野心家,为了摆脱这些桎梏,举兵叛乱,觊觎皇位。随着藩王势力的逐渐被削弱,他们越来越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更多的宗室子弟是在自己小小的封国里,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罪恶的一生。但是朱家子弟并不是天生劣种,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如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能学好文,曾作《元宫词》百章。朱橚又深感河南地瘠民贫,编成《救荒本草》一书,把可食的野生植物一一记下,以便灾年可以采来充饥。《救荒本草》是一本伟大的植物学著作。在这些有所作为的朱氏子孙中,最为知名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郑世子朱载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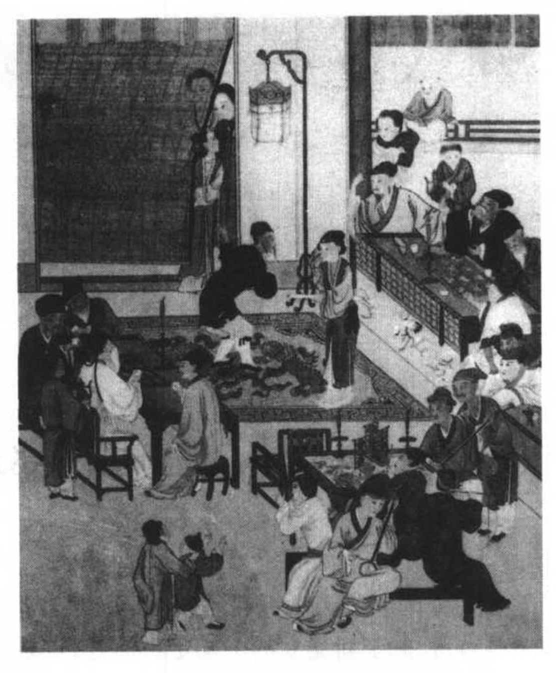
郑世子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谥号端清。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生于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朱载堉是朱元璋的九世孙,他在父亲死后,并没有继承郑王的爵位,而是把它让给了别人,因此后人称呼他为"郑世子",而不是"郑王"。

郑王封地在怀庆府,即今河南省沁阳县。传到郑康王的时候,康王无子又无侄,嫡长这一支已绝嗣,郑王这个爵位便由旁支来继承。本来盟津王最有资格继承这个郑王的爵位,但盟津王因为被诬告不孝等罪名被废为庶人,从而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这样郑王才由朱载堉的祖父来继承。后来盟津王的冤屈虽然得到昭雪,但郑王的爵位已经由朱载堉这一支系继承。等朱载堉的父亲死后,早在11岁时便被封为郑世子的朱载堉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但朱载堉认为郑王的爵位本来是盟津王这一支系的,便接连上书七次,请求让出郑王的爵位,最后一次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才最终获得皇帝的同意。

朱载堉胸襟广阔,视王爵利禄为无物,他在《醒世词・平生愿》中写道:"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更难得的是朱载堉事父至孝。盟津王这一支系的人为了夺得郑王的爵位,诬告朱载堉的父亲叛逆,嘉靖皇帝轻信了这种流言,把他的父亲囚禁在安徽凤阳的宫城内。朱载堉在宫城外自己造了一间小土屋,以便可以就近照应,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十九年。而后来朱载堉对盟津王这一支系以德报怨的行为更是赢得了世人对他的交口赞叹。

朱载堉品德高尚自不必多说,同时朱载堉读书刻苦,涉猎广泛,在音乐、天文、数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朱载堉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上找到了解决它的方法。

将纯八度分成十二个均等的部分的音律叫做十二平均律，它的最大好处是转调方便。十二平均律早在古代希腊时便有人提出了，但并未加以科学的计算。在十二平均律中，其中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半音，每个半音的距离是相等的，半音是十二平均律组织中最小的音高距离。两音间的距离等于两个半音的叫做全音。八度内包括有十二个半音，也就是六个全音。在音列的基本音级中，除了 E 到 F、B 到 C 是半音外，其余相邻两音间的距离都是全音。当然，朱载堉是通过自己的实验摸索发现了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称它为“新法密率”。直到今天，关于十二平均律，我们还是只要照抄朱载堉的计算结果就可以拿来用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计算工作，朱载堉是通过算盘来完成的。计算过程中有很多是 25 位以上数字之间的运算，我们现在的袖珍计算器一般最多只能运算十位数，可知朱载堉所付出劳动的艰巨。


明人演琵琶记图

欧洲对十二平均律最早作出数理阐述是荷兰数学家、工程师斯蒂文。斯蒂文在1585～1605 年的某一年完成解等比数列的同时，也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解。这在时间上比朱载堉晚几年至几十年。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依据大量的文化交流史事实，认为斯蒂文在仿造中国帆车的同时，也得知了朱载堉有关的音律理论。十二平均律，这一如此巨大地影响了当代音乐艺术的数理理论，实际起源于明代中国的朱载堉。李约瑟称赞朱载堉是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感的人”。

朱载堉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历学新说》、《乐学新说》、《律吕精义》，其中大部分收集在《乐律全书》之中。这些著作涉及音律学、数学和珠算、天文历法、计量学、物理学、音乐学、乐器制造、乐谱和舞谱、文学、绘画等丰富内容。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综观明代的宗室，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龙子龙孙们无所作为，吃着国家的禄米，仗势搜刮民脂民膏，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其中有些人为了成为真龙天子，叔侄相残，兄弟相煎。绝少有如朱载堉这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者。朱元璋本寄厚望于自己的子孙，希望他们能成为国家的干城，维护朱家千秋万代的江山。然而这些期望全都消散在金枝玉叶们的日日笙歌、醉生梦死中。这群世间的“弃物”、国家的蛀虫慢慢侵蚀着明帝国日益虚弱的身体，最终也随着明帝国的覆灭而消亡。

明代的城市、宫苑和陵园

明朝都城北京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元大都后,将大都改称北平府。

当初,关于新建立的王朝定都何处,也颇费了朱元璋一番思量。朱元璋攻下元大都之后,曾向大臣们征求意见,看是否可以在此定都。但很看重风水的朱元璋心中又早已暗暗地倾向于建都南京。因为南京的风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大臣们自然明白朱元璋的内心倾向,便无不投其所好,贬低北京的风水形势。大臣们的言论正中朱元璋下怀,他便不再提建都北平之事,决定建都南京。


明人绘《北京宫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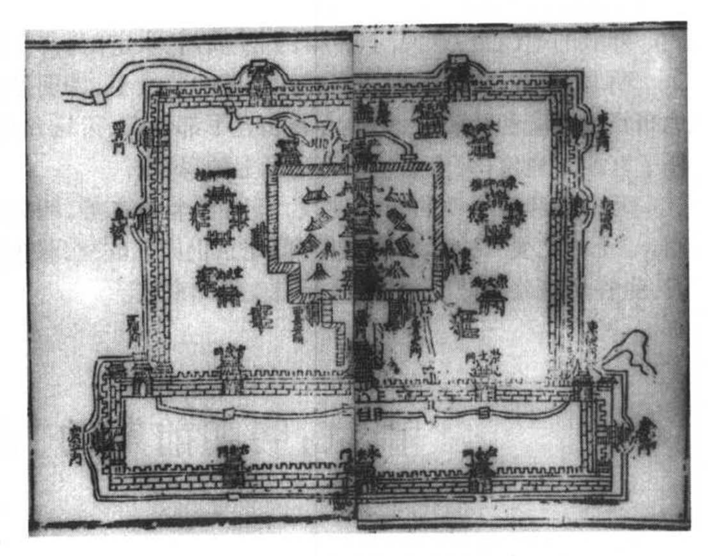
明朝在北平建立的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北平布政司。北平虽不再是首都,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其第四子朱棣为燕王,10年之后,燕王朱棣被封藩至北平。朱元璋驾崩之后,其孙建文帝即位,不久,燕王朱棣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夺取帝位。

明成祖即位后,深感北平之重要,势踞形胜,乃“龙兴之地”,再加上自己在此经营多年,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势力,决定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诏建北京宫殿”。第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经过15年的修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就此成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城经过明朝200多年的营建,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础。

从明代北京全城的形状来看,呈“凸”形。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而从外城到紫禁城,每城周围又有既宽又深的护城河。皇帝居住

的紫禁城就成为全城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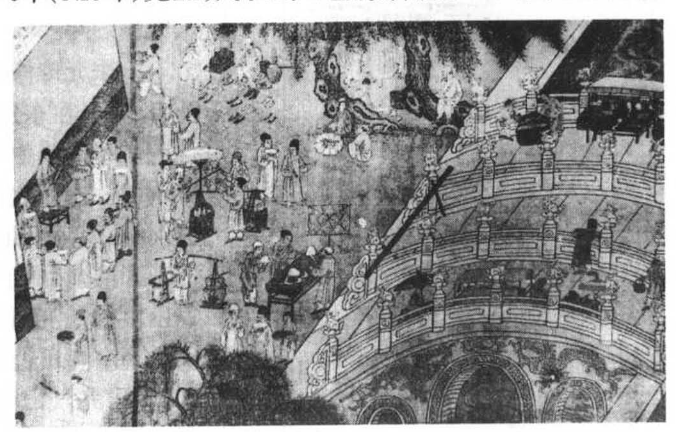
万历时期的北京城图

外城。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侵，时常迫近京城。世宗朱厚熜为加强城防，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筑外城。原计划筑城120里，四面包围内城，但因财力不足，只修包了南郊，成了"凸"字形，全长28里，有7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增修各门瓮城。外城的建成，形成了一条自正阳门通往永定门的笔直的大道，也是全城中轴线的南端。中轴线全长近16里，南起永定门，穿正阳门、紫禁城的正中心和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鼓楼和钟楼。

内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大都后，便着手改建城池。当时元顺帝退走蒙古高原，为防其南侵，遂将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荒落的地方放弃，北垣南缩5里，另筑新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命营缮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加修筑东、西、南三面城垣。东、西垣在元旧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南垣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向南推展了二里，亦用砖包砌。城周长40里，共9门，即明京城，后称内城。

皇城。包围紫禁城、西苑(三海)、景山之城曰皇城。长约18里，有7门。最南大明门，大明门内为正门，即承天门(清时改称天安门)，门前为广场，广场东北为长安左门(俗称东三座门)，西北为长安右门(俗称西三座门)，皇城东门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

紫禁城(今故宫)是京城的核心。明初攻克大都后，将原来的元皇宫，除隆福宫改为朱棣的燕王府外，其余大部分宫殿为了"灭王气"全部拆毁了。因此，迁都北京后，就需重新建造紫禁城皇宫。紫禁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完工，周长约6里余，南北960米，东西760米。城外护城河(称筒子河)宽52米。城四门：南午门、北玄武门、东东华门、西西华门。四角有壮丽的角楼。



明人绘《皇都积胜图》(局部)

明京城城门"内九外七"，明初内城各门之名皆沿用大都旧名。正统四年(1439年)，修建北京内城九门城楼竣工，这年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内城九门是：正阳、崇文、朝阳、东直、安定、德胜、西直、阜成、宣

武。外城的七门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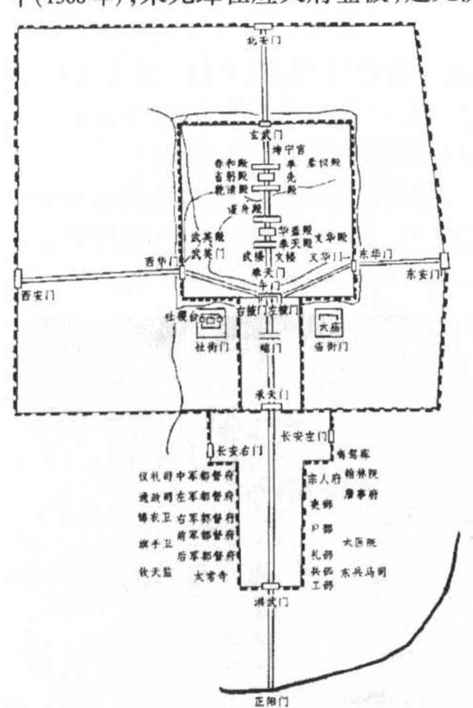
明北京城的规划重点在宫城和皇城的建设上，特别是在宫城前的中轴大道两侧，对称地布置着太庙和社稷坛、中央官署和五军都督府、天坛和山川坛，既加强了纵深效果，又烘托了宫城的地位，突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

北京城经过明朝的精心建设，呈固若金汤之势，明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北京城的稳固。“土木之变”之后，英宗被俘，但北京仍岿然屹立，蒙古的也先也奈何不得；“庚戌之变”时，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最终也未能攻陷北京城。

南京：明朝前期的“京师”

明代的南京城，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贯秦淮，北带玄武，城周33.68公里，规模盛大，气势磅礴，不仅为我国现存的第一大城，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座砖石城。

元至正十五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元时称集庆)，改称应天府，以此作为根据地。第二年，朱元璋召见朱升。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前两年，朱元璋就开始修筑城墙，营建皇宫。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极，建元洪武，定都应天府。从1366年一直到1386年，朱元璋用21年时间，修建了南京城。南京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精心设计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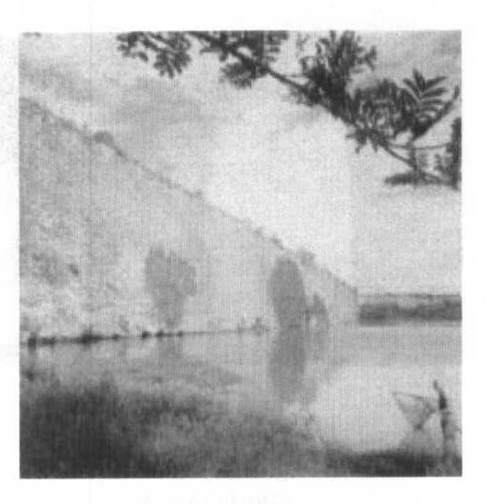
明代南京皇城示意图

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钟山西南麓新筑宫城和改筑南唐以来的金陵城；第二阶段，向北拓宽旧城直到江边；第三阶段，建造聚宝门、三山门、通济门等主要城门，并新筑后湖城和各主要街道；第四阶段，建造外廓城。

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是先改建南唐遗留的金陵城，再在东边建造一个方形的皇城。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所勘定的皇城位置，虽然位于钟山的“龙头”之前，乃“风水宝地”，但由于这一带是前湖(燕雀湖)，地势低洼，朱元璋只好调集几十万民工来填湖，由于工程浩大，因此南京民间有“迁三山填燕雀”的传说。还盛传朱元璋曾把住在湖边的一个叫田德满的老汉投入湖中，作为“填得满”的“吉兆”，田德满因此被朱元璋封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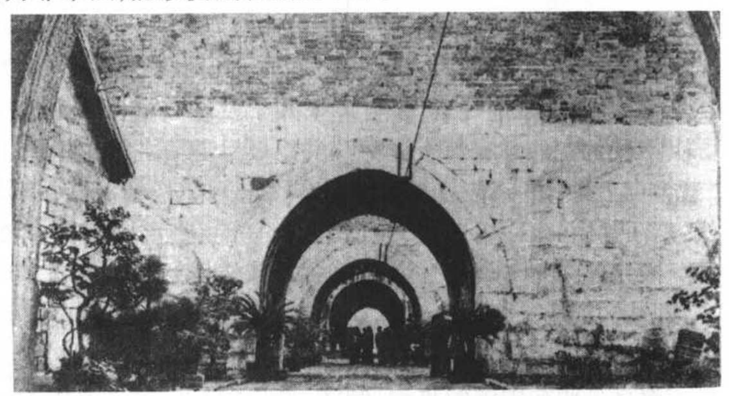
在南京城修筑过程中，还有一个传说与富商沈万三有关。沈万三资助筑城的故事，可说在南

京是家喻户晓。据说,沈万三原来是南京的渔民,打鱼时打到了一个聚宝盆,从此变成金陵巨富。明朝初年,建筑南京城南门(今中华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说地下有水怪在作祟,向朱元璋献计,要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朱元璋命人把沈万三召来,对他说:"你家的宝盆能聚金银,也该能聚土吧!"便强行借来沈万三的"聚宝盆",埋在第一道城圈内东边的城下,这段城墙便不再坍塌了。因此,南京城的南门叫聚宝门。


南京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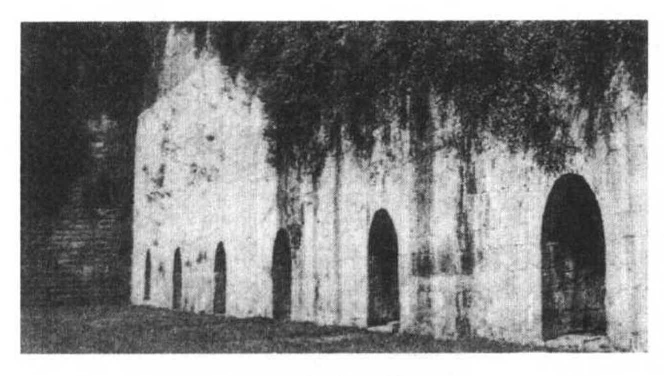
朱元璋兴建南京城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惊人的。仅承担造城砖的单位就有1部(工部)、3卫(横海、豹韬、飞熊)、28府(州)、118个县、3个镇。他们按照统一的规格尺寸,烧造大型城砖,运送南京。砖的质量很高,上面刻有造砖府县、监造官员和工匠的姓名、年月。砖的长度一般在40至45厘米,宽度在20厘米左右,厚度约10厘米,重量从10余公斤到20余公斤不等。大部分都是质地较为细密的青灰色砖。大部分的城墙都先用花岗岩或石灰岩的条石做基础,上面再用大砖垒砌内外两壁和顶部,内外壁之间常用碎砖、砾石和黄土层层夯实。城墙顶部和内外两壁的砖缝里,都浇灌一种"夹浆"。这种夹浆用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或再加桐油掺和而成,凝固后黏着力非常强,能够使城墙经久不坏。

明初建成的南京城,南北长,东西窄,把建康故城、南唐金陵城、石头城和历代设置的几个作为州府治所的小城,统统包进南京城里。可以说是集南京历史上各代城池之大成。


南京聚宝门四重券式门洞

明代南京城分宫城、皇城、京城、外廓城四层。南京城突破了中国古代都城采取方形规则,宫城位于都城中部偏北的旧制,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和防守需要筑城,使全城呈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形状,并将宫城单独置于都城东部。

城墙依山傍水,高度和宽度因地制宜,不求一致。最高处达60米,最低处仅10多米。厚度最宽处达25米,一般在7～10米之间。南京明城墙有城门13座,水关2座。城墙上还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余座,以供军事防守之用。在城的中央还建有钟楼和鼓楼。城门的上部都有高耸的城楼,而以聚宝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和通济三座城门各有城墙四道,每两道之间的空间称为"瓮城",可作为战时的防守之用。聚宝门是这些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城楼以下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而且有所谓"藏军洞"这样的特殊设施。"藏军洞"实际



南京古城墙藏军洞

上就是里端封闭的砖券门洞，在战时可供兵士休息和用来存放军事物资。这种“藏军洞”在聚宝门最南一道的城墙上计有两层共13个，左右两侧的城墙下部又各有7个，加起来共有27个。据说，每洞可容纳兵士百人以上，共可藏兵达3000人以上。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木质再加铁皮做成的两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都从城门洞里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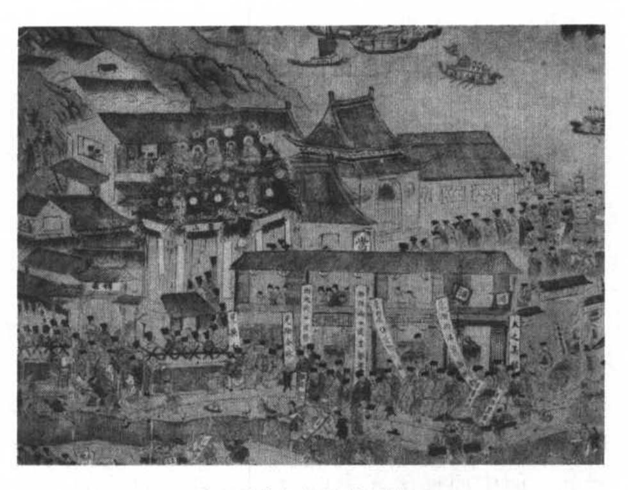
从整个宫城的布局来看，北京的明故宫与它相似。这是因为，北京故宫就是根据南京故宫的蓝图兴建的。

宫城南北长5里，东西宽4里，呈四方形。有午门，东安、西安、北安门。外有护城河围绕。南面的正门叫“洪武门”，后边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宽广的御道。御道的尽头是“外五龙桥”，桥北是“紫金城”。“紫金城”的正门是承天门。接着是端门和午门。在承天门、端门和午门以东，有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以西有祭祀主宰国家命运之神的社稷坛。午门以内是“前朝”。位于中轴线上的三座主要大殿是“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通称为“三大殿”。三大殿的东边是“文华殿”，西边是“武英殿”，还有左右对称的“文楼”和“武楼”。文华殿的东侧，有“东华门”，武英殿的西侧，有“西华门”。三大殿以北是“后廷”——皇帝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包括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和御花园，直到后宰门的玉带河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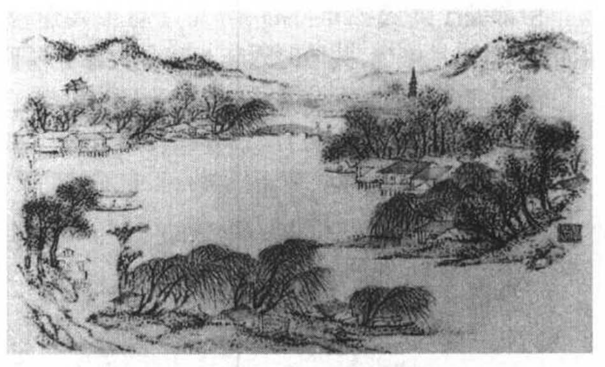
相传，南京城造好后，朱元璋率其子及左右群臣登上紫金山，观察都城之气派。他问群臣：“我的都城建得怎么样啊？”群臣极尽溢美之辞，唯独十四岁的王子朱棣却语惊四座：“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金城。”朱元璋仔细一看，不禁冒了一身冷汗：城周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等一些重要制高点都留在了城外，此乃城防之大忌。朱元璋因此对全面筹划筑城的刘基怒恨有加。他回宫后，让太监给刘基送去一盘桔子，刘基知道皇上怪罪自己筹划失当，送桔子是恨不得将其剥皮抽筋吃肉之意，吓得连夜逃入茅山避祸。

南京是明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说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南京在过去的各朝只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局部性割据政权的中心的话，那么，从明朝开始，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当时南京城的繁华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和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笼，每条街道上足有几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都繁会图》,被称为南京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350厘米、宽44厘米历史长卷直观地显现了明初南京的歌舞升平景象,生动地描绘了明朝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的盛况。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始,以城市的南市街和北市街为中心,在明皇宫前结束。画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广告标牌林林总总。秦淮河两岸,佛寺、官衙、戏台、民居、牌坊、水榭、城门,层层叠叠;茶庄、金银店、药店、浴室、鸡鸭行、猪行、羊行、粮油谷行,应有尽有。秦淮河中,运粮船、龙舟、渔船往来穿梭,甚至还有从内秦淮河拐出的唱戏小船。《南都繁会图》绘有109家商店及招幌匾牌,1000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侍卫、戏子、纤夫、邮差、渔夫、商人等在长卷上神态各异,展现出一幅繁华、热闹而又静谧的市井生活图。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

南京为明朝文化中心的标志是国子监的创办,甚至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国子监仍被保留,号称"南监"。国子监同时也是收藏图书资料、编辑刻印书籍的中心,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是在南京国子监编成的。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对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说:天下古今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篇幅浩繁,不易查看,应立即组织儒士,编出一部如探囊取物般考察方便的类书。明成祖十分重视编辑工作,由解缙、姚广孝等人负责,先后有数千文人参加了这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完整地保存了许多佚文秘典,是极为可贵的历史文献。


明人绘《金陵八景图卷·秦淮渔笛》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命士兵将皇宫围困。建文帝命人点火焚烧皇宫,然后仓皇出逃,不知所终。这场大火使奉先殿等宫殿毁于一旦。明成祖即位后,迁都北京,南京虽有陪都之名,但政治地位及繁华程度已是明日黄花,故宫也废弃不用。到了明末,南京昔日的辉煌已大半尽失。清初,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这座名城又一次横遭劫难,变得满目疮痍。康熙下江南时,只有通过路边村民的指点隐约感悟南京城昔日的繁华。有诗为证:

一代规模成往迹,千秋兴废逐流波。

宫墙断缺迷青锁,野水湾环剩玉河。

被人淡忘的辉煌：中都凤阳

明朝曾在三地构筑都城，即北京、南京和凤阳，其中最早的是中都凤阳。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登极。第二年，朱元璋决定以其家乡临濠为中都，像京师一样在家乡建置城池宫阙，并将临濠更名为凤阳。朱元璋为什么选择凤阳作为都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元璋本人出生在凤阳，多少迁就了一些家乡观念；另一个原因是，朱元璋考虑全国已经统一了，吴王时代建筑的南京城偏于东南，不便于控制全国，便想在中原建都。但中原地区元末以来二十多年的兵荒马乱，民生凋敝，既无人心基础又无物质基础，如果在中原地区建都，人力物力都要依赖江南，水陆转运也很困难，于是就选择了离中原稍近的位于淮河南岸的凤阳建立中都。在凤阳建中都，北有淮河为屏，南距素有"鱼米之乡"的巢湖、太湖也不远，有充足的粮草供应，交通运输也十分方便。据《中都志》记载，在凤旧建都，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可见，朱元璋在凤阳建中都城，是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以及军事地理这几个角度去考虑的。

中都城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动工兴建，集全国名材、百工技艺于此，于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停建，共历时六年。其中大部分项目已经完工。

洪武三年，建宫殿、宗庙、大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

洪武四年，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坛及太庙；

洪武五年，定中都城基址，筑禁垣、皇城，建百万仓、公侯第宅、钦天监、观星台；



凤阳城里的龙兴寺大雄宝殿

洪武六年，甄皇城，建中都城隍庙、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军士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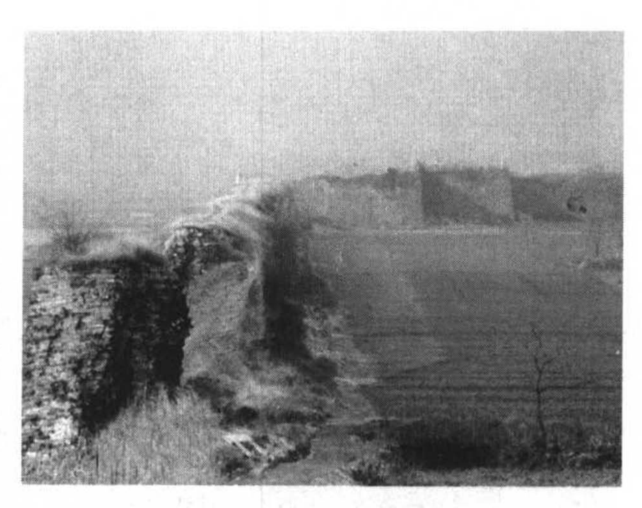
洪武七年，建会同馆、中都土城；

洪武八年，建中都国子学、鼓楼、钟楼。

中都城的建筑布局的基本特点是对称，它与南京、北京两城大体相似，分为内中外三道城。外为中都城，周长30公里，开9门。中为禁垣，周长近8公里，开4门，曰午门、东华、西华、玄武门。城内有正殿、文华和英武两殿，文、武两楼，东、西、后三宫，金水河、金水桥等。正南午门外，左为中书省、太庙，右为大都督府、御史台、大社稷。中都城内外，还有城隍庙、国子监、会同馆、历代帝王庙、功臣庙、观星台、百万仓、军士营房、公侯第宅、钟楼、鼓楼等。《中都志》称当时的中都"规制之盛，实冠天下"。明中都在建筑布局上，上承宋元传统，下启明清风格，对明北

京城的规划有深刻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都城城墙的建筑。


凤阳古城墙

皇城城墙雄伟坚固，皆用大城砖砌筑，已发现署有22个府70个州县及大量卫所、字号的铭文砖。城砖质地细密，规格整齐，烧造考究。一般宽20厘米，长40厘米，厚11厘米左右，重约20公斤。为了保证墙砖的质量，他们还层层建立了责任制，要求各地生产的城墙砖烧制出府、州、县、制砖人等5至6级责任人的名字，这在全国同类墙砖上极为罕见。其中有地方各府县、军队各卫所和少量刑狱砖。砖文有隶、篆、行、楷等各类书体，以刻划、模印、墨书等方法标于砖上。砌砖所用的灰浆是用石灰、桐油、糯米汁等材料混合而成。在城墙的关键部位，甚至用熔化的生铁代替灰浆灌铸。所以在明代的200多年中，城墙完好无损。

中都城方圆约45里，北达方邱湖，东抵独山，南至老人桥，西接马鞍山，有城门九座，已初具规模。中都城内还有皇城一座。皇城又名紫禁城，位于中都的中心，与中都城同期而建，方圆9里，有城门楼4座。当时，中都城内有94个坊，24条街巷，3个市场，2个闹市口，有居民及守城军22万多人。

但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又突然改变主意，停建中都，改都南京，并将营建中都宫室的余材，就地用于修建陵墓、寺观和其他工程。中都城虽只建成了大半，从历史的角度看，中都皇城是明代南京、北京的原型，其对后世的影响至大至深，甚至于连承天门、午门、玄武门等名称都被一一沿用。

这座古城在明末农民起义和近代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曾拆墙营建军事设施。“文革”期间，大批城墙砖被转卖到上海、蚌埠等地，使残留的古迹遭到彻底的破坏。昔日偌大的皇城，现在只残留城墙的西段和南段的一部分和城门两座。

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建筑群:故宫

明故宫是在元大都宫殿的基础上仿照南京故宫的格局兴建的，从1407年到1420年，历时14年，征用民工及军工达一百二三十万人。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群是东方最大的宫殿群。



从景山看故宫

故宫,明代被称为"紫禁城"。1925 年以后才被称为"故宫"。故宫为什么被称做"紫禁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传说中的天帝居住在天上的"紫宫",地上的皇帝既然为"天子"——天帝之子,皇权神授,因而他居住的地方就称为"紫禁城"。第二种解释是,"紫"字与"紫气东来"同义,即以祥瑞云气象征皇帝。第三种解释是,"紫禁城"借喻紫微星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曾把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紫微星垣在三垣的中央,是代表天帝的星座。皇帝作为天子,"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皇帝的居住之所自然被称为紫禁城了。

故宫占地 70 多万平方米,共有宫殿 9000 多间,均为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这些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是世所罕见。它标志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昭示着 500 多年前匠师们在建筑上的卓越成就。

故宫的四周有四个门。

正南为午门。午门是整座宫城的大门,位于紫禁城的最南面,俗称五凤楼。高高的城台上,中央有一座九开间的大殿,在它的两翼各有 13 间的殿屋向南伸出,在这殿屋两端各有一座方形的殿堂,这种形状的门楼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的形式。午门作为紫禁城的大门,同时又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和战士战后凯旋向皇帝献俘的地方。

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

后门为玄武门，位于中轴线之北。玄武为古代四神兽之一，从方位上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主北方，所以帝王宫殿的北宫门多取名“玄武”。玄武门也是一座城门楼形式，用的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式屋顶，但它的大殿只有五开间加围廊，没有左右向前伸展的两翼，所以在形制上要比午门低一个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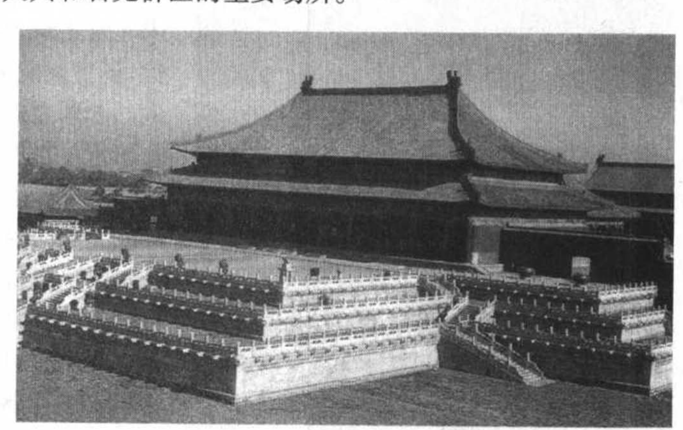

午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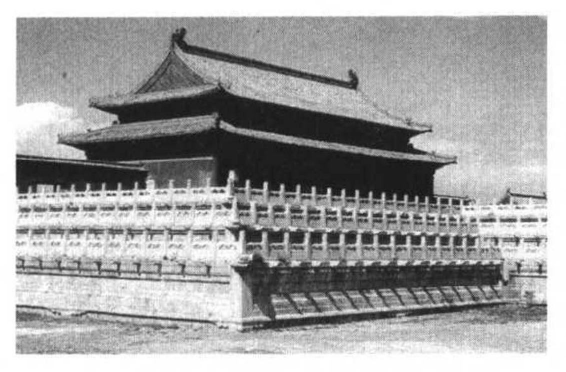
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华门与西华门遥相对应，门外设有下马碑石，门内金水河南北流向，上架石桥1座，桥北为三座门。东华门以西是文华殿。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3座券门，券洞外方内圆。城台上建有城楼，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基座围以汉白玉栏杆。城楼面阔5间，进深3间，四周出廊，梁枋绘有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乾清门以北为内廷。

外朝以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即今之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轴心，文华、武英两殿为侧翼，是皇帝行使权力、登极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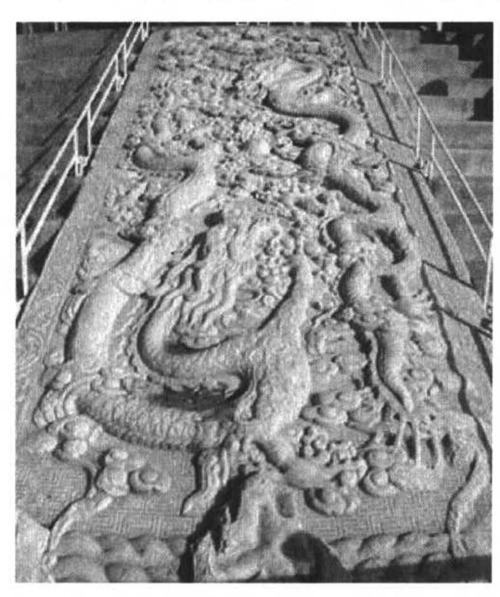
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是故宫里最吸引人的三座大殿。它们都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高的台基上，远望犹如神话中的琼宫仙阙。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殿高28米，东西63米，南北35米，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其中6根围绕御座的是沥粉金漆的蟠龙柱。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后面有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庄严绚丽。太和殿是紫禁城内最体现中国帝制权力的象征，不仅面积是紫禁城诸殿中最大的一座，而且形制也是最高规格。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皇帝在去太和殿之前先在此稍作停留，接受内阁大臣和礼部官员行礼，然后进太和殿举行仪式。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写有祭文的“祝版”，以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到中南海演耕前，也要在这里审视一下耕具，以示真切。中和殿在太和殿后面，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四角攒尖顶方亭建


太和殿(明初称奉天殿)


保和殿(明初称谨身殿)

筑。其深广各三间,周围出廊,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屋顶为单檐钻尖式,中央最高处安装着镀金的圆形宝顶,仿佛巨大的宝珠。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在故宫中和殿后,为故宫三大殿之一。其意为“志不外驰,恬神守志”,就是说神志得专一,以保持宇内的和谐,才能神寿安康,天下太平,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初名谨身殿,嘉靖时改名建极殿,清顺治时始称今名。乾隆时重修。保和殿面阔9间,进深5间,平面呈长方形,黄琉璃筒瓦四角钻尖顶。

内廷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居中轴线,有御花园、东西六宫环绕,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皇后、嫔妃以及太后、太妃等居住的地方。乾清宫是内廷正殿,面宽9间,进深5间,高20米。殿的正中有宝座,两头有暖阁。交泰殿是皇后寿庆之所,位于乾清和坤宁两宫之间,含天地交合、安康美满之意。坤宁宫被称为中宫,是皇后寝宫,面阔9间,正面中间开门,有东西暖阁。御花园原名宫后苑,占地11000多平方米,有建筑20余处。以钦安殿为中心,园林建筑采用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布局紧凑、古典富丽。殿东北的堆秀山,为太湖石叠砌而成,上筑御景亭,每年重阳节,帝后在此登高。


御道上的云龙石雕

明朝时,是谁主持、规划、设计了故宫?永乐时期,其规划领导人有泰宁侯陈珪、工部尚书宋礼及王通、柳升等人,建筑师是陆祥、蒯祥、蔡信、杨青及阮安等人,著名匠师有王顺、胡良等人。永乐之后,宣德年间有些营造,如南城里太孙旧宫的拓展;英宗时复建三大殿、后二宫(当时尚无交泰殿),并增拓南城。这时候的工程力量基本都是永乐时旧人,而朝中负责营造的官员,则是当时的工部尚书吴中。明代北京故宫的第二个营造高潮在嘉靖年间。重建三大殿,增建西苑,分建天地坛,改造太庙,建日坛、月坛和大高玄殿。主持营缮的是侍郎雷礼,主持工程的是匠役出身的徐杲。明代最后一次营造高潮在万历年间。主要有修复火灾后的乾清宫和坤宁宫,增建交泰殿等后三宫工程,另外对御花园等处都有修建。这时工程技术主持人是冯巧,担负工程核算的是贺盛瑞。

关于故宫有多少间房屋,流行的说法是9999间半,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而是一种理想的估计数字。因为在故宫的历史上,房屋数量是不断变化的,每次修建,都会有所增减,所以这个数字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永乐初建成时,为8350间,

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永乐朝建设紫禁城宫殿,是在拆除元大内后进行的。永乐新建的紫禁城在元大内的基础上向东南方向移动,但东六宫仍然在元大内范围之内,元大内东城墙(原址约在今东筒子)之外新拓出来的地方,还是空着的。明代中期起,宫殿增建,形成"三内"并列的局面:紫禁城为主体,被称为"大内";北、中、南三海(包括今府右街以西至西皇城根区域)为西苑,被称为"西内";东华门外直至东皇城根为"南内",或称南城、小南城。到明末时,全部宫殿为786座,房屋数字显然大于1万。

另一个有趣的事是,故宫各门匾中"门"字末笔直下至底而没有向上的勾脚。为什么故意写成这样呢?"门"字的这种写法,宋代就有了。据说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殿门烧光。宰臣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勾脚,带火笔,因此招火,将这些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凡宫殿的匾额,书写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勾脚。有一个为写"门"字而丧生的故事,说的是明太祖在南京命中书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所写"门"字,末笔微微勾起,明太祖看后便大发雷霆说:我要招贤,你詹希原却要闭门,塞我贤路!遂下令斩之。

"左祖右社":太庙和社稷坛

在紫禁城前面两侧有两组重要的建筑群,分别是太庙和社稷坛。东侧的是太庙,用以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有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太庙

太庙,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代皇家的祖庙。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朱厚熜将太庙合祀制度改为分祭,设九庙分别供奉历代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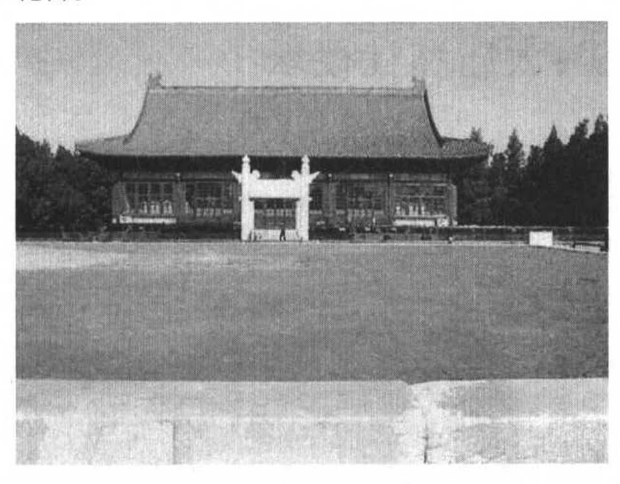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南北475米,东西249米。太庙的建筑群共有三重围墙,均为黄琉璃瓦顶红墙身。在第一重和第二重围墙之间是浓郁古老的柏树,清幽宁静的环境使人沉静严肃。第一道围墙的西边原有三座门,最南边的称为太庙街门,共5间,通向天安门里;中间的为太庙右门,共三间,通向端门里;最北边的为太庙西北门,通向午门外的阙左门。三座门都是坐东朝西。庙内主体建筑为前、中、后三大殿,每逢登基、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献俘等,皇帝、嫔妃均到此祭祀。

大殿、二殿、三殿为庙中主要建筑。大殿对面为大戟门，门外有玉带河，河上有桥5座。桥北东西各有六角井亭一座。桥南为神厨与神库。再南为五色琉璃门，门外东南有宰牲房、治牲房、井亭等。

前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是三殿之主，为皇帝举行大祀之处。前殿是供奉皇族祖先牌位的地方。每到年末岁尾大祭的时候，将太庙供奉的帝后神祖主木牌移到这座殿里，举行“祫祭”。其两庑各有配殿，东供有功的皇族神位，西供功臣神位。中殿也叫“寝宫”，是平日供奉死去皇帝神位的地方。两侧有配殿储存祭器。后殿自成院落，殿前有红墙同中殿隔开，称为“祧庙”，是供奉皇帝远祖神主的地方。此外，还有戟门、神库、神橱、宰牲亭、井亭、汉白玉石桥等建筑。皇帝祭祀太庙时所走路线，从午门至天安门御道东侧的阙左门出入太庙街正门。皇帝斋戒于斋宫。祭日时刻，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

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庙中的八庙被焚，仅存睿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建新庙，恢复了“同堂异室”的合祀制度。太庙的后殿及两庑是弘治四年(1491年)建成的，以后不断有扩建。

清帝逊位后，祭典始废，但太庙仍由清室保管。1924年，太庙由清室移交北洋政府，曾作为和平公园对外开放，1931年，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社稷坛

社稷坛位于今天中山公园的中央，坐南朝北，社稷坛区占地23万平方米，较太庙为大。坛本身范围之外，也遍植松柏。祭坛是园内的中心建筑，位于园中心偏北。坛呈正方形，分上下两层，以汉白玉砌就，各高4尺。上层5丈见方，下层5.3丈见方，四面均有陛阶，各分4级。拾级而上，登至坛顶，脚下积土为坛面，坛面中心为一圆，周围分4区，共5区，以不同颜色的泥土为区别，这就是社稷坛上有名的“五色土”。坛上五色土，分别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坛的地基全部用的是汉白玉，坛四周设围墙，上覆琉璃瓦，瓦色与坛上土色相对。在坛中央曾有一方形石柱，名为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坛的四方各有一座汉白玉的棂星门，显得庄严肃穆。在坛北有一座既庄重又精巧的木构大殿，称拜殿。此殿始建于永乐年间，顶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面阔5间，进深3间，朱红门窗，白石台基，是为皇帝在祭祀途中避风雨而设。在社稷坛“五色土”东北侧还有“音乐堂”。观“五色土”而后赏乐便当携来旷古的意境。赏乐后而瞻“五色土”自会激励未来的向往。

皇帝来社稷坛祭祀时，从阙右门进社稷坛东北门至坛的门外，下辇坐轿入右门，顺戟门往东行至拜殿东阶下轿，在乐舞声中到坛上行祀。坛上设有神牌，太社位于右，太稷位于左，均朝北。每年皇帝之所以要亲祀，是以表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王者以土为重，为

天下求福报功”。

社稷坛原址是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代改称万寿兴国寺，明代始改建为社稷坛，清代沿用。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军司令部就设在社稷坛。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祭祀社稷的制度。1914 年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1928 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皇家祭坛：天坛

天坛是明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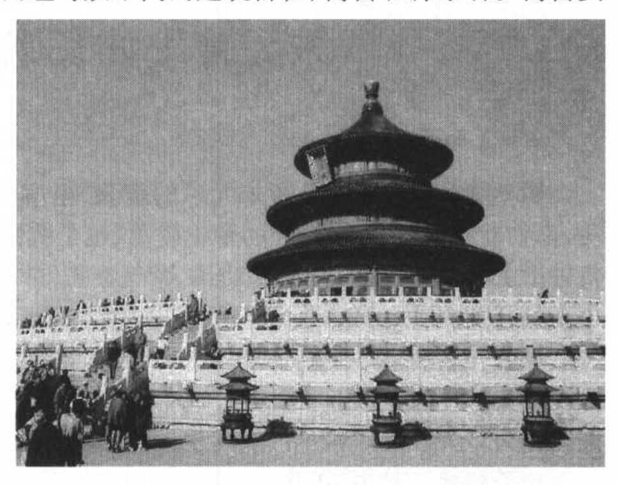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皇帝都把祭祀天地作为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而祭祀建筑在帝王的都城建设中举足轻重，必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完美的艺术去建造。明朝营建的天坛，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天坛共占地 270 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要大两倍多。它以严谨的规划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著称于世，是我国象征“天”的一座坛庙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颗明珠。

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二坛。圜丘坛在南部，是后来于嘉靖九年(1530 年)营造的，是祭祀天神的地方。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子墙四周各有一大门。北门叫成贞门，也称北天门；东门叫泰元门，也称东天门；西门叫广利门，也称西天门。南面正门叫昭亭门，也称南天门。祈谷坛在北部，是祈求丰收的地方。依照古人“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天坛围墙平面南部为方形，象征地象，北部为圆形，象征天象，此墙俗称天地墙。

天坛的主体建筑均集中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圜丘”、“祈谷”两坛也在这条中轴线上，各个单体建筑之间用墙相隔，并由一座长 360 米，宽 30 米的石桥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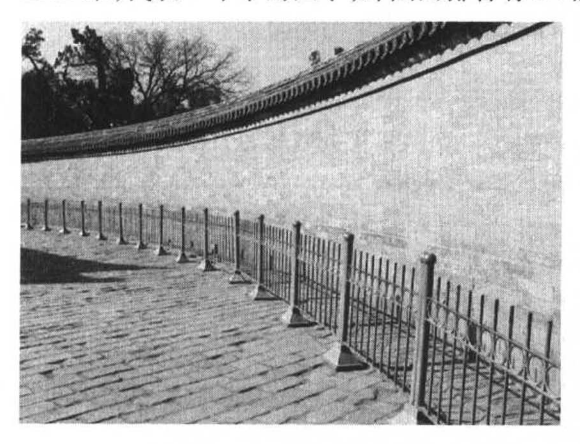
除祈谷坛和圜丘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即斋宫和神乐署。斋宫实际是座小皇宫，是专供皇帝举行祭祀礼前斋戒时居住的宫殿，也有城河围护。神乐署则是隶属于礼部太常寺，专门负责祭祀时进行礼乐演奏的官署。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拥有数百人的乐队和舞队，平时进行排练，祭祀时负责礼乐。署衙的位置在外坛西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一组标准的衙署建筑。



祈年殿

天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祈年殿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每年皇帝都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祷五谷丰登。祈年殿呈圆形，直径 32 米，高 38

米，是三重檐亭式圆殿，宝顶鎏金，碧蓝琉璃瓦盖顶；殿内九龙藻井极其精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大殿结构十分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中央的四根立柱高19.2米，代表一年中的四季，外围两排各有12根柱子，分别代表十二月和十二时辰。大殿建于高6米的三层汉白玉石台上，使大殿产生出高耸云端的巍峨气势。



回音壁

天坛中有两件宝物：三音石和回音壁。

先说三音石。皇穹宇殿门外有一条由大长方石铺成的甬道，站在甬道第三块石板上，敞开殿门，并将全殿窗户紧闭，使殿门到殿内正中神龛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然后面对殿门说话，就可以听到非常洪亮的三声回声，而且站在殿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由于这声音是在供奉“皇天上帝”的建筑里发出来的，并且回声很大，就有了“人间偶语，天闻若雷”的说法。这些石板也被称为“三才石”，取天、地、人三才之意。当然，人们必须站在人石上说话，为让“皇天上帝”听到，还必须打开殿门，而说话的回声便是“皇天上帝”的回答。

再说回音壁。回音壁其实就是皇穹宇的围墙。由于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又很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十分规则。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对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被称为“回音壁”。

朱元璋夫妇长眠的明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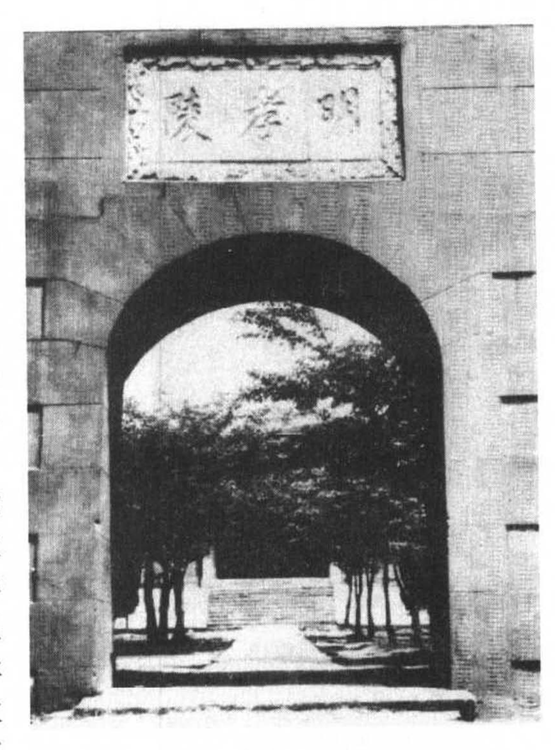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独龙阜北依钟山主峰，阜高150米，林壑幽深，紫气蒸腾，自古就有“发地多奇岭，千云非一状”之说。山南是开阔的平原和幽渺的前湖，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堪称风水宝地。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开始为自己筹建陵墓。洪武十五年(1382年)，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就将马氏葬入正在修建中的陵墓，因为马皇后的谥号为“孝慈”，所以这座明代第一陵被称为“孝陵”。孝陵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筹建，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动用10万军工，前后历时38年之久。

相传，朱元璋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曾于同一天从南京13个城门同时出殡，而且

车马仪仗完全相同,使人难辨真伪。当年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鹿鸣其间,气势非凡。

孝陵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几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自最前面的下马坊至后部的方城,纵深达 2.62 公里,围绕孝陵的红墙,周长 22.5 公里,相当于京城城垣长度的三分之二,可见规模之宏大。明孝陵的朱红大门坐北朝南,正对梅花山,门额上书"明孝陵"三字。碑亭后原建有两御亭,西边叫宰牲亭,东边的称具服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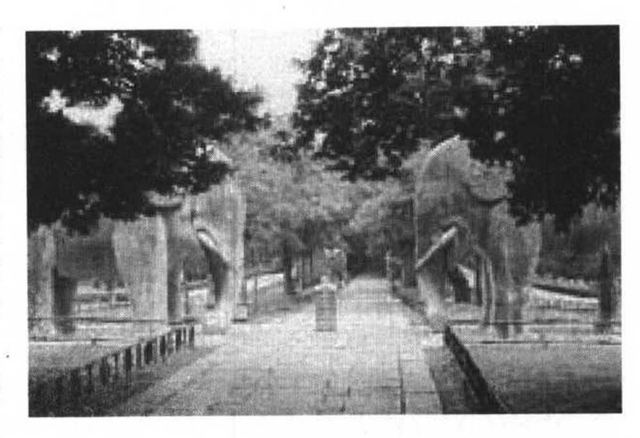


明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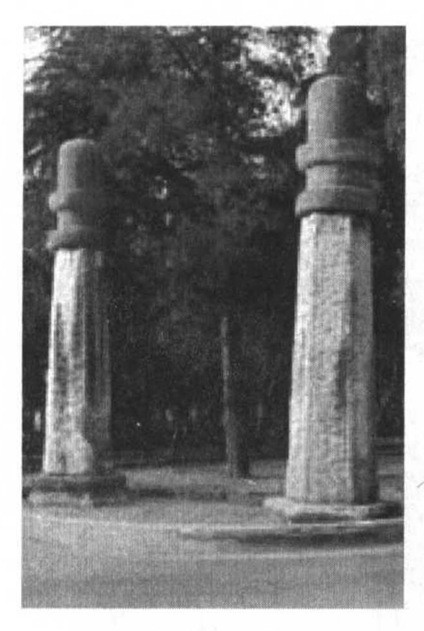
明孝陵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

孝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以前历代帝陵前的笔直神道改成一个弯曲的形状,颇出人意料。因此,自明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近年来有关神道弯曲的种种推测更是此起彼伏。流行的三种说法是,一朱元璋是农民出生的皇帝,做事随意,包括建自己的陵墓也别出心裁;二朱元璋要让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墓看大门,所以避开梅花山使神道变得弯弯曲曲;三朱元璋尊重自然,顺应山水形势,设计出了这座前无古人的陵寝布局。

孝陵的神道以弯曲幽长有别于历代帝王陵前道路的宽阔直接,一直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附会出很多传说。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取得"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崇仰天象,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


明孝陵神道石像

陵墓的神道从四方城开始。四方城内有立于龟趺座上的石碑一块,碑高 8.78 米。碑文由朱棣亲撰,计


明孝陵神道望柱

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碑座、碑额雕琢瑰丽。神道由此向西经外金水桥，绕过梅花山再折向北，长约1800米。其中段为石象路，这段路上相向排列着12对石兽，分别是狮、骆驼、象和马等6种，每种两对，姿态是一对伏，一对立。后面是一对高大的华表，上雕云龙，气势非凡。折向北面的神道上分别列着4对身着盔甲或蟒袍的文臣武将。石人石兽的体型都很巨大，是明代石刻的艺术珍品。

孝陵的主体建筑，包括正门、中门、享殿、大石桥、方城和宝城。中门已毁，须弥座台基上有清代修建碑亭1座。享殿仅存台基，台基前后有阶石，台基上有大型柱础56个，推断当年的享殿应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后部宝城用巨石砌成，城南面中间有拱式隧道，上部明楼已毁，尚存四壁和柱础。孝陵的建制和布局基本沿用了唐宋的做法，但在坟丘形制上，陵寝的布局却有所变化，即改方坟为圆坟，外建圆形宝城，合上下宫为一处，并新设明楼等。

孝陵在清初保存尚好，但到了咸丰年间，清军攻打太平军时，孝陵遭到了严重破坏，享殿等建筑成为一片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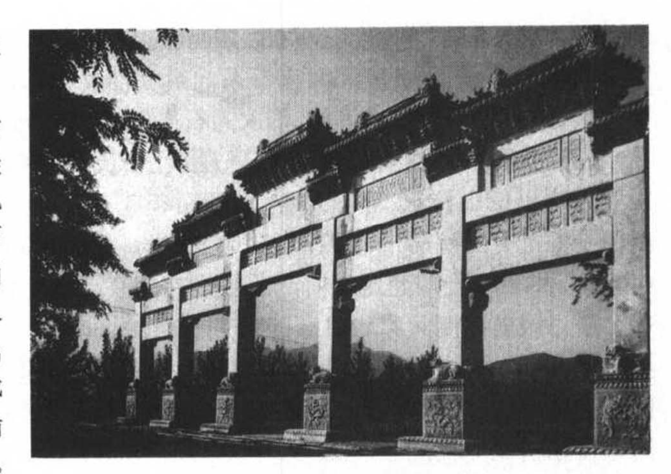
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陪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的妃嫔达46人，宫女达12人。这些妃嫔都是在朱元璋死后被太监用绳索吊死的。由于明朝正史没有记载，殉葬妃嫔宫女葬在何处，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

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

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寝的总称，位于北京天寿山麓，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为盆地。在广阔的盆地上，埋葬着明代13个皇帝、23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建造用时长达200多年(1409～1644年)，工程极为浩大。

十三陵陵区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各陵均依山面水。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是陵区第一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前。此后明朝营建的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等十一陵分别坐落在长陵两侧山下。陵区中部长达七公里的长陵神道(总神道)与各陵相通。崇祯帝朱由检的思陵是最后一陵，位于陵区西南隅。十三个皇帝的陵寝，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基本相同，均前方后圆，只有面积大小、筑饰繁简略有差异。其中，建筑最为雄伟

的是长陵，结构最为精美的是永陵，规模最小的是思陵。


十三陵石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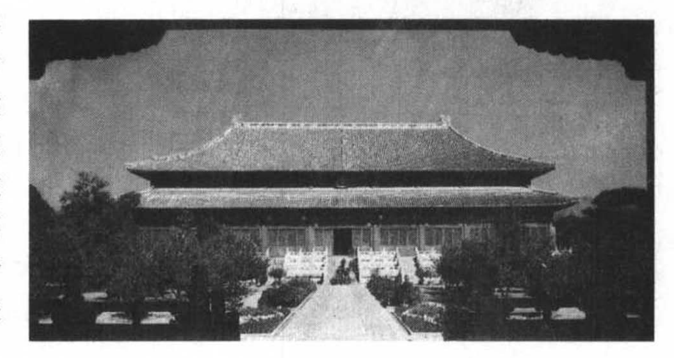
沿陵墓中轴线，分别有石牌坊（石牌坊是陵区最南端的建筑。该坊五门六柱十一楼，高14米，宽28.86米，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早的石坊）、大宫门（大宫门是陵墓区的正门。门分三洞，旁连40公里围墙。门前竖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碑楼（该楼为重檐顶四出陛，楼内存长陵的神功圣德碑，3000余字，明成祖陵长子仁宗朱高炽撰）、石象生（神路两侧有一组石雕群，24兽，12人，共18对，36个。包括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各4匹，二卧二立。武臣、文臣、勋臣各4人）、棂星门（6根门柱形似华表，三门额坊中央雕有石刻火焰珠。棂星门北有7孔汉白玉神桥一座，通往长陵陵门）。

十三陵的神路尉为壮观。关于神道两侧的石人和石马，有两个传说。

对于石人和石兽身上的伤，当地有个传说：石人和石兽白天不动，晚上则到附近村里祸害百姓。百姓震怒，就把石人打得遍体鳞伤，伤了石人的元气。此后，无论白天黑夜，石人都在原位不能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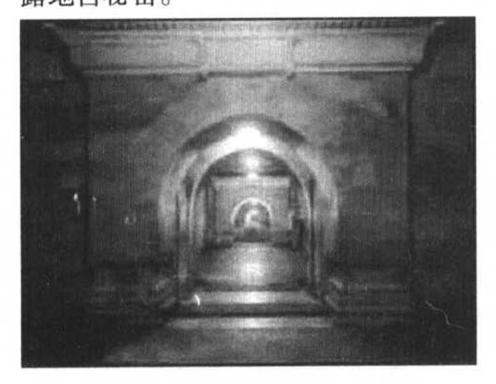
对于12尊石人，4匹马的传说更耐人寻味。传说石人有12尊，但马只有4匹，不够每人一匹。由于谁都解决不了宣宗皇帝所要求的"十二石人要备十二匹马，而且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这一难题，宣宗皇帝为此杀了很多人，最后一个中年人把皇帝带到神路旁指示天机。原来那两个武臣的后身，各有4匹浮雕石马，活脱逼真，与卧在神道上那4匹加起来，正好凑够12匹之数，没有违背"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的要求。这汉子原本是参与雕刻石人的石匠，他认为12石人应有12石马，而且早就雕成了四明八暗的样式。后来，汉子为阻止皇帝滥杀无辜，才道破了天机。事后，他悄然返乡种地去了。

长陵是在朱棣亲自主持下修建的，于永乐七年(1409年)破土动工，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把死去的皇后徐氏的尸骨从南京迁葬长陵。宣德元年(1426年)，长陵最后竣工，历时15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北伐蒙古之军中，与徐皇后合葬长陵。长陵是十三陵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座陵墓。陵门内有三进院落，陵门至棱恩门为第一院落，第二院落便是过去皇帝谒陵时举行祭祀仪式的棱恩殿，面阔9间，进深5间，总面积1956.44平方米，内竖60根不加粉饰的楠本巨柱，


长陵稜恩殿

高14米，直径1.17米，这座楠木巨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是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的珍品，也是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大而又完整的明代建筑。第三进院落从内红门至明楼，院内前部有二柱牌坊，依次为石五供、明楼和宝城。

昭陵是穆宗朱载垕和皇后李氏、陈氏、李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2.5公里的大峪山下。这里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占地面积3.5公顷。昭陵也是按前殿后寝格局修建的，前面是两进方形院落，长187.5米，宽95米。后面因地势修为纵向椭圆形的宝城，周长约440米。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前至后依次有碑亭、石桥、陵恩门、棂星门、石五供、明楼、宝顶等。陵思殿前两侧对称地建有配殿和神帛炉。宝顶下面是玄宫(即地下宫殿)。与其他陵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进深8.1米，高6.75米形同新月的全封闭式月牙城，俗称哑巴院。据说建陵初期，修建陵墓的工匠、民工都要等陵建成后到此处被迫吃药，变成哑巴，以免泄露地宫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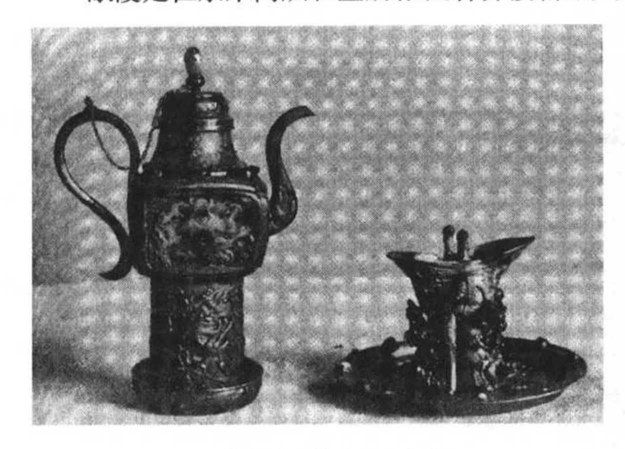


定陵地宫前殿

定陵位于长陵西南约一公里的大峪山下，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他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寝。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历时6年竣工，役使军匠、工匠达3万余人，耗银800万两，占地18公顷。定陵地宫于1956年发掘，1958年完工，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地下宫殿距墓顶27米，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组成，总面积1195平方米。地宫内全部是石结构，为拱券式无梁建筑，殿门均用汉白玉雕成。地宫前殿是空的，中殿放有三个汉白玉石雕宝座和三盏“长明灯”。左右配殿放有棺床，但没有棺椁。后殿是地宫最大的一个殿，地铺磨光花斑石，棺床上放置着帝后棺椁，皇帝居中，左右各一个皇后棺椁，周围放着26只朱漆木箱，内装随葬器物。

长陵、定陵和昭陵是目前开放的三座陵墓。

献陵是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合葬陵，位于长陵西侧的黄山寺。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末代皇帝崇祯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史家在评价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



定陵出土的金壶、金爵

景陵是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左侧的黑山。朱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景陵也是较为俭朴的一座帝陵。景陵自宣宗死时即动工，断断续续到天

顺七年(1463年)才完工,历时达28年。

裕陵是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2公里的石门山下。英宗在位期间,由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明王朝的衰败由英宗始。英宗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临死之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废止了明代开国以来妃嫔、宫人殉葬的制度。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1464年),蒯祥和陆祥两位技艺高超的技师督工,参加营建的工匠有8万余人。

茂陵是宪宗朱见深和皇后纪氏、王氏、邵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3公里的宝山下。茂陵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每日用工数万人,历八月即成。

泰陵是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约3.5公里的史家山下。因孝宗生前好舞文弄墨,故史家山又称"笔架山"。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

康陵是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约5公里的金岭山下。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帝中较突出的一个。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终年31岁,同年五月葬康陵。



十三陵分布图

永陵是世宗朱厚熜及皇后陈氏、方氏和杜氏的合葬寝陵,位于长陵东南1.2公里的阳翠山,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竟用了12年的时间。

庆陵是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刘氏、王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约1.5公里的黄山陵下。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

德陵是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东约2.5公里的潭子峪。德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方建成。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位于陵区西南约6公里的锦屏山下。思陵在明朝时仅是皇贵妃田氏之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葬入田氏墓中。清入中原后,才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与其他诸陵比,思陵规模不大。

明末清初,陵区内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此后其他建筑也不断残损。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1785~1787年)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民国建元后,北平市政府又于1935年修葺了长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对长、献、景、永、昭、定、思七陵和神道建筑进行修葺,发掘了定陵地下宫殿。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长、定、昭三陵和神道四处景点对外开放。

明代的内阁

朱元璋废宰相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大明天子之宝印

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

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明代官吏常服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

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内阁的形成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明代大学士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

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明《杏园雅集图卷》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

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 167 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



杨士奇像

所谓“三杨”,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都是历经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士奇为“西杨”,杨溥为“南杨”,杨荣为“东杨”。在他们的合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出现了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局面,因此,《明史》有“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说法,可见,三人确实是居功至伟。

杨士奇(1365~1444),明江西泰和人,名寓,号东里,字以行。年轻时曾在湖广一带做塾师多年,靠教书维持生活。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举荐下入翰林,充编纂官,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永乐初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朱棣选入内阁。仁宗即位后,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二帝时期及英宗初年,长期主持内阁。他知人善任,引荐于谦、周忱、况钟等人。为官清廉,为天下楷模。后来因为儿子杨稷犯罪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死后谥号文贞。著有《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辑有《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圣谕录》等。



杨溥像

杨溥(1372~1446),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弘济,建文进士,授以翰林编修。永乐年间侍奉太子,为洗马官。后来因为受太子遣使迎接皇帝迟到,为汉王陷害,关进监狱十年,在牢房中读书不辍。仁宗即位后,杨溥获释。主持修建弘文阁,宣宗登基,将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共同掌管机务,并升为礼部尚书。英宗初年,获少保头衔,晋升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定,著有《水云录》、《文定集》等。



杨荣像

杨荣(1370~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明福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建文元年(1399年)参加福建乡试考中第一,建文二年(1400年)礼部会试名列第三,殿试获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攻下南京后准备登基时,杨荣拦住他的马头对成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使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太祖陵)。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极好的印象,永乐初杨荣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选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赏识,多次随成祖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仁宗即位后,先后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宗时又加少傅,赠太师。正统五年(1440年)退休回家,死在返乡的路上,时年70岁。英宗赠封杨荣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并举行国祭,遣官护送灵柩还故里隆重埋葬。他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三人皆于建文帝时期进入翰林院,前后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炽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开始了三杨共同辅政时期,仁宗勤于政事,修建弘文馆,与大臣们谈论经史,不知疲倦。三杨帮助仁宗制定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俨然一派和平景象,创下了明朝政治中的一段佳话。

三杨中杨士奇先后受到仁宗、宣宗、英宗三位皇帝的重用,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四十年,任职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他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逃民,惩治贪官污吏,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后来都成为明朝名臣。杨荣在文渊阁任职也长达三十八年,他机敏通达,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多谋能断,深受成祖赏识。成祖性本威严,凡遇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只要杨荣到了,成祖马上就会变怒为喜,议事就会有好的结果。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他曾五次随君出塞,两次巡边。重修太祖高庙实录,总裁仁宗、宣宗实录。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给他凭借此印可以上疏密奏朝政好坏的权力。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却未恃宠骄矜,仍坚持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这二人各有长处,能够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正如明宣宗朱瞻基所言:"杨荣明达有为,

杨士奇博古守正……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处处以国家大事为重，能够相互谅解，不以个人恩怨影响国家事务。据史书记载，杨荣有时不能廉洁奉公，曾经多次接受边关大将馈赠的良马。事情传到宣宗耳中，于是宣宗向杨士奇对证，杨士奇却大力称赞杨荣长于军务，是他和其他朝臣所不能相比的，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的小错误就抓住不放。宣宗听完则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不仅没有愤怒的表示，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他一样信任杨荣。后来杨荣听说了这件事，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杨士奇，内心十分惭愧，从此二人尽释前嫌，视为知己。

杨溥不像他们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是他操守很好，朝中大臣都很服气他。宣宗十分信任这几位阁臣，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能够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史书记载说：“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在三杨执掌内阁的时期里，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去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拥立朱祁镇为帝，就是英宗。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长子，宣宗驾崩时，朱祁镇年仅9岁，于是朝臣有人欲立哀王为帝。在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力争下，朱祁镇终于继承皇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三杨在这非常时期的正确做法使仁、宣时期“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的安定局面得以继续维持。同时，由于英宗的登基是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努力的结果，所以英宗自然十分仰仗他们，于是三杨依然在朝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能够遵从宣宗遗嘱，在太皇太后的领导下尽心辅佐幼主，对稳定明王朝政局、保持良好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侍奉朱祁镇读书的太监王振因善于迎合朱祁镇的心理，深受朱祁镇赏识。朱祁镇即位后不久，升任他为司礼监太监。他倚仗英宗的宠信，多次私自作决定，干预朝政，压制百官。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准备诛杀王振，英宗带着五位辅政大臣为其求情方免一死。此后，王振虽有收敛，但太皇太后及三杨死后，他便开始飞扬跋扈，开明朝宦官把持朝纲之先例。

三杨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就是明代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作家就是三杨，杨士奇的代表作是《东里文集》，杨荣的是《杨文敏集》，杨溥则有《文定集》，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因为成员多为台阁重臣，所以他们的诗文便被称为“台阁体”。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包容在内。“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徒有华丽的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三杨及其成员的政治地位，使许多追逐功名利禄的士人拼命学习，得官之后也竞相摹仿传习，以致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

“纸糊阁老”万安

万安(生卒年不详),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循吉,四川眉州人。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 年),万安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宪宗成化初年,万安升为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 年)被提拔进入内阁,参与处理国家政务,同时仍兼翰林学士。同年又升为詹事。万安有个朋友叫李泰,是宦官永昌的养子,年龄比万安小,但是万安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所以两个人关系很好。他们官位相同,但是后来每当有了升迁的机会时,李泰必定要让给万安,所以后来万安的官职一直比必李泰高,到了选拔官员进入内阁的时候,李泰再次把机会让给了万安,并且很有把握地说:“你先进去,我不用担心我进不去。”由于这个缘故,万安才得以进入内阁,而李泰后来竟然暴病身亡。

万安虽然进了内阁,但他不学无术,名不符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断地拉关系,最后竟然巴结上宦官,作为他的内援。为了进一步稳定自己的官位,万安开始巴结万贵妃。当时万贵妃最受宪宗的宠爱,万安通过宦官结识了万贵妃,之后大献殷勤,极力投其所好,为了得到万贵妃的帮助,万安还自称是她的子侄辈。于是深得万贵妃的喜欢,竟然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娘家人,后来,万安还认识了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万通也把万安当做自己的本家和他互相往来。后来万通的岳母到京城来,万通的妻子王氏和母亲谈话时得知万安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妹妹,于是两家更加亲近。由于万贵妃的关系,万通的妻子可以随意出入后宫,于是,万安能够随时知道宫中的情况,然后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官位更加巩固。

成化七年(1471 年)冬,天上出现彗星。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说彗星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多日未见大臣所致,于是建议皇帝接见大臣,到朝堂议事。在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等人的大力请求下,司礼监宦官同意约定皇帝接见内阁大臣,并且交代说:“第一次和皇上见面,大家互相不太熟悉,感情也不融洽,所以不要多说话,有话以后再说。”等到他们将要进去见宪宗时,宦官再次叮嘱一番。见到皇帝后,彭时说天象发生变化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宪宗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也应当尽心为我效劳。”彭时接着说有御史上疏请求减少京官俸薪,而武将们非常不满意,提出俸禄照旧,宪宗表示同意。彭时还想继续说下去时,万安已经跪下叩头,口呼万岁就要告辞。彭时、商辂迫不得已,也只好叩头告退。这件事情于是成为笑谈,以至于宦官后来经常戏弄朝臣说:“你们经常说皇帝不召见你们,等到召见你们了,却只会口呼万岁而已。”从此,大家称这届内阁为“万岁阁老”。而宪宗从这件事以后就更不召见大臣了。

后来尹直进入内阁,想求见皇上汇报政事。万安制止他说:“过去彭公请求皇上召见,一句话没有说对,就叩头口呼万岁而退,从此留下笑话。不如我们把事情处理好,让太监选择一些让皇帝看,如果皇上有不同意的地方,要比面对面好多了。”可见,万安多么善于

把过错推给别人。

成化九年(1473年)万安升为礼部尚书,后来改任户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又改任吏部尚书,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彭时已经死去,商辂受到大宦官汪直陷害而被免官回家,所以当时的内阁成员主要是万安、刘珝、刘吉。万安作为首辅,和南方的官员结成朋党;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则和北方的官员结为朋党,双方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完全不顾国家利益。最后,万安联合李孜省、邓常和彭华等打败了刘珝等人。当时宪宗失德,崇信道教,不理朝政,而国家却到处在发生灾难。作为内阁大臣的他们却没有尽到责任,对皇帝加以规劝,反而听之任之,所以当时流传着"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可以说是对他们形象的讽刺。

成化十八年(1482年),掌握西厂的大宦官汪直被东厂太监排挤驱逐,于是谏官请罢西厂。宪宗没有同意。万安再次上疏请罢西厂,结果皇帝同意,于是万安受到朝臣的称赞,被加授太子太傅,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后来又加少傅、太子太师头衔,再升为少师,可谓尊荣一时。

1487年,宪宗驾崩,朱祐樘即位,就是孝宗。万安负责起草登极诏书,同时禁止谏官进言,使满朝官员一片哗然。御史汤鼐质问内阁,万安不动声色地说是皇帝的意思。于是汤鼐马上把他的话上奏皇上,揭发万安自己堵塞言路,却把责任推给皇帝,有失人臣之礼。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人也跟着弹劾万安。于是孝宗很不高兴。在此之前,有个叫倪进贤的人,读书不多,品行很坏,为了巴结万安,常常给他讲房中术。万安对他很好,让他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考中进士,授为庶吉士,担任御史。有一天孝宗在宫中捡到一本小书,里面都是讨论房中术的内容,后面署名"臣安进"。孝宗看后大为恼怒,命令太监怀恩拿着这本书到内阁质问万安:"这难道是大臣的所为吗?"万安吓得大汗淋漓,跪在地上,不敢出声。后来大臣们弹劾他的奏章呈上后,孝宗又让怀恩拿到万安面前朗读。万安跪着不肯起来,想得到宽恕。但是孝宗没有任何原谅他的表示。于是万安只好上书辞职,得到批准。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在回家的途中,万安还不时地回头张望,希望看见奉皇帝命令来召他回京的人,还幻想着被重新起用。回家一年后,万安病死。赠太师,谥文康。

万安执政二十年中,每当科举考试,必定让他的门生担任考官,所以他的子、孙、甥、婿考中的人很多。他的儿子万翼,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孙子万弘璧,任翰林编修。万安死后没有多久,万翼、万弘璧竟然也相继死去。

"光明俊伟"的刘健

刘健(1423~1526),字希贤,河南洛阳人。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先后为官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刘健少年时就端正持重,曾跟随薛瑄读书。他熟读经书,有经世之志。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考中进士,任庶吉士,被授为翰林编修。进入翰林院后,他闭门读书,谢绝交游。于是,大家称他为木头,他也不在意。

宪宗成化初年，刘健升为翰林修撰，不久再升迁至少詹事，并担任东宫（太子朱祐樘）讲官，和朱祐樘关系十分融洽。1488年，朱祐樘即位为帝，刘健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国家大事。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升为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春，成为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仗义执言，以天下为己任，心胸开阔，不记私仇。由于他位高权重，朝中谏官有时候弹劾他专权，他从不放在心上。后来，国子监学生江瑢弹劾刘健、李东阳阻塞言路。孝宗为了安慰刘健、李东阳，将江瑢下狱，刘、李二人不计较私人恩怨，大力为江辩护，将他救了出来。他的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

弘治十三年（1501年）四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告急，京师戒严。刘健建议提拔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守卫京城，保卫了京城的安全。第二年，孝宗想增加军饷，让大臣们商议。刘健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通过缩减宫廷费用、土木工程、裁减冗官等保证军饷供应。都被皇帝接受。《大明会典》修成后，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还和李东阳、谢迁都被赏赐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

当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开始的时候孝宗还不是全部接受，后来由于他们所奏都见成效，于是再有所奏，孝宗无所不纳，还尊敬地称呼刘健为“先生”。刘健每次进见，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谈。无论是刘健提出或是罢免文武大臣，还是他所建议实行的政治措施，孝宗绝大部分都能接受。

弘治十八年（1506年），孝宗驾崩，遗诏命刘健等辅政。孝宗死后，由朱厚照即位，就是武宗。而武宗正如孝宗所说那样，“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于是被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诱惑，贪玩享乐，不理政事。于是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时称“八党”）乘机干预朝政。刘健等人多次上书要求武宗上朝处理政务，清理后宫的玩乐设备，武宗总是表面答应，实际并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后宫玩乐。身负先帝重托的刘健看着年轻的武宗这么不争气，十分自责，于是只得上书请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于是，刘健等人不断上疏，指出政令错误的地方，尤其指斥贵戚、宦官。由于奏章很多，呼声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装命令下面商议。刘健十分失望，再次请求退休回家养老，李东阳、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没有办法，只得按刘健等的意见处理朝政。

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诱惑，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于是决心铲除“八党”，朝中大臣纷纷响应。刘瑾等人非常害怕，于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听了他们的哭诉，非常恼怒，于是下令将部分反对宦官很积极的官员下狱。“八党”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大权在握。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刘健、谢迁再次请求退休回家，这次武宗批准了。于是刘健告老还乡。

刘健回家后，刘瑾等人更加嚣张，增设特务机构，四处活动，镇压异己，排斥忠臣，引进私党，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退休在家养老的刘健痛心疾首，却毫无办法。而刘瑾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陷害刘健。在他退休的第二年（1509年）三月，刘瑾等人诬陷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而刘健位列第一。1510年，刘健被削职为民，并夺去一切封号。同年，刘瑾被另一个宦官张永杀掉，刘健官复原职。刘瑾被杀后，武宗仍然宠幸宦官张永等人，数次南下巡游，沿途不

断骚扰人民。刘健听说后，气得吃不下饭，连连叹息说："我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啊！"

1522 年，武宗驾崩，朱厚熜即位，就是明世宗嘉靖帝。他专门派人来慰问刘健，把他比做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这年刘健年满九十，嘉靖帝下诏命令大臣专门到刘健家里送上束帛、饩羊、上尊等，并封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

嘉靖五年(1526 年)刘健老死，时年 94 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奉劝皇帝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佞。嘉靖帝看了，十分感动。于是再次赏赐刘健家人，并赠刘健太师，谥文靖。

刘健前后辅佐四帝，忠于职守，呕心沥血，所以《明史》说他："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对他评价很高。

栋梁之才杨廷和



杨廷和像

杨廷和(1458～1529)，明朝内阁大学士，字介夫，四川新都人。他少年得志，十二岁就考中举人，一时名扬天下。宪宗成化十四年，十九岁的杨廷和又考中进士，成为成化年间最年轻的进士。

弘治二年(1489 年)杨廷和进翰林院为修撰。因为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为侍读，侍奉皇太子讲读。后来又参与编撰《会典》，破格提拔为左春坊大学士。正德二年(1507 年)由詹事入东阁，专门负责诰敕。由于得罪宦官刘瑾，降为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升迁为南京户部尚书。三个月后回到京城，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正德三年(1508 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头衔。正德四年(1509 年)加光禄大夫、柱国，不久又升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当时大宦官刘瑾掌管司礼监，大树朋党，排斥异己，侵占民田，诛杀无辜。杨廷和与李东阳虽然是内阁大学士，也无可奈何，只能巧妙地与他周旋。后来，安化王寘鐇以诛刘瑾为名谋反。杨廷和用计平定了叛乱。与此同时，另一个宦官张永告刘瑾谋反，武宗杀掉刘瑾。杨廷和由于平叛有功，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

正德四年(1509 年)河北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杨廷和镇压了农民起义，因功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升为内阁首辅。杨廷和执政期间，武宗很少上朝，经常在大同、宣府、延绥等地游玩，根本不过问政事。杨廷和屡次进谏劝说，武宗一点也听不进去。杨廷和无能为力，只好申请退休，但是武宗也不批准。

1521 年，荒淫的武宗死去。由于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嫡生兄弟，于是有的宦官想趁机弄权。谷大用、张永到内阁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并以皇太后的命令，要求内阁学士们选

定继承人。杨廷和拿出《皇明祖训》对他们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宦官进去将他们的意见报告给皇太后。宦官很快就拿着皇上遗诏及太后懿旨出来,宣读给群臣,跟杨廷和所要求的一样。于是,皇位继承人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使政权平安地完成了过渡,没有发生动荡。

世宗即位后,想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帝。而杨廷和等则坚持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应尊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生父只能为皇叔考。世宗十分不满,数次让大臣讨论,杨廷和等始终不肯让步,世宗十分生气。后来,中下级官吏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为了个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疏说当继统,不继嗣,应该尊兴献王为帝。

世宗派司礼太监把他们的意见拿给杨廷和看,说他们的意见没有违背祖训,合于古礼,应该按他们说的办。并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等人,令尊父母为帝、后。杨廷和仍然坚决不同意,群臣也支持杨廷和。然而,决心已定的世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宣称要加称兴献帝、后为“皇”。杨廷和再次请求辞职,朝廷大臣反对者百余人。世宗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虽然如此,但是世宗对杨廷和怀恨在心。

随着君臣关系不断恶化,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合作。杨廷和于是多次请求退休。嘉靖三年(1525年)正月,世宗允许杨廷和退休。但却批评他因为意见不和就辞职,不是做大臣的所为。许多大臣上书请皇上挽留杨廷和,嘉靖帝不加理会。杨廷和离开内阁不久,世宗就让大臣们商议称孝宗为“皇伯考”。于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群臣伏阙哭争,结果180人遭到杖责,杨慎发配云南,永不起用。接着,王邦奇诬陷杨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杨惇、婿金承勋、乡人侍读叶桂章等互为朋党,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后来由于没有罪证,又放了出来。嘉靖七年(1529年),《明伦大典》编成,世宗下诏宣布在大礼议中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为罪臣,共逮捕了134人,退休在家的杨廷和也被削职为民。

嘉靖八年(1530年)六月,杨廷和死,时年71岁。

杨廷和执掌朝政期间,革除弊政,减轻漕粮和赋税,取消团练,重整边兵,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裁减冗兵冗员,诛杀奸宦头子,使朝野为之一新。他还捐资为家乡筑堰开渠、维修城墙、重培宝光寺等,做了许多好事、善事。他死后不久,有一次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储存了多少粮食?”李时回答说:“能够用几十年呢。都是当初陛下下诏裁革冗员以后积累的。”嘉靖帝听了以后感慨地说:“这都是杨廷和的功劳啊!”

隆庆年初,穆宗为杨廷和平反昭雪,追复旧官,并赠太保,谥文忠。

屡遭弹劾的张璁

张璁(1475~15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秉用,明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张璁年轻的时候参加乡试,结果考了七次没有考中。正德十六年(1506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

47 岁了。

张璁考中进士的当年，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没有亲生儿子，也没有亲生兄弟，于是由他的堂弟朱厚熜即位，就是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帝登基后，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结果遭到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的坚决反对，嘉靖三次让大臣议论这件事情三次都被否决，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张璁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但他却认准了机会，于是上疏支持嘉靖帝，并从历史中给嘉靖帝寻找根据。嘉靖帝正愁得一筹莫展，看见张璁的奏疏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急忙把他的奏章交给朝臣商议。大臣们看了张璁的奏章，十分惊异，群起而攻之。这时候嘉靖帝的母亲献王妃到达通州，离北京很近，但是听说名号没有定好时，王妃不肯进京。嘉靖帝听说后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于是打算退位，还回去做自己的藩王。张璁于是写了《大礼或问》给嘉靖，皇帝拿着他的文章去批驳大臣，他们竟然驳不倒，只好同意尊孝宗为"皇考"，而尊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

但是世宗仍不满足，仍然想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嘉靖三年(1525 年)正月，嘉靖帝再次命令礼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依然遭到拒绝。张璁听说后，再次给嘉靖上疏，支持他的想法。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中级官员桂萼也上书支持嘉靖帝。嘉靖帝得到两人的支持，非常高兴，立刻召两人进京。五月，二人抵达京城，再次上书支持皇帝。众反对大臣气势汹汹，甚至扬言要杀了他们二人。桂萼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张璁也经过好多天才敢出门朝见皇上。在嘉靖的支持下，御史段续、陈相由于上书弹劾璁、萼二人而被下狱，刑部尚书赵鉴也请求将二人逮捕审理，还对人说："只要皇上有圣旨，就杀了他们。"结果被嘉靖帝定为段续、陈相的朋党。张璁、桂萼在嘉靖的支持下力辩朝臣。终于使嘉靖帝如愿定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从此，嘉靖非常宠幸张璁、桂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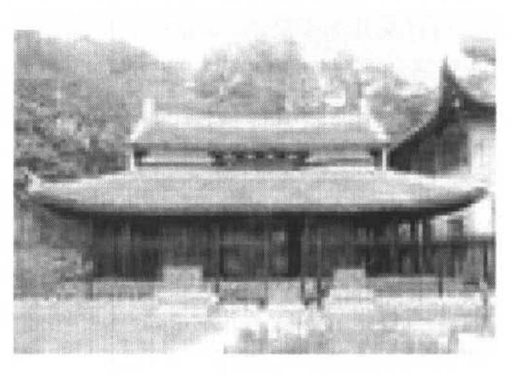
嘉靖四年(1525 年)冬，张璁升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从此更得嘉靖帝的器重。后来在讨论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问题上，嘉靖帝也都根据张璁的意见作出决定。嘉靖五年七月，嘉靖帝升他为兵部右侍郎。他的升迁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但反对者却都遭到嘉靖帝的训斥。不久，张璁又升为兵部左侍郎。张璁大权在握后，就开始报复原来反对过他的大臣。正好山西巡按抓住一个土匪李福，在他的供词中牵连到武定侯郭勋，而郭是张璁的同党，于是张璁向嘉靖帝进谗言，说是大臣因为大议礼的事情在有意陷害郭勋。嘉靖帝疑心大臣们结成朋党，就命张璁负责都察院，桂萼负责刑部，审理这个案件，于是张璁借机把那些反对自己的大臣们一网打尽。嘉靖帝还认为张璁真的立了大功，同年冬，又升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

当时的内阁首辅为杨一清，大学士翟銮的位置也在张璁之前，但是嘉靖帝却更信任张璁。他曾经对张璁说："朕有密谕毋泄，朕与卿帖悉亲书"。可见嘉靖对他的信任程度非常高。张璁当初进入翰林院时，许多翰林学士非常看不起他，张璁记恨在心。后来翰林侍读汪佃给皇帝讲解《尚书·洪范》，嘉靖不满意，于是让他出京去做地方官。张乘机请求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结果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嘉靖七年(1529 年)正月，嘉靖帝视朝，看见张璁、桂萼位列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于是不太满意。内阁首辅杨一清为了讨好皇帝，上书请求给二人加官，于是嘉靖帝赐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编成后，张璁又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杨一清虽然极力逢迎张璁，而张璁却很不满意居于杨之下，于是两人开始产生矛盾。

后来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欲置之于死地。而杨一清定的处罚却很轻，张璁大加恼火，怒骂杨一清是奸人鄙夫。于是杨一清上疏请求退休，并向嘉靖帝数说张璁的不是。嘉靖帝亲笔写诏书挽留杨一清。嘉靖八年秋天，给事中孙应奎劾一清、桂萼并牵连张璁，王准也弹劾张璁的部下陈璠。张璁于是请求退休，并且诋毁杨一清。接着，给事中陆粲再次弹劾张璁擅作威福，以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同僚。嘉靖帝于是罢免了张璁。但是不久，张璁的同党霍韬大力攻击杨一清，并替张璁辩白。于是嘉靖又下令召还张璁，而杨一清则被罢免，张璁成为首辅。

嘉靖十年(1532年)二月，张璁以避嘉靖帝的名讳为由，请嘉靖帝赐名孚敬，字茂恭，嘉靖帝还御书四字赐给他。当时，夏言受到嘉靖帝的赏识，夏言正直刚毅，经常攻击张孚敬。张怀恨在心，于是构陷行人司正薛侃，想通过陷害薛侃达到陷害夏言的目的。但是没有成功，嘉靖帝下旨斥责他。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接连弹劾他。于是嘉靖帝罢免了他，张孚敬惭愧地离开。不久，嘉靖帝再次派人召他回朝。嘉靖十一年(1533年)三月张孚敬回到京城，这时夏言已经升至礼部尚书，深得重用。当时李时、翟銮在内阁，张孚敬不能像以前那样专横跋扈。八月，天上出现彗星，嘉靖帝迷信，认为这是大臣擅政的征兆。都给事中魏良弼弹劾张孚敬，他辩解说这是魏良弼在报复他。给事中秦鳌再次弹劾张孚敬强辨饰奸，谏官也罗列他的种种罪状。嘉靖帝于是命令张孚敬自己请求退休。嘉靖十二年正月，皇帝又开始想念张孚敬，再次将他召回。嘉靖十三年，升张孚敬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张璁故居一碑亭

嘉靖十四年(1536年)春，张孚敬生病，嘉靖帝派遣宦官送去赏赐，后来又派遣宦官赐送药饵，张孚敬于是多次请求还乡养老。嘉靖帝同意，并派御医护送他回去。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张孚敬病死，时年64岁。

屡遭迫害的夏言

夏言(1482～1548)，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公谨，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嘉靖九年任吏科都给事中，后来先后担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嘉靖十七年成为内阁首辅，十八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嘉靖二十一年七月被严嵩排挤免官，二十四年，重新被起用为首辅，二十五年大力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的主张，由于世宗犹豫不定，严嵩乘机诬陷夏言，二十七年夏言再次被免职。严嵩乘势多方捏造罪名，十月夏言被杀，时年67岁。隆庆初年，恢复旧职，谥文敏。

嘉靖二年(1523年)他受命巡查各地皇庄,回京后他力主归还被侵占的百姓田产,禁止勋戚受献庄田,颇得嘉靖皇帝的赞许。嘉靖七年,调任吏科都给事中。由于支持嘉靖帝祭祀天地,并建议分祀天地而得到嘉靖的赏识,赐四品官服和俸禄。当时张孚敬为内阁首辅,权高势重,朝中百官谁也不敢得罪他。夏言凭借自己深得皇帝信任而不逢迎张孚敬,而张也不提拔夏,两人矛盾渐渐加深。嘉靖帝从中调和。升夏言为侍读学士,充任纂修官,仍兼吏科都给事中。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又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夏言的迅速升迁使和他有矛盾的张孚敬更加不安,于是捏造罪名,将夏言抓了起来。嘉靖帝看出来其中的隐情,于是将夏言释放。同年八月,夏言升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九月,取代李时为礼部尚书。


夏言像

由于张孚敬专权跋扈,朝中百官十分憎恶他。而夏言敢于和他对抗,深得大家的支持,威望逐渐提高。嘉靖帝喜欢作诗,写好后就交给夏言看,夏言总能回诗酬和,使嘉靖帝更加高兴,深受宠幸。张孚敬等也不敢再小看他。不久张孚敬等人退休。后来嘉靖帝的皇子降生,加夏言太子太保头衔,后来提高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嘉靖十五年(1536年),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虽然当时李时是首辅,但是政事全由夏言决定。同年冬,李时病死,于是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又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

夏言当上内阁首辅后,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严嵩最初只是个翰林院的小官,后来他听说礼部尚书夏言也是江西人,就刻意巴结,"称先达,事言甚谨",从而得到了夏言的信任。但夏言把严嵩当做自己的门客役使,使严嵩内心十分恼怒,便开始挖空心思,排挤夏言。一次,嘉靖帝拜谒显陵,完了以后严嵩请他再加拜谒,而夏却请求嘉靖启程回京,结果使嘉靖很不高兴。后来嘉靖帝到大峪山巡行,夏言由于来的稍微晚了一会,就受到责备并被责令交出皇帝所赐的银章、手敕等物,之后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退休。没过几天,嘉靖的怒气消了,就又让夏言留了下来。不久,昭圣太后驾崩,嘉靖帝下诏问太子服丧时应穿的服制,夏言回报的奏章上不慎出现了错别字,嘉靖帝十分生气,再次命令夏言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不久又恢复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务,重新执政。

可是夏言并没有因此接受教训,性情始终不改。虽然他擅长写青词,但他并不信奉道教。嘉靖皇帝曾经赐给他和严嵩各一领道袍、一顶道冠。他只是随意谢恩,却没有穿道袍,而严嵩不但天天穿着道袍,还把道冠仔细装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春,夏言做一品官满九年,嘉靖帝派太监赐银币、宝钞、羊酒、内馔。并赐宴礼部。虽然待遇依然优厚,但已经远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严嵩又勾结其他官员,继续诬陷夏言。同年七月,嘉靖终于将夏言革职。

至嘉靖二十四年,嘉靖帝发现严嵩贪婪放肆,于是重新召回夏言。夏言回到内阁后,地位又在严嵩之上。自然不把严嵩放在眼里,处理政务,从来不问严嵩的意见,并将严嵩任用的官员一一罢斥,朝中百官深以为快。严嵩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拉拢官员,不断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觉察到。严嵩还从皇帝身边的太监下手,陷害夏言。夏言平日很看不起飞扬跋扈

的宦官们,因此对皇帝派来的太监不屑一顾,将他们视为奴才。而严嵩对他们则是恭恭敬敬,还不时以钱财贿赂这些太监们。因此太监们回宫后总是说严嵩的好话,而对夏言则极尽污蔑。夏言刚毅正直在嘉靖面前不卑不亢;严嵩则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低眉顺眼、诚惶诚恐的样子。于是嘉靖帝看着严嵩越来越顺眼,对夏言也就越来越不满了。

嘉靖二十六年,陕西总督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在夏言的支持下,他的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赞赏。可是后来嘉靖又觉得没有把握而犹豫不定。夏言对皇上的反复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了皇帝,嘉靖帝很生气。而摸透了皇帝心思的严嵩则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嘉靖帝一怒之下,再次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让他以尚书的身份退休。

严嵩下决心要置夏言于死地,于是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口吐怨言,还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两人狼狈为奸。嘉靖帝听信谣言,于1548年处死夏言,时年67岁。从此严嵩稳坐首辅近20年之久,再也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

隆庆初年,夏言的家人上书替他申冤,穆宗下诏,恢复他的旧有官职,谥文愍,使他的冤案得以昭雪。夏言著有《桂洲集》、《南宫奏稿》。

一代奸相严嵩

严嵩(1480~1567),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担任编修。后来,严嵩听说礼部尚书夏言也是江西人,于是刻意逢迎,想方设法巴结夏言,取得他的信任。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回来后极言祥瑞,讨得世宗欢喜,加上夏言的推荐,他在几年内先后升为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为内阁首辅后,严嵩接替他成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并主持重修宋史。严嵩没有什么才略,但他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皇帝的心思,一味谄媚。他知道嘉靖帝信奉道教,便下工夫学习写作青词,最后以善于撰写焚化祭天的青词而受到皇帝的宠幸,加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兼礼部尚书,开始参与机要。后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严嵩升任首辅,独揽国政。他虽然年过花甲,却整天在西苑值班,连回家洗澡的工夫都没有,从而感动了明世宗,更加信任他。嘉靖二十六年,在他的诬陷下,嘉靖皇帝杀掉重任内阁首辅的夏言,从此专政近20年。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在他儿子严世藩的帮助下,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赵文华因为贪名昭著被贬官,后来通过重贿严嵩重新做官,被人称做"权门犬",此后又进一步与严世蕃结交,认严嵩为义父,后来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他帮助严嵩打击残害其反对派,深得严嵩青睐,官至工部尚书;鄢懋卿贪污受贿,生活奢侈,无恶不作,也被严嵩提


严嵩像

拔为左都御史，后来严嵩让他执掌盐政大权，他更是变本加厉，大肆贪污受贿，对于严嵩则是日日行贿，后来官至刑部右侍郎；仇鸾原是因罪被罢官之人，但是巴结上严嵩之后，便立即官运亨通起来，成为宜大总兵。当俺答入侵的时候，他和俺答的义子脱脱相约，请毋犯大同，且许与之通市。后来俺答汗进犯京师，他奉命率军救援，结果一战即溃，但是因为是严嵩的党羽，所以未受任何处分，反加官太子太保，总督京师地区军事。后来，仇鸾以误国败政被罢官戮尸。

植党营私的同时，严嵩还大力排斥异己，残害忠良。御史桑乔最早弹劾严嵩贪污，严嵩便将其谪戍九江最后死在那里；御史叶经上疏揭发严嵩结交朋党，收受贿赂，滥封官爵。严嵩怀恨在心，后来乘叶经主持山东乡试之机，摘录考卷中的言语，断章取义，说他讽刺皇帝，使嘉靖帝大怒，将他逮至京师，廷杖而死；锦衣卫经历沈练在俺答兵逼京城之际，历数严嵩十罪。结果被严嵩反噬，以诋毁大臣之罪，将其廷杖之后，谪贬于保安，后来以私通白莲教叛逆的罪名将其处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严嵩将杨继盛廷杖之后下于狱中，并最终将他害死。甚至连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学士夏言也不放过，先是设计离间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使夏言被罢官，又继续诬陷，说夏言与被嘉靖帝杀掉的曾铣结交，最终杀掉了夏言。这样的罪恶行径，举不胜举。在这样的黑暗政治形势下，正直的士大夫侧目屏息，而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严嵩还在南京购置了大量的土地。

在他执政后期，由于他大量侵吞军饷，导致前线武器陈旧不能更新，将士常年戍边军饷难以发放而怨声载道，消极懈怠，战备松弛。东南倭寇和北方蒙古骑兵更加猖狂地进攻明朝，边疆呈现严重危机，而身为首辅的严嵩却束手无策。由于政治黑暗，上下官员竞相贪污搜刮，导致赋役日增。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这样的国家状况，使世宗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后，对严嵩开始逐渐不满，转而信任大学士徐阶。方士蓝道行和严嵩素有矛盾，乘机借仙人之口指出严嵩父子是奸臣，使世宗产生了罢免严嵩的念头。御史邹应龙探知明世宗的这个意图，在徐阶授意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广置田宅，霸占民田，奏请斩杀严世蕃，罢免严嵩。嘉靖帝于是以严嵩放纵严世蕃有负皇恩为由，将他罢免，籍没家产，并将严世蕃下狱。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论罪依法被斩。严嵩也被罢黜为民，寄食墓舍，于隆庆元年(1567年)死去。

严嵩死后，江西巡抚成守节奉嘉靖帝命令抄查严嵩的家产，共得黄金二万多两，白银二百零二万两，府第房屋六千六百多间，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余亩，珍珠宝石更是不计其数。

晚节不佳的徐阶


徐阶像

徐阶(1503~158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子升。嘉靖二年(1523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先后担任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进入内阁,四十二年成为首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退休。万历十一年(1584年)病死,时年81岁,死后赠太师封号,谥号文贞。

据《明史》记载,徐阶刚周岁的时候,不慎掉进一口枯井中,当时昏迷过去,家人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但是三天后他竟然神奇地苏醒过来;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从悬崖峭壁上摔了下来,大家认为他肯定没命了,但是他的衣服居然挂住一棵大树使他保住了性命。这使人们感到十分惊奇,都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徐阶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生性聪颖机敏,善于谋略,喜怒不形于色。年轻的时候曾经跟王守仁的门人交朋友,所以他在士大夫中间有很高的知名度。

嘉靖二年,徐阶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他在翰林院时,内阁大学士张孚敬大权在握,嘉靖帝听从张孚敬的建议,想去掉孔子的王号,同时想降低祭祀孔子的标准。嘉靖帝让大臣商议这件事情,其他大臣由于惧怕张孚敬而不敢多说什么,只有徐阶坚决反对这样做。张孚敬很生气地训斥他,徐阶据理抗争。张孚敬大怒,说:“你想背叛我。”而徐阶从容地说:“背叛生于依附。我没有依附你,怎么能说我背叛你?”结果他被贬为延平府推官。在担任延平府推官期间,徐阶审理冤狱,把三百名无辜受害者放出大牢,创乡社学,捣毁淫祠,捕获为害乡间的盗贼一百二十人。后来,升迁为黄州府同知,之后依次担任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在担任吏部侍郎时,他一反过去吏部官员接见庶官不多说话的常规,见到下面来的官吏总是仔细询问边腹要害、吏治民情,所以各级官吏都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他还知人善任,经过他推荐的官员大多是谨厚长者,深得朝臣赞誉,不久他又升为礼部尚书。

当时严嵩专权,徐阶起初不肯依附严嵩。于是严嵩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徐阶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这使他认识到不能以卵击石,于是他改变策略,事事顺着严嵩,从不与他争执。为了得到他的信任,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表面上十分恭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十分霸道,多次对他无礼,他也忍气吞声。同时,徐阶向嘉靖帝靠拢,专门挑皇帝喜欢的话说,终于讨得嘉靖帝的喜欢,不久,加徐阶少保头衔,接着兼任文渊阁大学

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后来他密奏咸宁侯仇鸾罪状,使嘉靖帝杀掉仇鸾,得到皇上的信任,加太子太师头衔,地位进一步提高,仅次于严嵩。后来嘉靖帝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嘉靖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严嵩请求他回到大内住,嘉靖帝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猜透了嘉靖的心思,于是建议用被烧毁宫殿的剩余材料,营建新的宫殿,他的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赞同。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嘉靖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皇帝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

严嵩被勒令退休后,徐阶亲自到严嵩家去安慰。他的行为使严嵩十分感动,甚至叩头致谢。严世蕃也乞求徐阶替他们在皇上面前说情,徐阶满口答应。徐阶回到家里后,他的儿子徐番迷惑不解地问:"你受了严家父子那么多年的气,现在总算到了出气的时候了,你怎么这样对待他们?"徐佯装生气骂徐番说:"没有严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恩将仇报,会被人耻笑的!"严嵩派人探听到这一情况,信以为真,严世蕃也说:"徐老对我们没有坏心。"其实,徐阶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出皇上对严嵩还存有眷恋,而皇上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严嵩的爪牙还在四处活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嘉靖帝果然后悔,想重新召回严嵩,在徐阶的力劝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阶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十分注重选拔,他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他十分爱惜人才,大力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户部主事海瑞。他还十分勤政,凡是皇上交给的任务,即使一夜不睡,也要准时完成,因此他更得嘉靖的赏识。同时,他还经常劝说皇帝停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的做法,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后来因为指挥明军抵挡蒙古骑兵南下有功,升为建极殿大学士。

嘉靖帝朱厚熜死后,徐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反对嘉靖帝而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诏书颁布的那天,许多大臣感激涕零。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税。景王死后,他上奏将景王霸占的陂田数万顷给了百姓,使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还废除朝中的许多浪费项目,尤其是皇帝信奉道教的开支。他的做法,得到朝中上下的拥护,人们称他为"名相"。

由于穆宗行为荒诞不经,徐阶经常劝阻他,所以穆宗十分讨厌他。徐阶也很失望,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正好给事中张齐因为私人恩怨弹劾他。于是穆宗乘机允许他退休回家。朝中百官纷纷上奏章请求留下徐阶,但是穆宗说什么也不同意。

徐阶退休回家后,纵容自己的子弟横行乡里,大量购置田产,徐家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加上他的子弟、家奴为非作歹,致使告他的状纸堆积如山。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办案,惩治了他的家人,于是徐阶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罢免了海瑞和蔡国熙,可谓一手遮天。所以当时人称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有人因此把他称为"权奸"。

万历十年(1583年),徐阶80岁高龄,皇帝专程派人前去慰问,并赐玺书、金币。第二年,徐阶病死。赠太师,谥文贞,著有《世经堂集》。

恃才傲物的高拱

高拱(1512~1578),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高拱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十七岁参加乡试就一举夺魁,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考中进士,授为庶吉士。第二年升任翰林院编修,九年后升翰林为侍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高拱被选入裕王(后来的穆宗)府,成为裕王侍讲。当时皇太子已死两年而没有另立储君,裕王和他的异母弟景王都住在京城,按资格他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是世宗好像更喜欢景王。一时之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不知所措。而高拱尽职尽责,精心辅佐,还经常开导裕王,给他很大的安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而高拱作为裕王讲官,前途无量,所以两人都很器重他。在严嵩、徐阶的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被升为翰林侍讲学士,拜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为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四十四年,高拱升为礼部尚书,四十五年三月,在徐阶荐举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任礼部尚书。

进入内阁后,高拱依仗着是太子的旧臣,并不听从徐阶,徐阶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而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因此高拱怀疑胡应嘉是受徐阶的指使,对徐阶也心怀不满,两人矛盾逐步加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嘉靖帝驾崩,徐阶和张居正没有和内阁同僚商议就密定遗诏。高拱、郭朴等人十分不满,因而与徐阶矛盾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仍为首辅,后来又推荐张居正进入内阁,高拱更加愤愤不平。在议论朝政时常常跟徐阶抗争,两人矛盾日趋尖锐。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胡应嘉被贬官,朝臣认为是高拱公报私仇,于是群起而攻之,纷纷上疏弹劾他。高拱被迫请求退休,穆宗没有批准。徐阶出于面子也好言挽留,但没有批评攻击高拱的朝臣,高拱越发生气。于是他以徐阶弟子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等事攻击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弹劾徐阶。于是徐阶上疏请求退休。但徐阶很受朝中大臣的拥戴,所以大家纷纷上疏挽留徐阶,并当面辱骂齐康、高拱,三个月之内弹劾高拱的奏章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只好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退休。穆宗也只好批准他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病。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第二年,张居正奏请皇帝重新起用高拱。当年十二月,高拱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回到内阁。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尽职。他办事干练,不循规蹈矩,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成绩突出。高拱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使朝廷上下官僚风气为之一新。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经常南下侵扰,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高拱建议在兵部增加侍郎二员,负责巡阅边务,了解边疆情况,力争做到对边疆险隘、蒙古军队实力、将领是否称职、兵马强弱等情况都很熟悉。这样一来,边疆问题有人专门负责,将领空缺了,

他们也能补上。他还主张选拔有勇有谋的人担任边疆将领，而且不能随意调走。高拱还建议对边疆将领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提拔赏赐应该优先，其他官员不能和他们相争。只要有军功，就能得到提拔。这些措施大大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疆官员，使他们认真操练，苦练杀敌本领。


高拱故居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高拱周密布置，严密防范，蒙古兵只好撤退。十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前来投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奏请穆宗加封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听说明帝对自己的子孙这么友好，深受感动，于是决心与明朝和好，接受明朝册封。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八月，双方开始互市贸易。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战争不断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高拱、张居正功不可没。穆宗为了嘉奖高拱，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为建极殿大学士。

高拱虽然励精图治，政绩卓然。但他恃才傲物，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专擅国柄，所以在大臣中威望并不太高。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因受高拱排挤，称病辞职；接着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也被他排挤而去；然后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也被迫离职。后来大臣殷士儋买通宦官进入内阁，高拱很不高兴。不久高拱的心腹张四维被弹劾，高拱就怀疑是殷士儋所为，处处刁难他。殷士儋实在无法忍受，竟在内阁挥拳击打高拱，结果也被赶出内阁。至此，内阁旧臣除了张居正外，其他成员都被高拱排斥出去。

不仅如此，高拱连退休在家的徐阶也不放过。徐阶退休还乡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于是亲自上奏章告徐阶，并在隆庆五年起复与徐阶有嫌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暗地里命令他狠狠整治徐阶及其子弟，使徐阶苦不堪言，只得无奈地向高拱求饶。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升为中极殿大学士，此后作风更加专横。高拱是首辅，张居正位列其下。高拱与很多同僚发生矛盾时，张居正从不介入。而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当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迎合高拱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所以高拱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威胁。随着高拱日渐嚣张，威信越来越低，张居正取而代之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张居正暗中行贿讨好太监冯保，想借他的力量推翻高拱。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临死前，下诏命高拱、张居正等为辅政大臣。穆宗驾崩后，神宗朱翊钧即位。由于神宗年幼，冯保在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大权。高拱无法容忍权利被宦官夺去，想消灭宦官，于是派人游说张居正，想联合张居正共同对付冯保。但他不知道张居正与冯保关系密切，结果张居正将他的图谋密报冯保。冯保于是在太后和幼帝前诬陷高拱想废掉神宗而迎立河南周王等。同时冯保还买通两宫近侍，大家都这样说，于是太后和神宗深信不疑，便下决心除掉高拱。第二天，太后和神宗召集群臣，痛斥高拱擅权无君等罪而罢免了他，命他即日离京回乡。高拱原来满以为宣诏是驱逐冯保，没有想到是罢免自

己，听到被免职的诏书时“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还是张居正从旁边把他扶了起来。次日一早，他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后，高拱十分郁闷。可是冯保还不死心，再次制造事端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道是诬陷，大力救他，高拱才幸免于难。但却惊忧成疾，一病不起。

万历六年（1578 年）十二月，高拱病死家中，终年 66 岁。由于与当权的冯保有矛盾，冯保命令以很低的规格将其埋葬。到了万历三十年，高拱的儿子上疏替他申冤，经过廷议，得赠太师，并谥文襄。著有《高文襄公集》、《防边纪事》等。

宰相之杰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所以世称张江陵。他 12 岁考中秀才，16 岁中举人，23 岁（嘉靖二十六年即 1547 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到当时内阁首辅徐阶的赏识，两年后升为翰林院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时弊。后因受严嵩的排挤而托病回到家里闲居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被召回朝，仍然供职翰林院。隆庆元年（1567 年）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由于主持编撰《世宗实录》，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


张居正像

1572 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 1573 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日渐衰颓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景象。

张居正首先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肃法纪、信赏必罚。万历元年（1573 年）六月，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各级官吏从此不敢再敷衍塞责，使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有了保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加强内阁，抑制宦官，以巩固中央政权。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十分注重边防。他提出了饬武备、信责罚、造兵将的方略。调任

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整顿北方防务；用名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以巩固东北边防。戚继光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迫使鞑靼首领俺答跟明朝和好，接受册封，双方通商往来，发展经济，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有利于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在俺答汗的影响下，达赖喇嘛也向明朝遣使通贡请封，进一步密切了明朝与藏族地区的联系。

针对黄河年久失修，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大量农田，影响人民生活的情况，张居正任命擅长治水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水上运输畅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帝鉴图说》

万历年间，豪强地主兼并田地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地而不纳税，农民没有土地反而要承受沉重的税赋。导致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于是张居正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万历八年(1581年)，田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孝宗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土地丈量，使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打击。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役银由旧制按照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现象，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一条鞭法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稳定了明王朝的统治，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执政的第五年，他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法，他必须回家丁忧(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担心他离开后，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让他儿子回家奔丧，自己仍然留在京城履行职责。他的改革本来就有人反对，于是他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疏弹劾，有人甚至张贴标语攻击张居正。后来，明神宗处分了一些闹事者，对张居正的攻击才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反对他改革的人始终都没有罢休。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时年57岁。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还上疏请求免去万历七年以前老百姓积欠的赋税，并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万历皇帝还下诏罢朝数日，以示悲痛。并派锦衣卫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到故乡江陵，可谓尊荣至极！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万历皇帝又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并查抄他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

统被罢官为民；而被他罢免的官员，却又大都恢复官职。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

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大宦官冯保十分贪婪，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使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因此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尽管张居正本人比较清廉，曾经拒绝过数以万计的贿赂。但是他只能以一个腐败人物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因而也只好用腐败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又必然导致他的腐败！张居正去世后，他生前的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万历皇帝查抄了冯保后，果然发现了万贯家财。万历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于是下令查抄其家产，终于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1621 年熹宗朱由校即位，开始恢复张居正的官秩，重新给以葬祭。崇祯三年(1630 年)张居正的冤案被平凡昭雪，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状元首辅周延儒


周延儒像

周延儒(1593～164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城镇)人。周延儒自幼聪颖过人，熟读经书。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3 年)，他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京城的会试，夺得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再夺状元。21 岁的周延儒连中二元，少年得志，披红挂彩，骑马游城，万人瞩目，荣耀至极。按照惯例，周延儒以状元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熹宗天启年间，升为右中允，掌管司经局(管理经籍的机构)。不久，又升为少詹事，负责管理南京翰林院。

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继立，就是崇祯帝。当时明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政治黑暗，吏治败坏，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蒙古、后金不断侵扰，边境形势十分严峻。17 岁的崇祯帝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并大力选拔人才。身为状元的周延儒自然受到青睐。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召回北京，任命为礼部右侍郎。

崇祯元年(1628 年)冬，驻守宁远的士兵因军饷拖欠发生哗变，袁崇焕单骑入营，平息哗变。但不久锦州又发生士兵哗变，袁崇焕奏请发饷。崇祯帝召集大臣商议，许多人主张批

准。周延儒看出崇祯帝吝啬钱财，于是迎合崇祯帝的心思说："过去边关用来防止外敌入侵，可现在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又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这样了该怎么办呢？"皇帝问他怎么办？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他的话深得崇祯帝赞赏。数日后，在面议时周延儒又说锦州兵变是由于将帅统兵无策而导致。崇祯帝一直担心是边将趁机要挟，听周延儒这么一说，放下心来。从此崇祯帝对周延儒十分器重。

不久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下诏推荐阁臣。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结果吏部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周延儒。按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钱谦益等以温体仁威望不够而没有提他，而周延儒深得皇帝器重，也被排斥在外，心中愤恨，于是他到处散布流言，说推荐阁臣之事被钱谦益党把持。同样遭到排斥的温体仁也愤愤不平，于是弹劾钱谦益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崇祯帝在名单上没有看到周延儒的名字，心中本来就很怀疑。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立即在文华殿面讯，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质问下，钱谦益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免，相关人员受到处分，名单也被废除。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升文渊阁大学士。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同年六月，温体仁进入内阁，九月，周延儒成为首辅。又加少保，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任首辅后尽力改善同东林党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年)周延儒主持会试，录取东林党人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而温体仁则十分仇视东林党人，并联合阉党对付东林党。于是两人发生分歧。温体仁表面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却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没有察觉。温体仁暗中指使言官不断弹劾周延儒。周延儒的子弟横行乡里，结果周被弹劾；朝臣犯了错误，也弹劾首辅；周延儒与不少官吏关系很好，也被弹劾结为朋党；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考中状元，于是弹劾周徇私舞弊。周延儒多次上疏争辩，崇祯帝虽然表面安慰他，但心里却开始不信任他了。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在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告病还乡。

温体仁继任首辅后，专横跋扈，打击异己，朝臣极为不满，五年后被罢职。之后张至发、薛国观等相继执政，朝政更加腐败。李自成、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势头更旺；东北与后金作战也是屡战屡败。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虎视明朝。这时候崇祯帝开始怀念周延儒，想起他的好处。崇祯十四年二月，周延儒被重新起用为首辅，加太子太师，升为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周延儒再次为首辅后，任用东林党人，革除弊政，免除欠税，赦免轻罪犯人，重用有名望的朝臣。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政绩突出，朝野称颂。崇祯帝更加器重他。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崇祯帝接受群臣朝贺后，亲自揖拜周延儒，并说："朕以天下听先生。"

但周延儒缺乏雄才大略，又不懂军事。所以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重用的吴昌时等把持朝政，刁蛮专横，朝官恨之入骨，纷纷上奏，揭发吴昌时仗势专权，有时自然会牵连到周延儒，周用人不当，为自己种下祸根。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关，逼京师，进山东，一直抢掠到江苏沭阳。举朝震惊，周延儒迫不得已，请求督军。但到通州后停止不前，消极怠战，等待清兵自行撤退，却天天上

奏捷报。清兵退走后,周延儒凯旋而归,论功行赏,加太师,儿子受荫为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但仅过五天,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就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的事情上报皇帝。崇祯帝大为震怒,下诏传谕百官,"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于是周延儒被再度免官。

不久,御史蒋拱宸弹劾吴昌时贪赃巨万,案件牵连到周延儒。接着给事中曹良直也弹劾周延儒十大罪。崇祯帝下令对吴昌时严刑拷打进行审讯。前首辅薛国观因受贿被吴昌时弹劾而免职、赐死,他的学生魏藻德、陈演此时也为内阁学士,为替恩师报仇,也参与打击周延儒,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在旁边火上浇油。终于使崇祯下令将周延儒捕入京师。周延儒想托前辅臣王应熊为他求情,事情也被崇祯帝知道,所以王应熊见到崇祯还没有说一句话,便被喝令回去。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也被崇祯帝否决。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吴昌时被斩首示众。周延儒被赐自尽,终年51岁。著有《周挹斋稿》、《片野堂诗》等。

平庸首辅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升为礼部尚书。

崇祯元年(1628年)冬,在推荐内阁候选人时,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使吏部把呼声很高的周延儒排斥在名单之外,按例该进内阁的温体仁也受到排挤。温体仁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揭露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接着和周延儒一起在文华殿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官,他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

文华殿对质后不久,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曾经写诗歌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纳娶娼妓、夺人田产等不法行为。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展开辩论。在他的当面质问下,毛九华无言相对。于是温体仁趁机说二人都是钱谦益的死党,崇祯帝觉得他说的很对。后来经过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弹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于是崇祯对温体仁所说大臣结成朋党的话深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进入内阁。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三年六月,温体仁也进入内阁。但是在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产生分歧。于是温体仁开始图谋取而代之。而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自己又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身为首辅,周延儒纵容家人,在家乡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导致京城里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加上周延儒和宦官的关系不好,于是温体仁唆使太监诬陷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听后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



明代的文具

困难，于是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帮助，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年)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首辅。

温体仁最初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但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未做首辅时，就曾经以经筵讲解不好为借口，罢去东林党人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找借口将东林名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后来，又打击和文震孟友善的庶吉士郑鄤，制造了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使崇祯帝将郑鄤磔死，重臣黄道周因为替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因言及郑鄤案被斥为民。

后来东林党人庶吉士张溥建立复社，由于张溥名气很大，因此复社很快壮大起来。而历来痛恨东林党的温体仁想法设法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揭发张溥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弹劾复社称霸地方。于是温体仁便想兴起大狱，将他们一网打尽。正在此时，常熟人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在家里胡作非为。温体仁想将钱谦益、瞿式耜抓起来审问。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答应为他想办法。这件事被温体仁知道了，于是他秘密奏报皇帝，并请惩治曹化淳。他没有想到的是，崇祯竟然把自己的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案子完全翻过来，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而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想到奏章刚送上去皇上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下来，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身为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都没有任何计策。他所推荐提拔的人也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是由于温体仁善于逢迎，因此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温体仁死去，终年66岁。崇祯帝闻讯后，赠官太傅，谥文忠。但是到南明弘光朝廷时，他的赠谥皆被削去。

明代的宦官

明代宦官全貌大扫描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 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彩塑明代太监像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 3 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

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

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

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御马监铜牌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卤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 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 3000 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 6000 多名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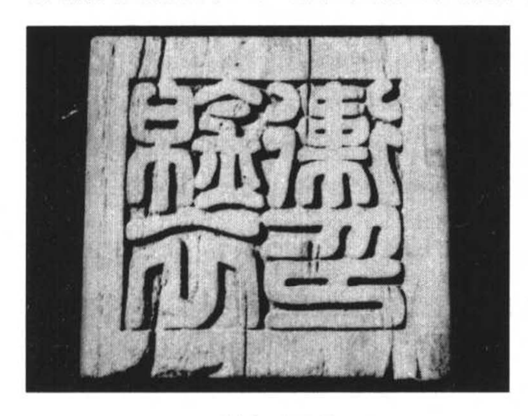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

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

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恐怖政治,而恐怖政治的代言人就是锦衣卫与东西厂,合称"厂卫"。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厂卫特务无所不至,上起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他们刺探的对象。厂卫特务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所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以烧红的铁烙脚)等,惨无人道。



锦衣卫木印

锦衣卫,全称锦衣卫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来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特令锦衣卫侦查"不轨妖言",兼管刑狱,握有巡察、缉捕的特权,可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任何法律手续,逮捕拷讯官民,以至于锦衣卫逐渐演变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使,由近臣或外戚担任。

锦衣卫下设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奉皇帝之命查办各种案件,是锦衣卫的核心。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上千人,最多时达六万之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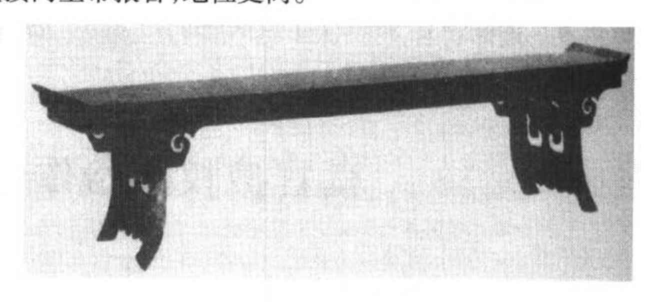
锦衣卫使用特务手段任意缉捕、审讯臣民,在严刑逼供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据史书记载,明初大臣钱宰罢朝之后回到家中,因为当天起早去赶早朝,便即兴吟诗: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明太祖就对他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迟呀!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一听,顿时一身冷汗,磕头如捣蒜。大学士宋濂有一次在家宴请宾客。朱元璋随即就知道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甚至主客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锦衣卫的一项著名的职能是"执掌廷杖"。受杖的人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令下,棍棒就雨点般落在他身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地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要一命呜呼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的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即使不死,也丢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

比锦衣卫更可恶的是东厂和西厂,它们是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设置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担任提督,直接向皇帝报告,地位更高。


明撇腿翘头炕案

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

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

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 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剌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剌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 50 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 20 多万匹,从征的 100 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 60 余库,珊瑚六七尺者 20 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兵部尚书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也先逼近京师,于谦率军民顽强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人,俘获瓦剌将领数十人,夺回了原先被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发动进攻,于谦加强防务,严整军备,瓦剌军的数次攻伐均告失败。这时,瓦剌内部也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议和。瓦剌看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就同意议和,释放英宗。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被称为“南宫复辟”。

“南宫复辟”的经过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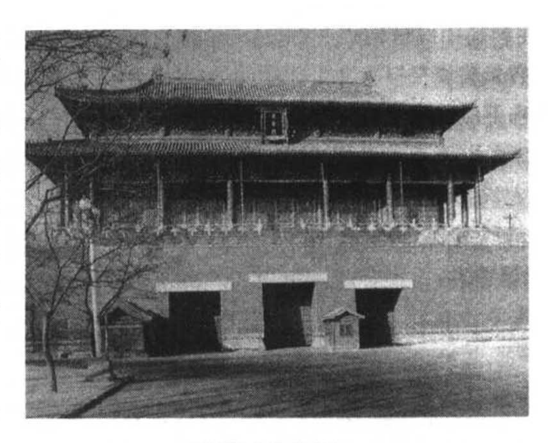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重。京师团指挥石亨、翰林侍讲徐有贞与宦官曹吉祥商议,要废掉代宗,重立英宗。于是决定利用曹吉祥出入宫中方便的条件,由他与英宗联系。正月十六日三更时,徐有贞提前进入朝房,石亨等率家兵1000多人潜入长安门,由曹吉祥作内应,直接进入南宫。英宗在曹吉祥、石亨等人的护卫下,乘上轿子便朝皇宫奔去。等到天亮时,曹吉祥敲响钟鼓,打开殿门。等待早朝的大臣们,没想到端坐于朝堂之上的竟是英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听见徐有贞说:“太上皇复位了,你们还不拜见?!”

曹吉祥因为策划参与“南宫复辟”有功,很快成了英宗眼中的红人,备受宠爱。英宗复辟成功,对拥立他的人论功行赏,曹吉祥被任命掌管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石亨进爵忠国公,徐有贞被封为武功伯。曹吉祥等三人一夜之间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曹吉祥左右着英宗,他们得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镇压朝中正直大臣。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北京保卫战的直接指挥者兵部尚书于谦。于谦这位忠心报国的忠臣最后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饮冤被杀。

曹吉祥欺骗英宗,排挤忠良,甚至幻想有朝一日成为皇帝。曹吉祥掌管朝廷中枢机构司礼监,可以随意出入宫廷;其子侄都握有兵权,嗣子曹钦担任都督同知不久又进封昭武伯,侄子曹铉、曹铎当上了都督,从此,有明一代开了宦官子弟封爵位的先例。曹吉祥身边

又有一批奸佞之徒趋炎附势，其嚣张气焰直逼“老前辈”王振。


紫禁城东华门

曹家的一些事情英宗也有所耳闻，英宗开始留意曹吉祥一家。此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李贤又被召回朝廷。李贤向英宗进言，说参与“南宫复辟”的这几个人都心怀鬼胎，要英宗严加提防。英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自从这几个人得势以后，背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便有所醒悟，开始疏远曹吉祥。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之嗣子曹钦动用私刑将人打死。英宗以此为突破口，令锦衣卫严查此事，并下诏谕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与曹钦商定，由曹钦领兵冲入皇宫，他在宫内领禁军接应，一举废了英宗。但风声走露。英宗急忙令人逮捕曹吉祥，并下令关闭皇宫四门和京城的九个大门。在与守门禁军进行了一番博杀之后，曹钦投井自杀，曹铎及其家人，不分老幼尽被屠杀。

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其党羽汤序、冯益等都被诛。

特务头子汪直


汪直像

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明宪宗时被掳入宫为宦官，在万贵妃宫中服侍。汪直为人狡诈，善于察颜观色，奉承讨好万贵妃。万贵妃于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为刚刚登基的宪宗生了一个儿子，便在后宫飞扬跋扈，从此不把王皇后放在眼里，一心想当后宫的主宰。可是，她生的儿子没活上一年就死了。万贵妃非常害怕别的宫女或妃子生儿子，篡夺她的宠位，便让汪直在宫中细心侦察，发现哪个宫女、嫔妃怀孕，立即向她报告。从这时，汪直特务的生涯就开始了。许多怀孕的宫女、嫔妃被万贵妃逼迫堕胎。因此，汪直深得万贵妃的欢心，汪直凭借讨好万贵妃，进而获得了宪宗的宠爱，很快升任御马监掌印太监，御马监是明朝宦官十二监之一，掌管御马、兵符等事务，有一定的权力。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年之中，汪直又掌管“西厂”，恃宠弄权，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朝野官民惨遭劫难，堪称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西厂是明代一个镇压官民的特种机构，是维护皇权、强化统治的特务组织。汪直本来是靠讨好万贵妃得以升官的奴才，当了西厂提督之后，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心，显示声威，他派出爪牙四出侦察、捕人审案。汪直诡计多端，颇具做特务的天分，经常带领一两名校尉化装成市井平民，四处打探，上至朝廷的大政方针，下至民间的繁杂琐事，他都细心搜集。尤其是官民们对朝廷和皇帝的议论都详细探听，然后直接向英宗奏明。汪直行动诡密，历时一年有余，竟未被人发觉。汪直控制下的西厂对官民言行的箝制，比先前的锦衣卫、东厂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官民因为西厂而生活在恐怖之中。汪直用一种叫“弹琵琶”的酷刑来陷害朝臣，排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

汪直提督西厂后，威风甚至超越皇帝。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汪直每次出行，都带上一大班随从，前呼后拥，朝中的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路。兵部尚书项忠因正直而遭汪直谗害。有一次项忠没有主动给汪直让路，汪直就当面凌辱项忠，最终使项忠被革职为民，汪直方才罢休。由于汪直掌握了朝廷重权，以至于人们把当朝的阁臣们戏称为“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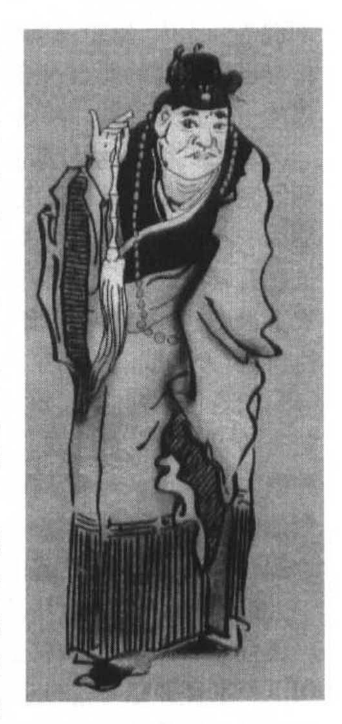
汪直为了巩固其受宠地位，先后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和成化十六年(1480年)，两次出征任监军，谎奏捷报，冒领军功，使其两个爪牙陈钺和王越分别升任兵部尚书，被封为成宁伯。汪直被累加禄米，数额是正一品文武官禄米的数倍。

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曾经在宫中装醉谩骂，周围的人说皇帝驾到，阿丑仍谩骂不停，有人叫道，汪公来了，阿丑立即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问其原由，阿丑回答：“现在的人哪知皇帝，只知道汪太监啊。”阿丑曾在宪宗面前表演：穿着汪直的衣冠，手持双斧，并说：“我领兵打仗，全仗此两钺。”两钺，即陈钺和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宪宗看过阿丑的表演后，感到汪直权重镇主，逐渐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北部边境遭受蒙古骑兵侵扰，宪宗命汪直、王越前往宣府御敌，敌兵退却后，其他人均奉调回京，却让汪直移镇大同。朝臣们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汪直在宪宗面前失宠了，才敢上告汪直的罪行。首辅万安领衔上疏，要废除西厂。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为人们所鄙视。但他奏请罢置西厂，大家都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的命运与汪直的命运紧密相连。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发生矛盾，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过去，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是偏向太监。但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遂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不久，科道官再次奏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不久又被罢了官，汪直遂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汪直去世。

“立皇帝”刘瑾



刘瑾像

刘瑾，生于陕西兴平的一户普通人家，自幼净身，本姓谈，因投身于镇守太监刘顺门下做义子而改姓刘，明英宗天顺初年入宫。在宫中，刘瑾很仰慕英宗时的宦官王振的做派。刘瑾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苦心钻营，学会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一系列本领，在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被宦官李广推荐，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刘瑾处处小心谨慎，挖空心思争取太子的欢心。太子朱厚照和孝宗对他都产生了好感。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在武宗周围，有八个太监对他影响最大，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人称“八虎”。而刘瑾乃“八虎”之首。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每天向武宗进献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置武宗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刘瑾爬上去的手段是陪皇帝玩，满足武宗寻欢作乐的要求。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便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亲自处理?”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不再上奏。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尤其是伶牙俐齿，善于狡辩，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这使他在后来的官场中如鱼得水。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他曾经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于是，刘瑾逐渐博得了武宗的宠爱与信任，武宗把刘瑾视为心腹。

刘瑾的羽翼丰满以后，权势不断扩张，完全控制了朝政。他一手栽培的亲信死心为其效力。主掌内阁的大学士焦芳称刘瑾为“千岁”，自称“门下”，凡出自内阁的票拟章奏，都完全遵从刘瑾的旨意。各种公文，均称刘太监而不呼其名。都察院所奏本章，直称刘瑾之名，没有称“刘太监”，刘瑾阅后大发雷霆，都御史闻讯急忙率属下前往刘瑾府中跪伏请罪，才免遭刘瑾的惩治。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

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武宗看到这些奏章，不禁大吃一惊。武宗派外朝官僚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外朝官僚便认为处置“八虎”已是手到擒来。刘瑾等人事先得到风声，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做了相反的决断，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瑾的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局面一夜之间突变。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令群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等几十人，罗织的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宣示奸党，便把异己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一个重大步骤。

正德三年(1508年)夏，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曝晒。宦官李荣同情被罚大臣，送去一些冰块为他们解渴消热，遭到刘瑾的喝斥。宦官黄伟见因一封匿名信连累众人，气愤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触怒了刘瑾，当天就被放逐到南京。文武百官被罚跪一天，也没有找到投信之人，傍晚，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入锦衣卫狱中，而主事何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三人因中暑身死。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

刘瑾依靠其淫威，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刘瑾掌权后，对言官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命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在朝时间竟达十四五个小时，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行厂，刘瑾亲自掌管。内行厂的酷烈更胜于东、西二厂，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构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朝臣和宦官都在刘瑾的监视之下，每天都担惊受怕。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奏章写好后再三思量，担心不能成功，把奏章揣在怀里，悬梁自尽了。

在畏惧和讨好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职官奏事，先把章奏送到刘瑾处。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当时，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

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这个数字如果靠着刘瑾的俸禄，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经过500万年才能达到。而事实上，刘瑾却只用了5年就完成了。可笑的是，这个巨贪竟然曾经上演了一场“拒贿秀”。据《明史·宦官列传》记载：有一次，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按照规矩来给刘瑾行贿。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刘瑾不但向皇上揭发了他们的行贿行为，而且还将欧阳云等全部治罪。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群臣也对他恨之入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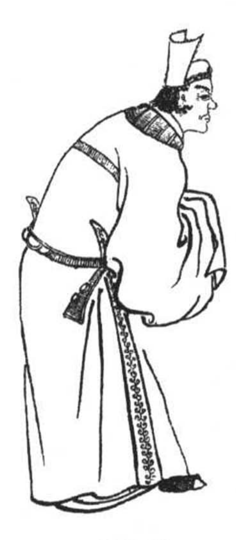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反叛事件。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

多武臣的拥戴。朱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刚一出兵，寘鐇即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就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欣然应允。

八月甲午日(9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13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之事。太监马永成也出言相助。武宗有所省悟，立即行动。在搜查刘瑾府第时，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还发现刘瑾平常使用的扇子里，装有机关，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可以发射致人于死地，武宗看后大为震惊，尤其是看了扇子中的机关匕首，不寒而栗："刘瑾这个奴才，果然要反！"下决心处死刘瑾。

依照惯例，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被处死。因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3357刀，据说在他身上剐了1300多刀后，他还没有死，当天晚上抬回监狱还能喝粥。凌迟时，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原来受过刘瑾祸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这一年，刘瑾刚好60岁。刘瑾被处死后，其家族15人及同伙吏部尚书、锦衣卫指挥等也被处斩。由刘瑾起用的大学士焦芳等60多人，均被逐出朝廷，结束了刘瑾专权乱政之祸。

"三角联盟"的核心冯保



冯保像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按照资历，冯保应该升任，但隆庆皇帝不喜欢冯保，而大学士高拱深受隆庆皇帝信任，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代了这个缺，冯保因此怨恨高拱。陈洪接管司礼监以后不久便死了。高拱又推荐了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这次，冯保可不干了，决心和高拱一决高下。

冯保选中了次辅张居正作为合作对象来搞掉高拱，而此时的张居正也想赶走竞争对手高拱，垄断内阁的权力，于是冯、张两人的关系逐渐牢固。同时，冯保又看中了皇太子李翊钧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想要在儿子登基之后，在做皇太后时要和正宫娘娘陈皇后做皇太后一样，要有一个徽号。冯保便趁机说，只要是高拱做首辅，李贵妃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如果能赶走高拱，张居正当上了首辅，李贵妃之事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李贵妃便和陈皇后商议，废了孟冲，由冯保任司礼监提督。

这样，在冯保的极力策划下，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的“三角联盟”正式形成，而冯保正是“三角联盟”的核心。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去世，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万历皇帝。万历即位时只有10岁。万历登基前后，冯保又导演了一出出巩固其权势的活剧。

朱翊钧登基那天，冯保将他扶上宝座，随后便站立在皇帝的宝座旁边不下来。满朝文武见冯保高高在上，侍立在新皇帝座旁，无不大惊失色。当他们听到穆宗遗诏说：“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司礼太监冯保辅佐朝政”时，也只好山呼万岁，伏首庆贺。矫诏盗取了朝政大权，冯保揽权便有了合法的依据，得以名正言顺地干预政事。

起初，穆宗驾崩时，高拱曾经在内阁中痛哭，说：“十岁的太子，怎样治理天下。”冯保却在皇太后和李贵妃面前诬陷高拱说：“高拱斥责太子为十岁孩子，怎样能作人主。”皇太后和李贵妃听后大吃一惊，太子听了，吓得面色大变。不久，高拱被逐。在家中闲居数年后，忧郁患病而死。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把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把李贵妃尊为“慈圣皇太后”。这样，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各得其所，三人垄断了朝廷内外的一切权力。冯保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即总管朝廷内外，势力更加嚣张。

慈圣太后对皇帝的管教很严格。冯保倚仗太后，经常挟持皇帝，皇帝很害怕他。有时和小宦官在一起玩，见冯保进来，赶快整理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好，说：“大伴来了。”冯保甚至让张居正代皇帝起草罪己诏，发给内阁。渐渐的，长大的皇帝对冯保心生不满。

而冯保却更加蛮横放肆，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如果不是从冯保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没有人敢去执行。皇帝越来越不能忍受，但冯保在里面倚靠着太后，在外面倚靠着张居正，皇帝也没有办法把他除掉。

冯保贪婪成性，他的亲信、锦衣卫指挥徐爵对什么事情都参与策划，依仗冯保的势力到处招揽权力，大臣也有很多人和他勾结。徐爵晚上到禁门，守卫的人都不敢盘问，冯保及其同伙就蛮横到如此地步。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张四维升任内阁首辅。神宗开始亲执朝政。亲政的神宗，发现君权与阁臣所握之权之间存有矛盾，而且阁臣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制约皇帝。神宗下决心要收回君权，树立绝对权威。但控制内廷的冯保正插手内阁事务，所以神宗决定先除掉冯保。而此时，李太后逐渐不干预朝政，冯保失去了另一个倚靠。宦官张鲸、张诚趁机罗列冯保的罪状，请求皇帝废逐冯保。皇帝还是害怕冯保，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大伴上殿来，我怎么办?”张鲸说：“既然有圣旨，他冯保怎敢再进入?!”这时，御史李植、江东弹劾冯保的奏章也送来了，皇帝便把冯保降职为奉御，安置到南京，不久，冯保病死。冯保被逐出不久，其党羽也相继被罢官免职。冯保的弟弟冯佑、从子冯邦宁也被革职关进监狱，死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冯保多才多艺。经常对酒设乐，雅歌投壶，颇有儒者风度，这在有明一代的宦官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皇帝多次把象牙的图章赐给他，上面刻着“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等字，对他非常尊重。冯保凡是写书法、匾额、对联之类，都把这些章或者“双林”、“景仰前哲”等图章盖在上面。冯保还是个制琴能手，所造的琴不少，人们以拥有他制作的一把琴为荣耀。

“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魏忠贤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原本是河间府肃宁的一个市井无赖，已成家并有一女。因为赌博输钱，又无力偿还，被人百般羞辱，一气之下，自己动手割去生殖器，投奔京城，希望在宫中能出人头地。魏忠贤入宫后，先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的孙暹名下做事，同时，魏忠贤小心行事，又极力讨好巴结太监魏朝，和魏朝结拜为兄弟，魏忠贤为兄，魏朝为弟，因此宫中有“大魏、二魏”之称。魏朝又把他推荐给王才人，管理伙食。王才人是神宗万历皇帝的妃子、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经常接近朱由校，不断送些奇巧玩物，精致吃食，朱由校非常喜欢他。当初，魏朝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客意娘）是“对食”，魏忠贤通过魏朝结识客氏之后，便向客氏大献殷勤，立刻博得客氏的欢心。后来，魏忠贤又与客氏相通。客氏逐渐喜欢魏忠贤，而厌恶魏朝，魏朝和客氏断了私情，魏忠贤得以专门侍奉客氏。


魏忠贤像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朱翊钧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朱由校被立为太子。不久，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下，由惜薪司升司礼监任秉笔太监。光宗即位不足一月，就一命归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朱由校是魏忠贤伺奉、讨好多年的主子，客氏又是朱由校的乳母，所以熹宗朝，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扰乱朝纲。


客氏像

魏忠贤得势以后，首先要除掉的便是其“兄弟”魏朝。这是因为，魏朝也是熹宗重用的实权人物，司掌兵仗局，不除掉他，自己的权势就得不到扩展。魏忠贤在客氏的支持下，借重熹宗的力量，勒令魏朝告病出宫，魏忠贤矫诏将魏朝逐往凤阳，又指使亲信在途中把魏朝杀死。

魏忠贤早已摸透熹宗的一喜一怒，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使其沉迷在糜烂的生活中不理朝政。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还能盖房子，刷油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干这些活的时候，全神贯注，所有事情都全然不顾，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魏忠贤见有机可趁，便故意找熹宗聚精会神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随口就交给魏忠贤去办理。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

熹宗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轻松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

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因此，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魏忠贤的名号愈来愈多愈高：厂臣、元臣、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距“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魏忠贤利用当时熹宗的昏庸，控制了皇帝以后，便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在魏忠贤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门下，先后集结约有80多位大臣，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其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则是阉党中的骨干。其中，以“五虎”、“五彪”尤为亲近。“五虎”是指文官，有佥都御史崔呈秀、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太常卿倪文焕；“五彪”指的是武官，有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司理刑杨寰、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此外，“十狗”则以吏部尚书周应秋为首。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则又不可胜数。魏忠贤通过他的党羽，把持了中央的内阁、六部、厂卫以及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是这帮人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当时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之为“阉党专政”。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的57人，那么共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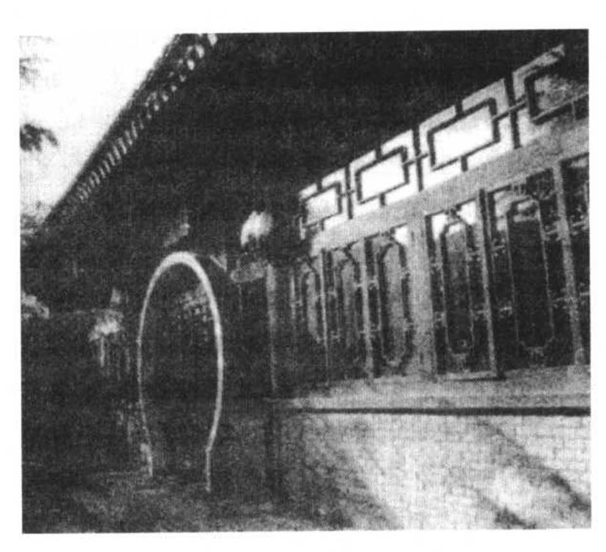


魏大中绝命书卷

“阉党专政”激起了朝廷内外忠正之士的愤慨。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统统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罗列其二十四宗罪，魏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浙江巡抚潘汝祯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请熹宗赐匾额，熹宗题名“普德”。不久，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此例一开，为魏

忠贤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苏州的“普惠祠”、松江的“德馨祠”、扬州的“沾恩祠”、淮安的“瞻德祠”和北京的“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四川等30余县，均建了生祠。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没有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2000余间。监生陆万龄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荒唐至极。



魏忠贤生祠遗址

2002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旧城大街附近的新明楼发现一尊铜像，此铜像高2.05米，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白毫”(眉心珠)，脸上无胡须。经专家考证，此乃魏忠贤之铜像。当时，任延绥巡抚的朱童蒙在“镇南之祠”为魏忠贤修建了一座生祠。魏忠贤倒台后，各地生祠遂废。明末清初之际，榆林政权更迭频繁，到了清代，这尊魏忠贤像已不为人们所识。由于当地人民不知真情，一直将魏忠贤的铜像当做佛像供奉了数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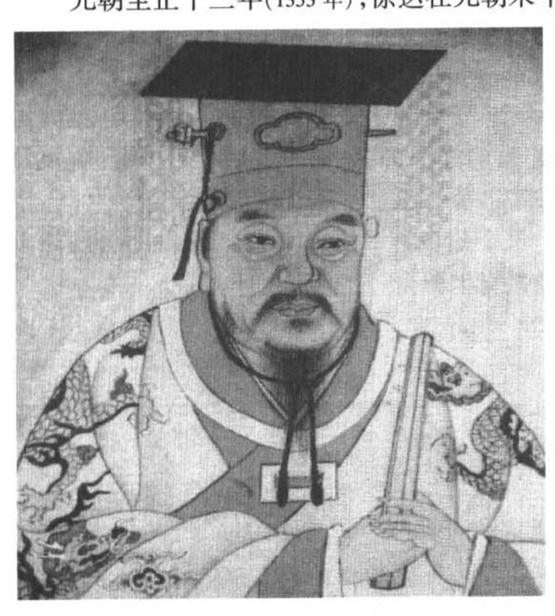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其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魏忠贤还想继续控制崇祯帝。据说，魏忠贤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就把客氏赶出皇宫。同时，各地官民上本论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崇祯片纸不遗，亲自披阅，看到阉党所为令人发指，不禁动怒，下诏擒拿魏忠贤等人，抄没家产。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崇祯看到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便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生不如死，便悬梁自尽了。崇祯下令分魏忠贤尸体，悬其首级于河间示众。又下诏在宫中浣衣局杀了客氏。同时，斩杀了许多魏党党羽，抄没他们的家产。魏忠贤及其党羽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名臣名将

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

徐达(1332~1385),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农家。徐达谋略过人,治军严明,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在帮助朱元璋攻灭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势力,北伐元军,消灭元朝等重大战争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名列功臣第一。明朝建立后,因功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且先后被封为信国公、魏国公。徐达一生刚毅武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功高不矜,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并称赞其"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85 年 2 月,徐达因病去世(一说被朱元璋害死),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死后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并赐葬钟山北麓(明太祖朱元璋之孝陵北)。

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 年),徐达在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队伍,隶属朱元璋部。至正十五年,他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克采石,打下集庆(今南京),辅佐朱元璋创建政权。后来奉命以大将军身份领兵攻取镇江,因功被授以淮兴翼统军元帅。至正十七年,他率兵东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屡次打败张士诚的部队,成功地阻止了张士诚军的西进。次年,奉命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斩俘陈友谅万余人。后来又随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再次大败陈友谅军,俘获 7000 余人。第二年,在攻打江州(今江西九江)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师猛攻,迫使陈友谅退兵武昌,并领军追至汉阳,战后因功升为中书右丞相。至正二十三年秋,在鄱阳湖大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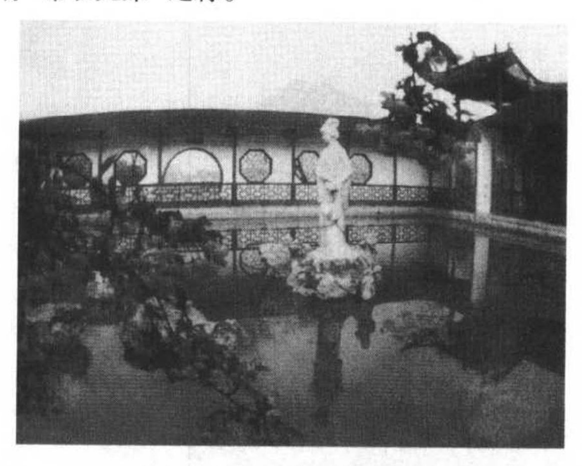


徐达像

陈友谅，次年，官升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以大将军衔率师出征，按照朱元璋先克淮东、再占浙西、后破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军事方略，进攻张士诚，攻克泰州。次年攻取高邮、淮安、兴化(今均属江苏)等地，彻底占领淮东之地，接着占领浙西，连战皆捷。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攻陷平江，俘获张士诚及其将士25万余人，再次因功封为信国公。同年十月，徐达被朱元璋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同副将常遇春率师二十五万开始北伐，不久攻取山东，随即占领河南，然后很快挥军攻下大都(今北京)，改名北平，宣布了元朝的灭亡。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加强战备，兴修长城。命徐达领兵平定山西，又向北驱逐元残余势力，主持重修北京的咽喉重地——居庸关，以防止蒙古骑兵的突袭。洪武三年，徐达率兵出潼关，趋定西(今属甘肃)，进剿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经过激烈战斗，大败元军，擒获元朝郯王、济王以下文武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兵八万六千余人。论功升至中书省右丞相，参理国事，并晋封魏国公。朱元璋命他镇守北方军事要地北平(今北京)。他在北平徙民实边，大兴屯田。他善于治军，号令严明，士卒都愿意以死效命。由于他长年在外征战，加上他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使他获得了“谋勇绝伦”的称誉，甚至连明太祖也与他有“布衣兄弟”之称。

作为明代的开国功臣，一生从事军旅生涯的徐达深知边塞对于国家的重要，再加上明朝初年蒙古残余势力骑兵不断南下骚扰明朝边境。于是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依山傍海筑长城及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山海关。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志》里面记载说：“国朝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从此，山海关成了北京东面的咽喉要塞。山海关的修建，使这一带的长城固若金汤，成为阻止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也使得周边的老百姓从此免于战乱，更使大明王朝从此没有了蒙古兵经常在这一带不断骚扰而又奈何不得的痛楚。


莫愁湖——相传朱元璋与徐达曾在湖边下棋

为了表彰徐达的显赫战功以及他修筑山海关的功劳，明景泰五年(1454年)，朝廷下令在山海关城内为徐达立庙祭祀，成化七年(1471年)建成，所建之庙叫显功庙，又称太傅庙、徐达庙，由内阁大学士商辂撰《显功庙记》，勒石立碑。可惜的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遗址在山海关北街居民前胡同。

太傅提兵出塞还，更因渝塞起渝关。

石驱到海南城堞，垒筑连云北倚山。

辽水至今来鞣鞨，蓟门终古镇寘颜。

岁时伏腊犹祠庙，麟阁勋名孰与班？

这是明嘉靖年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写的《显功庙》诗，它歌颂了徐达筑山海关建山海卫的丰功伟绩。

徐达墓位于南京钟山，是明初诸功臣墓中保存较好的。墓前丰碑石马，规模宏大。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立的"御制中山神道碑"。这块碑通高8.95米，宽2.2米，厚0.70米，下承龟趺，蔚为壮观，比明孝陵(太祖墓)四方城的"神功圣德碑"还高出0.11米，它是明代功臣墓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块神道碑。碑文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共约2100余字，记载了徐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块碑的碑文里有标点符号，这实在罕见，可算是古碑中的一件奇闻。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大概碑文是由臣下代笔，而他们怕没有文化的朱元璋读起来不方便，于是用圆圈断句，然后交付工匠镌刻，因是皇帝"御制"，工匠只得依样画葫芦，于是给我们留下了这块标有句读的碑文。

天下奇男子常遇春



常遇春像

常遇春(1330～1369)，明朝开国名将。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怀远)人。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先是投靠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转投朱元璋，从此追随朱元璋南征北伐十四年，在兼并群雄、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常遇春驰骋疆场，经历无数战役，屡建奇功。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先后做过总管府先锋、都督、统军大元帅、中翼大元帅等。在他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从没有打过败仗，所以他很豪迈地说能率十万军横行天下，所以军中常用"常十万"来称呼他，世人也都称他为"天下奇男子"。

常遇春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便"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土匪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天，投奔朱元璋，由于他勇敢善战，多次建功。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随朱元璋率军渡江南下，参加了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战斗中，面对着元军的如雨乱箭，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挥戈猛攻，率先登岸，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军大败，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朱元璋占领集庆及其周围地区，获得了富庶之地，为他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战役中，常遇春初露锋芒，一战成名，升为元帅，开始得到朱元璋的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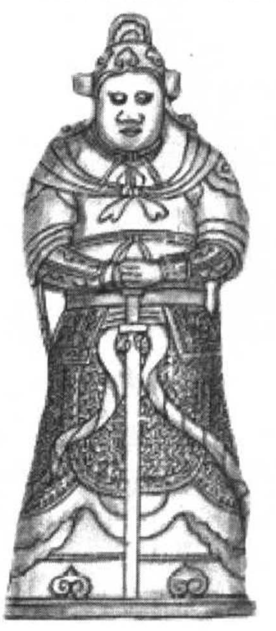
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逼应天府。陈占据长江上游，兵精船大，雄心勃勃，虎势群雄，是朱元璋统一事业的主要对手。双方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展开

恶战。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军三万设伏，经过一场鏖战，大败陈友谅，陈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并借机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升行省参知政事。龙湾战后的第三年，陈友谅率军六十万再次来攻，双方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大决战。战斗中，朱元璋座船搁浅，而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正率船队来围攻，情况万分危急。紧急关头，常遇春急来增援，射伤张定边，帮助朱元璋脱离困境。然后利用小船优势，组织火攻，乘风放火，把陈友谅的舰队烧得烈焰冲天，死伤惨重，湖水都变成红色。陈友谅在撤往湖口时遭到常遇春的迎头堵截，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打败陈友谅后，朱元璋的实力一举成为群雄最强。论功行赏，仍然常遇春功劳最大，升为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七月，常遇春随徐达率军攻取庐州。后来又率军与邓愈会合，占领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及岭南的韶州、南雄等地。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随徐达率军攻占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经过长达十个月的攻坚战，终于攻破平江城，张士诚战死。常遇春再次因功进封为鄂国公，朱元璋极为赞赏他，当众夸赞他说："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元朝。由于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率军仅用了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明军在洛阳与元军遭遇，常遇春率领麾下壮士突入敌阵，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并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西进陕西的门户，为攻取元朝都城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逼近北京。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名北平府。接着又挥军西进，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顺帝乘明军主力远征陕西、山西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攻，兵锋直抵通州。常遇春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兵一万驰援北平，元军闻讯仓皇北逃，常遇春率军追击千里，大获全胜。为了彻底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直捣元上都开平，迫使元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



常遇春墓前的盔甲石人

洪武二年(1369年)元月，常遇春与李文忠在大兴州(今隆化县城)大破元军，又率军杀向上都。《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常遇春和李文忠取得上都大捷后，凯旋而归。据《明史》记载，七月初七，当大军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时，常遇春忽得"卸甲风"，很快就病死在军中，年仅39岁。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惊，写诗痛悼他："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他下令将常遇春作为勋臣陪葬孝陵，择墓于南京太平门外，赐给祭田。朱元璋亲自主持葬礼，并派人

通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追封为开平王,谥忠武。后又在南京鸡笼山下建的功臣庙中给他塑像祭祀,把他排在首位。礼遇之厚,非同一般。

作为带兵将领,常遇春十分爱护士兵,并能处处身先士卒,史书说他"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同时他治兵严明,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百姓。他出身贫苦,非常关心百姓的疾苦,曾向朱元璋建议免除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过屯田,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

常遇春还很善于处理和同僚的关系,他率军作战时既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大家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关系十分融洽,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明朝的名将首推徐达,其次就是常遇春,二人并称"徐常",都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没有徐、常二人鼎力相助,朱元璋不可能战胜群雄,推翻元朝,登上皇帝宝座。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李善长像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大臣。少年时曾经读书,喜欢法家思想。他为人机智多谋,善于推断时事。元至正十四年(1353年),投靠朱元璋,他劝朱元璋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做法,以成帝业。从而受到朱元璋青睐,作为参谋,参预机要,组织馈饷,不断被委以重任。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封他为宣国公。后来朱元璋改制,以左为上,李善长于是成为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为帝,李善长被任命为左丞相。后为胡惟庸案牵连被杀,卒年77岁。

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正是朱元璋急需谋臣之际。朱元璋问他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安定下来,他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一番话深得朱的赞同,于是用为幕僚。后来朱元璋威名日盛,来投奔的人与日俱增。就由李善长考察他们,荐举优秀人才。臣僚之间出现矛盾时,也是李善长去做双方工作,消除隔阂,显示了很高的才能。郭子兴想把李善长调过来辅助自己,李善长坚决辞谢不去,使朱元璋更加信任他。

李善长注重取信于民,建议严明军纪、禁止抢掠。朱元璋十分赞同,立即严厉整饬军纪,使百姓得以安定,由此朱元璋的队伍声名日振,附近百姓纷纷前来投奔。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胜利面前,朱元璋的部队士气有些松懈,掳掠事件时有发生。为整顿军纪,李善长精心导演了一出"假杀徐达"的好戏,这出戏十分奏效,使徐军攻克镇江后,秋毫无犯,镇江城内平静如常。朱元璋的队伍更得民心,大大推进了根据地的扩展和军事上的成功。从此,"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此后朱元璋率军频繁作战,李善长则始终居守应天府(今南京)。作为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至关重要,朱元璋信任李善长,才将应天委托给他。而李善长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重托,他全力以赴,努力工作,表现出了极为出色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在很短时间里,便使应天将士和睦,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充裕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保证了军队的战斗,为朱元璋打下江山立了汗马功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率领的朱元璋大军,在战场上东征消灭了张士诚,北伐攻取了山东,向南逼降了方国珍,接着挺进福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谋士开始为朱元璋登基作好各项准备工作。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由李善长担当司仪,朱元璋在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南面称帝。

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太祖去汴梁(今河南开封)视察,留李善长在京居守,大小事务都由李善长自行处置,可见太祖对李善长非常信任。以后,朱元璋把除军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务,事无巨细,都由李善长掌管,李则不厌其烦,认真处理,井然有序。

明朝建立后,徐达、常遇春等大将仍在出生入死、戎马倥偬。而李善长身居后方却享受高官厚禄,自然招来非议。于是太祖强调:"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授给他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授铁券,上书李善长"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封公之人,仅有徐达、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六人。而李善长位居第一,荣耀之至。

李善长虽然功劳卓著,但他也有性格缺陷。《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忮刻"。即外表宽厚温和,而内心狭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因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而遭灭顶之灾,李饮冰被割乳身亡,杨希圣遭劓鼻而残。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视察汴梁时,李善长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罪,御史中丞刘基依法判斩,李善长却要求不作深究,刘基请示皇帝后,杀了李彬。李善长十分气愤,上奏诬告刘基专断擅权,还窜掇别的官员奏告刘基,刘基终于被迫告老回乡。李善长位高权重,是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力荐下,胡惟庸从宁国知县一步步爬上左丞相的位置。他们当政时,淮西集团在朝中居于统治地位,处处排斥不是淮西派的官员。朱元璋虽靠淮西势力起家,但也要笼络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服务,他更怕淮西集团势力膨胀威胁皇权。这就造成了朱、李间的矛盾,也埋下了李善长悲剧的伏笔。

胡惟庸为相后,大权在掌,专行横断。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植党、枉法等罪状杀了胡惟庸,接着大兴党狱,株连三万多人。虽然没有追究李善长,但对他的怀疑、不满却与日俱增。二十三年(1390年),监察御史告李善长与胡、蓝都有牵连。朱元璋斥责李"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赐缢死,终年七十七岁,其全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喊冤:"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

生封公,死封王……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太祖看了竟无话可说。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等人都对李善长参与谋反持否定态度。

“开国文臣第一”刘基



刘基像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朝开国元勋,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谋略家。刘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他通晓经史,能测天文,精通兵法,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说法。

刘基12岁就考中秀才,23岁考中进士。至元二年(1336年),出任江西高安县丞。他恪守本职,执法如山,曾经深入乡间,体察民情,严惩了一些勾结贪官污吏无恶不作的豪强恶霸,并整治官吏,使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当时的大文人揭傒斯赞叹说:“刘基是魏徵一流的人物,英雄豪迈之气还要超过魏徵,将来必是治国安邦的大才!”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但却遭受同僚们的嫉恨和排挤,于是他辞职归乡,闭门读书。三年后,江浙行省以儒学副提举第二次起用他,不久,他又辞职而去,移居杭州,寄情山水,遣兴自娱。至正十二年(1352年),浙江行省又以浙东元帅府都事之职三次起用他,以对付在沿海起义的方国珍,刘基因主张剿捕方氏反对招安而被罢官。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山民起义,江浙行省四次以都事起用刘基。此时的刘基已认识到朝廷的不可救药,他在一首赋中写道:“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摇摇而不固。”表达了他的绝望之情,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青田,发愤著述,写下了著名的传世之作《郁离子》,借书中主人翁郁离子之口批判元朝弊政,总结经世治国经验。

这时以金陵为根据地的朱元璋已成一方英雄,他非常注重人才,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便几次派人请刘基出山。被朱元璋的诚意所动,刘基于是投向朱元璋。朱以恭谦的态度向刘基请教灭元兴邦、统一宇内的办法,刘基呈上时务十八策,认真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多种谋略方策。朱元璋大为赞赏,将他安排在身边,参预机密。刘基很快成为朱元璋智囊的核心。

尽管朱元璋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对朱元璋构成极大威胁。另外,朱元璋尊奉小明王韩林儿,受其封爵,用其年号,没有自己的旗号。因此打破军事上张陈的夹击、政治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对于朱元璋来说事关重大。刘基力主朱元璋摆脱小明王,

争夺天下。朱元璋不久就杀害了韩林儿，树立了自己的旗帜。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并围攻南京。朱元璋内部吵闹不一，有的主张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有的主张献城投降。刘基坚决主战，并出计打败了陈友谅，取得了应天保卫战的胜利，还借机收复了太平，巩固了根据地。此役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和张士诚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消灭他们势在必行。朱元璋的多数将领主张先打张士诚。刘基则认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而来；若先攻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会轻举妄动。主张先攻打陈友谅，被朱元璋采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军队西征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自缢而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深感刘基策略的正确，称赞他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将他比做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从此更加倚重刘基，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到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密议。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连刘基母亲去世他想回乡奔丧都不愿意准假。后来虽然勉强准假，还经常写信给他请教军政大计，并提前召他回来。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朝建立，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和太子赞善大夫。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主张宽仁之道。他认为治世应该德刑并用而以德治为主，要有仁爱之心，关心和爱护百姓，反对暴政；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维护封建秩序。刘基同丞相李善长纂成《大明律》，作为治国大法。刘基任御史中丞时，处死了犯法当斩的李善长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引起朝野震动，连朱元璋也赞扬他的刚直不阿。刘基还多次以天旱求雨为由，请求明太祖处置天下积案、释放无辜百姓，以体现朝廷宽仁之心。

刘基在举荐贤能方面，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念私人恩怨，顾全大局，建议太祖以李善长为丞相。李善长辞职后，朱元璋想让与刘基私交很好的杨宪接任，刘基认为不合适而反对。又直言了当否定了太祖看好的汪广洋和胡惟庸。他不以恶己者为恶，好己者为好，而是是非分明，秉公无私，堪为历史上一段佳话。朱元璋没有听他的，先后选用了杨、汪、胡三人为相，结果个个都出了问题。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论功行赏，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等。第二年(1371年)受淮系排斥的刘基致仕还乡。洪武六年(1373年)，丞相胡惟庸在皇上面前诬陷刘基，说他图谋不轨。朱元璋听信谗言，革掉了刘基的俸禄，准备严加查办，刘基被迫赶往京师谢罪。怕再受诬陷，于是留在南京，结果积忧成疾。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重病不起，被送回故乡，一月后去世(一说为胡惟庸毒死)。享年65岁，谥号文成，著有《诚意伯文集》。


刘基祠堂

刘基死后，明太祖下诏令其子孙世代承袭诚意伯爵位。天顺元年，刘基六世孙奏请立诚意伯祠，天顺三年建成刘基庙。正厅塑有刘基及其二子坐姿仪像，神态庄严。大梁与巨柱上分别悬有历代名流题书的巨匾和楹

联。如明代正德皇帝的撰联是:"占事考详,明有徵验,开国文臣第一;运筹画计,动中机宜,渡江策士无双。"近人蔡元培先生的撰联:"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枌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

凄凉惨死的旷世奇才解缙


解缙像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内阁大学士。据说解缙聪明绝伦,他的母亲在地上写字教他,他过目不忘。解缙六七岁时就能即席吟诗作对,被誉为神童。关于他童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家喻户晓。他十九岁考中进士,授以中书庶吉士,因才华出众被明太祖朱元璋所器重。后因上"万言书"批评朝政,尤其是指责太祖屡改政令,杀戮过多,惹怒了朱元璋,被罢官达八年之久。到建文帝即位后才再度受到重用。永乐初年,担任翰林学士,主持编撰《永乐大典》,深得成祖重用。永乐五年(1407年),以"泄禁中语"、"廷试试卷不公"等罪名,贬到广西。永乐八年,他到京城奏事,正好成祖不在京师,于是他拜见太子而还,结果被加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狱,后在狱中被杀。著有《文毅集》、《春雨杂述》等。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考中第一名为解元,次年参加南京会试,被取为第七名,殿试后录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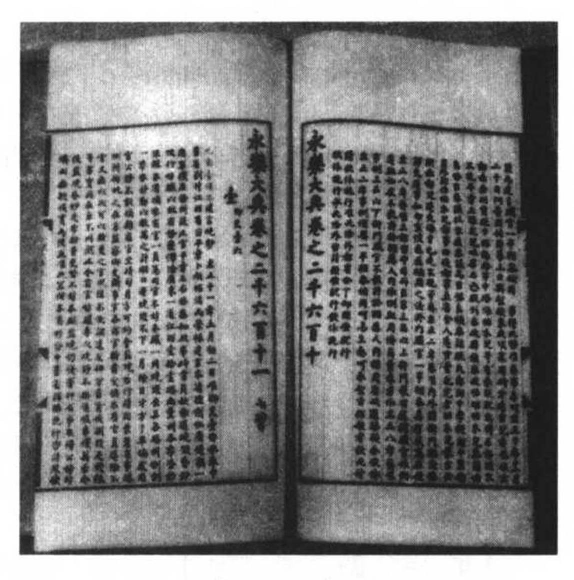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少年得志的解缙年轻气盛,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批评朝政,指责太祖屡改政令,杀戮过多。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但也因此触犯龙颜,被罢官回家,十年不许入京。直到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才再度被起用。后来,"靖难之役"爆发,燕王朱棣攻进南京时,解缙率先迎接朱棣进城。朱棣准备登基时,命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登极诏》,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也不肯写。于是解缙写了《登极诏》,为他以后受到朱棣重用奠定了基础。

朱棣即位不久,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九品官一跃至正六品,后又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成为朱棣身边的顾问。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其手,"论思献纳,多所裨益"。甚至有时在深夜,朱棣上床就寝时,还赐座给解缙,让他坐在床前,商议国家大事。前人曾把他比做宋代欧阳修、文天祥,可见他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解缙进入内阁的同时,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黄淮六人也被选入内阁,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件,他们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内阁之臣。

永乐元年,朱棣下诏,由解缙任总裁,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监修官,重修《太祖实录》。由于前车之鉴,解缙小心翼翼,书成"尽焚旧草",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杀建文旧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因为这次修改实录主要是删去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部分,并非真正重修,因此到第二年六月便完成。但是,担任《太祖实录》总裁给解缙来带来极高的荣誉,他的同僚甚至上司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修成《太祖实录》后,朱棣又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列女传》,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完成,朱棣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此科共取录四百七十人。但是十分凑巧的是: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相识,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前七人均属吉安府,令天下举子大哗。而主考的内阁学士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竟也都是江西人,而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如此一来,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其中定有隐情。所以后来解缙被弹劾廷试阅卷不公,他有口难辩。

解缙还主持纂修了《永乐大典》,这是中国第一部最大的综合性类书。编辑《永乐大典》动用了三千名专家学者,从永乐元年开始,历时六年完成,共有22937卷,装订成11095册,总计3亿7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

但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因为在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他离开京城的原因与"立储之争"有很大关系。成祖朱棣有三个嫡子,长子朱高炽敦厚仁孝,二子朱高煦雄武强悍且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并笼络了一批武臣,一心夺嫡,三子朱高燧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朱高炽的地位岌岌可危,不过要朱棣废长立幼,一时决心难下。于是他就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是极力反对废除嫡长子的,他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听后默然不语。事隔不久,成祖拿出一幅虎彪图,命廷臣应制作诗。解缙见图,很快写了一首诗呈上,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见诗,心中有所感悟,加之群臣也大都主张立高炽为太子,于是朱棣不再犹豫。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并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等人奉旨侍奉东宫,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解《文华宝鉴》,以东宫官属为自己的责任,忠心辅佐,这样就与蓄谋夺嫡的汉王朱高煦的矛盾日趋激化。而太子之立原属勉强,所以成祖始终不喜欢朱高炽。解缙于是进谏说:"这样做会引起争端,不好。"成祖很不高兴,加上朱高煦挑拨,认为解缙是有意离间,一怒之下,便将解缙黜任广西。从此解缙便不再春风得意。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从广西至南京朝廷奏事,而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便由于征伐蒙古前往北京。解缙未能见到朱棣,出于旧主情谊,便去谒见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之后便回去了。十一月,朱棣回到京师,汉王朱高煦便状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诬告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朱棣听后十分恼怒,下令逮解缙入狱。之后解缙更是倍受冷落,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五年,无人过问。永乐十三年(1415年),锦衣卫上报囚犯名册,成祖看见了解缙的名字,才想起问道:"解缙还在吗?"并稍露怜惜之意。朱高煦听说后,害怕成祖重新起用解缙,于是密令用酒灌醉他,然后把他埋到积雪中,活活冻死,当时解缙年仅47岁。一代文才,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谥文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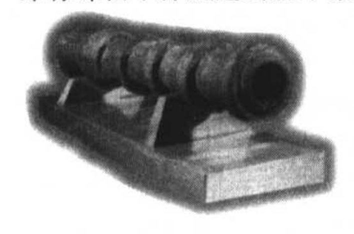
四平安南的四朝重臣张辅

张辅(1374~1449),字文弼,明朝河间王张玉的长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他和父亲张玉跟从朱棣作战,为指挥同知。后来张玉在东昌战死,张辅接替父亲的职位。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朱棣攻下京师登基后,封张辅为信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这年,安南黎季犛弑主夺位,自称太上皇,立儿子苍为帝。老国王的孙子陈天平从老挝逃跑来投奔明朝,后来季犛假装要把政权还给陈天平,请陈回国即位。于是,成祖遣都督黄中带领五千士兵护送陈天平回去。但是季犛却设下埋伏,杀死了陈天平。成祖闻讯大怒,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为右副将军,率兵八十万,讨伐黎季犛。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朱能死于军中,张辅代为统帅,接着被朱棣拜为将军。次年五月,张辅率军俘获季犛及其子苍,押送京师。安南平定,得四十八府州,一百八十县,三百一十二万户,设交阯布政司,统治其地。自唐朝灭亡后,交阯独立四百余年,如今重新归入明朝版图。

永乐六年(1407年)夏,张辅回到京师。朱棣赐宴奉天殿,亲自为他作赋《平安南歌》,并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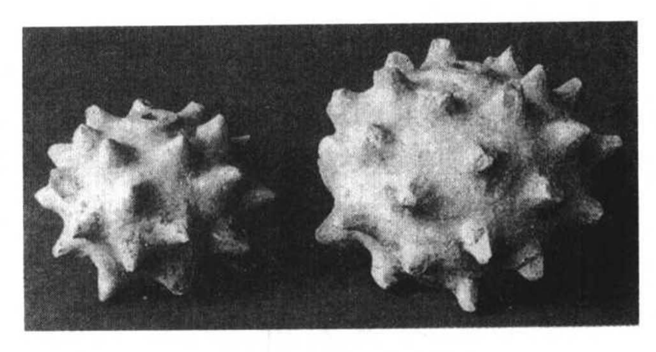
是年冬天,安南简定又起兵叛乱。明政府命沐晟前去征讨,沐晟却大败而还。永乐七年(1408年)春,张辅再度率师征讨,很快大败叛军,俘获简定,押送京师。永乐八年(1409年),朱棣命留下沐晟追击叛军余部,张辅班师还朝。但是张辅回去后,安南陈季扩再度叛乱,沐晟难以制服。永乐九年(1410年)正月,朱棣再次派张辅与沐晟协力进讨。永乐十二年(1413年),再次平定叛军,抓住季扩解送京师。在安南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永乐十三年春张辅回到京师,被命为交阯总兵官,前往镇守。后来陈月湖等再度作乱,都被张辅消灭。永乐十四年(1415年)冬,朱棣召回张辅。



明代铁炮

张辅先后四次交阯平叛,并建置郡邑,进行有效的管理。

所以交阯人最怕张辅。因此，当张辅回去一年后黎利又起兵造反，明政府几次派兵征讨，都无功而返。宣德年间，柳升再次兵败交阯，宣宗召集大臣廷议，打算放弃交阯，张辅力争也无法改变。明朝严从简论及安南之失的时候叹息说：明朝失去安南，第一在于不让张辅在安南镇守；第二在于驻守安南的官员贪暴，致使安南动荡不安；第三在于明朝大臣只会小门小户算计，而不看见保有安南的远利。



明军作战时使用的陶蒺藜

永乐二十三年(1424年)，朱棣以65岁高龄第五次北征蒙古，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死前召见英国公张辅嘱咐后事，命传位于太子朱高炽。

1425年，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升太师，并监修《成祖实录》。仁宗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一年皇帝就病死，由皇太子朱瞻基继位，为明宣宗。宣德元年，宣宗的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他想引诱朝中大臣武将为内应，于是派遣其属下枚青到英国公张辅家里游说。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宫内，并向宣宗请求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天下安定。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可谓人才济济。宣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但可惜的是，宣宗也只做了10年皇帝就死了。1436年，英宗朱祁镇即位，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宣宗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了。因此，他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为太子时，身边有个宦官王振朝夕侍侧，王振狡黠多智，由于英宗年幼无知，王振投其所好，得到信任，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称呼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朝中大臣对他唯唯诺诺，不敢得罪。只有张辅不把他放在眼里，敢与他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他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回奏稽延，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太皇太后闻知，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对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腐败，军备废弛。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兵南下，侵犯明朝。英宗在王振的劝诱下御驾亲征，率明军50万北抗瓦剌。由于王振专权，张辅虽然跟随出征，但是不能干预军事，不能指挥作战。结果在土木堡明军大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张辅战死，时年75岁。后追封

定兴王，谥号忠烈。

张辅“雄毅方严，治军整肃，屹如山岳”。四次率兵征服安南，开疆扩土，战功为诸武将中第一。并“历事四朝，连姻帝室”，地位非常显赫。虽然如此，张辅为人却从不刚愎自用，而是小心谨慎，与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同心辅政。仁宣时期二十余年，海内晏然，张辅功不可没。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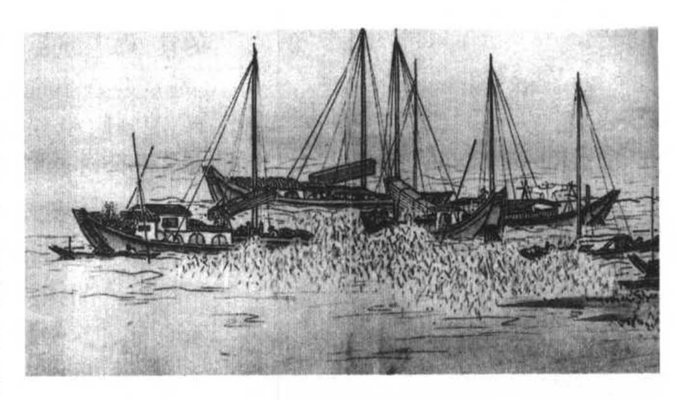
这是江西靖安县况钟墓后清风亭里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用朴实无华的语句，高度概括、赞扬了一代清官——况钟清正廉洁的高贵品德。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明江西靖安人。二十四岁时被靖安县知县俞益选拔为县书吏。后来被慧眼识人的吏部尚书吕震举荐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任职期间，先后受到明成祖朱棣31次嘉奖。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被破格提拔为仪制司郎中。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被荐举出任全国税粮中心地区的苏州府知府，因政绩卓著留任达13年之久，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卒于任所。

况钟在礼部任职十五年，口碑很好，因而得到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器重。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等九个府空缺知府，明宣宗命大臣推选廉洁而有才能的官员去任职。尚书蹇义推荐况钟，杨士奇也赞成，于是宣宗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他到任后，针对苏州吏治腐败的状况，首先大力整饬吏治。认真清查、审理较大贪污案件，经过多日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赃枉法的胥吏，接着对苏州府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罢免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官员，选拔培养廉洁公正之士分任各级官吏。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减削田赋，废除苛捐杂税。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下诏减免，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多次上奏请减官租，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苏州百姓负担大大减轻。他还率领苏州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兴修太湖一带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设济农仓，防备饥荒，赈济灾民。并修建学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

况钟的前任知府惰怠公务，致使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心系百姓，到任后仔细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下辖七个县：吴县、吴口、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逐县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即为佐证。况钟还大力清理军籍，释放受冤百姓。明朝军人是世袭的，都立有军籍。军士死了或逃亡了，要由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

清理军籍，为邀功请赏，他们借“清军”之名，动用酷刑，强迫民户抵充军户，百姓被冤死者不计其数。况钟到任后，这些受尽冤屈的百姓，“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况钟经过调查，向朝廷揭发了李立、张徽等的罪行。在苏州府范围内，免除了160人的军籍，明确了1240人的军籍仅限于本人，不得株连追捕。同时下令缉捕抢劫百姓的官军。明代设在苏州府范围内的苏州卫、太仓卫及浙江等地卫所的官兵，经常四出行凶抢劫，敲诈勒索。况钟鼓励被害人检举揭发，对本府卫所的违法官军逮捕严惩，属于外府卫所的则押解进京法办，遏制了这股邪气。



明代运河戎克船

况钟虽在富庶之地为官，却能廉洁无私。《况太守集》记述了况钟的日常生活：“其内署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每食一肉一蔬，非公燕别兼味。家人及亲旧相对，尊酒数行，青灯夜话而已。”他写过一首《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他在《示诸子诗》中说他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告诫他的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虽然苏州是丝绸之乡，但况钟的儿子每次从老家到苏州探望父亲，回去时下属们都不敢以当地的寸丝相送。他生前俭省，死后薄葬。文革中，他的坟墓被挖掘，结果发现墓内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外，一无所有，足以证明况钟的清廉俭朴。

正是由于他的政绩和品格，况钟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况钟母亲去世，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原籍守丧三年，叫“丁忧”，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但是苏州百姓四万余人上书称道其贤能，请求起复，他们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这首歌谣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民望所归，朝廷决定让他“夺情”复任，缩短“守孝”期，早回苏州继续任职。

宣德十年(1435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百姓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第二年(1436年)正统皇帝即位，下诏全国推举优秀府县官员上报。苏州官民八万多人联名奏况钟贤政，政绩评为全国之冠。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满九年，进京考绩，朝见皇帝，并赴吏部候升。启程时送行者“数百里不绝”。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上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土特产等，以巴结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所以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况钟赴京时，下属们念他一贯清廉，替他筹备了些礼物，以供到京城上下打点。况钟闻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并写下著名的《进京诗》：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况钟到北京后，因任期满且政绩突出而升官。苏州百姓不愿意他到别处作官，张瀚等二万余人请愿于巡按御史张文昌，要求况钟再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


况钟墓

的官，赐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况钟返任时“民欢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正统七年(1442年)12月，况钟因积劳成疾，病逝任所，享年60岁。朝廷对他的品行备加赏慰，特赠正义大夫资治卿。

第二年春天，装载况钟遗体的灵舟启程去江西时，苏州城“郡民罢市，如泣私亲，其奔程路祭者，络不断绝。”况钟灵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数十万百姓身穿孝服为其送行，“民多垂泣送其柩归”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全郡近50万户，几乎家家挂有他的“喜神”(画像)，百姓由衷爱戴这位廉政清官。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


于谦像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也是他人格的自我写照。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大臣、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德三年(1428年)巡按江西，严惩污吏，审理冤狱，颂声满道。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在各州县设平准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深得民心。后来升为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在两省百姓官吏以及藩王的力请下免死，并官复原职。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反对南迁，指挥北京保卫战，升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他整饬兵备，严格督战，亲自率师二十二万，在北京九门外大败瓦剌军队，加少保头衔，总管军务。后来也先以英宗为人质逼明朝议和，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和谈。使也先无计可施，只得放回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罪”被杀。成化初年平反昭雪，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明永乐十年(1412年)，十五岁的于谦考中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参加杭州“乡试”，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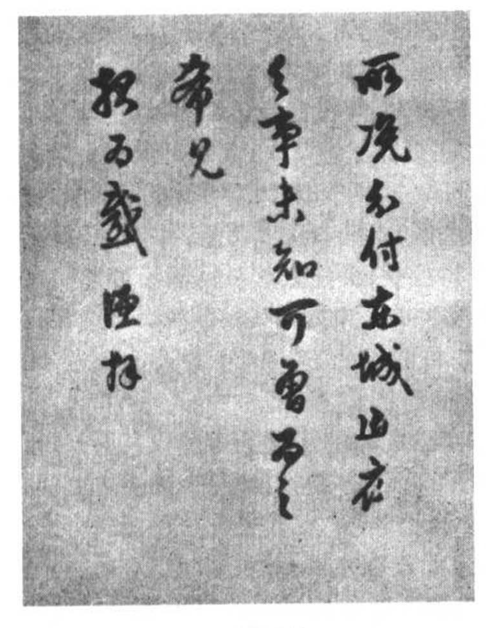
中第六名,次年会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他随宣宗御驾亲征。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巡按江西,他公正廉明,执法不阿,即使是藩王官属,犯了罪也不宽恕,还审理平反冤狱数百件。宣德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同年,明朝开始设立"巡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被任命为首批巡抚,巡抚河南、山西长达十九年。在任期间,他深入民间,察访疾苦,惩治贪官;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立平籴法以备荒,并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命地方官员修治河堤以防水患,招抚山东、陕西难民,予以安置;屡次上疏请求蠲发生灾害地方的钱粮赋税。始终保持为政清廉,不受私谒,为民请命,不避权贵的耿直作风,被两省百姓呼为"于青天"、誉为"于龙图",甚至有百姓在家给他立像供奉,有的州县还为他建立了"生祠"。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英宗年少贪玩,于是宦官近侍投其所好,得到恩宠。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渐渐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形成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朝中上下,贪污成风,地方官员进京办事,必须先贿赂上司,但是于谦从不送礼。有人就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甩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并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品行:"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山西、河南两省百姓上书求情,加上几位藩王说情,王振只好放了于谦,复任旧职。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分四路大举南下,很快占领明朝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由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监国,于谦以兵部事辅助。8月15日明军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同时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徐有贞等主张南迁避难,于谦坚决反对,并对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太后决定立郕王为景帝,明英宗改称太上皇。于谦升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负责指挥军民守城。于谦针对瓦剌利用英宗作为人质以要挟明朝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

十月,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闭门坚守,等到敌人粮草接济困难,自会退兵。于谦则主张主动出击。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还命令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且下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于是全军上下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跟瓦剌军决战到底,保卫京城。这时,各地勤王的明军也陆续到达北京,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也先战败被迫退兵。于谦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于是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将镇守山西关隘,严防瓦剌军队南下。也先看到明朝军力日渐强大,在军事上打败明朝已不可能。同时,瓦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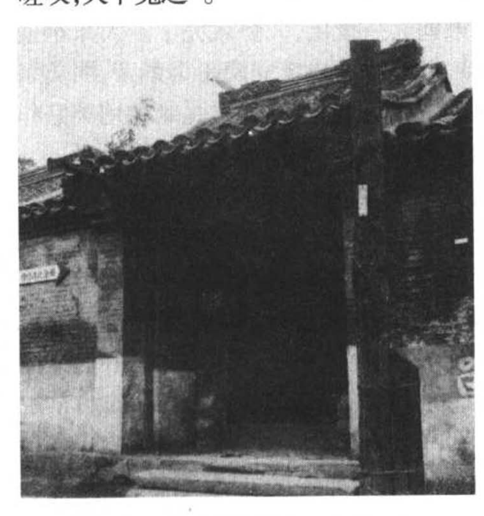


于谦手札

内部矛盾也日渐尖锐，也先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王牌，实际上已变成累赘。于是他决定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与明朝讲和。而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这使景帝朱祁钰很不高兴，他生气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之间群臣惶恐万分，无言以对。于谦劝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最后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明朝与瓦剌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通好，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于谦高瞻远瞩，知道和平局面断难长久，于是上安边三策，建议改革军制。并首创团营建制，挑选精兵，分营集中操练，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在政务上，他的章奏很合时宜，令人叹服，处理公事，号令明审，百官威服，可谓功高名盛。但是他十分俭约，以国家栋梁之臣，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念其劳苦，曾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拒绝了，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突然患病，卧床不起。英宗趁机在宦官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人的帮助下复辟，重夺帝位，改年号为天顺。英宗被放回来后，始终对于谦不顾他的生死拒绝议和并拥立景帝耿耿于怀，正月二十三日，以“谋逆罪”逮捕于谦，不久将其处死，时年60岁。北京百姓听到于谦被害消息，十分悲痛。据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于谦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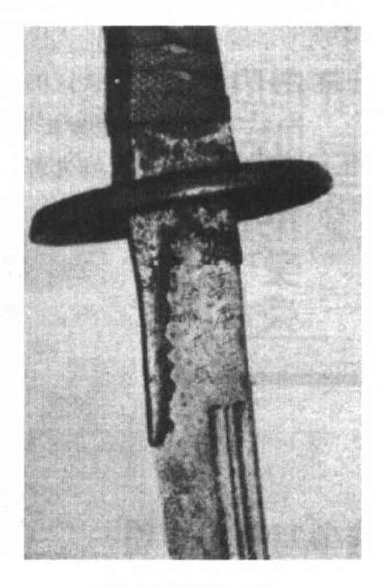
于谦死后，他的遗骸被人悄悄收敛起来，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的长子于冕上书替父伸冤，宪宗为于谦平反，并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还下令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百姓“皆世奉祀不绝”。

西子湖头，三台山麓，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正如清人袁子才诗中所说：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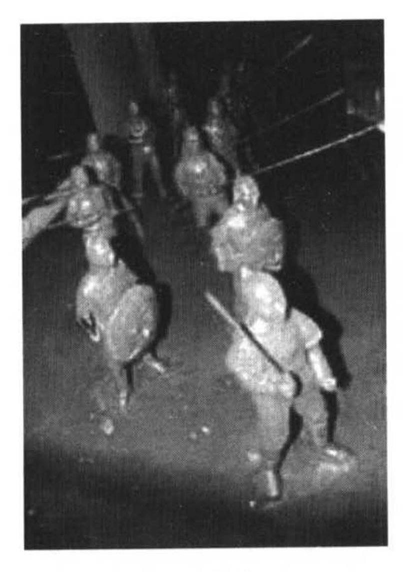

戚继光用过的军刀

戚继光(1528～1587),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陶,自小就立志保疆卫国,十六岁时,他就写下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五言律诗: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年轻的戚继光已有保卫祖国海疆的远大志向。十七岁时,戚继光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十五岁的戚继光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省沿海防御倭寇军务。倭寇指在日本内战中失败的流亡武士和商人,他们从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经常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抢劫中国商船,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十五世纪后期,倭寇与中国沿海的劣绅奸商狼狈为奸,愈加猖狂,有时甚至深入内地,攻城略地,掳掠财物,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患。戚继光任都指挥佥事后,统辖3营24卫所。防线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很长,而兵力有限,如何设防是个很大的问题。戚继光走访了当地许多官员、渔民,了解到一年之中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间多是3、4、5月和9、10月间,掌握了这几个月间的天气状况以及船只可能停靠的地方后,他采取了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的措施。同时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于是,山东海防变得固若金汤,倭寇不敢再轻易骚扰,戚继光在山东防倭初见成效。

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有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又把他派往浙江,担任定海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这一带是倭寇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素质很差,战斗力很弱,于是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组建新军。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


鸳鸯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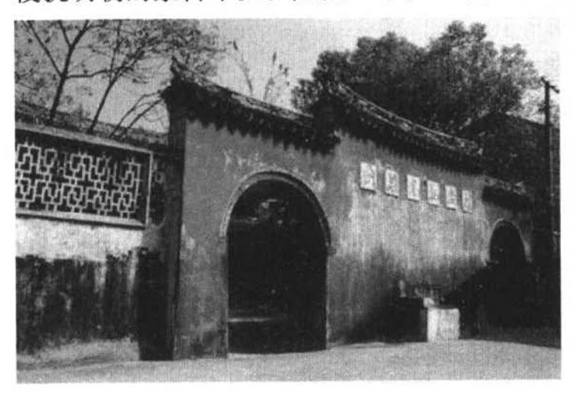
继光的严格训练，军纪严明，精通战法，训练有素，进退有序，作战勇猛。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革队列，创造了著名的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互相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用火器，进入六十步内用弓箭，敌人更近时，便用“鸳鸯阵”冲杀。这支军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发挥了巨大威力，深受百姓的爱戴，称他们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800多名倭寇入侵龙山所，戚继光率军迎击，两军刚一交锋，明军由于怯战开始后退。在这危急时刻，戚继光飞身跃上一块巨石，连发三箭，射倒3个倭寇头目。倭寇见状，仓惶逃窜。戚继光率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威名大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一万多名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戚继光率部九战九捷，取得台州大捷。这场战役歼敌6000余人，使倭寇遭到致命打击。从此倭寇们心惊胆战，闻风丧胆，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

次年，倭寇转而进犯福建，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南下福建，迅速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联合战斗，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因功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十一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家军“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震中国东南沿海，倭寇望风而逃。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战争节节胜利，为祸已久的倭患终于被彻底消灭，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功绩卓越，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称颂。在福建的于山，有一座戚公祠，里面有百姓给戚继光立的雕像，以缅怀他抗击倭寇的业绩。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内阁首辅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以对付北方不断南下侵扰明朝的蒙古军队。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辎重营，并使各营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在旧长城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段加厚城墙，同时在长城沿线建立了空心敌台，从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戚继光坐镇蓟州16年，鞑靼军队轻易不敢来犯。万历年间，蒙古骑兵曾3次骚扰边城，结果都大败而回。


戚继光庙

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

去世，被视为张居正亲信的戚继光也受到排挤，调任广东总兵，失去了拱卫京城的重要地位。后来，以万历皇帝为首开始清算张居正，戚继光更加不得志，于是请求退休，但仍然被当成张居正的同党而遭到弹劾，终被革职。他回到故乡山东蓬莱后，因为避嫌，很少有人跟他来往。万历十六年(1588年)一月，戚继光寂寞地逝世于蓬莱故居，享年60岁。有感于戚继光晚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的好友汪道昆在他的墓志铭里写下了“口鸡三号，将星殒矣”的凄凉词句。



蓬莱阁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在山东抗倭，至隆庆元年(1567年)调任蓟州，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14年，驻守北方边镇、拱卫京城16年，足迹遍及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河北等地，历经大小战斗80次，戎马倥偬几十年。正如他在一首题为《马上作》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刀马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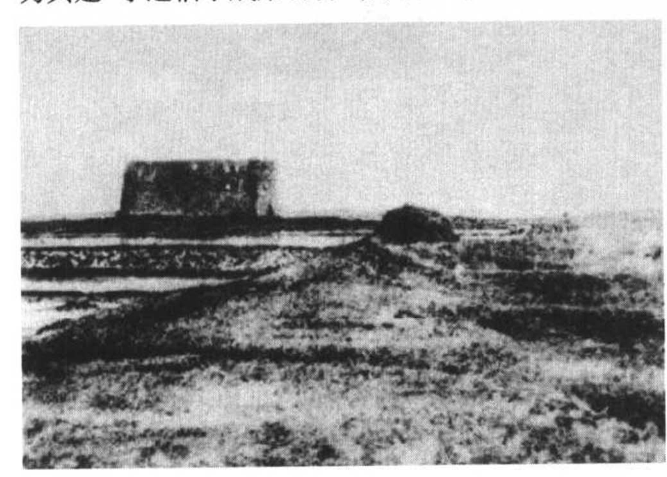
这首诗正是戚继光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创建的戚家军以军纪严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飚发电举，屡摧大寇”而闻名天下。甚至还创造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战争记录，因而他被誉为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因为战功赫赫，戚继光由署都指挥佥事，先后升至参将、副总兵、总兵、左都督(一品)，并授少保兼太子少保。

戚继光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为后世的军事家所推崇。

辽东大将李成梁

李成梁(1526~1615)，明朝著名将领，字汝契，明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他的高曾祖李英“以军功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曾祖李文斌、祖父李春美、父李泾都世袭指挥佥事。生长在这样一个武将世家的李成梁自幼读书习武，并考取秀才。嘉靖四十五年，李成梁袭铁岭

卫指挥佥事。由于作战有功,不久升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升为辽东都督佥事。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击败建州女真酋长王杲,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大破蒙古泰宁卫后,加太保,当年十二月又因军功加封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宁远伯”,赐大红蟒袍,食禄一千六百石。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今北宁市为其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并赐甲第于京师。



明代抗倭敌楼

明朝从建立时起,边患就未曾断绝,北方边境一直动荡不安。隆庆、万历年间,蒙古族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等实力都很强大,经常南下侵犯;东边女真族首领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等也羽翼渐丰,蠢蠢欲动,不时骚扰。而且他们都是游牧、狩猎民族,体力强悍,勇猛好斗,难以制服,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当时明朝政府内部又是政治腐败,文官贪财,武将懦弱,军备松弛,对他们只能束手无策。李成梁成为指挥佥事以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整饬武备、信守赏罚、精选兵将、改良武器,使他所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抗击北方、东北少数民族的侵犯中屡立战功。

穆宗期间,李成梁主要和北方的蒙古部落作战,数次大败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因为战功显赫而升为辽东险山参将。

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率军征讨被朝廷视为辽东大患的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建州女真是满清的前身,控制着清河以南抵达鸭绿江口的地区,建州势力逐渐壮大后,对明朝边境构成极大威胁。经过激战,李成梁生擒王杲,将其处决。他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所有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又大破蒙古泰宁卫,加太保;万历六年十二月,再次大胜土蛮部。万历八年,李成梁重创另一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兀堂,将其逐出塞北,这个部落从此衰落下去。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北宁市为其修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以表彰他的功勋,并赐甲第于京师。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再度发兵攻王杲之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王杲的孙女婿,死于这次战斗。《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向导而战死。所以后来李成梁将塔克世的土地人马等送给努尔哈赤,令让他承袭都督指挥衔。努尔哈赤后来羽翼丰满,统一女真各部,建元后金之后,报父祖之仇是他讨明的所谓“七大恨”之一。

后来,李成梁设计杀掉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海西叶赫部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内部分裂瓦解,万历十七年,其首领那林孛罗投降明朝。

李成梁镇守辽东20多年，转战各地，多次打败外敌进犯，使辽东安息多年，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因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格外器重，给以种种尊荣。李成梁的显赫使“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李成梁有九子或为总兵或为指挥使，或为指挥与参将，一时功盖当世，权顷辽东，时人誉为“李家九虎将”。他个人则居功自傲，贵极而骄，奢侈无度。随意侵吞军饷、盐税等。并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连著名政治家张居正也受过他的贿赂。

李成梁治军通过厚奖有功将士，以荣华富贵激励士气。起初成效很大，但到了后来，享受富贵的将领们丧失了早年的进取心，功业逐渐由盛而衰。开始出现将士不愿打仗的事件，掩盖失败真相，虚报胜利以得赏赐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杀害良民冒充敌人首级邀功的恶劣行径。这些虽是部下所为，但作为统帅的李成梁难辞其咎。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派副将李宁出战，大败而还，李成梁竟然充耳不闻。这件事传到京城，于是一些对他不满的京官开始大做文章，纷纷谴责，巡按御史胡克俭上奏弹劾，李成梁被解任回朝。



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

李成梁被解职后，辽东再无可胜任总兵之人，“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长子李如松也是一代名将，万历中期援朝鲜为主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如松出任辽东总兵，但他一年之后便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辽东局势十分紧张。因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学士沈一贯上疏请求万历皇帝让李成梁复镇辽东，以求国泰民安，万历皇帝表示同意。这时李成梁已75岁，虽再三推辞，但没有得到皇帝恩准，于是他重新镇守辽东。而此时辽东的局势已经今非昔比，建州女真部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吞并了许多部落，日益强大，难以撼动。李成梁改变策略，转攻为守，以抚为主，放弃宽甸一带，将当地居民迁入内地，目的一是为坚壁清野，二是想开辟出一片利于攻防的缓冲区，遏制女真的入侵。京城里的言官们却闻讯哗然，纷纷指责李成梁放弃国土，丧权辱国。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坚决支持下，李成梁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威名不减当年，并加太傅头衔。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享年90岁。万历皇帝下诏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

在明代将吏贪懦，边防废弛的时代，李成梁驰骋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屡退外侵，使北方游牧部落闻风丧胆，为保卫、拓展明朝的边境线立下丰功伟绩，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所以《明史》里说他“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铁骨为民海青天海瑞



海瑞像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今海南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字汝贤,号刚峰,所以后人也尊称海瑞为“刚峰先生”。海瑞是明朝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清官,据《明史》记载,海瑞“秉刚劲之性,憨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由于他对上敢于直言进谏,匡正皇帝的过失,对下能够疾恶如仇,惩恶扬善,为民请命,因此他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南包公”等,古代已有“北包拯,南海瑞”之说。他的事迹被编成小说、故事、戏剧等,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海瑞四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良师的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使他很早就有了报国安民的抱负。他二十多岁考中举人,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不久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到任之前,里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海瑞到了淳安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因此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海瑞对下爱民,对上则从不卑躬屈膝。他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势欺人,到处敲榨勒索,有不顺从的轻则罢官,重可至死,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领随从耀武扬威,路过淳安,这可是巴结总督大人的难得机会。可是海瑞在淳安县早立下一条规矩,不管高官显贵,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而胡总督之子素来养尊处优,看到驿吏送上来的一般饭菜,觉得是有意羞辱自己,火冒三丈,一把掀翻饭桌,还命令随从把驿吏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海瑞本来对胡公子招摇过境就很反感,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决心惩治他一下。听完报告,他不动声色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已经吩咐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绝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败坏大人的名声的。”于是命令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开始还暴跳如雷,咆哮公堂。但海瑞毫不畏惧,坚持认定他是假冒公子,并要把他重办,他才垂头丧气地认罚。海瑞把他的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然后把他狠狠教训一顿,逐出县境。等胡公子狼狈回到杭州向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早已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假借公子之名作非法之事。胡总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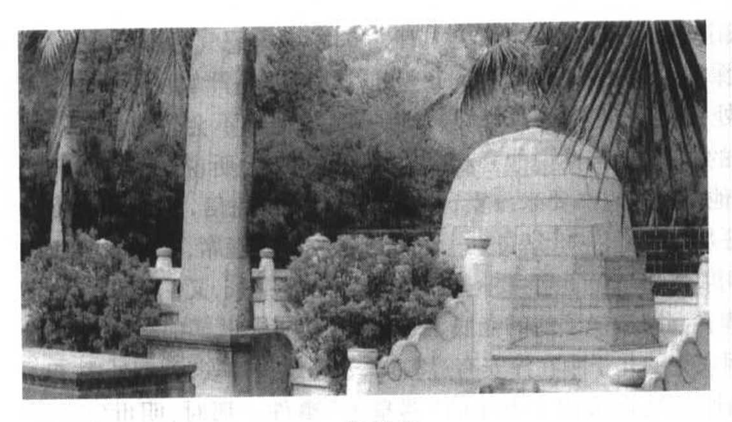
虽然明知儿子吃了大亏，但是知道如果把这件事声张出去有失体面，只好忍气吞声。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朝廷派出的御史鄢懋卿到浙江巡视。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胃口很大，贪得无厌。他所过之处，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钱，他绝不会轻饶。但是鄢懋卿偏又要摆出一副廉洁守法的面孔，传出话说他喜欢简朴。各地官吏一听说鄢懋卿要来巡视，都很犯愁。海瑞早有妙计，他听说鄢懋卿要来淳安，派人给鄢送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又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鄢懋卿看到海瑞揭了他的老底，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骨头，加上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有过教训，于是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更能体现海瑞刚直不阿品性的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那时，明世宗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在后宫里跟道士们修道说教，朝臣谁也不敢劝说。海瑞虽然官职低微，却大胆向世宗进谏，给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奏疏中，海瑞抨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并说："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是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读这样的骂文，确实痛快，可海瑞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成以善于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恐怕也难以容忍这样的进谏。世宗读完奏疏，气得浑身颤抖，把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他身边有知道海瑞的宦官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事实果真如此，明世宗下令把海瑞抓起来关进锦衣卫问罪定刑。但该给海瑞定个什么罪名，却很使刑部官员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骂皇帝，所以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也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海瑞死罪。刑部官员翻遍了《大明律》，也不知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依"骂父"，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海瑞绞死。但幸运的是，世宗还没有来得及处死海瑞，自己先死了，海瑞得以大难不死。

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逾70的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是由于重赋和贪官污吏的压榨，二是由于不断的水灾。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他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淞江及其支流。又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在他的组织下，工程很快完成，当地受益的百姓十分感激海瑞。为了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大力惩治恶霸，迫使他们归还强夺的农民土地。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享年73岁。死后，朝廷赐祭八坛，封太子少保，谥号忠介。神宗在悼词中给予海瑞"直言敢谏之忠臣"的褒词，并派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当日，南京城万人空巷，商人罢市，农夫辍耕，自发为海瑞送殡。海瑞去世时，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只能由别人料理。经过清点，海瑞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资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灵柩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队伍长达百里。


海瑞墓

海瑞墓座落于今海口市西郊滨涯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瑞墓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据说运送过程中，海瑞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人们认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葬。在海瑞墓室后“扬廉轩”的亭柱上挂有海瑞写的两副对联，其中一副是“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正是海瑞的真实写照。

海瑞祠堂位于浙江淳安县境内千岛湖龙山岛上。海瑞任淳安知县四年零两个月。四年间，他改革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革除县衙陋习，成效显著。海瑞任职期满离开淳安时，淳安百姓为缅怀其恩德，立“去思碑”，并自发集资建生祠以表纪念。海瑞祠碑廊有海瑞自书诗碑五块，其中一块十分奇特。碑上用草书写成一个特大的“寿”字，这就是被称为奇书的“寿字碑”。这个寿字由“生”“母”“七”“十”四字组合而成，而且倒过来竟然还是个“寿”字，不禁让人感叹海瑞书法之精妙。据淳安县志记载，海瑞任知县的第二年(1559年)，正值其母七十大寿，而他只给母亲买了“肉二斤”，并动手书写了这个狂草“寿”字作为寿礼，这件事一直传为佳话。而海瑞的清正廉洁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人民心中，海瑞是正义的象征，所以在他死后，有十几种地方戏都在传唱着他的故事。万历年间就已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的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字飞百，号芝冈，明朝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从小聪颖好学，由于家境贫寒，时而辍学，只能边劳动边读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乡试考中第一，次年考中进士。二十七年(1599年)，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担任推官期间，熊廷弼处理了很多冤案，政绩突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升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等主动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并让那里的六万多户居民内迁。三十六年六月，李成梁受到弹劾，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调查此事。熊廷弼经过实地勘察，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他又详细考察了辽东


熊廷弼像

的地理形势，深入了解敌我情况。不久他就提出了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实内”就是屯田积储，“固外”就是修边并堡。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清醒地看到女真对明朝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主张把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方针。熊廷弼任巡按期间，为了实现这一方略，修建了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同时，他整顿军队，革去弊端，改变作风，严格军纪，充实营伍。并努力改善与叶赫部、蒙族各部的关系，使努尔哈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明朝故地，与明朝和好。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但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随着他的离任，他所制定的卫辽方略也告结束。四十一年(1613年)熊廷弼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革职。之后他回到故乡，为了防汛，他变卖家产，主持修筑长江堤防41里，还建成一座石闸，使当地免遭旱涝灾害，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大败。朝廷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到辽东去慰问。六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辽东防务。熊廷弼上任后果断地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斩杀逃将刘遇节等，震慑欲逃者；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他还连连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并佯装要进兵后金，使后金不敢进攻辽阳。而他则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两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坚固的辽阳城建成，明军的防卫能力空前加强。熊廷弼还进一步扩大防御面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部署完毕不久，六月，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他又率五六万人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于是辽东局势初步稳定下来。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熊廷弼却遭到弹劾并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被罢职，由袁应泰接替他负责指挥。结果仅仅过了几个月，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下，袁应泰自杀身亡。这时人们才认识到熊廷弼的重要，于是熹宗决定重新起用熊廷弼。

而这时的辽东，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三岔河以东全部被后金占领，河西则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命，广宁城只有老弱残兵千余人。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制定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根据地，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等地集结水军，准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他的方略。接着，熊廷弼又建议派

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组织流亡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联合，与登、莱之军互相配合，构成收复辽东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变成了四方并进。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如果能够全面实行，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失败。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开始实施三方并进策。但是，他的三方并进策，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一是请调之兵迟迟不到，二是广宁巡抚王化贞麻痹轻敌，不执行计划。王化贞不懂军事，不做积极进攻的准备，反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认为努尔哈赤不会久居辽阳，而且守城兵力较弱，如果出兵，定能胜利。他屡次率兵出击，不仅无功而返，还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却支持王化贞，使职位低于熊廷弼的王化贞反而不听熊廷弼的指挥。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只有护卫兵五千。熊廷弼苦于没有兵权，自然十分恼火，难免言语过激，使朝中部分官僚也倒向王化贞，反对熊廷弼，至此，三方并进策难以实现。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很快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王化贞听说西平被围，轻率地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攻打后金军队，使三万明军全军覆没。王化贞见状急忙放弃广宁逃跑。广宁失守，明军没有了立足之处，于是熊廷弼只得退至山海关，接着王化贞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都被处以死刑。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并传首九边，以警告那些临阵逃跑的将士。他死后全家受到株连，财产被没收，妻子在衙门受审，长子熊兆珪被逼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

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和阉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把丢失边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的党徒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通过杀害熊廷弼，来打击东林党。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朝中许多官员都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明思宗下诏为熊廷弼平反，谥襄愍。并允许熊廷弼的儿子将其尸体归葬故里。

千古奇冤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朝末年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潜心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但是他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经常向一些曾经在辽东战斗过的退役将士询问辽东的地理状况和防御体系，一直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按照惯例进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推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到山海关后,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关东地形。后来,袁崇焕在辽东修筑宁远城,并修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从而使明朝的边防从宁远城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大体上收复了天启初年被后金占领的失地。他还制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他大力整饬军队,号令严明,认真操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治边有方,成效显著,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袁崇焕像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命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还宰牛杀马,慰劳将士,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努尔哈赤情急之下,亲自指挥作战,结果被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主帅受伤,后金军队于是退兵。在归途中,努尔哈赤伤情加重,死在军中。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遭到的唯一一次败绩。袁崇焕因此声威大振,名扬边境。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全部由袁崇焕指挥。他审时度事,调整战略。一面假装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休整军队,并修筑锦州、中左、大凌等要塞,以防止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想诱惑袁崇焕出宁远增援锦州,以便趁机偷袭宁远。但是他的用意被袁崇焕识破,袁崇焕按兵不动,坚守宁远,同时派四千精锐骑兵绕到清军背后猛攻,使清军两面受敌。皇太极阴谋难以得逞,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袁崇焕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而宁远城巍然不动。皇太极无可奈何,只好退兵。父子两人,两代皇帝都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使他更加威名远扬。

宁远、宁锦大捷在于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他原应功劳第一。但明廷在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将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连他的走狗也个个受赏。而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仅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奏疏请求回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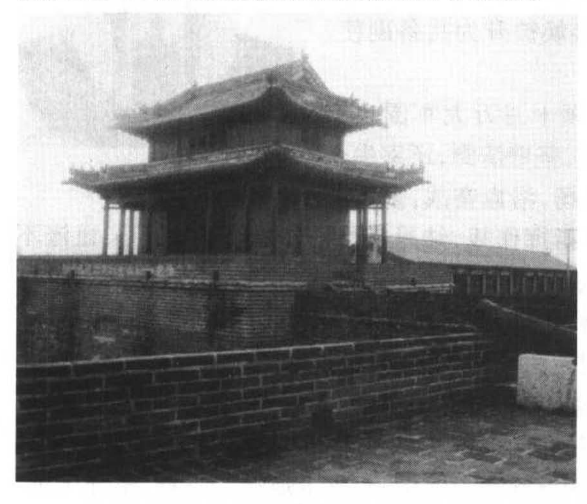
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后,首先除掉了魏忠贤,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有所好转。但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卧不安,日夜想得到良将以解除边境之忧。于是,许多大臣呼吁请回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上任后马上奔赴前线,正



袁崇焕手迹

好遇上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哗变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以振抚军心,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放军饷,稳定军心。

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心中很不高兴。他生气地对大臣们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旁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说士兵哗变不是由于缺饷,而是另有隐情。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听后,对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在借机中饱私囊。



宁远城遗址

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是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岛上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崇祯帝接到袁崇焕杀掉毛文龙的奏疏,十分恼怒他事先没有上报就擅杀边将。但还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所以只好强忍怒气。

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决定绕过宁远、锦州防线,从蓟门南下。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蓟州防线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明军的防守,大军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成一团。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地驰往京师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并命令各路勤王军队服从袁崇焕指挥。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稳定下来。

皇太极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心中又恨又怕。于是采纳了他的谋臣范文程的计策,决定使用反间计,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袁崇焕这个心头大患。他首先假造了两封所谓的"密信",信中以很亲近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然后让部下放在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明军士兵捡到后消息传开,许多人信以为真,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埋怨纷起。那些过去与袁崇焕有矛盾的朝臣也趁机诬陷他要和敌人结盟和谈。正在崇祯帝半信半疑的时候,两个从清营中逃出来的宦官也报告说在清军营中亲耳听见敌人将士议论,说袁崇焕已经和清主和议,不久就要献出北京城。如此一来,崇祯帝深信不疑,认为袁崇焕真的要造反。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当场命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部将,见袁崇焕被抓,于是代替他统领部属,并率领部队返回宁远,不再替皇帝打仗。狱中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自写信给祖大

寿，才将所属部队召回，投入战斗，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以“谋叛欺君罪”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妾兄弟也被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死后，清军在辽东再没有对手，很快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直到清军入关后，人们才知道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个宦官是清军故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后有意放回的。而崇祯帝疑心过重枉杀大将，自毁长城，导致不久之后清军大举入关。使一代名将袁崇焕忠心耿耿却只能含恨九泉。

“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明末大臣，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崇祯元年(1628年)，任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七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十年，升为兵部尚书。他深得明思宗信任，力主“安内方可攘外”，并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计划用三个月消灭农民起义，但没有成功。十一年，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十二年五月，大败张献忠于玛瑙山，十四年初，张献忠占领襄阳，杀襄王；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杨嗣昌畏罪忧死(一说自杀)。著有《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督师纪事》等。

步入仕途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三年(1623年)，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乡。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五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熟悉军务闻名朝野。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不久，因为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

崇祯元年，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崇祯八年(1636年)，各路起义军将领大会荥阳，之后共同作战，势不可挡。崇祯十年，杨嗣昌被夺情(守孝不满三年而召回)起复，提前回京，被皇帝召见。杨嗣昌以通晓历史、善于言谈而深得崇祯帝欣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起义。他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并以本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为“灭贼之期”。但等到崇祯十一年三月，农民义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声势仍然相当浩大。于是朝廷大臣群起弹劾杨嗣昌“灭贼逾期”。由于崇祯帝的保护，没有被定罪。六月，改任礼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管兵部事。到了十一月，李自成先后被洪承畴和孙传庭打败，躲入商洛山。张献忠也寡不敌众，接受招安。杨嗣昌的计划初见成效，于是他更得崇祯的信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进攻明朝，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醉酒中被清军杀死，蓟州失守，京城危在旦夕，朝廷急召卢象升率军增援。卢象升由于主战而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意见不合，杨于是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清军交战。那些将领本来就惧畏清军不

敢迎战，于是趁机按兵观望，导致许多城池失守。而杨嗣昌在作战中总是不能决断，《明史》说他："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往往要将军情上报等到皇上同意才行动。结果等到圣旨来到时，情况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导致贻误战机，使卢象升阵亡，杨嗣昌因此被降三级。

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伪降的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兵，罗汝才也在房县响应，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再次进行镇压。他制定计划，想先集中兵力，包围张献忠，然后一举消灭。十三年二月，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张奋力突破包围，撤入四川，杨嗣昌挥兵跟踪追击。张献忠采取"以走制敌"战术，使明军疲于奔命，士气涣散。明军将领消极怠战。杨嗣昌虽然屡次下令进剿，但是他们却都按兵不动。使张献忠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崇祯十四年初，休整后的张献忠挥师沿江东进，连连打败明军，二月，张献忠攻占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当时杨嗣昌在夷陵，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害怕，急忙上奏请死。不久又听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更为担忧。当年三月，死于湖北沙市(一说自杀)，时年 54 岁。崇祯帝闻讯对朝臣叹息说："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杨嗣昌死后，定国公徐允祯等上奏按照失陷城寨给他定罪。崇祯帝称赞他"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不仅没有给他定罪，反而赐祭，并进太子太傅。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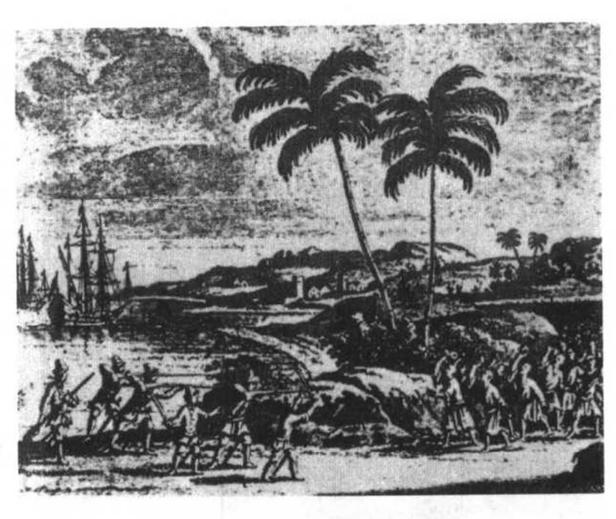
郑成功像

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天启四年(1624 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是明末闽粤沿海海商海盗集团首领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七岁以前一直随母居住日本，崇祯三年(1630 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

隆武帝朱聿键即位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成功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故人称"国姓爷"。郑成功自幼习文练武，研读兵书。从清顺治三年(1646 年)正月起，他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当时，隆武帝曾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委其镇守闽赣界上大定、大安等地。

不久，后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下福建，杀死隆武帝，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降清，而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郑芝龙完全不同的道路。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降清时曾

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郑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他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抗清。



1622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入澎湖

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先是以南澳为基地，组织抗清武装，后来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逐渐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势力很快发展壮大，接连攻占了福建沿海许多地方，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郑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曾多次进行北伐和南征，其中以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北伐，声势最大。这年六月，郑成功同张煌言率领十七万水陆大军，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克镇江，进围南京。张煌言另率一支军队溯江而上，进驻上游门户芜湖，并分兵攻克太平、宁国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南京清军几不可守。但由于郑成功麻痹轻敌，耽误了战机，最后全军溃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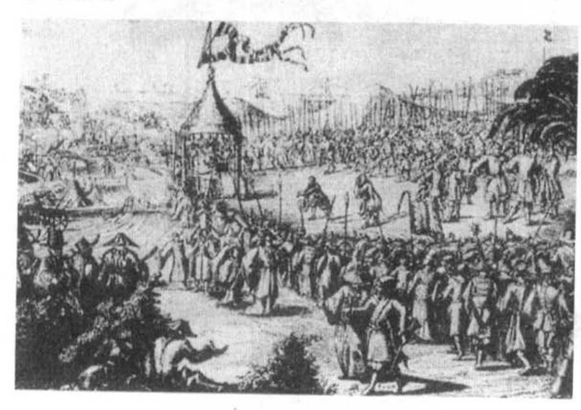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为对付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特别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清斗争，在爱国思想支持下，郑成功遂决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以为抗清根本。

台湾本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自天启四年(1624年)起，荷兰殖民者就派兵侵占了台湾，残酷压迫剥削台湾人民。他们修筑要塞，强迫台湾人民"耕田输租"，还巧立名目，对七岁以上的中国人每月征收人头税，对打猎的征打猎税，捕鱼的征鱼税，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掠夺台湾的财富。为此，台湾各族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剥削。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退回金门、厦门后，进一步感受到台湾人民殷切盼望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要求。这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者何廷斌，向郑成功献了一幅台湾地图，透露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机密情况，并表示愿做攻取台湾的向导。于是，郑成功决定乘侵台荷兰殖民军兵力薄弱、求援困难之机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令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金门、厦门，自己率军队二万五千人、大小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大军由金门料罗湾出发，经一日航行抵澎湖，四月二日拂晓，在浓雾弥漫中船队进入台湾海面，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导下，出敌

不意地通过泥沙淤积的鹿耳门航道，迅速取得了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台南市）西北部附近港口的胜利。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听到郑成功军队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迎接并协助作战。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两千余人，他们船坚炮利，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当郑成功军队登陆台湾后，荷兰长官揆一指挥其侵略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郑成功指挥军队迅速打退了敌人，随即包围了赤嵌城，要求荷兰殖民者立即退出台湾，若能献城投降，可以受到优待，如继续顽抗，必将受到严惩。但揆一不听警告，拒绝投降。郑成功遂指挥军队猛攻赤嵌城，终于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献城投降。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后，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地的台湾城（安平），攻城一时未能奏效。郑成功决定“围困俟其自降”，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地，发动群众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斗争。顺治十八年八月间，荷兰殖民者从巴达维亚派甲板船十余艘、海军数百人，来台湾增援。台湾荷军乘援兵到达，发动反扑。郑成功派水兵勇将多人，率军迎敌，大获全胜，夺获甲板船二只、小艇三只。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无力出击了。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又发起了强攻。清康熙元年（1662年）十二月十三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撤离台湾。中国军民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他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措施，如在当地设置府县机构，管理各地；组织士兵进行屯田，奖励各族人民垦荒，大陆人民也陆续迁往台湾。郑氏政权规定向高山族每社派去汉族农民一名，给熟牛一头和一些农具等，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氏政权还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素质。

郑成功收复台湾并经营台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它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使台湾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的丰功伟绩表明，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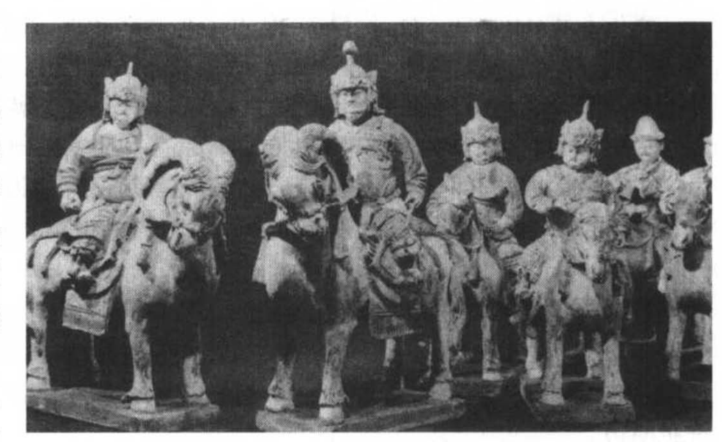
外交与边防

“燕王扫北”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入元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仓皇逃亡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元璋遂改大都为北平府。

元顺帝在上都没呆多久,就又被明将常遇春赶出了上都,逃亡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回忆起逝去的荣华富贵,元顺帝不禁潸然泪下,作诗以排遣心中的忧郁:“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悔。”元顺帝自然不甘心于失去的天堂,遂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向明朝统治地区反扑。明朝初年,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明王朝多次北伐蒙古。

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远征沙漠。四月,明军在沈儿峪口大败元将王保保,生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等千余人,消灭元将士8万余人,缴获马匹4800余匹。这次北征,迫使元朝残余势力进一步北撤,稳定了北方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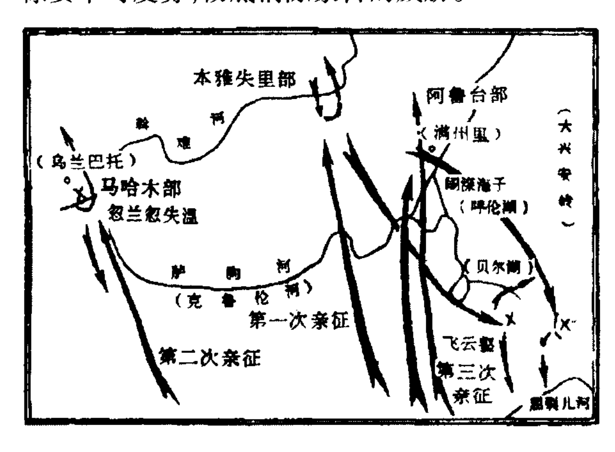
明代骑马武士俑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再次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与李文忠、冯胜兵分三路,各率骑兵5万,征伐蒙古。徐达领中路,李文忠领东路,冯胜领西路。结果,虽然东西两路小有斩获,迫使蒙军再次后退,但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等战死疆场;作为主力的中路军战死数万人。这一役,使朱元璋意识到,蒙古之兵力难以短期内平定,就改变了策略,以防御为主,从第二年开始,命徐达、李文忠赴山西、北平练兵备战。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再加上看到元将王保保已经去世,朱元璋又起了伐蒙的念头。洪

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肃清沙漠”。由于明军准备充分,此役大获全胜。杀元大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俘获将相官校3000余人,军士7万余人,马匹4万余匹,牛羊10万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途中,被部将缢杀。蒙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日益衰微。1402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朱元璋去世。临终前,仍担心残元为害明边,一再叮嘱朱棣要审时度势,彻底消除蒙古的威胁。



明成祖远征漠北路线图

明成祖即位之后,继承了朱元璋对蒙古的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以求安定边境,稳固政权,恢复经济。但蒙古贵族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一面称臣纳贡,一面又不断南下袭扰。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结果被杀,这个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线。朱棣忍无可忍,遂决心征讨鞑靼。七月,明成祖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10万出征鞑靼。结果,全军覆灭,五将军全部战死。消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除边患,决计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蒙古诸部,其气魄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队行动。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听说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剌部。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杀敌无数,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向明朝称臣,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明朝给他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剌部又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鞑靼首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

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剌部。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此役,朱棣部署精当,亲自冲锋陷阵,大败瓦剌军。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进犯明边。

鞑靼部在明朝帮助下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阿鲁台改变了对明的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大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万多辆,挽车夫23万多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阿鲁台听说朱棣亲征,连夜逃走。回师途中,朱棣大败阿鲁台之羽翼兀良哈部,九月初,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

扰明朝边境。朱棣听说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九月上旬，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降附。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次请求率兵攻击阿鲁台。这次，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阿鲁台逃跑，明军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下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终年65岁。

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都没能真正同蒙古主力决战，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但从客观效果上说，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明朝边境各民族的安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郑和下西洋

在明朝，宦官乱政是出了名的。但也有宦官为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七下西洋的郑和，其身份就是太监，所以也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洪武四年(1731年)，郑和出生。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以博友德、蓝玉为首领，进入云南。第二年，明军平定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由于家庭遭受如此变故，再加上当地连年战争，郑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12岁的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燕王朱棣家的一名仆人，后来做了宦官。

郑和做宦官期间，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又勤劳谨慎，很快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他为内宫兼太监。由于郑和小名“三保”，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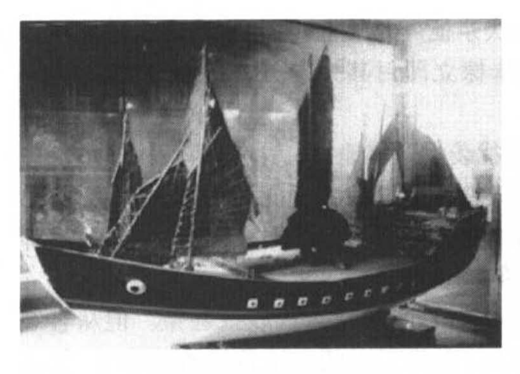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他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既是回教徒，又信奉佛教，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交往，同时，郑和又是宫廷内官兼太监，也可以兼为皇廷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及所铸铜钟

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情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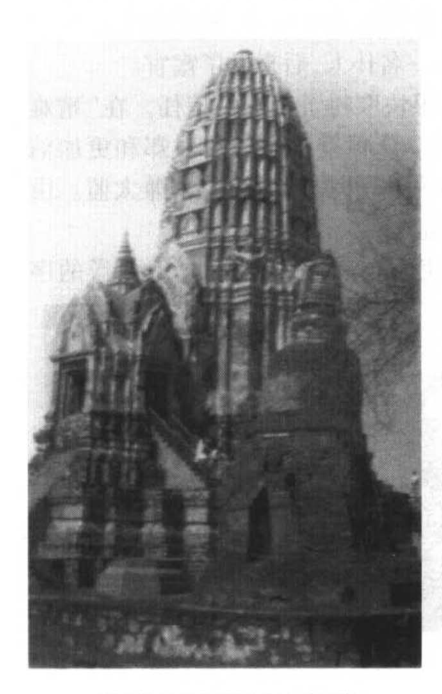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年)。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郑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人员有水


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模型

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的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仅舵就重4810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航行路线为,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年)。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年)。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郑和途中曾遇险,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成祖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保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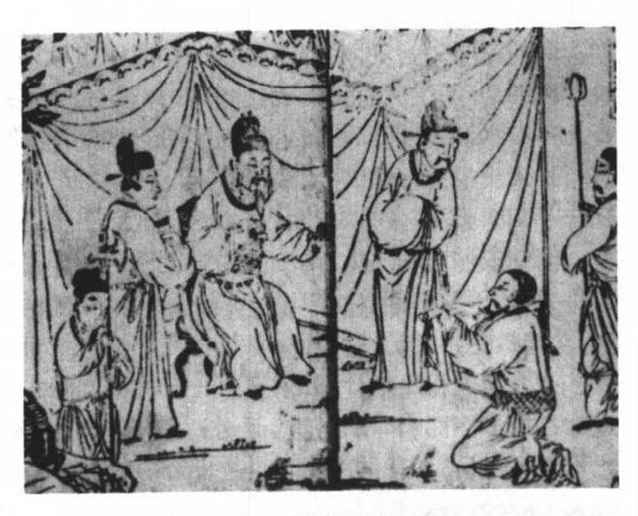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年)。此次,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自到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担任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年)。郑和此次到了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19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年)。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队而行。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

宗。仁宗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一年不到，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决定继续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再次派郑和下西洋，27000余人分乘61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郑和在返航途中辞世于印度古里，终年62岁，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



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方物

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航程10万余里，历时28年。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还早半个世纪。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确切原因一直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搜寻明朝建国前割据东南一方的张士诚或方国珍的余部；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海上贸易，建立海上大联盟。但不管怎么说，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明长城

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派遣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后，把原来分段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且继续修建、延伸，以后历代不断维修扩建，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代末年，中国的“长城”前后修筑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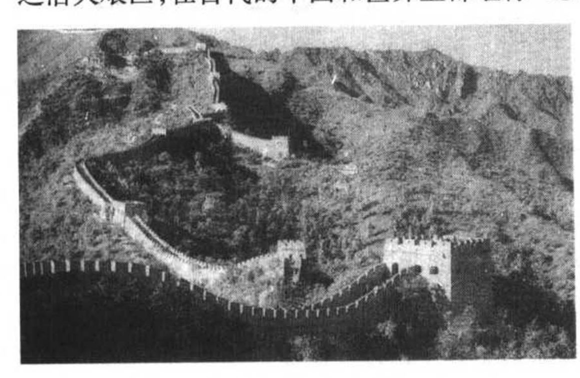


明代长城遗址

明朝建立以后，被明军击溃退回到漠北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期以后，东北地区兴起的女真族也不断威胁明

朝边境的安全。为巩固北方的边防，有明以来的200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明朝初年，洪武、正统、成化各朝，只是对几百年前遗留的长城进行修修补补，多是沿着北齐、北魏所筑的旧长城进行修筑的，大多修筑的是关塞、烟墩，较少筑城，到弘治时，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增设诸边城堡1000多所。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明朝长城工程之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相比的，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作用更加强大。可以说，明长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工程最坚固、功能最完善的长城。现保存比较完好的长城即是明长城。

有人做过粗略估计，如果把明长城的土方砖石，筑一道高5米、厚1米的大墙，可环绕地球一周多。而当时从备料、运送到施工，又都是在异常复杂艰险的地势下进行的，工程之浩大艰巨，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堪称“之最”。



明长城——八达岭长城

明代之所以大规模修筑长城，除和中国以前历代重视修筑长城的传统有关之外，也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防御思维有关。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朱元璋率兵攻打过许多城池，深知城防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他起义后，采纳朱升“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朱元璋即位后动员全国大修城池，州县城墙皆用砖包。明长城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有效延伸。

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和成祖通过北伐，不断把明朝边境线向北推进。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修缮的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蒙古瓦剌、鞑靼等部屡屡兴兵南侵，明开始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筑，把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100余年间先后建成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宣府、山西等重镇。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继续加固和改建了原来的长城，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1200多公里的长城上修建1000余座墩台，还在长城南北构筑了许多堡城、烟墩。经戚继光重新修筑过的长城最为壮观。

明后期，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九个防区被称“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总兵把守，每镇有许多重要关口，多者至数百座，九镇长城的关口总数上千，其中著名的就有数十座。长城沿线九镇的设置，使长城的防御作用更加强大了。

明长城由城墙、关城、城堡、墙台和烟墩等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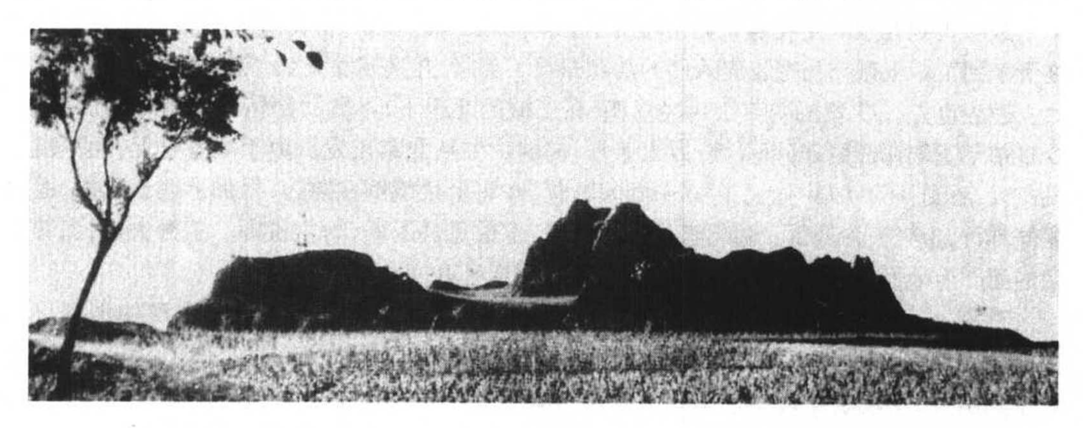
城墙是长城的主体。在明朝以前，城墙大多是用土筑或石砌的，明长城在不少地区已经改用砖、石砌筑，在工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重要的是，在一些重要地带设多层次的“重城”，如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等地，都有几重长城，最多的地方达20多重。

关城是出入长城的通道，也是长城防守的重点，上筑城楼和箭楼。

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也有个别设在城墙外面。在明长城的东端，北起角山、南到海岸之间的山海关，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筑的山海卫城。

墙台在长城之上，每隔约300米设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建铺房，供守城士卒巡逻时避风挡雨。

烟墩也称烽火台，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明火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明朝对烟墩的使用做过一些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余人，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这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迅速知道敌兵的大概数量。



长城烟墩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明代长城的修筑还有一个传说。在修嘉峪关时，兵部官员与工程主管之间心存私怨，兵部官员就企图伺机报复，规定工程主管上报工程预算，对所用材料及工资，既不准多报，也不准追加，完工来验收时，如果违犯了规定就要重罚。正在工程主管为难之际，一个老工匠经过周密的估算，拟订出一个工程计划，让主管报了上去。等到嘉峪关全部工程完成时，所有的材料和工费都恰好用完，只多出一块砖，还是特意留下准备兵部来人验收时送给他们作为礼物的。兵部知道后，自然也就不再派人来验收了，而这一块砖就作为永久纪念物，放在城楼上了。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逐渐增强，其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妄图进一步吞并中原。而当时，瓦剌部表面

上还是臣服明朝的，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借口制造事端。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抵达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王振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也先，也先借口明朝违背诺言，兵分三路向明朝进军，东路攻辽东，西路攻甘州，中路攻大同、宣府。也先亲率中路大军，步步紧逼，明朝边塞城堡纷纷陷落。守大同的明军被瓦剌军打得大败，参将吴浩、宁侯宋涣、武进伯朱冕相继为国捐躯。

战报传到北京。司礼监太监王振听了心情为之一振，他认为，为英宗和自己扬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王振立马把也先入侵的消息禀报了英宗，并且鼓动英宗，应该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去迎战也先。23岁的明英宗年轻气盛，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劝阻，令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率兵50万人亲征，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由于准备仓促，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在路边，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士气极为低落。随驾官员尚书邝野、王佐见势不妙，力主班师。王振大怒，当着英宗的面严斥他们，罚他们在风雨中跪在路边的荒草丛里"冷静"思过。

英宗一行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了与也先交战的明朝先头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害怕了，决定班师回京。王振的老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为了光宗耀祖，在家乡父老面前显示其威风，王振决定带英宗率部队到自己家乡走一趟。但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大批人马踩坏了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便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初，英宗一行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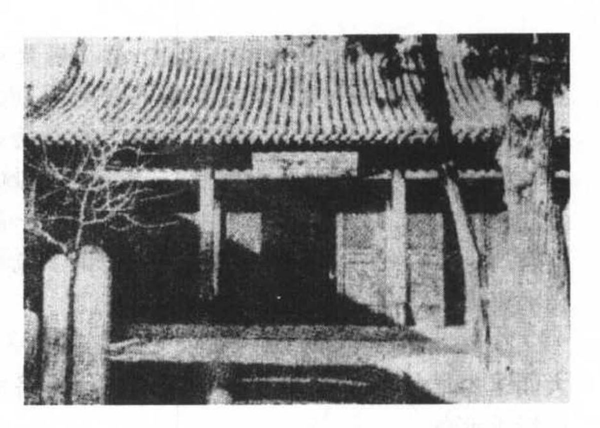
也先像

英宗到土木堡时，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也可以在城中坚守。王振却以装运辎重的车子还没到为由，硬要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驻扎。土木堡根本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舌燥，土木堡又没有水源，离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也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多深，也没找到水。

也先的大军第二天就追到土木堡，将土木堡重重包围。明军无险可守，水源又不足，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

也先虽然把英宗困在土木堡，但其所率部众才约2万人，不知明军兵马数量，所以也不敢贸然进攻。便要一花招，打探明军虚实。第三天，也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下令移营取水，当数以万计的明军到离土木堡15里的河中取水时，也先率军发起猛烈进攻，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也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束手就擒。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首辅曹鼐、户部尚书王佐、侍郎王永和等66名大臣战死，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

没。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锤结果了性命(一说为乱军打死)。瓦剌军不仅缴获了明军大批衣甲、器械、辎重,还在沿途掠杀百姓数十万,并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土木之变”。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成为明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瓦剌首领也先从此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


显忠祠——土木堡死难将士纪念祠

如何处置明英宗,瓦剌内部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杀掉,也先的一个弟弟伯颜帖木儿力排众议,力主不杀,如果明朝来迎,便送他回去,也可留下万世美名;同时也可以把英宗作为砝码,骗开明朝更多的城池,赚取更多的钱财。也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英宗朱祁镇交给他照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慌乱,朝廷上下哗然。英宗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为了救英宗,把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马驮着,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英宗。结果也先仍然不肯释放英宗。

在朝廷内部,就何去何从展开激烈争论。有人主张迁都南方,以躲灾难;也有人坚决反对再把都城迁回南方。兵部侍郎于谦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死守京城!”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干脆立朱祁钰为帝。这时,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

土木堡战败后,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积极调集军队,加强城防,大大加强了北京的防御力量。10月,也先又率兵进攻北京,于谦奋起迎敌,打败也先。于谦又积极备战,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另将京师三大营改为“团营”,统一指挥,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次年也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庚戌之变”

嘉靖十二年(1543年)蒙古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达延汗的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称其为俺答汗。

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其他物资匮乏,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

和手工业产品。以前各朝蒙古霸主，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明廷便决定中止与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俺答汗害怕了，多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要求明赐予封爵，允许每年向明廷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担心“土木之变”重演，严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要求，甚至悬赏购买俺答汗的首级。


俺答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再次派出使者与明谈判。大同巡抚龙大有却将来使逮捕，请示朝廷后将俺答汗的使臣斩首示众。

明廷的态度和做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南下，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是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不敢抵抗。后来，他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转而进犯其他边镇。俺答收受了贿赂，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8月中旬，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驻扎在古北口的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直入内地，京师震恐。

8月20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为14万人，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200余骑，在北京郊区大肆杀掠，百姓纷纷逃往京城，而京城却城门紧闭，百姓走投无路，哭号震天。而朝廷内的主降派严嵩要求守城诸将坚壁勿战，任凭俺答兵在城郊掳掠劫杀。俺答兵围困京城3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23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一同还押走了大批男女、牲畜和金银财宝。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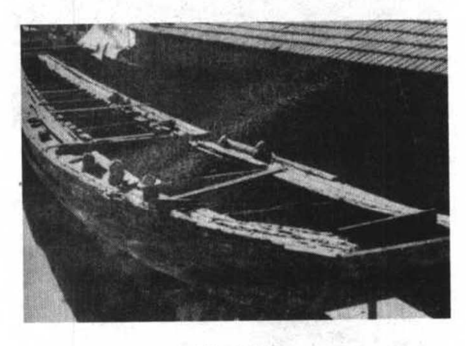
俺答撤退时，大雨已经数日，北京城郊的泥淖竟达一尺多深。俺答兵所撤路线为羊肠小道，俺答担心明军在其撤退途中预设埋伏，又中途掉头，兵分两路相继撤去。撤退时，俺答的军队也已经是人马疲乏，溃不成军。

俺答兵撤走后，大同总兵仇鸾收拾残部，打道回京，沿途竟然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说是俺答兵的首级。世宗竟然信以为真，对仇鸾大加赏赐。

“庚戌之变”让大明天子世宗丢尽了脸面，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有我在，你绝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请求与明通贡互市。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但是，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由于未得到明廷同意，俺答又兴兵骚扰诸边。嘉靖皇帝又停止了马市贸易。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对峙之中，此后的20多年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边境地区的百姓深受其苦，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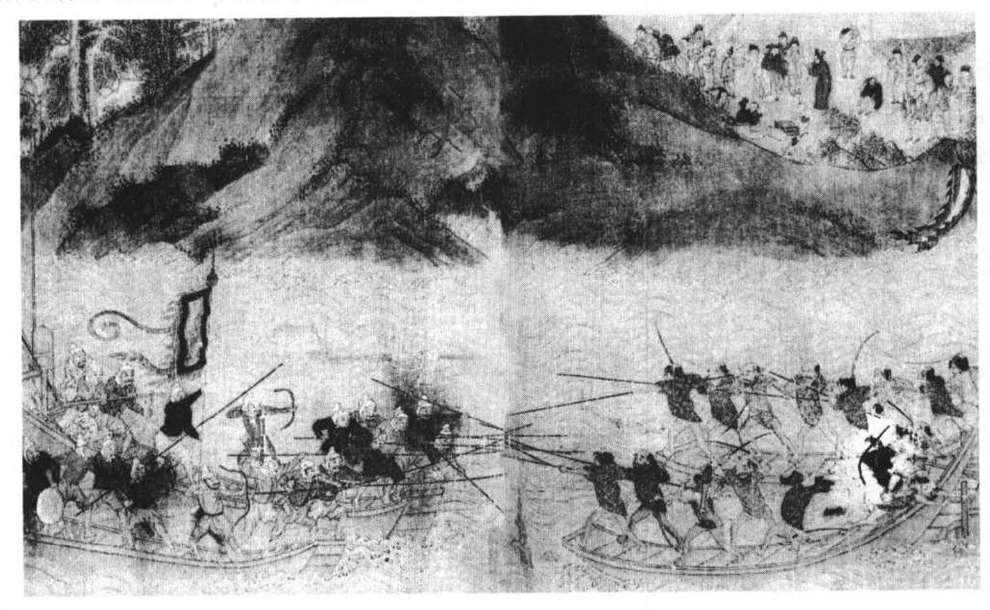
嘉靖倭患


明代兵船

“南倭北虏”是明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所谓“倭寇”，是来自日本的失意的武人和浪人，他们组成海盗集团，经常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中国的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大举袭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各地百姓备受倭寇蹂躏，这场倭患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倭患之所以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出现，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

13世纪中叶，日本存在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之间除了掠夺财富，互相征战之外，还经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朱元璋即位后，曾经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同时也是为了消弭倭患。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国王良怀曾遣使至中国奉表进贡，同时送回“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余人”。但从整体说来，朱元璋的友好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倭寇侵扰日渐频繁。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特别是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之后，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便流落海上，盘踞于诸岛之上，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地区，造成嘉靖年间的大规模倭患。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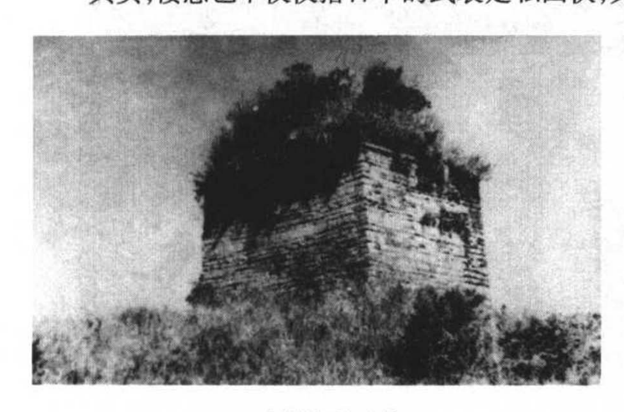
从明朝自身来讲，宣德以后，皇帝大多昏庸无能，朝政腐败，边防废弛，倭寇又兴盛起来。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股倭寇流窜至宁海石所庄，在该庄一呆就是十多天，沿海居民全部逃走。嘉靖二十年(1547年)，倭寇分乘百余艘大船在宁波、台州沿海耀武扬威，不时派遣数千人登岸烧杀抢掠。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官僚豪富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并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朱纨被迫服毒自杀。从此，巡视大臣不再设立，朝廷内外没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日贸易完全断绝，日本商人转入走私贸易，逐渐演变成倭寇，他们与中国从事走私的海商相互勾结，由走私转而寇掠。不仅辽东到广东的沿海地区深受其害，甚至东南内陆也难以幸免。倭寇甚至纠集数千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甚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给社会带了严重的动荡。如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绑在竹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儿啼哭，倭寇拍手笑乐。倭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嘉靖三十年(1557年)前后，倭患最为严重。江北的淮安、扬州，江南的松江、苏州、徽州、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兴化，广东的潮州，都有倭寇、海盗出没，攻破上百处州县卫所城池，攻陷福建兴化府，甚至攻至南京外郭南端的大安德门，气焰十分嚣张。

其实，倭患也不仅仅指日本的武装走私团伙，其中还有大批的中国人参与其中，被人们统称为“倭寇”。如中国盐商王直等人长期从事武装走私，勾结倭寇，还在海上劫掠，被海盗奉为盟主，其窝点成为倭寇和海盗最主要的一个据点。明朝曾悬赏伯爵爵位、黄金万两，希望捕获王直。


泉州抗倭敌楼

与倭患的兴起同时，中国官民的抗倭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戚继光和俞大猷为肃清倭患立下了赫赫战功。

嘉靖二十八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戚继光到浙江后，针对沿海卫所废弛、军令难行、

战斗力低的情况，在胡宗宪支持下，亲去义乌等地招募矿夫、农民4000多人，训练成著名的“戚家军”。他针对倭寇创造了一种叫做“鸳鸯阵”的战术，这种战术就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刀、棍等长短兵器相互配合，使其能各尽所长。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部队很快成为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令倭寇闻声丧胆。1561年，戚继光率军在台州等地大败倭寇，生俘1000多人。第二年又驰援福建，捣毁了倭寇设在横屿的老巢，并乘胜追击，连克60营，杀死倭寇3000余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明廷先后命王忬和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军务。他们重用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编练水军，请调援军，水陆军密切配合，抗击倭寇。第二年三月，俞大猷等率舟师夜袭倭寇盘踞地普陀山，俘斩倭寇数百人。嘉靖三十四年（1561年）四月底，倭寇4000余人突袭嘉兴。俞大猷率水陆军奋勇抗击，斩倭两千，明军乘胜追击，在苏州等地歼灭逃倭千人。嘉靖三十五年（1562年），明廷命胡宗宪为浙江总督，他计杀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徐海，诱降勾结倭寇的海盗巨贼王直。

在戚继光和俞大猷所部士卒的英勇奋战和广大受害民众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多年奋战，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困扰明朝十余年，给江、浙、闽、粤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的倭患和海贼之乱终于平息。

蒙汉“隆庆和议”

“庚戌之变”以后，蒙汉之间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长城内外汉蒙两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损害，都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俺答汗在扩展势力的同时，也努力试图恢复与明朝的经济联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发展与长城以南汉族的贸易往来。

在明朝这方面，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首辅高拱认为，过去对俺答汗的互市和好要求一概拒绝并非上策，反而会酿成祸害，主张与蒙古通贡互市，满足俺答汗等领主的要求，这样可以求得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又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缮和加固辖区内的长城，新筑1000余座敌台。这样，通贡互市也有了安全方面的保证。

隆庆四年（1570年）冬天，俺答汗与其孙子巴噶奈济发生家庭纠纷，因巴噶奈济仰慕汉族文化，出走降明。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诏封巴噶奈济为指挥使，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刚开始想武力从明朝夺回其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


马市图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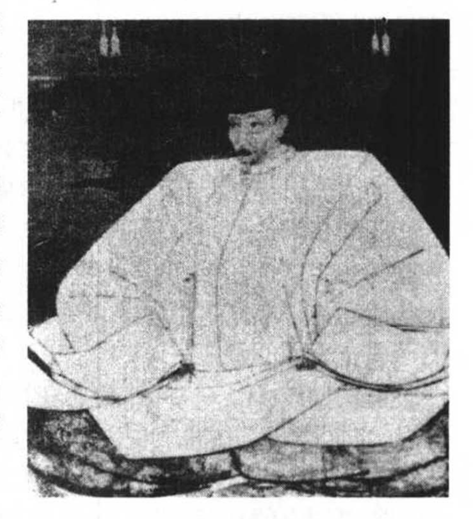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考,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以后不久,“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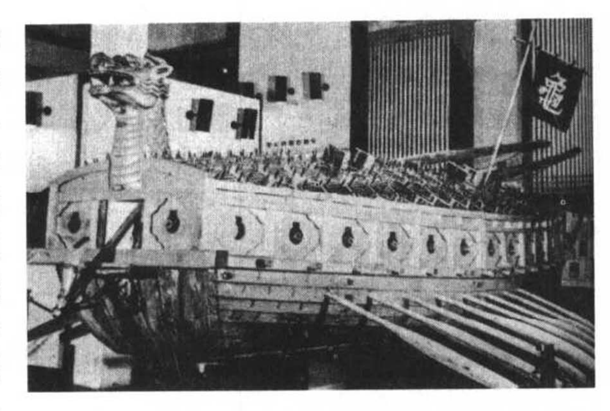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援朝战争:抗倭援朝

16世纪末期,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开始了武力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之机,决定以武力征服朝鲜。当时,整个朝鲜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这为日本提供了绝好时机。明朝获得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后,特意派使臣去询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朝鲜国王连连否认。当然,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朝日三国归于一统,进而称霸东亚。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丰臣秀吉像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出了可以说是日本当时的最豪华阵容发兵侵略朝鲜,共调动

了50万军队，其中30万用于作战，15万人是先遣队。先遣队分为八个军，宇喜多秀家为总司令官，小西行长率第一军，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4万水军和700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10万人马驻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日军在釜山登陆后，长驱直入，只用了20天时间，相继攻占开城、京城(今汉城)、西京(今平壤)。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达6万人。朝鲜有些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国王李昖惊慌失措，仓皇放弃首都，先奔平壤，继而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



朝鲜龟甲船

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梦想，便派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除了正式向皇帝递交国书外，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明廷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如若再纵容日本侵吞朝鲜，那后果不堪设想，遂决定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弁、史儒率兵2万出征，副总兵祖承训、游击王守官带大部队继后进入朝鲜。同年秋，以陈璘为总兵、李如松为副将的5万余大军赴朝抗倭。第二年初，朝鲜爱国官兵在明军的支援下，一举收复西京、开城，直指京城，同时展开海陆两路反攻。朝鲜名将李舜臣指挥的朝鲜水军龟船队，连创倭军，掌握了制海权。日军处境十分狼狈，遂于1593年8月被迫接受“议和”，但是，由于日军无议和之诚意，竟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谈判拖延了3年，仍未能达成协议。

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又出兵14万入侵朝鲜，东西两路并进，连占要塞。明朝此次也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淞的水军共14万，再度增援朝鲜。

朝中联军全力进击，连战连捷，日军再次要求停战议和，撤离朝鲜。同年8月，丰臣秀吉积郁而死。其部将德川家康遵其遗命于10月下令撤军。11月19日，日军万余官兵乘500余艘舰船行至露梁海域，被李舜臣统率的水军截住，朝中水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多人。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七十的明朝老将邓子龙，跃上朝鲜战船奋战，壮烈牺牲。陈璘赶来救援，李舜臣不幸身中流弹，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



李舜臣像

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战斗结束后，陈璘急忙去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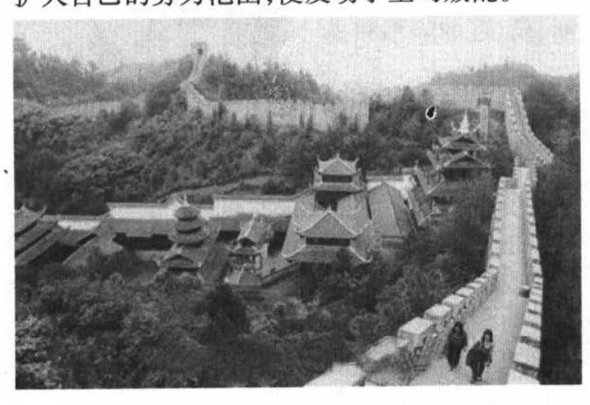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上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这场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长达7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多民族国家的不和谐音符：西南土司叛乱

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通过这些官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朝设置土司是从湖广开始的，然后逐渐向西南地区推进，到明朝中期，在整个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土司。明代全国分为13个行省，设置土司的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广和陕西等7个行省。

在明初，少数民族的土司与中央政权之间即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西南土司经常发动武装叛乱。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最强的陇川土司叛乱，西平侯沐英率军讨伐。当时叛军30万，驱赶百头战象来战。沐英和将领商议，叛军士气都在中原地区没有见过的战象上，而战象又没有见过中原地区的火铳火器，便下令开战时神机营的火铳火箭一定要络绎不绝地撒向战象。第二天，陇川军的大象被明神机营猛烈攻击，果然奔溃。最后，大败陇川土司叛军。明廷世封沐家镇云南，终于建立了对现在云南地区全境的有效统治。

到了万历末年，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上日益腐败，明朝中央政权和地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存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后金，进犯辽东，明中央政府在各地增派“辽饷”，土司们一方面感到经济压力，同时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发动了土司叛乱。


恩施土司城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苗族土司及贵州水西土司奢崇明、安邦彦趁明末社会矛盾激化，中央政府腐败日盛之际，联合乌蒙、东川、沾益等地土司联合起兵叛乱，图谋扩大割剧势力，拥兵自重。

同年九月十七日，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在重庆起兵叛乱。10月，奢崇明率兵进围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全省为之震动。第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宣慰同知苗族土司安邦彦自称“罗甸王”，其手下48支及其他土司头目安邦俊等蜂起

响应。贵州水西土司安氏是盘踞黔西北历史最长、势力最强的封建领主，一切耕地、牧地、山林、水源都属领主所有，比奢氏还要强大。

几月之内，四川、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陷于叛军之手，成都、贵阳相继被围困长达数月之久，波及云南、广东、湖广等省。明中央政府四方筹集兵饷，调四川、贵州、广东等五省兵力会剿，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到崇祯十年(1637年)，才平定了土司叛乱。

西南土司叛乱之所以能为害如此长久而不被剿灭，是因为当时明中央正全力募兵抗击女真族的进攻，根本无力顾及西南地区，四川、贵州武备空虚，土司叛军才可能势如破竹，短期内攻陷川贵大部分地区。同时，明末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有的将帅渎职不检，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加上西南地区地形复杂，给惯于平原作战的明中央军剿乱造成了困难。

奢安土司叛乱虽然终于被平定了，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明朝损兵折将，耗资巨大，牵制了明政府抗辽的力量，加重了明朝的统治危机。战争也给川黔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

明清(后金)第一战：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礼。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率步骑2万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神宗在得知抚顺沦陷的当天，一方面布置紧急应付事宜，另一方面召集群臣准备讨伐后金。20天后，明神宗在听取了辽东的危机情报和文武大臣们提出的各种战略策略陈述以后，对兵部重申明要大举征讨努尔哈赤。

明朝决定奋力反击，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神宗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努尔哈赤像


努尔哈赤穿过的甲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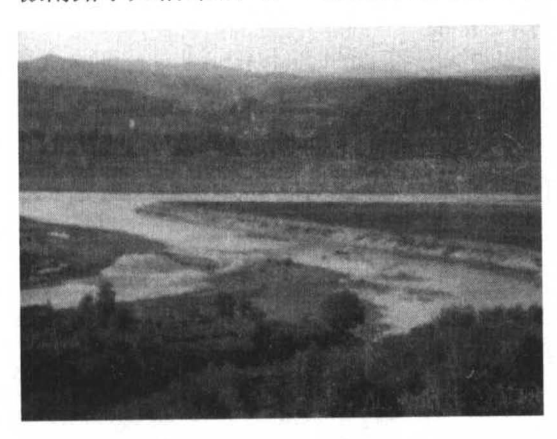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24万云集辽沈,号称47万。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兵分四路,分进合击,企图直捣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6万余人,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5万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綎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


萨尔浒之战旧址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队在5天之内歼灭明军10多万人,缴获大量的驼马、甲仗和炮车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使明满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役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更趋稳固,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却损兵折将,耗银巨万,陷入了被动困窘的境地。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朱氏政权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政治斗争

洪武四大案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

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

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 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

“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凡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
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
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
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有能告捕者將犯
人財產全給充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
百流三千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
若逃避山澤不服追喚者以謀叛未行論其
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

“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镇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 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 70 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 10 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 1000 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

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

“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叔侄争斗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还刻意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朝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然后再伺机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清君侧之恶”之名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登极而结束，历时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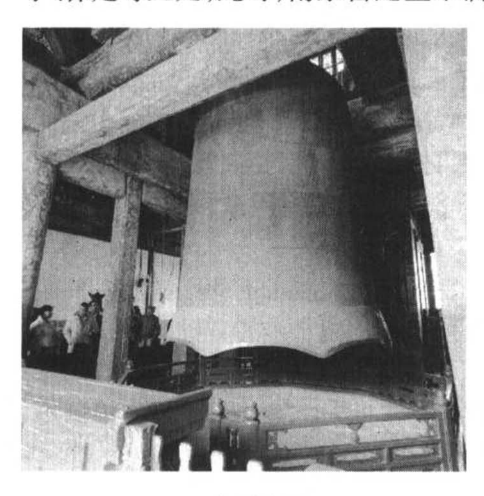
朱元璋做皇帝时，担心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史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燕王起兵后以旋风般的速度，不到一个月，即攻占了北平北部的居庸关、怀来、密云、

蓟州、遵化、水平(今河北卢龙)等军事重镇和沿边州县。然后挥师攻破大宁(今内蒙宁城),挟持宁王,收编了宁王的护卫亲军,兵力更加强大,回师南下。

懦弱迂腐的建文帝命令将士在同燕王军队作战时,不得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样,使得燕王肆无忌惮,同时,建文帝派出的将领老的老,无能的无能,尽管军队数量多于燕王,却连连败退。

燕军和南军在北平南部地区混战了近三年,燕军屡次获胜,但所得的城池仅永平、大宁、保定等几处,此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宦官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据此决定改变战略,挥军径直南下,一路之上不再攻占城池,兵锋直逼南京。大军渡过长江,燕军中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一举冲破了南军的沿江防线,六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永乐大钟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并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明成祖为纪念“靖难之役”阵亡的将士及迁都北京,在北平华严寺铸造了“永乐大钟”。它通高6.75米,最大外径是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布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其文字为汉文佛教铭文225939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计230184字。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所书,字迹端正,雄健有力。

“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剌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剌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

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

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

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

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

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万，才得以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并终于继承了帝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与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明三疑案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朝廷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桩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即神宗朱翊钧朝的“梃击案”和光宗朱常洛朝的“红丸案”和熹宗朱由校朝的“移宫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到第一道宫门,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后直闯入宫,又闯过第二道宫门,直到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便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蜂拥而上,将张差捉住,当即便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万历皇帝得知,下诣将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万历皇帝报告道: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再次提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宷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便私下里审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庞保、刘成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王之宷便将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



慈庆宫正门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舆论哗然。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个人行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看起来,此案与郑贵妃有牵涉是肯定的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来平息此事,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他又对朱常洛说:"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朱常洛只得说:"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吧!外面的议论都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群臣自然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历皇帝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郑贵妃也就从此案中解脱出来。

随即,张差被凌迟处死。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审问庞保、刘成。由于张差已被处死,死无对证,庞保、刘成对张差所供各项俱不承认。正要详加盘问,太子下谕:庞保、刘成二人也许曾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庞保、刘成主使,不可轻信。会审只得停止。万历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涉及此案的李守才、马三道等亦发远方戍守。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为审明案情立过大功的王之寀，案子一了结，立刻被找个借口罢官为民。后来又随着在这个案子几起几落，天启五年(1625年)，竟被囚死于狱中。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究竟有多大牵连，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红丸案

万历末年，阴险毒辣的郑贵妃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不可动摇，便百般讨好太子，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这个朱常洛，也是好色之徒，郑贵妃便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强，再加上与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厉害。登基仅十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可他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晚上，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精神极度亢奋，竟一连"御幸"数名宫女。



乾清宫

"红丸"到底是什么东西？"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制法很特别：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成丸，因其色红，故称"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红丸案"。



明代药柜

再说朱常洛。由于一连十多天的折腾，朱常洛终于扛不住了。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并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便下了一副泄火的猛药。朱常洛服后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时，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诊治，李可灼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下，服了这丸药，光宗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大喜。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夜，李可灼留在宫中。又过了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想再服一颗。李可灼便又进了一颗。



御药房金罐

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到大臣们赶去时，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此时，朱常洛即位才刚满30天！

光宗驾崩，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春药“红丸”,皇帝阴寒大泄,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是对症下药。

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不是御医,却擅自给皇帝吃药。李可灼一定是受人指使,谋杀皇上。

继朱常洛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没有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草草收场。

但朱常洛暴死之谜,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移宫案



乾清宫内景



移宫图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朱由校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朱由校自幼也备受冷落,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王才人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朱由校从小也受到李选侍的侮辱凌虐,害怕李选侍,性格软弱。

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不久,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引起朝臣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和大臣们见面。杨涟等人见到朱由校,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定于当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安全。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是大臣的章奏,要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遭到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朝臣们又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李选侍拒绝。

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在乾清宫,

她住进乾清宫完全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乾清宫。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就上疏，敦促李选侍移宫。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让朱由校即位，也遭到大臣们的拒绝，李选侍和朝臣们的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登极日期越来越近。直到登极大典之日的前一天，李选侍仍然没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要继续住在乾清宫。群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李选侍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

九月六日，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落空了。

熹宗即位后，传出谕旨，痛数李选侍数条罪状，又下令让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至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事事关心"的东林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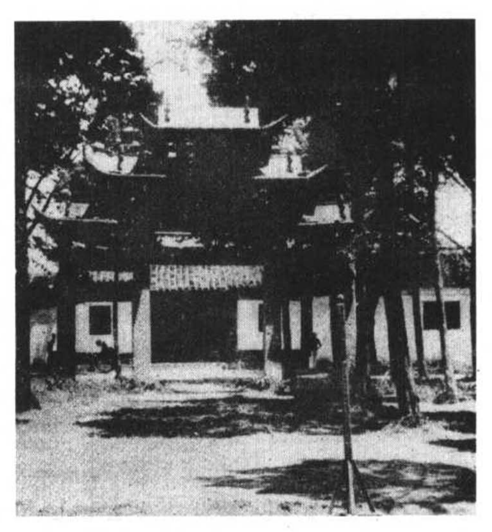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书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东林党人身在书院、心怀天下的志向。

从万历"争国本"斗争开始，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党争。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的"国本"之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却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因此，顾宪成颇遭神宗的嫉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来的首辅王家屏，被神宗削职罢官。



东林书院

顾宪成的老家在无锡，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原为宋代杨时讲道之所。顾宪成被革职后，与其弟顾允成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后来，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又相继被朝廷所黜，也先后赴东林讲学。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一些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讯响应。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他们"每岁一大


顾宪成像

会，每月一小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朝内官员也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渐渐自成一党，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被称为“东林党”，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化。顾宪成说：“在朝廷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做官，志不在民生，离官而去，志不在世道，子所不取。”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在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阉党”集团。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 100 余人。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杨涟像

天启四年(1624 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 70 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1626 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

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本节拟从五个方面介绍明朝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农业与手工业,商品经济的繁荣,赋役与户籍,土地关系与依附关系,乡绅阶层与宗族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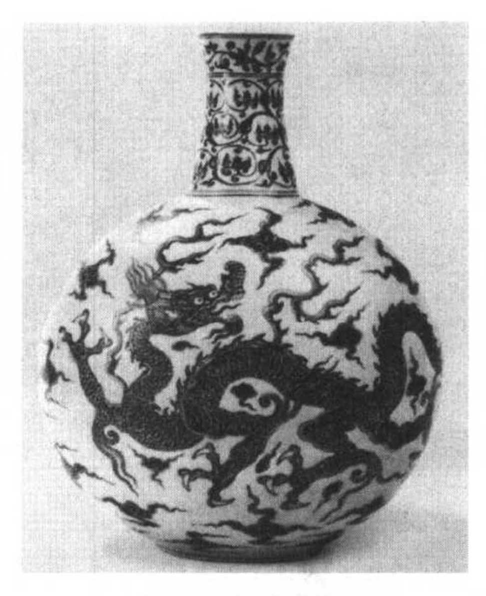
农业与手工业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

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明朝人总结说,三吴地区赋税苛重,然而"闾阎不困",就是因为当地人"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见谢肇淛《五杂

俎》卷3《地部一》)。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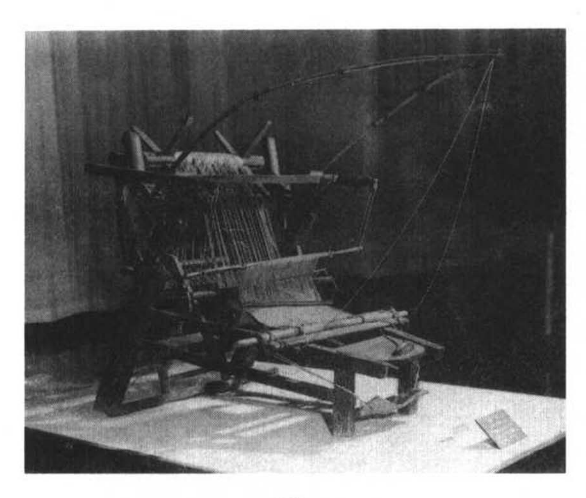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见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谈参传”条)。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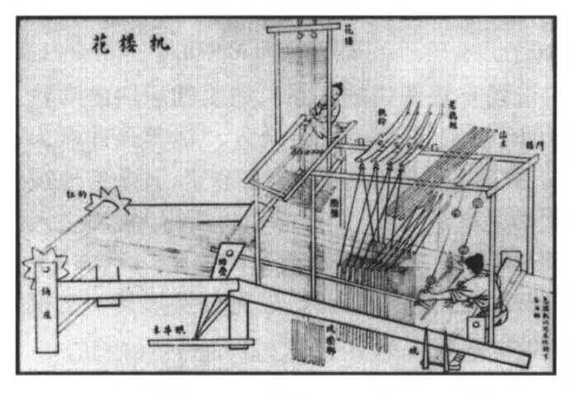
明代镀金铜佛塔

明朝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制瓷业中以吹釉法代替过去的刷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有利于烧制大型瓷器。采矿业较多地使用火药爆破技术,冶炼业则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活塞式木风箱。丝织业中改进了提花织机,使织品档次提高,更加富于变化。印刷业中铜活字普遍使用,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非常精美的彩图。明初沿袭元制,官手工业发达,工匠单立为匠户,世代不得脱籍。其中少量为在京的住坐匠,无工作自由,每月定期服役;大部分为各地轮班匠,轮流至京服役,四年一次,每次三月,往返路费自理,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朝中叶以后,工匠逐渐可以纳银代役,身份趋于自由。

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术界习称的“资



明代腰机



花楼机

本主义萌芽”。这方面较早的记载见于苏州丝织业。当地已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其中大部分仍属家庭手工业性质,但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织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见《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而且他们与雇主并无主奴、师徒一类依附关系,基本上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类似的生产关系,在明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中均有出现。一些商人插足于棉织、丝织生产,通过贷款、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等方式,以包买商的身份控制了一批家庭手工业者,将他们变成在家工作的雇佣工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在明朝仍然只是出现于局部范围的局部行业,尚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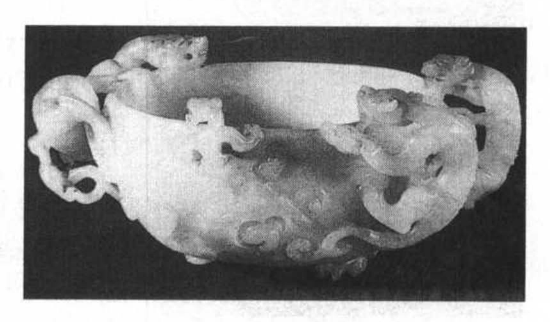
商品经济的繁荣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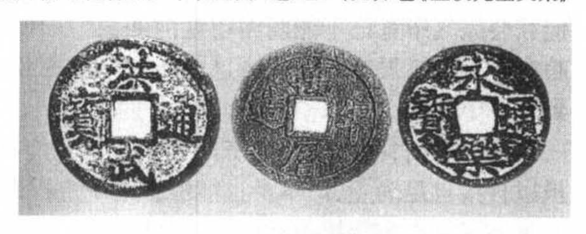
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白玉螭龙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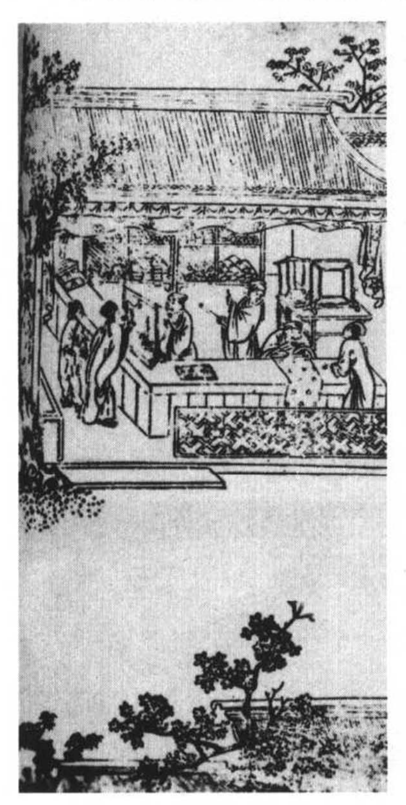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



明代钱币

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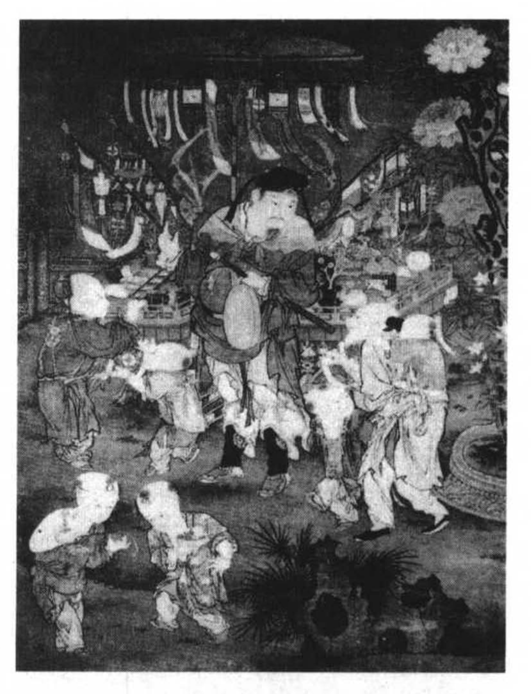


明代都市绸缎店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

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又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朝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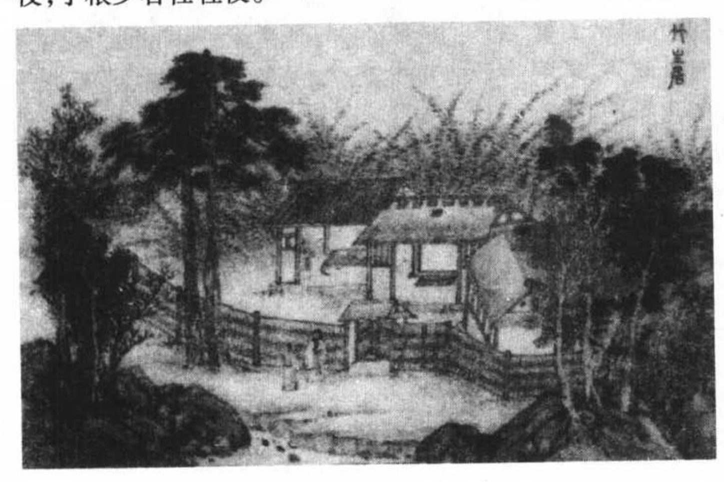
明人绘《货郎图》

赋役与户籍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以其为基础征发赋役。其中民户为国家常规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军户、匠户因已有军役、匠役的特殊负担，常规赋役可适度减免。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每110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黄册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更造，写明十年来各户人丁、财产的变迁，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了解户籍的变化，合理征发赋役。另外，还命各地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一州县中根据税粮多少划分为若干粮区，分别丈量其土地情况，详列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税则高低、田主姓名，编号绘制为分图，汇为州县总图册。鱼鳞图册和黄册互相配合，通过对耕地、户口两大要素的统计，实行户籍和赋役管理，在巩固明朝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到明朝中后期，黄册的更造渐成具文，地方官多简单照抄旧册予以应付，甚至提前预造以后十年、二十年的黄册，致使其上"人多百岁之

老，产竟世守之业”。鱼鳞图册的编绘也基本未再进行。

明朝的赋税征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纳米麦者称为“本色”，纳钱、钞、绢或以其他物产代输者称为“折色”。税率因地而异，有不同的“科则”，差别很大。为便于征收，各州县划分粮区，每粮区设置粮长一名，以地多纳粮多的大户担任，负责该区税粮的催征、验收和解运，同时也协助里长进行基层管理。役有正役，有杂役。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每年由里长一名督率一甲十户应役，称“见年”或“当年”，其余九里长与九甲人户在此后九年内依次应役，称“排年”。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通常是当地特产），支应官府公用等等。除此之外官府所派之役统称杂役，亦称“杂泛”，其名目、数量的伸缩性更大，主要包括官府差遣、仓库、驿递、土木工程等工作，粮长亦属杂役之列。杂役基本上是临时佥派，佥派标准则以黄册所载丁、粮状况为主，分为三等九则，丁粮多者任重役，丁粮少者任轻役。


明代《南村别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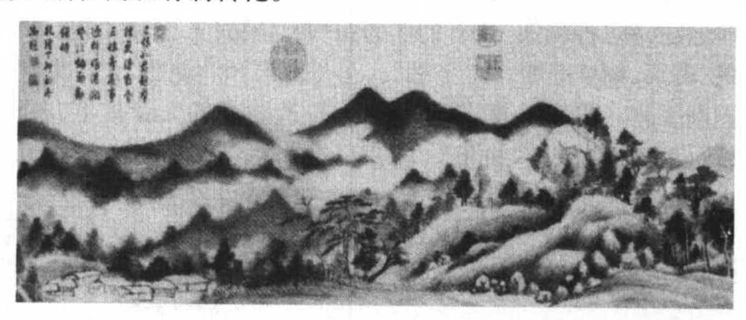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官绅大户百般逃避赋役，中下户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每至于破产流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赋役尤其是杂役差编之法繁琐混乱，胥吏上下其手，弊端丛生。改革赋役制度的要求日益高涨，很多地方官已开始因地制宜进行变革。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权，将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是即“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以简化赋役征发的项目和手续为基本原则，规定各州县以白银为单位通算每年的正、杂役费用，得出一个“役银”数目，然后“量地计丁”，即按照丁、粮两项标准将其分摊到每家每户头上，每粮一石征银若干，丁一人征银若干，最终与该户的田赋（亦折银）合并征收。此法归并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名目，征收手续简便，而且量出制入进行分摊，使民户预知缴纳数额，官吏不易作弊。赋役统一折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纳银代役，受到的国家人身束缚有所削弱，田赋折银则可免去运输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银征收标准也比以前佥役时更向田亩偏重，有利于无地少地的农民。因此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是张居正改革的一项主要成就。

随着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一系列改革，明初建立的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佥役无关，划分也因而比里甲更为灵活，每保所辖甲数和每甲所辖户数均不固定。保甲长的委派不论资产，而主要选用“才力为众所服者”。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财产状况和户籍类别。但里甲制并未取消，只是渐趋有名无实而已。

土地关系与依附关系

自宋朝“不立田制”以来，土地私有制已确定无疑地成为社会上土地占有的基本形态，明朝亦不例外。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土地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国有制残余，只是其国有性质并不完整，而且都逐渐在向私有制转化。

官田——明朝存在着一批原则上属于国有、租与百姓佃种的官田。其主要来源，一部分承自南宋末年贾似道强买的“公田”，一部分则是元、明两朝官府籍没的土地，也包括一些荒地。其“国有”性质的主要表现，是按租佃制下的地租比例向耕种者征收赋税，所纳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民田，官府册籍均概称之为田赋。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官田分布最为集中。据明太祖在位后期的统计数字，上述六府耕地面积仅占全国4%，而缴纳田赋数额却占到全国的22%，其中苏州府的亩平均赋额是全国的8.2倍。而官府对官田的管理只重赋额，对由何人耕种并不关心，因此耕种官田者事实上几乎等于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转佃。在时人看来，这些土地并非朝廷之田，只是一类特殊的重赋田。在不断的买卖、转佃之下，官田频繁转手，簿籍混乱，赋额大量积欠。政府被迫逐步采取改革措施，减轻官田所有者的负担，即在不减少田赋总额的前提下，将官田重赋的一部分转移到当地民田上面，称为“扒平官民田科则”，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田的私有化。万历以下，官、民田的分类逐渐消失，各地官田相继转化为普通的民田。



明人绘《书画合壁卷》

屯田——明朝屯田数量很大，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区分，均属国有，而以与卫所制度结合的军屯最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较好，基本解决了军队供给。中期以下，卫所制趋于瓦解，军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废，或是为军官侵占盗卖，十去五六。对一些濒于荒废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种、顶种，有的地方还允许耕种者“永远管业”，屯田已是名存实亡。崇祯时规定屯田无论军种、民种，一律按民田标准征税，等于完全将屯田废除。后来到了清朝，除在边疆和漕运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绝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转化成了民田。

庄田——明朝的一种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兼具国有、私有双重特点。其中包括皇庄(皇帝庄田)、王府(宗室)庄田、勋贵庄田、寺观庄田等种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其来源大部分为皇帝拨赐的官田，可以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有时还由朝廷设立机构代为经营，因此具有国

有性质。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侵占、购买或接受投献所得,仍可转卖。明朝后期,贵族卷入土地买卖的趋势日益严重,往往违制卖掉钦赐的官田。

有明一代,租佃制普遍存在于民间土地和官田、庄田等一部分国有性质土地之上,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依附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佃户与"凡人"同,地主对其实施人身奴役和虐待,在制度上属于非法。但事实上,佃户与地主之间总是程度不等地存有契约以外的依附关系。明初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仅亲戚之间例外(见《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耕种贵族庄田和官、绅地主土地的佃户,更是往往受到后者挟政治权势而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如额外加派,遇灾不免,代人包赔,承当差役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地主,也时常对佃户进行额外勒索。如出租土地时要求佃户先缴纳一笔抵押金,停租时退还,称"押租钱"。有的作为租种礼钱缴纳,停租不退,称"批田银"。于地租外勒索鸡鸭、蔬菜、柴草等物,称"冬牲"。另外还有预收地租、大斗大秤、送租上门、过期加息等多种剥削手段。明朝后期,在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佃户、奴仆等纷纷掀起"佃变"、"奴变",采取"抗租"、"霸田"等方式与地主斗争,推动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走向松解。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

佃户之外,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人身依附程度更重的社会阶层,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奴婢——是法律上规定的贱民阶层,主要从事家内服役,也有用于生产劳动者,不易区分。明初规定,只有贵族、官员方可蓄养奴婢,庶民之家不得蓄奴。实际上民间蓄奴者仍然很多,仅讳其名,称"家人"或"义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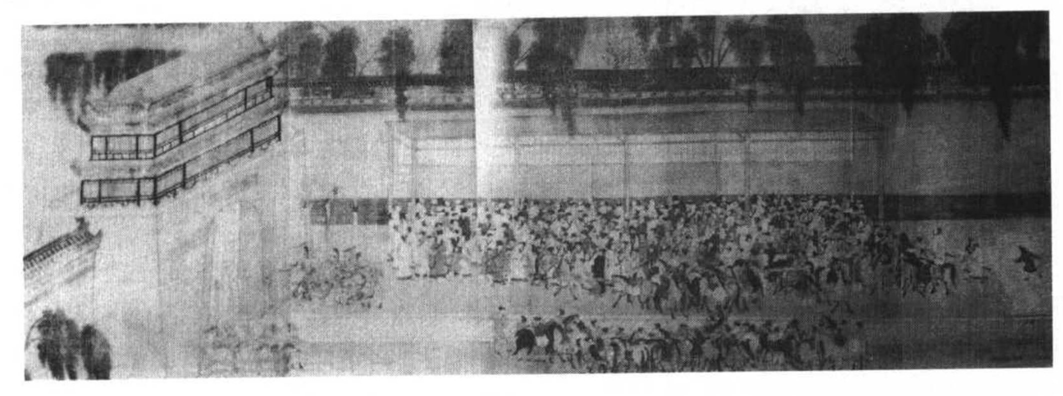
佃仆——是佃户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奴婢化的佃户。既与佃户一样佃田纳租,经济相对独立,又与奴婢一样与地主结成"主仆"关系,不得迁徙、脱业,要向地主提供繁重的劳役,甚至可以被随田或单独典卖,犯罪亦比照奴婢论处。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交通较闭塞、宗法势力较强的地区,尤以皖南山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宋、元世代传袭而来。

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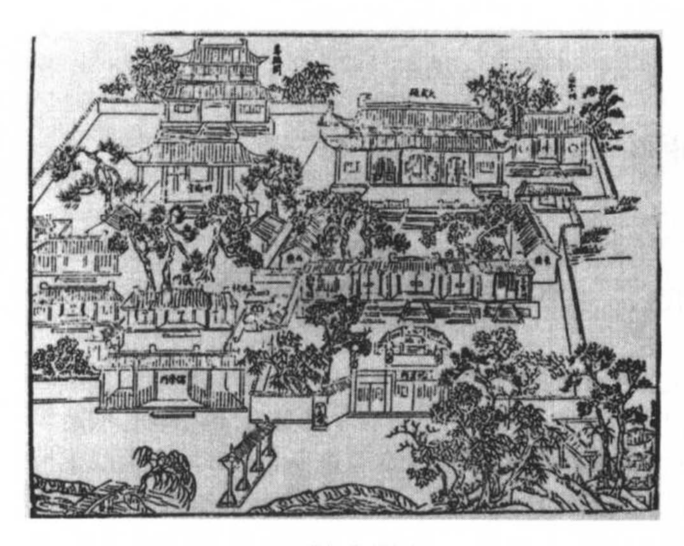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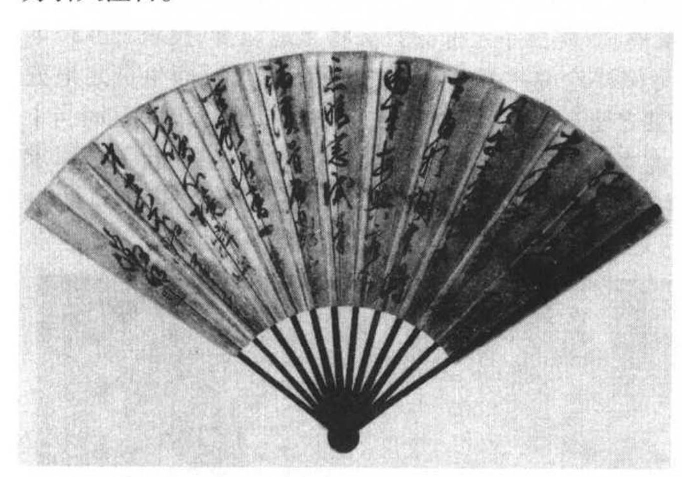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

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祇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文征明行书诗扇面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

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思想文化

心学祖师王守仁



王守仁



王阳明讲学处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号阳明,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谥文成。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守仁以"存天理,灭人欲"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

盗，益长刁顽”。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

王守仁因反对朝廷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此任上，他捕获一个强盗头目。在审讯时，强盗头目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你是大学问家，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信这个。”王守仁说：“好。今天我们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这么热，在审案前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强盗头目说：“好！”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便又脱了内衣。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一听说要脱裤头，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王守仁当即诱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羞耻感。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强盗头目心诚口服，便将自己的罪行如实供出。

王守仁不是军事家，但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又非一般将帅所及。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争夺皇位，发生叛乱。宁王反叛后，朝野震惊，许多将帅都束手无策。这时，王守仁挺身而出。王守仁所率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然而王守仁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胜，四十天竟大功告成，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儒生，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令人叹为观止。

“王学左派”与王艮

嘉靖、万历年间，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成为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



王艮纪念馆

之别。

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李贽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他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认为穿衣吃饭的问题即可说明，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

“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家境贫寒，只上过3年学，后跟随父兄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靠刻苦自学，王艮终于成为一名儒学大家，并形成了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谈解的平民学风。

王艮原来叫王银，据说王艮在拜王守仁为师时，王守仁认为他有些高傲，个性太强。为了使王银今后能谦虚谨慎，注意克制自己，就把他的名字“银”，改成了一个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从此就叫王艮。

王艮38岁那年，他从别人处了解到王守仁的思想，便去南昌找这位心学大师请教。结果，一番问对，王艮被王守仁的理论所折服，只好拜师称徒。可回头一想，王守仁的思想中也有与己不合之处，便后悔了。第二天早上，见到王守仁，便直言拜其为师有些轻率之意。王守仁一听，高兴地说：“你不轻易地相信盲从别人，太好了。”两人便展开论战，直到王艮心悦诚服。王守仁事后对门人们说：“当初我手擒叛贼朱宸濠也没有今天激动呵！王艮疑就是疑，信就是信，一丝不苟，你们都不如他啊！”

嘉靖元年(1522年)，为了宣传王守仁的学说，40岁的王艮辞别了王守仁，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辆古怪的蒲轮车，由两个仆童推着，开始向京城进发，路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四省，一路上讲学不辍，到达京城时轰动了整个京师。王阳明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开始独立授徒讲学。

王艮在接受王守仁学说的同时，注重“自得”之风，“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在理论上，其禅宗佛学色彩更为明显，故而对封建传统思想的破坏作用也更大；反对笃信谨守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反礼教和道学的斗士李贽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初名载贽，号卓吾。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1566年为避穆宗载垕讳，取名贽。他曾为官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因仰慕邵雍而筑室于苏门山百泉上，又号百泉居士。晚年居龙湖，号龙湖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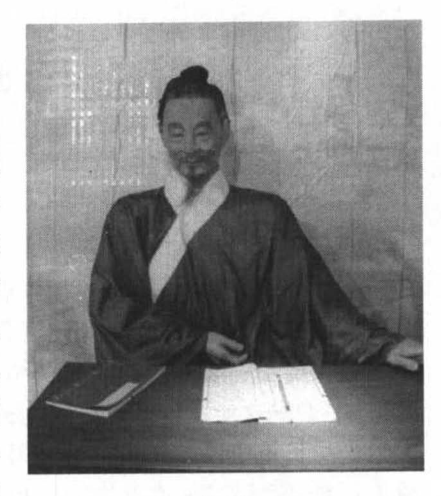
李贽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在共城任满，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父丧回家，三年服满后，进京候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补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1570年)，任满致仕，专心著述。

李贽在云南姚安县任知府时，曾在自己办公的厅堂挂了一副对联：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

李贽一生读书治学，从不中缀。70岁时，在麻城龙湖作《读书乐》曰：


李贽像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之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中身，朽者足骨。此独不朽，原与偕殁；倚啸丛中，其声振鹃。歌哭相从，其乐无穷！雨阴可惜，曷敢从容。

李贽在这首诗中，描绘了自己读书时的心情。对于李贽来说，读书就是生话，读书就是快乐。

李贽骨子里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李贽学说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那就没有是非了吗？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也不能随意夸大孔子的作用。

李贽认为道学家崇尚的“经典”是骗人的。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

李贽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明朝统治者把李贽的学说看做是“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加以销毁。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莫须有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镇抚司的狱中用剃刀自杀，结束了他七十六岁的生命。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四大奇书

在明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产生了号称中国四大奇书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优秀的长篇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由冯梦龙、李渔论定，经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批点，几百年来流传不衰，家喻户晓，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拥有众多读者。

《西游记》

《西游记》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曲艺、戏曲、话本等的创作，最后由吴承恩做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全书共 100 回，41 个故事，于 1592 年由金陵书商世法堂唐氏刊刻出版。

《西游记》主要描写唐三藏受唐太宗的委托，在徒弟孙行者(悟空)、猪八戒(悟能)、沙和尚(悟净)等人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故事。首先写孙悟空的出世，大闹天空，这是全书的最精彩部分；然后写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和玄奘奉诏取经的故事；再写取经正题，唐僧和他的徒弟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历尽艰辛，受尽苦难，以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化险为夷，实现取经的目的。《西游记》书中大部分人物以神怪妖魔的形象出现，通过他们的活动，展现了人间的美丑善恶。孙悟空艺高胆大，蔑视天纲，不畏艰险。唐憎分不清敌我，常常认敌为友；猪八戒害怕困难，私心很重，贪恋舒适生活。但他们与妖魔之间，有一道鲜明的界线，属于阵线分明的两个营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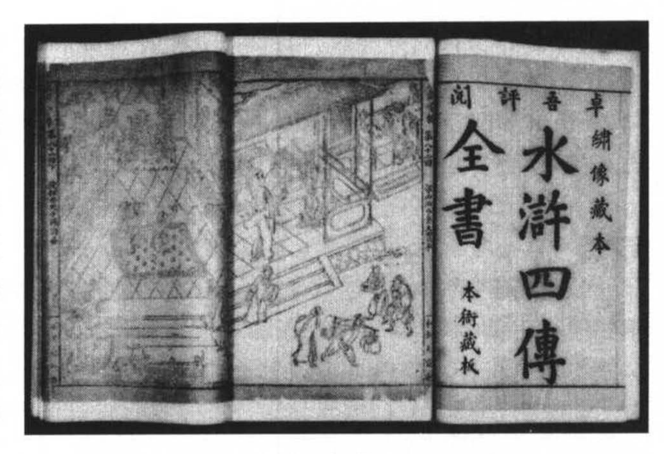
《西游记》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释道儒三教合流的思想体系，成功地将道教的天上、地狱和海洋的神仙体系与佛教的西天糅合到一起，并在同时体现“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的儒教思想。

《西游记》的成书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出现，因此也反映出对封建体系的不满，第一次提出“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的大胆言论。同时这本书对神仙体系的描绘正是作者当时生活的明朝政治社会的缩影。

《水浒传》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 36 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拿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宋末明初，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相继问世，最后，施耐庵把这些故事汇

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写成《水浒传》。《水浒传》如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



明刻本《水浒传》

《水浒传》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其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水浒传》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其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身份和经历刻划人物性格；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描写人物性格，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反衬法来凸显人物性格。《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吸取话剧本、戏曲中三国演义的精彩内容，再参照《三国志》的历史资料，再加上其他史书，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写成的。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剧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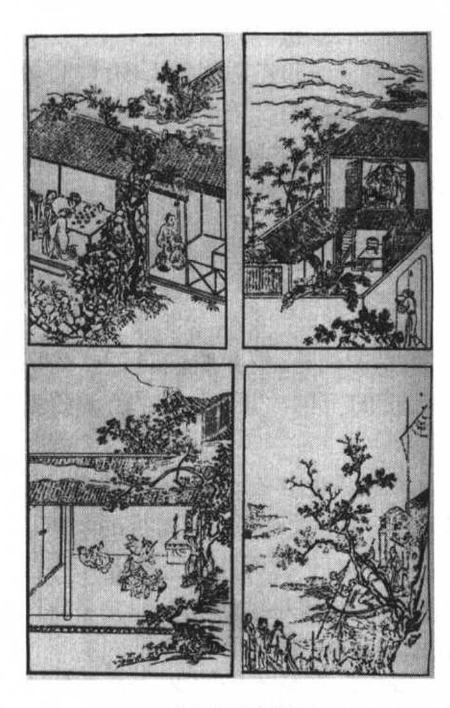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

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形象。

《三国演义》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40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

《三国演义》是一部"陈叙百年、赅括万事"的经世作品,以英雄豪杰作为话题,对演义中众多的英雄形象,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加以发挥和阐述,进而使中华民族传统的英雄观念得以发扬光大。问世以来,影响深远,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金瓶梅》



《金瓶梅》插图

《金瓶梅》成书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即山东峄县,书中运用大量的山东口语,故作者当为山东人,但没有真姓名。所以,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

在明朝的著名的四大奇书中,只有《金瓶梅》不以史书为依托,而是借《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并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的生活,通过写西门庆的家庭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腐败,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著名史学家吴晗说,《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逼真再现了16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鲁迅曾高度评价《金瓶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以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全方位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百姓所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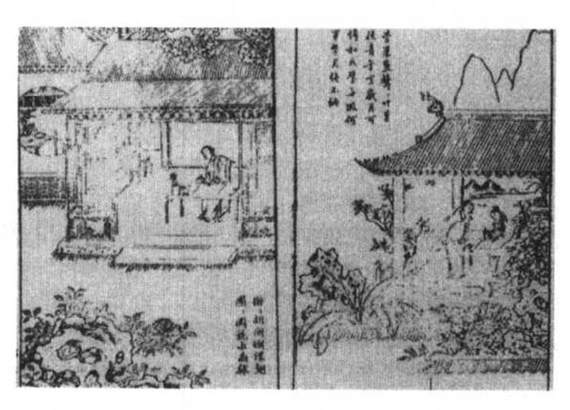
的一个现实社会世界，深刻地揭露了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机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展示了市井生活的广阔图景。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等淫乱。作者还描写了他认蔡京为义父，和太尉等大臣串通一气，鱼肉人民，作品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及其家庭罪恶生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增强了作品批判的深刻性。在艺术上，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的结构也颇为讲究，把复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严整有序。对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也很生动，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金瓶梅》语言酣畅明快、活泼生动，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同时，《金瓶梅》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年间，但作品的真正兴趣却是现实生活，所以写的多有明朝史实，从其生活的时代文化特征来考察，借宋写明无疑。

《金瓶梅》堪称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在封建社会，这部小说长期被禁，其被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淫书”，而是因为写了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腐败，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一部诽谤统治者的“谤书”。

《金瓶梅》中淫秽描写太多，使其美学价值受到严重损伤，如果洗刷掉《金瓶梅》淫乱的内容，它具有其他古典小说所不备的两重优点，这就是它既有近似于《红楼梦》的言情，又有近似于《史记》的谤书性质。从暴露封建社会专制黑暗这一点而言，《金瓶梅》不逊于《史记》、《水浒传》、《红楼梦》，尽管它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远不及《史记》与《红楼梦》。

“三言”与“两拍”

“三言”，即《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的合称，“两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由于“三言”和“两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后人将其合称为“三言两拍”，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很早就传入日本和欧洲，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文学遗产。



明崇祯本《醒世恒言》插图

“三言”的编著者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理论家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三言”共收宋元以来话本小说120篇，每集40篇。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编著"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认识深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冯梦龙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言"的内容很庞杂,有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王娇鸾百年长恨》、《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有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表现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愤怒谴责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也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行为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桂员外穷途忏悔》、《吴保安弃家赎友》等。

"两拍"的作者为凌蒙初。"初刻"和"二刻"各为40卷40篇,惟二刻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40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所以"两拍"实际共收小说78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两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这78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创作。凌蒙初所作的"两拍"大多有事实依据,但事实在作者的作品中只是一个创作的因由,作者凭借这点因由,充分发挥了艺术创作的才能。这种作品,在重视史实的中国读者看来,因为它有事实作根据,更具有可读性。

"两拍"主要取材于《太平广记》、《剪灯新话》、《夷坚志》、《齐东野话》等书,所本故事按时代来分,"初刻"含唐9种,宋7种,元6种,明13种,时代不明者5种。"二刻"含春秋1种,宋14种,明19种,时代不明者2种。"两拍"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的有《通闺闼坚心灯火》、《姚滴珠避羞惹差》、《同窗友认假作真》等,描写晚明商人经商生活的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描写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的有《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等。

"两拍"题材来源,大多有所凭借,但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一个影子,作品更近创作。"两拍"所着墨的是明末之际的市井故事,与"三言"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商业文明萌芽时期的一部纪录片,尤其是商品经济兴起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在"两拍"中占有较大篇幅,细致的心理变化衬托出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读来令人拍案。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唐寅(1470~1523),江苏吴县人,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字伯虎,又字子畏,号鲁国唐生,晚年好佛学,又号六如居士,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唐寅自幼天资聪敏,博览《四书五经》、《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喜爱绘画,拜名画家周臣为师,又与文征明同师沈周。16岁时参加童生试,经县试、府试、院试,高中第一名案首。弘治十一年(1498年)赴南京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故也有"南京解元"之称。次

年进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下狱，成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后来经吴宽保举出狱，他无辜受牵连入狱，妻子又改嫁，精神上备受打击。


唐寅绘《震泽烟树图》

由于仕途受挫，饱尝世态炎凉，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闽、赣，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大量从事绘画创作。唐寅的绘画以山水为主，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宋元之风，造景或雄伟险峻，或平远清悠，山石皴法以大斧劈为基，中锋行笔掺合"披麻"、"乱柴"诸法，风格独特。其作品烘染墨彩，更是随象多变，明洁滋润，巧妙无穷，世称"六如居上笔灵逸，洗其勾研，焕然神明"。其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堪称登峰造极。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其作品中常流露遭受打击后的忧郁之情和消极出世的思想。


唐寅绘《秋风纨扇图》

唐寅潇洒飘逸，傲世不羁，常常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说话做事常有惊人之处。某年春节，有个财主送给唐伯虎礼物，请他给写几个吉字，图个吉利。唐伯虎满口答应，来到财主家，"刷刷刷"写下："父死、子死、孙死"。财主怒不可遏，恼羞成怒，一把抓住唐伯虎："我哪点对不住你，你竟用这么恶毒的话咒我全家?"唐伯虎慢悠悠地说道："这是很好的祝福辞呵！一个家族的人如果是按这个顺序，父亲死了儿子死，儿子死了孙子死，那说明家里没有横死暴死的，每一代人都无祸无灾，个个都寿终正寝。这样的家庭能不幸福吗?"财主想想，这道理倒也对，只得把唐伯虎恭恭敬敬送走。

由于唐寅放荡无羁，又曾治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再加上其仕女画炉火纯青，故被后人误解，有许多风流传说，如"唐伯虎三点秋香"等。其实他坎坷一生，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贫困凄苦。"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过着以作画卖文聊补家用的穷苦生活。到了晚年，唐伯虎体弱多病，不能天天作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中断，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有时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来维持一家生活。更不幸的是，在这样拮据的生活环境里，她的妻子先他而去。妻子的死，使唐伯虎伤心欲绝，不久，这位杰出的书画家带着绝望，走完了他那坎坷的人生之路。嘉靖二年(1523年)，唐寅去世，是年54岁。临终，唐伯虎留下一首绝命诗：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它乡。

一代风流才子的终局，竟是这等凄惨！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像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出生于世代业医的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落榜之后,继承家业,走上了研习医药之路。他20岁开始学医,34岁时受聘楚王府,任奉祠正,管理祭祀礼节方面的事情。后被荐入京师,任朝廷太医院院判,不久告归蕲州,一面行医治病,一面编修《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历时27年(1552～1578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三易其稿。为了完成这一鸿篇巨制,李时珍涉猎群书,钻研文献近千种,作札记数百万字,广罗博采前人的著述和经验;多次离家远行,亲身实践,历尽千辛万苦,广泛收集单方秘方,精心编选,反复实践,就地采药,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本草纲目》集中药学之大成,立本草之新体系,纠本草之偏误,增前人未录之新品,阐明中药性味之理论,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收集的药物共1892种,收入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还绘制了1110幅插图。卷一至卷四是附录,收入序言、凡例、目录、附图、引用书目、资料及一些医药基础理论等。卷五以后是主体部分,李时珍把1800多种药物分为16部: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共计60类。其中植物1095种,动物340种,矿石357种。在药物解说方面,《本草纲目》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第二,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第三,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第四,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第五,主治,列举该药所能医治的主要病症;第六,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第七,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第八,附方,介绍以此药为主的各种验方及其主治。可谓条理清析,内容完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还驳斥了方士道家妄图通过服食炼丹求得长生不老的邪说谬论。


李时珍行医的湖北蕲州元妙观

《本草纲目》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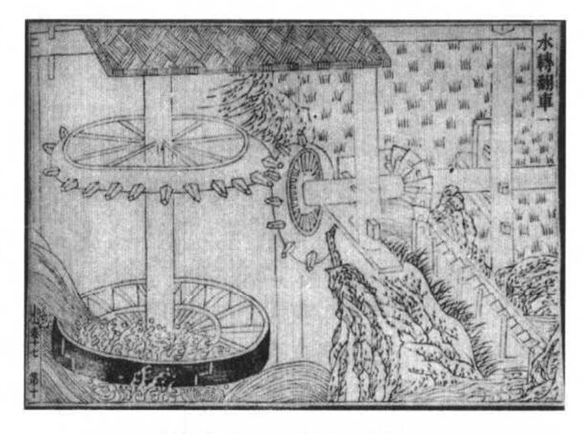
分类法：一是按照“从微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纲辖目，依首归类。《本草纲目》不但是一部总结我国2000多年来药物学知识和经验的巨著，而且是一部具备了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内容的巨著。


明代制药铜炉

作为一代名医，李时珍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他给许多穷人看病，都不收医药费。人们称赞他是“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同时，李时珍不阿附权贵，常常借自己名医之手愚弄权贵。他曾任四川蓬溪知县，后辞官回乡。相传，离职前，新任的县官为李时珍饯行。新知县要李时珍为其开一帖滋补单方。李时珍早闻新知县是“酒色财气”四全的昏官，便提笔开了一纸药方：柏子仁三钱，木瓜二钱，官桂三钱，柴胡三钱，益智二钱，附子三钱，八角二钱，人参一钱，台乌三钱，上党三钱，山药二钱。次日，新知县将药方交给师爷，让他去取药，师爷仔细一看，说：“李时珍是在骂你啊！”接着道出了其中奥秘，原来每味中药的第一个字组成一句话：柏木官柴益附八人台上山（薄木棺材亦附八人抬上山）。

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著的大型农业科学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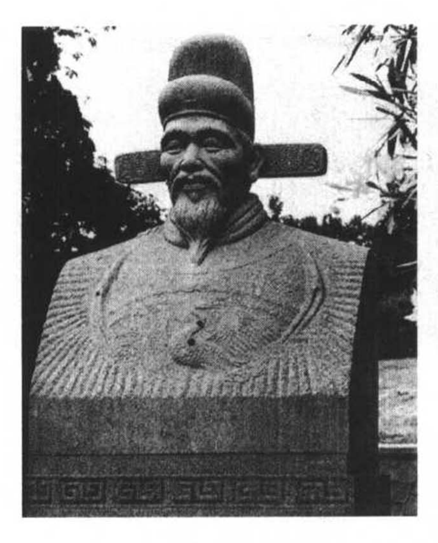


《农政全书·水转翻车》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徐光启自幼好学，经行万里，广咨博讯，20岁考取秀才，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农政全书》写于1625～1628年。徐光启写作此书时尚未确定书名，暂称为《农书》或《种艺书》。这本书的酝酿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到这时才系统地进行增补、审订、批点、编排等工作。编写成稿后，没有立即付刻。这部农书由其弟子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板付印，定名为《农政全书》，这时，徐光启已经离世6年了。

《农政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


徐光启墓

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农政全书》包容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等等，不仅是17世纪以前中国农学的总结，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外来的农业知识。

《农政全书》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全书征引的文献达200多种，可谓“杂采众家”。

《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要重视备荒、救荒等荒政。在农业技术方面，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倾其毕生精力钻研农业科学。《农政全书》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

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古今史籍、舆地及山海图经。22岁起，他决定外出旅行，历时30余载，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沿途历尽艰险，将观察所得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


徐霞客像

《徐霞客游记》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这些日记，后经季会明等人整理成书，成了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世传有10卷、12卷、20卷等多种版本。主要按日记记述作者1613～1639年旅行观察所得，对沿途的地理、水文、地质、动植物均有详细的记载，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其中，有关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特征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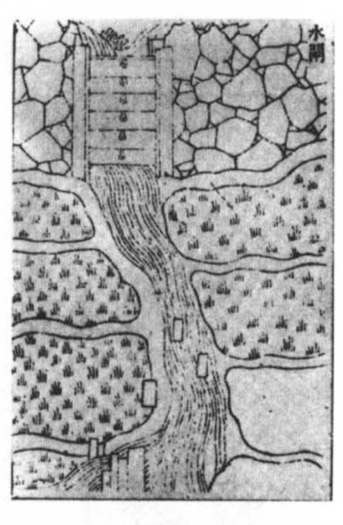
形成原因的探讨,早于欧洲人两个世纪,尤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另外,游记的文笔清丽新奇,记述精详真实,既是一部科学巨著,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游记》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被世人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徐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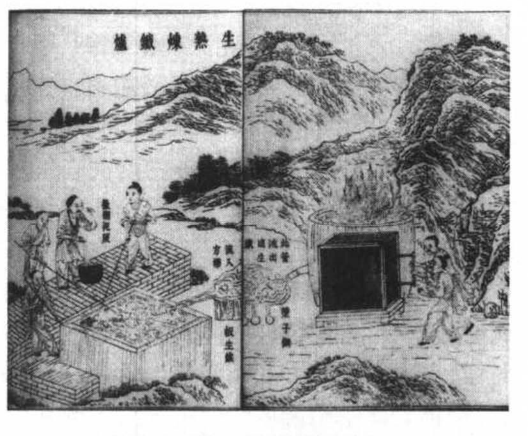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江西、福建、安徽为官,明亡后,弃官回乡。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写成《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上、中、下3部,原有20卷,只刊刻18卷,分别叙述了有关我国古代农业、纺织、制糖、冶铸、造船、酿酒以及制造火药、兵器等物品的生产过程。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从民用机械到国防武器,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应有尽有,内容广博,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巨著。宋应星因此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天工开物·水闸》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资助刊刻。《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卷先后顺序的安排依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卷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卷,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卷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尤其可贵的是,书中附图123幅,包括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机、大型浇注锤锻千斤锚、阶梯式磁窑、玉石加工磨床等。所绘内容,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立体感强,依其图样与数据,即可将所绘的各种机械设备重新制造出来。



《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

《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载了有关炼锌技

术，其中介绍了密封加热法，解决了锌极易氧化的难题，也记载了铁矿石变成钢的生产过程，完全符合现代钢铁生产原理。书中还介绍了防治稻田八大灾害的方法，至今仍然在农村中广泛流传和应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冷浸田使用骨灰蘸秧根，是我国使用磷肥的最早记录；利用不同品种蚕蛾杂交而生出“嘉种”，是我国利用杂交技术改良蚕种的最早记录。书中记载的精巧复杂的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载的锌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天工开物》是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是保留我国科技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书，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我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教士的宗教和科学活动



利玛窦像

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使东西新航路畅通，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传教士东进的高潮。一时间，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在中国积极从事宗教活动，但最终，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宗教本身。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作为传教工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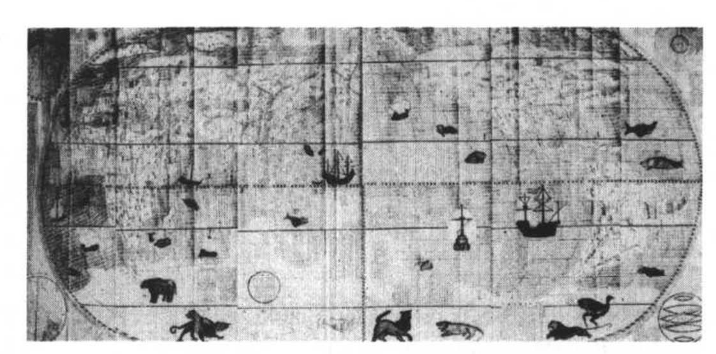
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先驱。1541 年，沙勿略从里斯本出发到了印度和日本。在日本，他感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便决心访问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 年 4 月，他离开印度果阿前赴中国。但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沙勿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到中国，但也失败了，年底，沙勿略染上疟疾，不久便去世了，年仅 46 岁。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开始以此为据点，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

1582 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经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居住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此后，利玛窦在中国寓居 28 年，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万历十一年(1583 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拉上了关系，

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利玛窦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他利用在意大利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后来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游历十多年，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徐光启等人。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所进呈的自鸣钟非常感兴趣，甚至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就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还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被称为“合儒”、“补儒”、“趋儒”。为了博得士大夫的信任，他用15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被称为“西儒利氏”。他一面教学，一面传教，他甚至用中文写成《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经过数年的努力，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当时名士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袁宏道、杨廷筠、瞿太素一批官员和开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坤舆万国全国》



《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

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中，著名的还有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和李文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在天文学方面，传教士龙华民协助完成了《崇祯历书》的修撰。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庞迪我的《职方外纪》等都给中国带来了地理知识。为了大规模测算，传教士们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使明末出现了一个科技发展与交流高峰。

明朝的灭亡

李自成和张献忠

明朝末年，各地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地瘠民贫、生产落后的陕北也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率领陕北澄县饥民冲进县城，杀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汇合。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为“闯王”。在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涌现出两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

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二十一日，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祖辈世代务农。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在穷伙伴的帮助下，他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赶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准备逃跑。




明人绘《饥民图说·饥民逃荒》

李自成平时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于是他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起义军，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等投奔高迎祥。由于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再加上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因此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将，号称“闯将”。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与李自成同岁，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

陕北的一系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军。在明军剿抚兼施的进攻形势下，陕西战场的起义军除壮烈牺牲的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有的则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三十六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自此由分散作战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起义军势力的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的破产，主抚派杨鹤也因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后来，王自用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继续作战，但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河南省渑池县突破明军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积蓄力量，继续战斗。渑池突围的胜利，不但使起义军未被消灭，反而变被动为主动，对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农民起义的严重威胁，明朝政府于崇祯七年（1634年）末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北等省官兵。次年，明朝政府又调兵七万二千余，准备在六个月之内消灭起义军。为了迎击明军，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会上，回民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遭到张献忠等人反对。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这一战略思想得到大会赞同，于是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二路向西阻挡陕西明军；三路屯兵荥阳、汜水一带，扼守黄河；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



李自成雕像

荥阳大会对粉碎明朝的军事围剿乃至推翻明朝统治起了重大作用。高迎祥、张献忠等在豫鄂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陷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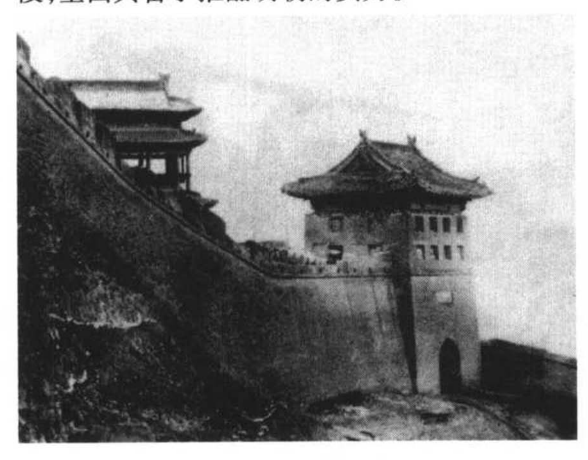
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起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

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分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退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张献忠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

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攻占洛阳，杀死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在谷城再次起兵，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襄阳，镇压了襄王。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

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大军相互应援，分别在川陕和河南战场与明军作战。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李自成则从洛阳转入湖广作战，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下襄阳，次年，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此后连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县）、孝感、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基本上消灭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据河洛取天下”。

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受到各地人民热烈欢迎，军事上，逐渐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术，派遣将领分守所克城邑，严密军事组织，把军队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种，形成营队两级编制，战术上步骑配合的良好局面：骑兵诱敌，步兵拒战，然后骑兵包抄合围，攻城时则骑兵布围，步兵冲锋，昼夜三番轮攻。同时，他又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这表明起义军已由流动作战阶段进入阵地战阶段，全面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



潼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十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势力进一步壮大，把西安作为攻打北京的基地。然后，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克太原，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从北面威胁北京。另一路起义军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渡黄河攻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分取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从南面威胁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从昌平围

攻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十九日李自成率兵进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统治被推翻。

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当时，明朝残余势力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部队，也是起义军的心腹大患。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很快出现奢侈腐败的严重情况；而且出于对农民起义军仇恨的地主阶级本性，吴三桂投降满洲贵族，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

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双方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地主阶级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称帝，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的计划，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另一说李自成脱逃，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得以善终。


李自成曾用来处理政务的故宫武英殿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后，政治上，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通天历》，并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经济上，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一百二十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据了四川省全境。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可惜的是，在这期间，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大军之间因种种原因产生了矛盾，再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其势力逐步走向衰落。当时，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并攻打汉中，但却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对抗，另一方面和清军作激烈的斗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朝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进入川北。

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但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二岁。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后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父吴襄，字两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像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胜少。然而，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屡投机，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政府，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

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早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暂时失去了倚靠的对象，为了寻找新的主人，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同时，李自成也派人到吴三桂军中劝降，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势力对比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一些措施，使得吴三桂的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后不久，从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对俘获的明朝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

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而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则表示与李自成起义军彻底决裂。


陈圆圆像

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吴三桂之妾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但是，这一事件的确是触发吴三桂叛李降清的偶然因素。明末，封建士大夫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起义军合作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生存，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敌对状态，因此，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吴三桂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机会呢？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吴三桂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相当强烈的，此刻，吴三桂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是否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多次劝吴三桂投降，但都被吴三桂拒绝，在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吴三桂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朝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实施他的联清击李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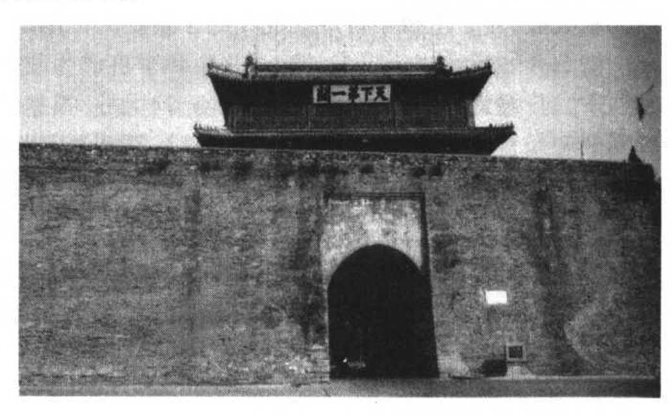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人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

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主力进行火并，吴三桂则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但是，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

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难以扭转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吴三桂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城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



山海关东门城楼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行抵关门之时，发现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知道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一来，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黎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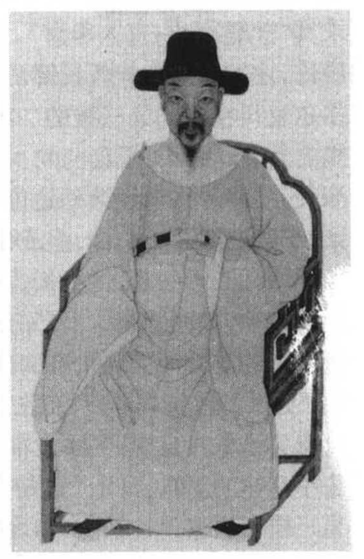
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剃发归顺清皇朝并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给清朝。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另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当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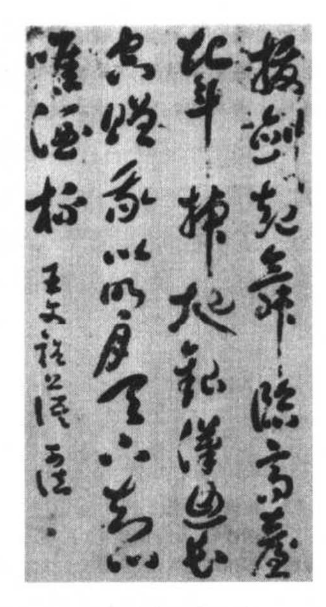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史可法像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史可法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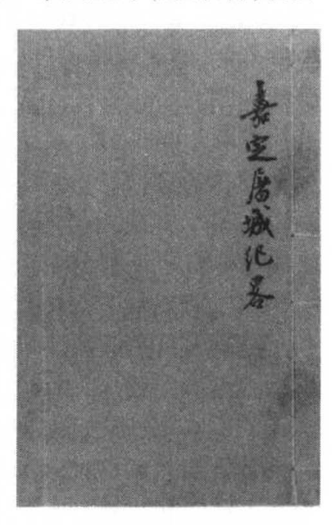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

"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

孙可望与李定国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一说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投奔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等地。李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二十四岁时,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一起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并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派兵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不幸战死,大西军数十万众溃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到达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孙可望、李定国等鼓动部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死曾英,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大西军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并向贵州进军。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在贵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向岭南发展,在沿海与清军周旋,李定国则主"复明"。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拔出战刀自刺抗争,众将领也一致表示同意联明抗清,孙可望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

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随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明朝原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建议孙可望称帝,李定国等不同意。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目中无他,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为防止分裂,听从白文选劝告勉强同意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从此,两人矛盾公开化。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与南明永历政权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朱由榔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李定国对此很不满。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然而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湖南后,翌年又攻占桂林,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清顺治八年(1651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可望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南明永历政权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走。

清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并答应每年向南明永历政权"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同时,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并准备实行科举考试。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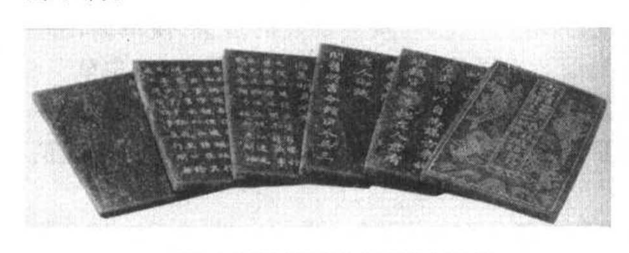
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孔有德军队。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取得了桂林大捷。

这之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八月，李定国以明朝原巡抚徐天佑镇守桂林，自己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军闻风而逃。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又取得了湘桂大捷的胜利。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战果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

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清顺治四年(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明末名士黄宗羲曾称赞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



《吴三桂擒桂王朱由榔论》书影

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他擅自改变作战计划，与李定国处处作梗。清军早已得知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和，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孙可望的部队在宝庆相遇。由于骄傲轻敌，孙可望被清兵杀得大败，急忙逃往峒江，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李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累累战果，可惜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清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鄘迎接大西军入粤，广东的抗清烈火又被点燃。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于六月主动致书当时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明将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孙可望不仅不帮，反而派兵想趁势置李定国于死地，好在李定国早有防备，孙可望未能得逞。经过几年的内部争斗，孙可望于清顺治十

四年(1657年)以十余万大军进攻李定国,但广大将士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孙可望日暮途穷,投降了清军,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在狩猎途中死去。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李定国退至孟艮(今云南边境),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当时,清朝命吴三桂等人统兵入缅。清康熙元年(1662年),缅甸人将朱由榔献于吴三桂,后来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篦子营。李定国得知朱由榔被俘,回兵勐腊,仍遣人往车里借兵,以为持久抗清之计。但营中人马死者相继,李定国亦病,复闻朱由榔凶信,更加愤懑,于六月二十七日死于勐腊,临终时遗命其子:“任死荒徼,勿降也!”

后　记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朱元璋创建大明到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77年的兴衰。如果再加上南明政权的21年,明朝有近300年的历史。

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朝代,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朝代,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朝代,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朝代……我们这里试图以优美的文笔和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展示一轴明朝历史的写实画卷,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它的皇帝、后妃、宗室、内阁,它的宦官、将相,它的城市、宫苑和陵园,它的宫廷倾轧、民族争斗、思想文化……

本书由北京大学教授拟出大纲,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孙景峰博士组织历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编写。参加撰稿的有:孙景峰、李金玉、孟轲、李国峰、马瑞红、龚建伟、李平等。

本书在写作时,程度不同地参阅了国内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并不是在这里署名的几位作者的成果,而是大家共同心血的结晶,在此谨代表本书的署名作者和广大读者致谢。

著者

2005年5月30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正说明朝三百年
作者=孙景峰　李金玉等著
页数=272
SS号=11494606
DX号=
出版日期=2005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